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说明

本卷选载恩格斯 1884—1895 年的著作和《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2—1895 年的书信。

1884—1895 年这一时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入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斗争加剧，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无产阶级为未来的革命战斗正在积聚力量。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并得到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团结加强，80 年代末成立了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即第二国际。

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同时由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由于工人贵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机会主义倾向也增长了。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负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他为进一步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关心和支持《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并撰写序言；他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本卷的首篇著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系统而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

恩格斯把他的著作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因为马克思曾打算根据美国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撰写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恩格斯在写作《起源》时广泛地利用了他的战友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和批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并补充了大量的材料。在 1891 年问世的第 4 版中，他又根据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重要的修订。

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他的著作是以两种生产的思想为基础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见本卷第 2 页）

恩格斯在探索家庭的演变时，说明家庭的形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的。他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家庭血缘关系曾对社会制度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作用逐渐减弱，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就被受所有制支配的社会所代替。他细致地考察了家庭从最早的群婚制发展到一夫一妻制的过程，揭示了这些变化取决于生产方式。他说明了妇女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地位的原因，并证明妇女的真正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

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产生的过程。这就推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私有制的观点，证明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到处存在着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所有制，人类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了几千年。而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相联系的。《起源》描述了私有制的出现怎样导致财产不均，人对人的剥削，导致对抗阶级的形成。恩格斯证明这个过程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恩格斯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他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见本卷第 170 页）恩格斯在分析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特征和实质时写道，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见本卷第 172 页）。他说明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也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它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还指出，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恩格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而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阐明了 1848—1849 年民主革命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特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把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无产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必须在积极参加争取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始终坚持自己的最终目的。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是关于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一部出色的简史。它指出了革命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开始是和科学共产主义分不开的。这就批驳了当时那种把德国独立的工人运动源于拉萨尔 1863 年创立的全国工人联合会的观点。《同盟史》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期间提出的策略原理，这有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与普鲁士当局进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它虽是为评丹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卡·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但也是出于工人运动的需要而写的。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有一定程度的复活，由于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日益流行，就需要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终结》阐述了哲学的对象和功能、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性，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理论，首先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并说明这些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同时概要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中两大阵营根本对立的原理。他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见本卷第 223 页）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存在、自然界是本原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凡是断定思维、精神是本原的，属于唯心主义阵营。恩格斯强调，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术语，否则就会造成混乱。同时他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存在和它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

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么“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见本卷第225页）。

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剖析，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是人类思维的伟大成就，指出它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他同时揭示了这种方法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使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分裂成两派，一派特别强调黑格尔体系，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成为保守派，另一派认为辩证法是主要的东西，企图从辩证方法引出革命的结论，但他们也无法使黑格尔学派免于解体。出路在于回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此，他“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见本卷第222页）。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对当时思想界起了解放作用。可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有局限性，他在否定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同时，抛弃了它的辩证法，而且没有克服在社会历史观点上的唯心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见本卷第241页）。恩格斯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见本卷第243页）。它又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彻底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在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

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唯物史观的实质。他在阐述唯物史观时，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指出历史发展不同于自然界的发展，它表面上受偶然性支配。我们的任务是要发现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规律。他说明了经济关系是历史过程的基础，它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同时强调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另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著作是《自然辩证法》。它由10篇论文和大量札记和片断组成，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断断续续花了十多年时间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他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证明：“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见本选集第3卷第349—350页）

恩格斯研究了著名自然科学代表人物近百部的著作，对自然科学获得的大量实际材料进行了概括，并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作了分析。本卷收

入了 6 篇论文和 46 个札记和片断，内容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物质运动形式以及一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

恩格斯依据自然科学史的广泛材料，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材料，说明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实践和生产的需要。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积累的材料数量很大，这就需要对获得的成果进行系统的概括，并建立各门科学互相之间的正确联系。而自然科学自身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必须求助于哲学。他写道：“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见本卷第 308 页）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见本卷第 259 页）“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见本卷第 284 页）这就提出了自然科学家自觉地掌握辩证法的必要性。

恩格斯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根本对立，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见本卷第 259 页），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他把辩证法的规律表述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见本卷第 310 页）。他着重研究了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辩证逻辑问题，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是支配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他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认识的辩证过程、判断的辩证分类、归纳和演绎的辩证关系、假说的作用等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恩格斯研究并阐述了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分类，说明了物质运动形式和相应的科学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分析了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学预见，如原子的可分性、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性、电运动的物质基础、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等。有些预见后来得到科学的证明。

恩格斯还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阐述了劳动和工具的制造在人的形成和人类社会诞生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见本卷第 373—374 页）。这样他就克服了单纯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人的产生的片面性。他论证了劳动活动在猿变成人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分析了劳动、思维和语言在这一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劳动活动作为环境改变和人自身改变的统一这一辩证性质，并根据对历史上达到的环境改变所作的剖析，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立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合理形式提出了基本思想。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和顾问，恩格斯十分关心各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及其存在的问题，各国工人党也总是向他请教。本卷相当一部分文献反映出恩格斯对欧美一些工人政党发展的热情关怀以及向它们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美国工人运动》是恩格斯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版写的序言。他首先驳斥了在美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生根的错误论调。他说明，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美国的工人运动也必然会蓬勃开展起来。他仔细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即亨利·乔治领导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各自的弱点，指出把美国分裂的工人组织联合为一支具有临时纲领的全国性工人大军是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主要条件，这种联合是朝着创建独立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步，并指出这个政党的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见本卷第 394 页），也就是说，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

恩格斯批评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这个党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但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针对这个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外国移民，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担负起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使命，“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见本卷第 394 页）。

1890 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二月选举中获得很大的胜利，这次选举的结果实际上已宣告反社会党人法的破产（虽然它在形式上仍然有效），标志着俾斯麦时代的结束，3 月，俾斯麦宣布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向该党提出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查策略的问题。本卷收入的《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就涉及这个问题。

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持有“左”倾立场的青年派无视客观形势的变化，否认利用议会活动的重要性，责备党信奉“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并且把冒险主义的策略强加于党。他们还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文章，宣称恩格斯支持他们的观点。恩格斯在《答复》中，深刻地批判了青年派的理论和实践，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指出忽视实际条件的冒险策略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见本卷第 398 页）。恩格斯还提出党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条件，他说：“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见本卷第 399 页）

在 1890 年二月选举后，党的领导机构迁至柏林，并准备把《柏林人民报》改为中央机关报，因此同年 10 月 1 日当时在伦敦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停刊，恩格斯为此写了这封告别信。他明确告诉读者，党在目前应把合法斗争方式提到首位，“现在帝国政府又想再试一试用普通法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也想再试一试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见本卷第 402—403 页）。但他同时强调：“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见本卷第 403 页）

恩格斯的《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社会主义政党在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恩格

斯尖锐地批判了在党的报刊上散布的机会主义幻想，即认为像德国那样的反动专制制度的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见本卷第 412 页）。他指出，根据德国特殊条件，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和政治要求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但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没有否定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认为这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才有可能。

恩格斯在这一文献中还对机会主义的实质下了十分明确的定义，指出机会主义“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 412 页）。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状况时，恩格斯批评纲领草案中关于无产者的贫困越来越增长的论点，提出工人的组织和斗争“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见本卷第 408 页）。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即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越来越为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而为托拉斯所排挤，而托拉斯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为有计划的生产创造了可能性。

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中，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的请求，发表了他对意大利社会党的策略的意见。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整个形势，说明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远未成熟。由于意大利工业很不发达，无产阶级人数很少，革命的基本力量首先是农民和日益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发生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告诫社会党人对可能发生的革命运动不能袖手旁观，而应积极参加，否则，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指出社会党人“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作是沿着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见本卷第 454 页）。同时他提醒社会党人要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保持警惕，他说：“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见本卷第 455 页）恩格斯还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一般策略原则虽是正确的，但怎样把它们运用于意大利，这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1892 年恩格斯为他于 1845 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第二版写了一篇序言，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他指出自己在 40 多年前所描写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认为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他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必须节约时间和劳动，“时间就是金钱”。工厂主也不再使用那种打小算盘的赚钱的方法，于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被通过了，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工厂主在与工人的斗争中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

的存在和力量，鼓吹和平和协调。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因此，“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第 421 页）。恩格斯还提到，英国资产阶级 40 多年前采用的剥削手段，英国工人阶级那时的悲惨处境，在 90 年代的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仍可看到。恩格斯还叙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工人阶级贵族产生的条件以及它的危害性，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见本卷第 430 页）

恩格斯为他的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新版所写的跋中，进一步分析了 20 年来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实了文章的思想。他指出那种认为公社能够自动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想法是一种空想，说明：“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见本卷第 442－443 页）恩格斯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不过这只有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但是，恩格斯指出，在他写这篇跋的时候，俄国的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它“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见本卷第 450 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俄国村社也已经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如果俄国发生革命，这“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见本卷第 450—451 页）。

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这封贺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掌权后需要大量的专家，他写道：“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见本卷第 435 页）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问题的著作。文章对基督教的产生原因和演变及其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根据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说明基督教在产生 300 年之后怎样从奴隶和被释奴隶的宗教、从奴隶社会中被压迫群众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剥削者国家的官方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工具。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文献，它对社会主义者制定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制定对待农民的

战略和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写这一著作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工人党的纲领中包含一些在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论点，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领导人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修正主义的言论。

恩格斯强调指出，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应当特别重视在劳动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因为这部分群众几乎到处占居民的大多数。社会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见本卷第 485 页）。他对农民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把农民分成小农、中农和大农三种类型。他把对小农的态度看作是解决整个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强调必须把劳动农民和占有雇工的剩余价值的农民严格区别开来，指出正是劳动农民，即农业工人、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是工业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甚至可以与大农、中农、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结成暂时的联盟，但坚决反对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他说：“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见本卷第 494 页）

这篇著作阐述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认为小农合作化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道路，他写道：“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见本卷第 499—500 页）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国家决不能对小农进行剥夺，而是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见本卷第 498—499 页）。他强调建立合作社时必须遵守自愿原则，必须对小农采取耐心的态度，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见本卷第 500 页）。他还指出，为了使这个过渡易于实现，无产阶级国家还应当给合作社提供资金、机器、化肥等方面的帮助。这样做“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见本卷第 501 页）。

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和中农，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出路只能是“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见本卷第 503 页），并认为对他们也可能不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而对于大土地占有者，恩格斯则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当剥夺他们，就像剥夺资本家一样。但这种剥夺既可以采用没收的办法，也可以采用赎买的办法，这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的态度。

本卷的最后一篇著作《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包含关于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思想。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根据历史经验和对 19 世纪最后 20 多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新现象的分析，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前景的思考。

恩格斯回顾了他和马克思在 1848—1849 年以及《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持的立场时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巴黎工人的六

月起义，他们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表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见本卷第 510 页），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见本卷第 512 页）。他还谈到，即使在巴黎公社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他对以往的一切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原则的区别，指出后者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进行的，只能是真正大多数人革命，“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见本卷第 521 页）。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就必须进行长期而坚持不懈的工作。

恩格斯分析了自巴黎公社以后 20 多年来的变化，指出一方面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了思想上的胜利，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大军形成了，另一方面，军事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军国主义增长了，常备军数量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暴力机构加强了。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建立议会制的国家，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普选权有重要意义。他要求在资产阶级合法的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巩固无产阶级组织并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对德国的革命民主党人利用普选权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了高度评价：“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见本卷第 516 页）但恩格斯决没有把普选权和参加议会这些斗争形式绝对化，把它们看作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的主要斗争形式。他指出，尽管社会主义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这并不是说就不能使用其他斗争形式，而且反动派的行动可迫使无产阶级采用其他的非和平的方法，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自己的革命权。

恩格斯告诫社会党人要警惕反动势力的挑衅，不要发动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因为这样做，“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见本卷第 524 页）。他指出，在现代武装力量的条件下，以往那种防御性的街垒战术很难奏效，将来的巷战只有在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势力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他还以暗喻的方式强调党要在军队中开展工作，把很大一部分军队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大部分是摘录），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它们不仅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重要补充，而且对一些原理进行了新的探讨或发挥。

本卷收入的书信中，哲学问题，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占有重要的位置。马克思 1846 年 12 月 28 日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可以说是他从 1847 年 1 月起开始撰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简要草稿。它深刻地分析了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物质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它们的矛盾运动导致社会革命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还阐述了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动力的思想，并对分工、所有制、垄断、竞争等概念进行了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给约 魏德迈的信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的无阶级的社会制度

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的学说。他高度评价了以往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李嘉图、奥·梯叶里、弗·基佐、约·威德等人在研究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方面的功绩，并阐明了他自己对阶级斗争学说增添的新内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见本卷第547页）

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10月27日）、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的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着重论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他自己一向认为，物质的生活条件，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们归根到底决定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但是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对物质条件，对经济运动发生反作用。他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见本卷第695—696页）"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见本卷第728页）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有"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见本卷第701页）。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可以起与这种发展反方向的作用，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或使其沿着特殊方向前进。在后两种情况下，国家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他还指出，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见本卷第705页）恩格斯还揭示了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发展规律，说明了意识形态领域依赖于经济的特殊性质。他在阐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还提出了社会历史运动是社会生活各种因素的合力的思想。

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时，论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认为任何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出现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造成的。"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见本卷第733页）

恩格斯在1872年1月14—15日给卡·特尔察吉和1872年1月24日给泰·库诺的信中，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并论述了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他写

道：“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作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见本卷第 606 页）“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见本卷第 608 页）

马克思 1877 年 11 月 10 日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十分明确表示他和恩格斯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见本卷第 628 页）

本卷收入的书信中有一些反映了马克思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他与恩格斯研讨经济学的情景以及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一丝不苟的态度。马克思 1868 年 1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他自己的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区别，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中崭新的因素：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提出劳动的二重性，说明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马克思 1866 年 10 月 13 日、1868 年 7 月 11 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论述了自己出版《资本论》的计划，阐述了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以及这一规律的实现形式问题，指出任何社会生产都需要在各个生产部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见本卷第 580 页）马克思 1868 年 1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这一问题。

恩格斯 1893 年 1 月 24 日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分析了交易所这个新现象，论述了它的实质、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指出“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见本卷第 719 页）。因此，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但是交易所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对工人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恩格斯在 1895 年 3 月 11 日给威·桑巴特和 1895 年 3 月 12 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阐述并解释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关系、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平均利润的形成等问题，从而也就驳倒了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某种矛盾的荒谬论点。恩格斯批评康·施米特把价值规律说成是虚构的错误观点，指出“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

己的概念。”（见本卷第 744 页）一般利润率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只是作为许多企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如果我们想要求利润率……在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为虚构，那我们就严重地误解了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见本卷第 745 页）恩格斯在给威·桑巴特的信中指出：“在交换之初，当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花费在两种物品上的劳动，正是它们在数量上进行比较的唯一标准。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实现停止了，现在不再有这种情况了。我认为，对您来说，不用费什么事就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将这种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后一种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见本卷第 743 页）。

本卷收入的书信中有不少涉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凭空想和主观愿望来预测未来社会，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反对把社会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社会，强调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未来社会。1881 年 1 月 6 日荷兰工人运动领导人斐·多·纽文胡斯写信求教于马克思，请他回答如下的问题：如果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马克思 2 月 22 日在回信中写道：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见本卷第 643 页）英国社会主义者爱·皮斯请求恩格斯简要地叙述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在 1886 年 1 月 27 日给爱·皮斯的信中对此婉言拒绝，指出“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见本卷第 676 页）。1890 年 8 月 21 日恩格斯在给奥·伯尼克的信中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见本卷第 693 页）1890 年 8 月 5 日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谈到《柏林人民论坛》1890 年 6—7 月间就未来社会中产品分配问题展开的讨论时写道：“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

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见本卷第 691 页）这些思想对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 1886 年 1 月 20—23 日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谈到了无产阶级掌权后发展合作生产问题。他写道：“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他接着说道：“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见本卷第 675 页）

恩格斯 1881 年 2 月 1 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他写道：“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至于那时人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这不必预先加以指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见本卷第 641、64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书信还包含对民族殖民地问题、妇女问题和文学艺术问题的重要论述。马克思在 1869 年 11 月 29 日给路·库格曼以及 1870 年 4 月 9 日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阐明了爱尔兰的解放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意义。他要求坚决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他认为，如果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不与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不与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英国工人阶级在本土就永远不会有所作为。恩格斯 1882 年 9 月 12 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阐述了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而“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见本卷第 649 页）。恩格斯晚年仍然十分关心中国问题。在 1894 年 11 月 10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他谈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指出这次战争必然会打破中国的闭关自守，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写道：“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见本卷第 737 页）

马克思 1868 年 12 月 12 日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高度评价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见本卷第 586 页）恩格斯 1885 年 7 月 5 日左右给盖·吉约姆-沙克的信中指出：“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见本卷第 67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就文艺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观点。马克思 1859 年 4 月 19 日和恩格斯 5 月 18 日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指出拉萨尔不懂得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

展动力的作用，批评他突出 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小贵族阶级和市民阶级的作用，而漠视农民和平民阶级的作用，批评他把以骑士济金根为首的贵族反对派描写成革命思想的真正代表，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的错误（见本卷第 555 页），对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见本卷第 559 页）。马克思提出在文艺创作中不应当“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见本卷第 555 页）。恩格斯指出文艺创作应当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他还提到文艺创作中的“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而且人物的这些动机应当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见本卷第 557、558 页）。恩格斯 1885 年 11 月 26 日给敏·考茨基的信中批评她在《旧和新》这部小说中把塑造的人物理想化了，这样，人物的“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并再次指出文艺创作中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他写道：“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见本卷第 673—674 页）恩格斯 1888 年 4 月初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赞扬她的小说《城市姑娘》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作品，同时批评她的小说还不够现实主义，她把工人阶级描写成消极的群众。恩格斯写道，这样的描写，“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 50 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他还对现实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见本卷第 683 页），并以巴尔扎克的作品为例说明了现实主义和典型人物、细节的真实性和典型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贯强调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他们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始终反对对他们的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这一点在书信中也有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批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时指出，他们认为只要把理论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见本卷第 677 页），“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见本卷第 681 页）。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还强调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意义，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见本卷第 692 页）；“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见本卷第 688 页）。恩格斯 1885 年 4 月 23 日在给维·查苏利奇的信中强调要把正确的原

理与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见本卷第669页）。他认为自己对俄国的情况知之甚少，不能对采取什么具体策略作出判断。恩格斯1884年2月4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批评杰维尔那种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经济学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的错误做法，指出那些原理如果离开了一定的条件就会是不正确的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论述，为我们如何对待他们的理论，如何学习和领会他们的著作，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

1884年第一版序言

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正如德国的职业经济学家多年来热心地抄袭《资本论》同时又顽强地抹煞它一样，英国“史前史”科学的代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①]，也用了同样的办法。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①]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引用。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而他的著作也并非一日之功。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40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补充的。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在这里，摩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关于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77年版。该书在美国刊印，在伦敦极难买到。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28—571页。——编者注

德意志人的章节——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义的赝品[1]。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最后，凡是没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作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

写于 1884 年 3 月底—5 月 26 日
载于 1884 年在苏黎世出版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第 29－31 页

1891 年第四版序言[2]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版者[1]早就请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做这件事。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文本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将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在]

因此，我仔细地校阅了全文，并作了许多补充，我希望在这些补充中恰如其分地照顾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序言里，我将把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而在其他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中于效尤英国。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译成意大利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阅，1885 年贝内文托版。后来译成罗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安·纳杰日杰译，载于 1885 年 9 月至 1886 年 5 月在雅西出版的《现代人》杂志。以后又译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格尔松·特里尔 1888 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腊韦从德文本版译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

在 60 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详尽的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实际上就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诚然，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它们彼此并立而没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于说在古代历史的个别民族中间，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间，世系不是依照父亲而是依照母亲计算，因此，女系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间，某些相当大的集团（那时还没有被详细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而且这种习俗，在各大洲都可

---

[1] 爱·奥·弗里曼《比较政治》1873 年伦敦版。——编者注

[1] 约·狄茨。——编者注

[在] 《新时代》3 刊载的文本里，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这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经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出版界来说仍然是非常罕见的”。——编者注

见到，——这种种事实诚然已经是众所周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甚至在爱·伯·泰勒所著的《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1865 年版）一书[1]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看作“奇怪习俗”，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滑稽怪事相提并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 1861 年，即从巴霍芬的《母权论》[1]的出版开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1) 最初人们实行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淫游婚[Häterismus]”来表示；(2) 这种关系排除了任何可以确切认知的父亲，因此，世系只能依照女系——依照母权制——计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见，高度的尊敬和威望上升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Gynaikokratie）；（4）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就是说，实际上侵犯了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暂时有限地献身于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从他极其勤奋地搜集来的无数段古代经典著作中，为这些论点找出了证据。由“淫游婚”到专偶婚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希腊人中间——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挤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内部；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日益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克丽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为按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论中。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明确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1]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那个女凶手的丈夫，也是可以赎罪的，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她们的职务只是追究血缘亲属中间的谋杀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这时，阿波罗出来作奥列斯特的辩护人；于是雅典娜就把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

---

[1] 爱·伯·泰勒《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 年伦敦版。——

[1]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 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1]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编者注

——雅典娜的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判刑的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战胜了依理逆司神，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的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最美好精彩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像当年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用父权制推翻母权制的奇迹。显然，这种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观点，归根结蒂必然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绝非始终值得的事情。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降低他开辟道路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性关系杂乱的毫无所知的原始状态的空谈，而证明古代经典著作向我们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希腊人及亚洲人那里，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必须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外人，以赎买实行个体婚的权利；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计算；女系的这种唯一有效性，在父亲的身分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此以后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现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湮没无闻。1865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貌似有理的推论。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么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找到足够的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1865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作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作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僵硬的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对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以至一切场合，那么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

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血缘亲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这毫不相干，因为这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有关系。他说，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男子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几个男子共有一个妻子，即一妻多夫制；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于是，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计算，这就是母权制。部落内部妇女缺少——这缺少虽然由一妻多夫制所缓和，但并未消除——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落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一妻多夫制既是起于同一原因——两性数目的不等，那么我们就应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亲方面来认知血缘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 年版。《原始婚姻》第 124 页）[4]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没有理解这个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的更早的个别记载——这些正是麦克伦南的材料来源，莱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加尔人[5]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 年版），并且说，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还在 1847 年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 1851 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6]中也证明了在这个民族集团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一点上，像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照女系计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 through females 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依照女系计算，但亲属关系也依照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用语，就继续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麦克伦南的理论，虽然好像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来，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值得注意的是，（假装的）抢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系〈应该说依照男系计算的世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突出，最明显”（第 140 页）。

而且，他又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据我们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并存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杀婴的习俗。”（第 146 页）

这两点都是事实，是和他的说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加混乱的假说来解释。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响应：在英国，麦克伦

南被普遍认为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个领域的第一个权威。他那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虽然人们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任何不抱成见的通观这一研究领域、从而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进步都成为不可能。鉴于在英国，而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个事实，即他那纯粹理解错了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

而不久便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法装进他的理论的小巧框框中去的事实。麦克伦南只知道三种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个体婚制。但是一当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不发达的各民族中间，存在过一批男子共同占有一批女子的婚姻形式；而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870 年版[①]）则认定这种群婚（Communal marriage）是历史的事实。

紧接着，在 1871 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那种特殊的亲属制度，乃是美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陆，虽然它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级是直接矛盾的。他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问题和表格，了解有关其他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情况，他从答案中发现：（1）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许多部落，并且以略有改变的形式，流行于非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2）这种制度，在夏威夷及其． 他澳洲岛屿上正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说明。（3）但是，在这些岛屿上，与这种婚姻形式并存而流行的亲属制度，则是一种只有用更为原始而如今业已消失的群婚形式才能说明的亲属制度。他把所搜集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同发表在他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 年版）[②]一书中，因而把争论转移到更无比广大的领域里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之相应的家庭形式，这就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追溯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如果这个方法能够通用，麦克伦南的精巧设计就要烟消云散了。

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1876 年版）中起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他自己只根据假说完全人为地编造出一套家庭史，却要求拉伯克和摩尔根不仅要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提出证据，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苏格兰法庭上才会要求的那种不可争辩的确凿证据。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同一个人，却根据德意志人中的舅甥之间的密切关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20 章），根据凯撒关于布列吞人每 10 个或 12 个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记述，根据古代著作家关于野蛮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记述，毫不犹豫地作出结论说，所有这些民族都盛行过一妻多夫制！这就好像在听这样一位检察官讲话，他在起诉时可以信口开河，然而却要求辩护人每句话都要有最明确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他断言群婚是纯粹的想象，这样，他便比巴霍芬落后了许多。他认为，摩尔根所说的亲属制度，乃是纯粹的社交礼仪的规则，并拿印第安人把异族

[①]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 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 年华盛顿版。——编者注

人、白种人也称呼为父亲或兄弟这一事实作为证明。这正如某人因为人们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也称为父亲和母亲，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会员和英国同业公会会员在庄严的集会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说父母、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总之，麦克伦南的辩护是极端软弱无力的。

不过他还有一点没有被攻破。他的全部体系所依据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不仅没有被动摇，而且甚至被公认为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们承认，麦克伦南试图给这个对立所作的解释是不够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举出的一些事实相矛盾。不过这一对立本身，即存在着两种相互排斥的独立自主的部落，其中一种是在本部落以内娶妻，而另一种则绝对禁止这样做，却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请参看例如日罗-特隆的《家庭的起源》（1874 年版），甚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82 年第 4 版）[①]。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 年版）[②]（本书即以这部著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 1871 年仅仅模糊地推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发挥出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完全可能一度到处盛行，——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么包括了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满足于此。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帮助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式。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对于迄今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来说都是一个谜，如今可以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史前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确切些说，所窃取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肯公开承认，这一观点上的革命恰恰应该归功于摩尔根。在英国，人们对他的书尽可能保持沉默，而对他本

[①]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82 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 年伦敦版。——编者注

人则只是以宽大地称赞他以前的成绩来敷衍一下；对他的叙述中的细节尽力吹毛求疵，而对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却顽强地闭口不提。《古代社会》的第一版已经脱销；在美国，这类书没有应有的销路；在英国，这本书看来是一贯受到压制；这本划时代的著作的唯一还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译本。

这种冷漠态度很难不令人想到是一种共同蓄意采取的沉默抵制行为，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那些公认的史前史学家的著作中充满了仅仅是出于客气而作的许多引证，以及其他对同行表示尊敬的证据，就更会使人这样想，——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对于英国的史前史学家极其难堪的是，他们尽管在热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赞扬，但是在整理与分析这种材料所必要的一般观点方面，一句话，在他们的思想方面，却求助于两个天才的外国人——巴霍芬和摩尔根呢？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还可以容忍，但是对一个美国人怎能容忍呢？在美国人面前，每个英国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可笑的例子。[7] 何况麦克伦南可以说是官方任命的英国史前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史前史学界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规矩，只能以莫大的敬意谈论他那从杀婴经过一妻多夫制、抢劫婚姻到母权制家庭的人工编造的历史理论；对于绝对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的存在稍有怀疑，便被视为放肆的邪说；这样，把所有这些神圣教条打得粉碎的摩尔根，就是犯了某种渎圣罪。加之，摩尔根在打破这些教条时，又是用一经说出便立即人人明白的方式；因此，一直茫然彷徨于外婚制与内婚制之间的麦克伦南的崇拜者，现在简直要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大叫起来：我们怎么会这样愚蠢，自己没有老早把它发现出来呢！

如果说这些罪过还不足以使官方学派非把摩尔根冷漠地撇在一边不可，那么他还有一个实在太过分的地方，就是他不仅用类似傅立叶使用的方式对文明，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评，而且还用了卡尔·马克思才能说的话来谈论这一社会的未来的改造。所以，摩尔根就罪有应得，麦克伦南忿然地责难“他根本厌恶历史方法”[①]，而且日内瓦的教授日罗-特隆先生在 1884 年也重申了这一点。可是要知道，这位日罗-特隆先生在 1874 年（《家庭的起源》）还是束手无策地徘徊于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宫中，全仗摩尔根才被解救出来！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 14 年了，这 14 年间，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职业的史前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观点。结果，摩尔根有一些假说便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甚至可以说，越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将越来越获得大家的公认。[①]

[①] 约·弗·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76 年伦敦版第 333 页。——编者注

[①] 我于 1888 年 9 月从纽约返欧途中，遇到一位罗切斯特选区的前国会议员，他认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分住在罗切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 年 6 月 16 日于伦敦

载于 1890—1891 年《新时代》杂志第 2 卷第 41 期和 1891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46—259 页

的兄弟是个上校，曾在华盛顿国防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介绍，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加以关注，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期间，也曾多次帮过 摩尔根的忙。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大的时代，是跟生活来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8]。

家庭的发展与此并行，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的划分没有提供这样显著的标志罢了。

1.蒙昧时代

1.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在这种原始状态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2.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我们把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算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各大洲，就是这种迁徙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就提供了新的食物，这就是在热灰或烧穴（地灶）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和块茎，以及随着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像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从未有过；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此后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处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上。

3.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如果把已经知道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摩尔根认为向野蛮

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术开始）的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韧皮纤维做成的手工织物（没有织机），用韧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已经使人能够用方木和木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进步，这些印第安人虽然已经使用弓和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2.野蛮时代

1.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同样可以使用。

在此以前，我们可以很一般地把发展过程看作适用于一定时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土坯（即用阳光晒干的砖）和石头开始。

我们先从西大陆说起，因为在这里，在被欧洲人征服以前，不论什么地方，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

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凡是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看到的都属于这种印第安人），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园圃里种植玉蜀黍、可能还有南瓜、甜瓜及其他园圃植物的某种方法，这些东西构成他们食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住在木造的房子里，村落用木栅围起来。西北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的各部落，尚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他们既不知道制陶术，也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种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谓普韦布洛印第安人 [9]，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鲁人，当他们被征服时，已经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住的房屋是用土坯或石头造成的，类似城堡，并且在人工灌溉的园圃内种植玉蜀黍和其他各种依所住地区和气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这些东西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他们甚至已经驯养了某几种动物：黑西哥人饲养火鸡及其他禽类，秘鲁人饲养羊驼。而且，他们还知道了金属的加工——唯有铁除外，因此他们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在这里似乎直到这一时期的晚期还不为人所知。牲畜的驯养和

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雅利安人中间，家畜的名称还是共通的；而栽培植物的名称却几乎完全不同。

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闪米特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奥克苏斯河及药杀水、顿河和第聂伯河的草原上。动物的驯养，最初大概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因此，后人便以为游牧民族是起源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根本不会是人类的摇篮，相反，对于人类的祖先蒙昧人，甚至对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人，都几乎是不适于居住的。反之，一旦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了游牧生活以后，就永远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沿河平原自愿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林区去了。甚至当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继续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时候，要不是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的和欧洲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们的牲畜，特别是在这里过冬，那他们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起初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种族的卓越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有利影响。的确，不得不几乎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上，食人之风正在逐渐消失，仅仅当作一种宗教活动或巫术（在这里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着。

3.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10]时代的诺曼人[①]，都属于这个阶段。

首先，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铧的用牲畜拉的犁；有犁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野农业，从而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从而也能够清除森林使之变为耕地和牧场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不可能大规模进行。但这样一来，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内。而在田野农业产生以前，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 50 万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 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有过。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凯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11]跟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

[①]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 而是“凯撒时代的德意志人（或者是我们更爱说的，塔西佗时代的德 意志人）”。——编者注

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

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二　家庭

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间度过的，这种易洛魁人现在还居住在纽约州；他并且被一个易洛魁人部落（塞讷卡人部落）接纳入族。他发现，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们的实际的家庭关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在易洛魁人中间盛行的，是一种双方可以轻易解除的个体婚姻，摩尔根把它称为“对偶制家庭”。因此，这种夫妻的子女，是众所周知和大家公认的；对谁应该用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兄弟、姊妹等称呼，是不会有疑问的。但是，这些称呼的实际使用，却与此矛盾。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把自己亲生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他为父亲。他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则称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称他为舅父。反之，易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概都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她为母亲。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则称为自己的内侄和内侄女，她自己被称为他们的姑母。同样，兄弟的子女们互称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们也互称兄弟姊妹。而一个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则互称为表兄弟和表姊妹。这并不是一些空洞的名称，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和辈份的观点的表达；这种观点是一种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达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系。不仅如此，这种亲属制度不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德干的达罗毗荼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无变更地实行着。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和纽约州的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用来表达亲属关系的名称，即使现在，也还有 200 种以上不同的亲属关系是相同的。所以在印度的这些部落中间，正和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一样，从现行家庭形式中产生的亲属关系，也是同亲属制度相矛盾的。

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由于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种族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像例如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含糊过去。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说明终于找到了。在桑威奇（夏威夷）群岛上，本世纪上半叶还存在着一种家庭形式，这种家庭所产生的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姊妹、儿子和女儿、舅父和姑母、外甥和外甥女、内侄和内侄女，正好同美洲及古印度人的亲属制度所要求的一样。然而，好奇怪！夏威夷群岛上流行的亲属制度，又是同当地事实上存在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的。因为，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无例外地是兄弟姊妹；他们不仅被看作自己母亲及其姊妹或自己父亲及其兄弟的共同的子女，而且毫无区别地被看作自己双亲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的子女。由此可见，如果说美洲的亲属制度，是以在美洲已经不存在，而我们在夏威夷确实还找到的比较原始的家庭形式为前提，那么，另一方面，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向我们指出了一种更加原始的家庭形式，诚然，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现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加以证明，但是它一定是存在过的，否则，就不会产生相应的亲属制度。摩尔根

说：

“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同样，——马克思补充说，——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12] 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超过它了。不过，正像居维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骨胳的骨片，来确实地断定这种骨胳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里曾经生存过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

刚刚讲过的那些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现在所盛行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孩子有几个父亲和母亲。按照美洲的亲属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与它相适应的），兄弟和姊妹不能成为同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反之，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以通常都是这种情形的家庭为前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系列家庭形式，这些家庭形式，同那些迄今习惯上认为唯一通行的形式正相矛盾。传统的观念只知道有个体婚制，以及和它并存的一夫多妻制，至多还有一妻多夫制，同时，正如满口道德的庸人所应当做的那样，还把实践偷偷地但毫不知耻地逾越官方社会所定的界限这一事实隐瞒起来。反之，原始历史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作大家共有的子女；这种状态本身，在最终分解为个体婚姻以前，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联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

摩尔根在这样考证过去的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多数同行一致，也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①]。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决没有追溯到杂乱性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追溯到晚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的化石，即在落后的蒙昧人中间，我们未必可以找到它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了。巴霍芬的功绩，就在于他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作为考察的中心。[①]

[①] 以下直到“血缘家庭……”（本卷第 33 页）那一段以前的文字，都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中增补的。1884 年版中是：“这种原始状态的发现，是巴霍芬的第一个伟大功绩。从这种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以下几种家庭形式。”——编者注

[②]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 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①] 巴霍芬把这种原始状态叫作淫游婚[Het(rismus]，从而表明，他是 多么不了解他所发现的，或者正确些说，

近年来，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已成时髦了。人们想使人类免去这一“耻辱”。在这里，人们不仅以缺乏任何直接的证据为口实，而且还特别引用其他动物界的例子；从其他动物界里，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 年版）搜集了许多事实，表明完全杂乱的性关系即使在这里也应该属于低级发展阶段。但是，我从这一切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它们对于人类及其原始生活条件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脊椎动物长期的成对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说明，例如在鸟类中，是由于雌鸟在孵卵期间需要扶助；在鸟类中存在的忠实的专偶制的例子，对于人类丝毫不能有所证明，因为人类并非起源于鸟类。如果严格的专偶制是各种美德的最高峰，那么优胜的棕叶就应当属于绦虫了，因为绦虫在其 50—200 个关节或体节的每一节中都有完备的雌雄性器官，终生都在每个体节中自行交合。而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哺乳动物，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切形式——杂交、类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个体婚制；所缺乏的只是多夫制，这一点只有人类才能做得出来。甚至我们的近亲——猿猴类，在雌雄的配合上也显露了种种可能的差别；如果再缩小范围，仅仅考察一下四种类人猿，那么在这里勒土尔诺只能说，它们有时是专偶制，有时是多偶制，而从日罗-特隆的著作来看，索绪尔则断言它们是专偶制。[13] 最近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1891 年伦敦版）关于类人猿是专偶制的断语，也远不能作为证据。总之，现有的材料都是这样一种性质，以致诚实的勒土尔诺承认：

“不过，在哺乳动物中，智力发展的程度和性关系的形式之间，根本没有严格的关系。”[①]

而埃斯皮纳斯（《论动物的社会》1877 年版）则率直地说：

“群是我们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大概是由家庭构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在对抗之中，它们是以反比例发展的。”

从上述情况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关于类人猿的家庭集团及其他共居生活集团还几乎没有丝毫确定的知识；现有的材料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甚至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蒙昧人类族系的一切材料，也是十分矛盾，十分需要严格考证和精选的；而观察猿猴社会，比观察人类社会，还要困难得多。因此，凡根据这样绝对不可靠的报告而作的任何结论，我们都必须加以屏弃。

反之，上面所引的埃斯皮纳斯的命题却给了我们一个较好的论据。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埃斯皮纳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忌妒是怎样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

“在家庭紧密结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群差不多是自动地形成的……为了使群能够组成，家庭的纽结必然要放松，个体必然要重新自由。因此，我们在鸟类中才

他所猜到的东西。希腊人使 用淫游婚这个名词，是表示未婚男子或过个体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 的女子的性关系；这种淫游婚，总是以一定的婚姻形式的存在为前 提，在这个婚姻形式之外发生这种性关系；并且包含着至少是一种 可能性的卖淫。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过，我和摩尔 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巴霍芬的极端重要的发现，到处都 被他的幻想——即认为历史上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起源于 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而不是起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弄得 神秘化了，令人难以置信。

[①] 沙·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 年巴黎版第 41 页。——编者注

极少见到有组织的群……反之，我们在哺乳动物中之所以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组织的社会，正因为个体在这里没有被家庭所吞没……所以，群的集体感在其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说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发展起来，那么这只是由于它把遭受了彻底变化的家庭容纳于自身之中才能发生；这并不排除，这些家庭正是由于这一点以后才有可能在无限优越的环境中重新组成。”（埃斯皮纳斯《论动物的社会》；转引自日罗-特隆《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 年版第 518—520 页）

由此可见，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有某种价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忌妒，既联结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忌妒，作为共居生活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最多不过是，其进一步的发展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正在努力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一种没有武器的动物，即使互相隔绝，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马克根据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情况那样，也是能够以不多的数量生存下去的。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用现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根本无法解释向人类的状态过渡；这种类人猿给我们的印象，勿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轨的旁系。只此一点，就足以驳倒由它们的家庭形式类推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的任何论调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忌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较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忌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动物所没有的。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复杂的条件，以致必然使我们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蒂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这样，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就使我们恰好回到这些引证本来要使我们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上去了。

那么，杂乱的性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规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忌妒所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溃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忌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血亲婚配的观念，也是如此。不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经是夫妇，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今日在许多民族中也还是允许的。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 年版第 1 卷）证明，白令海峡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亚克岛上的人、英属北美内地的提纳人，都有这种关系；勒土尔诺也提出了关于印第安赤北韦人、智利的库库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岛的克伦人的同样事实的报告；至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关

于帕提亚人、波斯人、西叙亚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必说了。在血亲婚配尚未发明之前（这的确是一种发明，而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发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所引起的憎恶，并不大于其他不同辈的人们之间的性关系；而后者即使今日在最市侩气的国家里也还在发生，而且并不引起多大的惊骇；甚至年逾 60 的老“姑娘”，如果她们十分富有的话，有时也可以嫁给一个 30 来岁的青年男子。不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最原始的家庭形式上抛弃那种与它们连在一起的血亲婚配的观念，——这种观念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是跟它们直接冲突的，——那么我们就得出一种只能叫作杂乱的性关系的形式了。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一片混乱。短时期的成对配偶决不是不可能的，正如在群婚制中，当时的多数情况也是成对配偶那样。所以，如果说韦斯特马克（他是最近的一个否认这种原始状态的人）把两性在生孩子以前一切成对同居状态，都叫作婚姻，那么就应该说，这种婚姻完全可以在杂乱的性关系状态下发生，而它跟杂交状态，即不存在习俗规定的对性关系的限制的那种状态不相矛盾。当然，韦斯特马尔克是从如下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

“杂交状态包含着对个人爱好的压抑”，因而“卖淫是这种状态的最真实的形式”[1]。

而我却以为，只要还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便永远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我们在研究群婚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

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1.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份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子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的这一阶段上，也自然而然地包括相互的性关系。[1]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

---

[1] 爱·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1891 年伦敦—纽约版第 70—71 页。——编者注

[1] 恩格斯在 1884 年版上加了一个注：“马克思在 1882 年春季所写的 一封信 14 中，以最强烈的措辞，批评瓦格纳的《尼贝龙根》歌词中比 比皆是的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曲解。歌词中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 妹妹做新娘？’15 瓦格纳的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现代方式，用一 些血亲婚配的事情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此 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 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补加的注文：“瓦格纳的一位法国友人和 崇拜者，不同意这个注，说在瓦格纳所根据的《老艾达》中，在《厄革 斯德列克》中，洛基就曾指责弗莱雅说：‘在诸神面前，你拥抱自己的 哥哥。’可见，兄弟姊妹婚姻在那时候已经被唾弃。不过，《厄革斯德 列克》乃是对古代神话的信仰已经完全丧失的那一时代的表现；这 是纯粹琉善式的对神的讽刺。要是作为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洛基在 这里对弗莱雅作了这样的指责，那么这倒是反驳了瓦格纳。而且，在后边数行诗中，洛基对尼奥德尔说：‘你同你的妹妹生了一个（这样的）儿子’（vidh systur thinni gaztu slikan m(g）16。尼奥德尔本不是亚萨神，而是瓦那神，所以他在《英格林加传说》中说，兄弟姊妹婚姻，在瓦那国是很普通的，但在亚萨神中间并不如

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甚至在历史所记载的最粗野的民族中间，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证实的例子来。不过，这种家庭一定是存在过的，如今还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通行的，夏威夷的亲属制度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它所表现的血缘亲属等级只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之下才能产生；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一家庭形式作为必然的最初阶段决定着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

2.普那路亚家庭。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那么，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1]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以后逐渐成为惯例（在夏威夷群岛上，在本世纪尚有例外），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一进步可以作为“自然选择原则在发生作用的最好说明”[1]。

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当作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

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户经济（它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后期），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这种规模虽然依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当确定的。不过，认为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不妥的观念一旦发生，这种观念就一定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这种新的家庭公社这时并不必然同家庭群体相一致）。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公社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摩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家庭的形式，便经过这样或类似的途径而由血缘家庭产生出来了。按照夏威夷的习俗，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即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或更远一些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兄弟，他们也不再必须是兄弟了，而是互称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即所谓 associé。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也互称普那路亚。这是

此。17 这大概是表明，瓦那神是比亚萨神更古的神。无论如何，尼奥德尔是作为同亚萨神一样的神生活在亚萨神中间的，因此，《厄革斯德列克》勿宁说是证明，在挪威的关于诸神的传说产生的时代，至少诸神之间的兄弟姊妹婚姻尚未引起任何憎恶。要是想为瓦格纳辩护，引用《艾达》倒不如引用歌德，歌德在关于神和舞妓的叙事诗中，说到妇女在寺院献身的宗教义务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过于把这种风俗习惯比作现代的卖淫了”。——编者注

[1] “大概”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425 页。——编者注

古典形式的一种家庭结构；这种形式后来又有一系列变种，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被排除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

这种家庭形式十分精确地向我们提供了美洲的制度所表现的亲属等级。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子女，他们全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但是我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现在都是我母亲的内侄和内侄女，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现在都是我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们全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因为，固然我母亲的姊妹的丈夫们依然是我母亲的丈夫们，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妻子们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妻子们——即使事实上不总是如此，在道理上却是如此——，但由于社会禁止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结果就使迄今不加区别地被作为兄弟姊妹来对待的兄弟姊妹的子女划分为两类：有一些人像过去一样，相互之间依然是（血统较远的）兄弟姊妹，另一些人即一方面兄弟的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的子女，再也不能是兄弟姊妹，再也不能有共同的双亲了——无论是共同的父亲，共同的母亲，或是共同的父母；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发生了分为外甥和外甥女、内侄和内侄女、表兄弟和表姊妹这一类别的必要，而这一类别在从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恐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在以某种个体婚为基础的任何家庭形式下，看来都是极其荒诞的事情，现在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和自然的根据。只要美洲的亲属制度流行过，普那路亚家庭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①]至少也应该同样存在过。

如果虔诚的传教士，像美洲早先的西班牙修道士一样，在这种反基督教的关系中，除去简单的“丑事”[②]外能够看一看更多的东西，那么，大概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可以找到这种已被证明确实存在于夏威夷群岛上的家庭形式。如果说，凯撒在谈到当时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布列吞人时曾告诉我们说，他们“每 10 个或 12 个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19]，那么，这最好解释为群婚[③]。野蛮时代的母亲不会有 10 个至 12 个这样年龄的儿子，以致可以有共同的妻子们；而跟普那路亚家庭相适应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却能提供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的一切血统近的和远的从（表）兄弟都是他的兄弟。所谓“父母和子女”，大概是凯撒弄错了；在这个制度下，固然还没有绝对排除父亲和儿子或母亲和女儿属于同一婚姻集团的可能性，但是却不许父亲和女儿或母亲和儿子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内。同样，这种群婚形式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④]，最容易说明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著作家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共妻情况的报告。这也可以说明沃森和凯（《印度的居民》[20]）所叙述的关于奥德（在恒河以北）的蒂库尔人的情况，即：

[①] “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②] 巴霍芬认为是他发现的不加区别的性关系，即他所谓的“污泥生殖”（Sumpfzeugung）的遗迹，这些遗迹是来自群婚制，现在关于这一点再不容怀疑了。“如果巴霍芬认为这种普那路亚婚姻是‘非法的’，那么，那一时代的人也许要认为今日从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之间结婚，近的和远的，大多数都是血亲婚配，正如亲兄弟和亲姊妹之间结婚一样。”（马克思语）18

[③]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④]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这种群婚形式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而是“这种家庭形式”。——编者注

“他们共同地〈即在性关系上〉生活在大公社中，差不多毫无区别，要是他们之间有二人被视为夫妻，那么，这种关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诚然，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也可以成为产生氏族的出发点[21]；澳大利亚人有氏族，但他们还没有普那路亚家庭，而只有比较粗陋的群婚形式[①]。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作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伟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作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从普那路亚家庭中取它的两个典型集团之一，即由一列同胞姊妹和血统较远的姊妹（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或更远等级的姊妹）连同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血统较远的兄弟（按照我们的前提，他们不是她们的丈夫）所组成的典型集团来看，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群人，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员。她们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女始祖；由于世系出自同一个女始祖，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但是，这些姊妹的丈夫们，再也不能是她们的兄弟，从而不能是出自这个女始祖的，因而也不包括在血缘亲属集团即后来的氏族以内了；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属于这个集团，因为只有唯一确知的母方世系才具有决定的作用。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关系的禁规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设施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族区别开来了。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过，我们既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人和一切文明民族中，几乎毫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①]

当摩尔根写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关于群婚的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仅略略知道一点那种组织为级别的澳大利亚人的群婚，此外摩尔根早在1871 年发表了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②]。普那路亚家庭，一方面，给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亲属制度提供了完备的说明，而这一制度曾经是摩尔根的全部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引出母权制氏族的现成的出发点；最后，它乃是远比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摩尔根把这个形式看作必然先于对偶婚存在的一个发展阶段，

[①]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而只有比较粗陋的群婚形式”，而是“他们的组织具有十分个别的性质，我们就不要管它了”。——编者注

[①] 以下直到“对偶制家庭”（本卷第 43 页）那一段以前的文字，都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②] 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 年华盛顿版。——编者注

并且认定它在较早的时期普遍流行，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那时以来，我们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现在我们知道，摩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不过，他仍然很幸运，在他的普那路亚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从这种群婚形式向更高形式的过渡，最容易得到说明。

使我们的关于群婚的知识大大丰富起来的，是英国传教士洛里默·法伊森，他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典型地区——澳大利亚，对群婚作了多年的研究。[22] 他在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的澳大利亚黑人中发现了最低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整个部落分为两个级别：克洛基和库米德。每个级别内部都严格禁止性关系；反之，一级别的每个男子生来就是另一级别的每个女子的丈夫，而后者生来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集团相互结婚，即级别和级别结婚。而且应当指出，这里除了两个外婚制级别的划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也没有因年龄差别或某种特殊血缘亲属关系设下什么条件。对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说来，库米德的每个女子都是他的当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儿，既是库米德女性所生，根据母权制也是库米德，所以，她生来就是每个克洛基男人的妻子，从而也是自己父亲的妻子。至少，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级别组织对于这一点是没有悬为禁规的。所以，或者是在这种组织发生的那个时期，虽然已有限制近亲婚配的朦胧意向，但是人们还不把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看作怎样特别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级别制度就是从杂乱的性关系的状态中直接产生的；或者是在级别发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业已为习俗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状态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经存在过血缘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缘家庭的第一步。后面这一种情况，比较可信。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父母和子女间的婚姻关系的例子，还没有人提到过；而比较晚一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权制氏族，通常也默然以禁止这种关系为前提，把这种禁规看作一种在氏族产生时就已存在的事情。

两个级别的制度，除了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以外，在更靠东部的达令河流域和东北部的昆士兰也有，所以，这个制度流行颇广。它只排除母方兄弟姊妹间、母方兄弟的子女间、母方姊妹的子女间的结婚，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级别的；反之，姊妹的子女和兄弟的子女却能相互结婚。进一步阻止近亲婚配的办法，可以在新南威尔士达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人中间看到，在那里，两个最初的级别分裂成四个，而这四个级别之中每一级别又都跟其他一定的级别整体结婚。最初的两个级别生来就互为夫妻；根据母亲属于第一或第二级别，她的子女就属于第三或第四级别；这后两个同样互相结婚的级别，其子女又加入第一和第二级别。这样，一代总是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下一代则属于第三和第四级别，第三代又重新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根据这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不得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这一特别而复杂的制度，由于母权制氏族嫁接上来——肯定是在较后的时期——而更加复杂。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研讨这个了。这样，我们看到，阻止近亲婚配的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是自发地摸索着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

群婚在澳大利亚还是一种级别婚，它是往往分布于全大陆的整个一级别的男子和同样广布的一级别的女子的群众性夫妻关系，——这种群婚，如果加以详细的观察，并不完全像习惯于娼妓制度的庸人幻想所想象的那样可怕。相反地，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仅仅猜测到有这种群婚存在，而不久以前又对它争论起来。在皮相的观察者看来，它是一种不牢固的个体婚制，而

在某些地方则是与偶尔的通奸并行的多妻制。只有像法伊森和豪伊特那样，花费许多年工夫，才能在这些使普通的欧洲人对于其实践反倒更感到亲切的婚姻关系中发现一种调节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一个外地的澳大利亚黑人在离开本乡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说着他所不懂的语言的人们中间，往往依然可以在一个个住宿地，在一个个部落里，找到毫无反抗和怨恨地委身于他的女子，而根据这种规则有着几个妻子的男人，也要让出一个妻子给自己的客人去过夜。在欧洲人视为不道德和无规则的地方，事实上都盛行着一种严格的规则。这些女子属于客人的通婚级别，因而她们生来就是他的妻子；把双方结合起来的那个道德规则，同时又用剥夺权利的惩罚方法，禁止相互所属的通婚级别以外的任何性关系。甚至在抢劫妇女（这是经常的，某些地方还是通例）的地方，也很慎重地遵守级别的规则。

顺便提一下，抢劫妇女的现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迹象：当一个青年男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的时候，他们便轮流同她发生性关系；但是在此以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动抢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反之，要是被劫来的女子背夫潜逃，而被另一个男子捕获，那么她就成为后者的妻子，前者就丧失了他的特权。这样，与普遍继续存在的群婚并行，并且在它的范围以内，就形成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即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以及与此并行的多妻制，于是在这里群婚也开始消亡，问题只在于：在欧洲人的影响下，首先消失的是什么——是群婚制还是奉行群婚制的澳大利亚黑人。

像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无论如何，乃是群婚的一种十分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前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后者则已经是以有了比较牢固的共产制公社的居民点为前提，并且直接导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种婚姻形式之间，我们无疑还会发现某些中间阶段；在这里，目下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一个刚刚敞开而尚未有人进入的研究领域。

3.对偶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1]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中间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1]看作一种杂乱的共妻，有时又把它看作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级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事情更加向前发展了。例如我们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点到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其数多至几百种。由于婚姻禁规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

---

[1]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1]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解除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23]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见，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其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越来越远的亲属，最后甚至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结果，只剩下一对暂时松散地结合的配偶，即一旦解体整个婚姻就终止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字面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现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但是苏格兰的学究麦克伦南，却把这些迹象，这些单纯的求妻方法，说成是“抢劫婚姻”和“买卖婚姻”，虚构为两种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中间，缔结婚姻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们商量），而是他们的母亲的事情。这样，订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全不相识的人，只是到婚期临近时，才告诉他们业已订婚。在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礼物给新娘的同氏族亲属（即新娘的母方亲属，而不是她的父亲和父亲的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代价。婚姻可以根据夫妇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解除，但是在许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社会舆论；在夫妇不和时，双方的氏族亲属便出面调解，只有在调解无效时，才实行离婚，此时子女仍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重新结婚的自由。

这种对偶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希望有自己的家户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户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户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种地位到了对偶婚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过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莱特作证明。他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招来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不可有

反抗的企图；他无法在这栋房子里住下去，他非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不可；或者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到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势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24]

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发现妇女占统治地位，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妇女都担负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说的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比我们欧洲人常常对妇女怀着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作真正的贵妇人（lady， frowa， Frau=女主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要弄清现在美洲的群婚[①]是否已完全被对偶婚所排除的问题，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还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西北部民族、特别是南美的各民族。关于后者，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性关系不受限制的事例，使人很难设想在这里旧时的群婚已经完全克服。[②]无论如何，群婚的遗迹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北美的至少 40 个部落中，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一俟达到婚龄的一切妹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而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据班克罗夫特说，则有一些节日，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不加区别地发生性关系。[25] 这显然

是指一些氏族，它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们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①]这种习俗在澳大利亚仍然盛行着。有些民族中，还有这种情形，即男性长者、酋长和巫师，利用共妻制来为自己服务，自己独占大多数妇女；但是，他们在一定节日和民众大集会时，必须重新实行以前的共妻制，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轻的男子们寻乐。韦斯特马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第 28—29 页，举了许多例子，表明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札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中，在某些非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 [26]，即在一个短时期内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关系。奇怪的是，韦斯特马尔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并不是他所否认的群婚的残余，而是原始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交尾期的残余。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被巴霍芬说成是对违反古代神戒的赎罪，即妇女用以赎买贞操权利的赎罪，事实上不过是对一种赎身办法的神秘化的说法，妇

[①]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②] “使人很难设想……”这句话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①] 以下直到“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本卷第 50 页）以前，在 1884 年版中是如下一句话：“旧大陆的这一类遗迹是众所周知的，例如，腓尼基姑娘在阿斯塔尔塔节在寺庙中献身的风俗；甚至中世纪的初夜权，也是大概由克尔特氏族（克兰）传下来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尽管德国的新浪漫派竭力掩饰这个事实，初夜权却极其确凿地存在过。”——编者注

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从旧时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这种赎身，是一种有限制的献身：巴比伦的女子每年须有一次在米莉塔庙里献身；其他前亚细亚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庙去住好几年，让她们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允许她们结婚；穿上宗教外衣的类似的风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恒河之间的所有亚洲民族中间都是共同的。为赎身而作出的赎罪牺牲，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越来越轻，正如巴霍芬已经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这种牺牲，让位于一次的供奉；从前是妇人的淫游婚，现在是姑娘的淫游婚；从前是在结婚后进行，现在是在结婚前进行；从前是不加选择地献身于任何人，现在是只献身于某些人了。”（《母权论》第 XIX 页）

在其他民族中，没有这种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有色雷斯人、克尔特人等，在现代则有印度的许多土著居民、马来亚各民族、太平洋岛屿的居民，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姑娘在出嫁以前，都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特别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处都是如此，只要稍稍深入到该大陆内地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阿加西斯（《巴西旅行记》1868 年波士顿—纽约版第 266 页）曾经谈到一个印第安人世系的富有家庭。当他被介绍同这一家的女儿认识时，他问到她的父亲，意思是指她母亲的丈夫，一个正在参加对巴拉圭战争的军官，但是母亲含笑回答道：Naõ tem pai，éfilha da fortuna——她没有父亲，她是一个偶然生的孩子。

“印第安妇女或混血种妇女，总是这样毫不害羞或者说毫无自责之意地谈到她们的非婚生子女；这远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形才是例外。孩子们……往往只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照顾和责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们对于父亲却毫无所知；看来妇女也从来没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对他应当有什么要求。”

在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在群婚制中却是一种通例。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的一个；在巴利阿里群岛和在非洲的奥及娄人中，在古时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亚的巴里人中，现在也还是如此。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尽管新浪漫主义者竭力掩饰这一事实，但这种初夜权至今还作为群婚的残余，存在于阿拉斯加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班克罗夫特《土著民族》第 1 卷第 81 页）、墨西哥北部的塔胡人（同上，第 584 页）及其他民族中；在整个中世纪，它至少存在于原为克尔特人的各个国家中，例如在阿拉贡；在这些地方，它是直接由群婚传下来的。在卡斯蒂利亚，农民虽然从来没有成为农奴，但在阿拉贡却盛行过极丑恶的农奴制，直到 1486 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决为止[27]。在这个文件中说：

“兹决定并宣告，上述领主〈senyors，男爵〉……亦不得在农民娶妻时与其妻同睡第一夜，或在婚礼之夜，新娘躺在床上以后，跨越该床及该女子，作为自己统治的标志；上述领主亦不得违反农民的女儿或儿子的意志去差使他们，无论偿付报酬与否。”（转引自祖根海姆《农奴制度》1861 年彼得堡版第 355 页上的加泰罗尼亚语原文。）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说的“淫游婚”或“污泥生殖”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越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森林原始生活的素朴性质，就必然越使妇女感到屈辱和压抑；妇女也就必然越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的权利，取得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步决不可能由男子首创，这至少是因为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专偶制——自然，这种专偶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有些地方刚刚到达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这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专偶制之于文明时代一样。要使对偶制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专偶制，需要有别的原因，这种原因与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不同。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益缩小婚姻共同体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么，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

我们现在撇开美洲这个对偶制家庭的典型地区不谈吧。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我们作出结论说，在美洲曾经发展起更高级的家庭形式，或者在美洲被发现和被征服以前，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曾经存在过牢固的专偶制。而旧大陆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在旧大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直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天天都要重新获得食物。现在，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地区和恒河地区，以及当时水草更丰茂的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草原的雅利安人，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已经有了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这些财产，只须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越来越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获取食物的方法，现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猎在从前曾经是必需的，如今也成了一种奢侈。

但是，这种新的财富归谁所有呢？最初无疑是归氏族所有。然而，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很难说，亚伯拉罕族长被所谓摩西一经的作者看作畜群的占有者，究竟是由于他作为家庭公社首领所拥有的权利，还是由于他作为实际上世袭的氏族酋长的身分。只有一点没有疑问，那就是我们不应该把他设想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其次，没有疑问的是，在成文史的最初期，我们就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家庭首领的特殊财产[1]，完全同野蛮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同金属器具、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隶一样。

因为这时奴隶制度也已经发明了。对于低级阶段的野蛮人来说，奴隶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战败敌人的办法，与较高发展阶段上

[1]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的人们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杀死或者被当作兄弟编入胜利者的部落；妇女则作为妻子，或者把她们同她们的尚存的子女一起收养入族。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力还不能提供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盈余。由于采用牲畜繁殖、金属加工、纺织以及最后田野耕作，情况就改变了。正如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交换价值[②]而可以购买一样，劳动力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特别是在畜群完全转归家庭所有[③]以后。家庭并不像牲畜那样迅速繁殖。现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看管牲畜；为此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何况这些敌人像牲畜一样，也是可以继续繁殖的。

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家庭[①]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对偶婚给家庭添加了一个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它又确立了确实的生身的父亲，而且这个生身的父亲，大概比今天的许多“父亲”还要确实一些。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在离婚时，他就随身带走这些劳动工具，而妻子则保留有她的家庭用具。所以，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即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即奴隶的所有者。但是根据同一社会的习惯，他的子女却不能继承他的财产，因为关于继承问题有如下的情形。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习惯，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早先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财物不多，在实践上大概总是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亲的姊妹的后代所有。他自己的子女则被剥夺了继承权。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巴霍芬所搜集的关于母权制的许多遗迹的材

[②]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交换价值”，而是“以前众多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价值”。——编者注

[③]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家庭所有”，而是“私人所有”。——编者注

[①] “家庭”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料可以充分证明；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容易地完成的，可以从许许多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来；在那里，部分地由于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从森林移居大草原）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文明和传教士的道德上的影响，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发生，现在还在进行。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八个部落中，有六个是实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继承制的，只有两个还按女系。在肖尼人、迈阿密人和德拉韦人各部落中，已经形成一种习俗，即用属于父亲氏族的一个氏族人名来给子女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入父亲的氏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决疑法！于是就寻找一个缝隙，当实际利益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时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马克思语）[28] 因此，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混乱，这种混乱只有通过向父权制的过渡才能消除，而且确实这样部分地被消除了。“这看来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语）[29] 至于研究比较法的法学家们对这一过渡在旧大陆的各文化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说法，——当然几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说而已，——见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 年斯德哥尔摩版[①]。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

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不是多妻制（关于这一点后边再讲），而是

“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整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以内照管畜群”[30]。

这种家庭的根本之处在于，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人的家庭。Familia 这个词，起初并不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由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组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 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 familia 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familia，id est patrimonium（即遗产），就是通过遗嘱遗留的。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因此，这一用语不会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这种家庭制度是在采用田野耕作和奴隶制合法化以后，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腊人分离以后发生的。”[31]

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专偶婚的过渡。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

[①] 在“（马克思语）”以后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①]

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史的领域，从而也进入比较法学能给我们以很大帮助的领域了。而比较法学在这里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进步。我们感谢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 年斯德哥尔摩版第 60—100 页），他向我们证明了，今天我们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还可以见到的那种称为扎德鲁加[32]（大意为大家庭）和 Bratstvo（兄弟社）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以及在东方各民族中所见到的那种形式有所改变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一个由群婚中产生的母权制家庭和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之间的过渡阶段。至少对于旧大陆各文化民族说来，对于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说来，这一点看来已经得到证明了。

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是这种家庭公社现存的最好的例子。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公社处于一个家长（domaćin）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财务，并对财务和对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他是选举产生的，完全不一定是最年长者。妇女和她们的工作受主妇（domaćica）领导，主妇通常是家长的妻子。在为姑娘择婿时，主妇也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即全体成年男女社员的会议。家长向这个会议作报告；会议通过各项重大决议，对公社成员进行审判，对比较重要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作出决定。

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前，才证明了在俄国也还继续存在着这种大家庭公社[33]；现在大家都承认，这种家庭公社，像农村公社一样在俄国的民间习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它们出现在俄罗斯最古的法典——即雅罗斯拉夫的《真理》[34]中，其名称（vervj）和达尔马提亚法典[35]中所用的相同；它们在波兰和捷克的史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根据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的意见，德意志人的经济单位起初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而是由几代人或者说几个个体家庭所构成的、并且往往还包括许多非自由人的“家庭公社”。罗马的家庭也被归在这种类型以内，因此，家长的绝对权力，其他家庭成员对家长的无权地位，近来是受到很大怀疑的。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中，据说也存在过类似的家庭公社；在法国的尼韦奈，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这种家庭公社还以 parconneries 为名称保存着；而在弗朗什孔泰，它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鲁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见到巨大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很高的、直达屋顶的大厅，四周是卧室，由六级至八级的梯子登入，在这里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

在印度，实行共同耕作的家庭公社，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奈阿尔科斯就已经提到过[36]，它今天也还存在于原来那些地方，即旁遮普和该国的整个西北部。在高加索，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就可以证明这种家庭公社的存在，在阿尔及利亚，它还存在于卡比尔人中间。甚至在美洲，据说它也曾经存在过；苏里塔所记述的古墨西哥的“calpullis”[37]，人们就想把它看作是家庭公社；

[①] 以下直到“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本卷第 57 页）以前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而库诺（1890 年《外国》杂志第 42—44 期）[38] 十分清楚地证明，在秘鲁被征服时，存在过一种马尔克制度（而且很奇怪，这种马尔克[Mark]叫作marca），实行定期的重新分配耕地，从而实行个体耕作。

无论如何，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对于它在旧大陆各文化民族和其他若干民族中，在母权制家庭和个体家庭之间所起的重要的过渡作用，已不能有所怀疑了。在以后的阐述中，我们还要说到柯瓦列夫斯基所作的进一步的结论，即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也是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从中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

谈到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应当指出，至少在俄国，大家都知道，家长对于公社的年轻妇女，特别是对他的儿媳常常滥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们作为后房；俄罗斯民歌对于这点的描述很有说服力。

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专偶制以前，我们再就多妻制和多夫制说几句话。这两种婚姻形式，只能算是例外，可以说是历史的奢侈品，除非它们在某一个国家内同时并存，但是大家知道这是没有的事。因此，由于被排除在多妻制以外的男子并不能从因多夫制而成为多余的妇女那里求得安慰，而且男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论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上升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并且限于个别占据特殊地位的人物。在闪米特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多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其余的人都以一人一妻为满足。现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专偶制的生活。印度—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于它起源于群婚[①]这个肯定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在实践上，多夫制的容让性看来要比伊斯兰教徒的富于忌妒的后房制度大得多。例如至少在印度的纳伊尔人中间，虽然每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妻子，但是他们每人同时还可以和别的三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第四个……妻子。奇怪的是，麦克伦南在叙述这种婚姻俱乐部时（其成员可以同时加入几个俱乐部），竟没有发现俱乐部婚姻这个新类别。不过，这种婚姻俱乐部的制度，决不是真正的多夫制；恰好相反，正如日罗-特隆已经指出的，这只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化了的形式；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着多夫制的生活。[②]

4.专偶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专偶制家庭和对偶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赶走他的妻子。对婚姻不忠的权利，这时至少仍然有习俗保证丈夫享有（拿破仑法典明确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把姘

[①]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②] 最后一句话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妇带到家里来[1]）；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利也行使得越来越广泛；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想加以恢复时，她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新的家庭形式的全部严酷性，我们在希腊人那里可以看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早的时期，那时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39] 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被贬低了。[2]只要读一下《奥德赛》，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是怎样打断他母亲的话并要求她缄默。[1]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择其中的最美丽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亚特》都是以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这样一个女奴隶的纠纷为中心的。荷马的史诗每提到一个重要的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帐篷和枕席的被俘的姑娘。这些姑娘也被带回胜利者的故乡和家里去同居，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亚加米农对珈桑德拉就是这样做的[2]；同这些女奴隶所生的儿子可以得到父亲遗产的一小部分，并被认为是自由民；特夫克尔就是铁拉孟的这样一个非婚生的儿子，他可以按父名给自己取名字。对于正式的妻子，则要她容忍这一切，同时还要她自己严格保持贞操和对丈夫的忠诚。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比文明时代的妇女较受尊敬，但是归根结蒂，她对于男子说来仍不过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亲、他的最高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他可以随意纳这些女奴隶为妾，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正是奴隶制与专偶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专偶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这种性质它到现在还保存着。

谈到较后时期的希腊人，应该把多立斯人同伊奥尼亚人区别开来。前者以斯巴达为典范，他们的婚姻关系在许多方面甚至比荷马本人所描写的婚姻关系还要古老。在斯巴达，是一种由国家根据当地的观点而改变了的对偶婚制，这种对偶婚制在有些方面还像群婚。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国王阿拿克散德里德（约公元前 650 年）在一个不育的妻子以外又娶了一个，有着两个家；大约在同一时期，国王阿里斯东除了有两个不育的妻子以外还娶了第三个，而把前两妻中的一个退了。另一方面，几个兄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妻子；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朋友的妻子，就可以和那个朋友共同享有她；并且认为，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一个按照俾斯麦的口吻所说的壮健的“种马”去支配，即使这个家伙本人并不属于公民之列，也是合乎体统的事情。在普卢

---

[1] 1804 年拿破仑统治时期通过的民法典第 230 条。——编者注

[2] 在 1884 年版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 就看到，妇女处于半囚禁的隔绝状态，以便保证子女确实出自父 亲”。自此以下直到“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本卷第 62 页） 以前的几大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以代替 1884 年版中的如下一段话：“相反，男人却以被俘的女奴隶、他的战时共 享帐篷的女伴来寻欢作乐。古典时期的情况未必更好。从贝克尔《查 里克利斯》一书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查阅到希腊人如何对待妇女的 情形。她们虽说不是被幽禁，但也是与世隔绝的，她们成了自己丈夫 最高等的婢女，只能同主要是其他的婢女来往。姑娘们则干脆被幽 禁起来；妇女们只有由女奴作伴才能离家外出。如有男子来访，妇女 就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去”。——编者注

[1] 荷马《奥德赛》第 1 首歌。——编者注

[2]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亚加米农》。——编者注

塔克的作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一个斯巴达妇女，叫一个向她求爱的情人去找她的丈夫商量；因此，按照舍曼的看法，可以认为在习俗上甚至存在着更大的自由。[40] 所以，真正的通奸，妻背夫不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另一方面，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时代，还不知有家务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黑劳士则另外居住在庄园里，因此，斯巴达人 [41] 占有他们妻子的机会比较少。在这些条件下，斯巴达的妇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人尊敬得多的地位。斯巴达的妇女和少数优秀的雅典淫游女，是受古人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举世无双的希腊妇女。

我们看到，在以雅典人为代表的伊奥尼亚人中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姑娘们只学习纺织缝纫，至多也不过学一点读写而已。她们差不多是被幽禁起来，只能同别的妇女有所交往。妇女所住的房间是在家中的单独一部分，在楼上或者在后屋中，男子，特别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内，如果有男子来到家里，妇女就躲到那里去。妇女没有女奴隶作伴就不能离家外出；她们在家里实际上受着监视；阿里斯托芬曾经提到摩罗西狗，说人们饲养它们是为了吓走奸夫[①]，而且，至少在亚洲各城市，还用阉人来监视妇女，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在希俄斯岛上就制造这种阉人出售，据瓦克斯穆特说，并不是只卖给野蛮人 [42]。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被称为 oikure-ma[①]，即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这个词是一个中性名词）；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丈夫从事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而妻子不许参加；此外，丈夫还常常有女奴隶供他支配，而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希腊妇女那超群出众的品性，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上的审美教养而高出于古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达妇女由于性格刚烈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但是，要成为妇人，必须先成为淫游女，这是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判决。

这种雅典家庭随着时间的进展，成了一种范例，不仅其余的伊奥尼亚人，而且本土和殖民地的所有希腊人都逐渐按照这种范例来建立他们的家庭关系。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希腊妇女仍然常常可以找到欺瞒自己丈夫的机会。那些似乎耻于表示任何对自己妻子的爱情的丈夫，就同淫游女纵情取乐；但对妇女的侮辱，却在男子身上得到了报复并侮辱了男子本身，直到他们堕落到玩弄男童的丑恶地步，并且用加尼米德的神话使他们的神同他们自己一样都受到侮辱为止。

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作的考察，专偶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①]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并且应当能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其实，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

[①] 阿里斯托芬《费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编者注

[①] 欧里庇得斯《奥列斯特》。——编者注

[①] 在 1884 年版中这句话是：“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社会条件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编者注

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谓婚姻义务。[②]

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我于 1846 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43] 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

旧时性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或者甚至个体婚的胜利而消失。

"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的最初期……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消失在新型的淫游制中，这种新型的淫游制伴随着人类直到进入文明时代，就像一个阴影笼罩在家庭上面。"[①]

摩尔根所说的淫游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了。[②]这种淫游制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牺牲。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亚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庙的庙奴[44]，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女，即所谓 Bajaderen（葡萄牙语 bailadeira——舞女一词的讹误），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在其他一些民族中，这种淫游制起源于允许姑娘们在结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残余，只不过这种残余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传到今天的。随着财产差别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补充，也出现了与女奴隶的强制献身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由此可见，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一样：一方面是专偶制，另方面则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淫游制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的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淫游制，在口头上是受到诅咒的。但是实际上，这种诅咒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剥夺权利，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无条件统治

[②] 最后一句话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 。——编者注

[①]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504 页。——编者注

[②] 以下直到"淫游制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以前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但是，在专偶制内部第二种对立也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同靠淫游制来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冷落的妻子。[1]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没有对立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对立的这一面。尽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这样，直到他们的妻子教训了他们，使他们醒悟为止。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淫游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制度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自父亲，像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拿破仑法典》第 312 条规定：

“L'enfant concu pendant le mariage a pour père le mari”——凡在结婚以后怀胎的婴儿，以丈夫为父。

这便是个体婚制 3000 年的最后结果。

这样，在个体家庭中，在仍然忠实于它的历史起源和使得由于丈夫的独占统治而出现的男女之间的冲突明白显露出来的场合，我们就看到了自文明时代开始分裂为阶级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着、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图。自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个体婚制的如下一些场合，即夫妻生活确实是按照这整个制度的最初性质的规则来进行而妻子反抗丈夫统治的场合。至于说并不是一切婚姻都是这样进行的，这一点没有人比德国庸人知道得更清楚了，他不知道怎样维护他在家中的统治，正如他不知道怎样维护他在国家的统治一样，所以，他的妻子有充分权利操起不配由他掌握的权柄。但是他却自以为，他比他的同样不幸的、比他本人更常遇到恶劣得多的境遇的法国难友要优越得多。

不过，个体家庭决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具有像希腊人中间所有的那种古典的粗野形式。罗马人作为世界的未来征服者，具有虽不如希腊人细致但比他们远大的见识，在罗马人中间，妇女是比较自由和受尊敬的。罗马的男子认为，妻子的贞操已经由于他对妻子有生杀之权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此外，这里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在个体婚制发展方面的最大进步，无疑是随着德意志人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的，因为在德意志人中间，大概由于他们贫穷的缘故，专偶制看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从对偶制中完全发展起来。我们是根据塔西佗所提到的如下三种情况而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一，尽管十分尊重婚姻，——“他们以一个妻子为满足，妇女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来的环境中”[1]，——但是在他们的显要人物和部落首长中间却实行多妻制，同我们在实行对偶婚的美洲人中间看到的情况类似。第二，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在他们那里可能只是在前此不久的时候才完成的，因为母亲的兄弟——按照母权制是最近的男性的同氏族亲属——在他们那里仍然被认为是比自己的父亲更亲近的亲属，这一点也是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常常说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第三，在德意志人中间，妇女很受

---

[1] 这句话和前一句话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18—19 章。——编者注

尊敬并且对公共事务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同专偶制所特有的男子统治是直接对立的。差不多在这一切方面，德意志人都与斯巴达人相一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斯巴达人中间，对偶婚也还没有完全被放弃。[1]因此，在这方面，一个崭新的要素也随着德意志人的出现而获得了世界的统治。在各民族混合的过程中，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专偶制，使男子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使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有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从而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专偶制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与它相反——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专偶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

但是，这个进步无疑是由这样的情况引起的，即德意志人还生活在对偶制家庭中，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把适应于对偶制家庭的妇女地位嫁接到专偶制上来；这一进步决不是由于德意志人的什么传奇性的、道德上纯洁得神奇的天性所引起的，这种天性只不过是：对偶制实际上并不像专偶制那样在明显的道德对立中前进的。恰好相反，德意志人在其迁徙时期，特别是在向东南方，即黑海沿岸草原游牧民族区迁徙时期，在道德上堕落得很厉害，除骑马术以外，他们还从这些游牧民族那里染上了丑恶的反常情的恶习，阿米亚努斯关于泰发耳人，普罗科皮阿斯关于海鲁莱人的叙述就是明显的证明。[45]

不过，如果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家庭形式中，专偶制是现代的性爱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唯一形式，那么这并不是说，现代的性爱作为夫妇相互的爱完全或主要是在这一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在男子统治下的牢固的个体婚制的整个本质，是排斥这一点的。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和对偶婚以来的做法相同，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亦即作为热恋，作为每个人（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作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特性），而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旺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所歌颂的也正是这个。Albas，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是普罗旺斯爱情诗[46]的精华。它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门外站着侍卫，一见晨曦（alba）初上，便通知骑士，使他能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接着是叙述离别的情景，这是歌词的最高潮。北部法兰西人和老实的德意志人，也学到了这种诗体和与它相适应的骑士爱的方式，而我们的老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也以这种挑逗性的主题留下了三首美妙的破晓歌，我觉得这些诗歌比他的三篇很长的英雄诗更好。

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其结果自然是专偶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淫游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相反，在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一定程度的爱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为了体面，也始终以此为前提，这一点符合新教伪善的精神。

---

[1] 后半句话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在这里，丈夫实行淫游婚并不那么厉害，而妻子的通奸也比较不那么常见。不过，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又大多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专偶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作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缔结婚姻的方法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1]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两种场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德国小说的枯燥之于法国资产者，正如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之于德国的庸人一样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是，最近，自从“柏林成为世界都市”以来，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的淫游和通奸了。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2]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

“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算作一个美德。”[47]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成为而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专偶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律，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它是要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同他的妻子的关系就没有效力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从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专偶制出现以来就蔓延开来的对妻子的野蛮粗暴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甚至在双方都保持最热烈的爱情和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的家庭了。所以，专偶制的经常伴侣——淫游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重新取得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1]

诚然，我们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越来越失去申诉不平的任何根据。现代各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越来越承认，第一，为了使婚姻有效，

---

[1] 在 1884 年版中是：“德国的和瑞典的”。——编者注

[2] 以下直到“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以前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 以下直到“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本卷第 81 页）以前的文字，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它必须是一种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第二，在结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那么妇女就有了她们所能希望的一切了。

这种纯法律的论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资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抚无产者的论据完全一样。劳动契约据说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规定双方平等，这个契约就算是自愿缔结。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此方或彼方没有明白表示放弃，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放弃掉，这又是与法律无关。

在婚姻问题上，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让人把他们出于自愿一事正式记录在案，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发生了什么事，这种自愿是怎样造成的，关于这些，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之不问。但是，最简单的法制比较，在这里也会向法学家们表明，这种自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律保证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应得部分，因而不能剥夺他们继承权的各国，——在德国，在采用法国法制的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子女的婚事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采用英国法制的各国，法律并不要求结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这些国家，父母对自己的财产也有完全的遗赠自由，他们可以任意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很明显，尽管如此，甚至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和美国，在有财产可继承的阶级中间，结婚的自由在事实上丝毫也不比在法国和德国更多些。

男女婚后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行业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

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论述证明，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妇女越来越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是，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变化越大，越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越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来说，长期的未婚夫状态，十中有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专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像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经济基础一样，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专偶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专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专偶制根本不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专偶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么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完全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那么，会不会由于这个原因，就足以逐渐产生更随便的性关系，从而也逐渐产生对处女的荣誉和女性的羞耻都更加马虎的社会舆论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专偶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专偶制与它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专偶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

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形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情性等等，都曾引起异性对于发生性关系的热望；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所谓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在整个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为当事人缔结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库斯曾歌颂其爱情的喜悦和痛苦的那些牧人，朗格的达夫尼斯和赫洛娅，全都是不参与国家事务，不参与自由民活动的奴隶。而除去奴隶以外，我们所遇到的爱情纠纷只是灭亡中的古代世界解体的产物，而且是与同样也处在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与淫游女，即异地妇女或被释女奴隶发生的纠纷：在雅典是从它灭亡的前夜开始，在罗马是在帝政时代。如果说在自由民男女之间确实发生过爱情纠纷，那只是就婚后通奸而言的。所以，对于那位古代的古典爱情诗人老阿那克里翁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性爱竟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致被爱者的性别对于他来说也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

现代的性爱，同古代人的单纯的性要求，同厄洛斯[情欲]，是根本不同的。第一，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从这方面说，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的厄洛斯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人们不仅要问：它是婚姻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自然，在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实践中，这个新的标准，并不比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境遇更好——人们对它视若无睹。不过，它的境遇也并非更坏；它和其他道德标准一样——在理论上，在字面上，也是被承认的。而更高的要求目前它就不能提了。

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的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前进的地方接着向前走的，它以通奸的方式接着前进。我们已经叙述过那创造了破晓歌的骑士爱。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这段路程骑士们将永远走不到尽头。甚至我们由轻浮的罗曼语族各民族进而考察有德行的德意志人时，在《尼贝龙根之歌》中也可以发现，克里姆希耳德虽然暗中钟情于齐格弗里特，并不亚于齐格弗里特对她的钟情，但是当贡特尔宣布已把她许配给一个骑士（他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时，她却简单地回答道：

“您不必问我；您要我怎样，我总是照办；老爷，您要我嫁给谁，我就乐意和他订婚。”[1]

她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她的爱情在这里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贡特尔向布龙希耳德求婚，埃策耳向克里姆希耳德求婚，他们一次也不曾见过她们；同样，在《古德龙》[48]中，爱尔兰的齐格班特向挪威的乌黛求婚，黑盖林格的黑特耳向爱尔兰的希尔达求婚，以及莫尔兰的齐格弗里特、诺曼的哈尔特木

---

[1] 《尼贝龙根之歌》第10首歌。——编者注

特和西兰的黑尔维希向古德龙求婚，都是如此；而这里第一次出现古德龙自愿嫁给黑尔维希。按照通例，年轻王公的未婚妻都是由父母选择的，要是后者还活着的话；否则他就同大诸侯们商议，自行选择，大诸侯们的意见在一切场合总是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对于骑士或男爵，像对于王公一样，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爱情怎能对婚姻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呢？

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市民，也是如此。单是保护着他的那些特权，带有各种限制的行会规约，在法律上把他或者同别的行会、或者同本行会的同事、或者同他的帮工和学徒分开的种种人为的界限，就大大缩小了他寻求适当的妻子的范围。至于这些女子当中谁是最适当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体系下，决定这个问题的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家庭的利益。

因此，直到中世纪末期，在绝大多数场合，婚姻的缔结仍然和最初一样，不是由当事人决定的事情。起初，人们一出世就已经结了婚——同整个一群异性结了婚。在较后的各种群婚形式中，大概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状态，只是群的范围逐渐缩小罢了。在对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亲给自己的子女说定婚事；在这里关于新的亲戚关系的考虑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新的亲戚关系应该使年轻夫妇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当父权制和专偶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故事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从地理发现的时代起，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而准备取得世界统治的时候它所遇到的状况。人们应该认为，这种结婚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非常合适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世界历史的讽刺神秘莫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结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它把一切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它用买卖、“自由”契约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历史的法。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49]，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①]。

然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人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工作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但是这同迄今为止的订立婚约的实践怎么能协调起来呢？按照资

[①] 见本选集第1卷第272—277页。——编者注

产阶级的理解，婚姻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就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问题作出规定。虽然这种契约那时在形式上是自愿缔结的；没有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就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人人都非常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实际上是谁在订立婚约。然而，在缔结别的契约时要求真正自由的决定，那么在订立婚约时为什么不要求这种自由呢？难道两个将要被撮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支配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难道性爱不是由于骑士而成为时髦，对比骑士的通奸之爱，难道夫妇之爱不是性爱的正确的资产阶级形式吗？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难道相爱者彼此结婚而不是同任何别人结婚不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吗？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吗？既然自由的、个人审定的权利已经无礼地侵入教会和宗教的领域，它怎么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身体、精神、财产、幸福和不幸这种无法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

这些问题，在社会的一切旧有的联系正在松弛，而一切因袭的观念正在动摇的时候，是必然要提出来的。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十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们赶紧去占据其余的七个四分之一。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样崩溃了。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内心的眼睛前面，都展开了无比广大的视野。在为印度的财富、墨西哥和波托西的金矿银矿所引诱的青年男子看来，尊长们的赞许以及世代相传的荣耀的行会特权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资产阶级的漫游骑士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浪漫故事和爱情幻想，但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而且归根到底是抱着资产阶级的目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现存制度最受动摇的新教国家里，都越来越承认在婚姻方面也有缔结契约的自由，并用上述方式来实现这一自由。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再也没有比认为不以夫妻相互性爱和真正自由的协议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总之，恋爱婚姻被宣布为人权，并且不仅是 droit de l' homme[1]，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妇女的权利。

但是，这种人权有一点是与其他一切所谓人权不同的。当后者实际上只限于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而对于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则直接或间接地被削减了的时候，历史的讽刺又经受了考验。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像我们所已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今日只是在妇女身上无例外地得到实现，——那么，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我们已经看到，巴霍芬认为由群婚向个体婚的过渡这一进步

---

[1] “droitde l' homme”既有“人的权利”的意思，也有“男子的权利”的意思。——编者注

主要应归功于妇女，是多么的正确；只有由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进步才是男子的功劳；在历史上，后一进步实质上是使妇女地位恶化，而便利了男子的不忠实。因此，只要那种迫使妇女容忍男子的这些通常的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一旦消失，那么由此而达到的妇女的平等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来判断，与其说会促进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大的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专偶制。

但是，专偶制完全肯定地将要失掉的东西就是，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专偶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经济状况和专偶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这种不可解除性现在就已经遭到千万次的破坏了。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只是要使人们免于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潭才好。

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我们已经把他丢开很远了。对于在文明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考察，是超出了他的著作的范围的。所以，他只是非常简单地论述了一下专偶制在　这一时期的命运。他也认为专偶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并不认为已经达到了。不过，他说：

“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它正如迄今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然专偶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进一步完善，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如果专偶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也无法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50]

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摩尔根的另一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据亲属制度恢复原始家庭形式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摩尔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质上是与希腊人的 genea[氏族]、罗马人的 gentes[氏族]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原始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就现有资料而言）。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原始时代——国家产生以前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个发现在人们一旦知道它之后显得十分简单，但是，摩尔根只是最近才做到这一点的；在他于 1871 年出版的前一部著作中，他还没有看透这个秘密，而这个秘密一揭开之后，就使一向那样自信的英国原始史学家们一时[1]沉默了下去。

摩尔根普遍用以表示这种血族团体的拉丁语 gens[氏族]一词，像同意义的希腊语 genos 一词一样，来源于共同雅利安语的字根 gan（德语为 kan，因为在德语中，通例是用 k 代替雅利安语的 g），gan 的意思是“生育”。Gens，genos，梵语的 dschanas，哥特语（依照上面所说的通例）的 kuni，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的 kyn，英语的 kin，中古高地德意志语的 künne，都同样表示血族、世系。不过拉丁语的 gens 和希腊语的 genos，都是专用以表示这样的一种血族团体，这种团体自夸有共同的世系（这里指的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男始祖），并且借某种社会的和宗教的制度而组成一个特殊的公社。但是这种血族团体的起源与本性，我们的一切历史编纂学家迄今为止却一直弄不清楚。

我们在前面，在研究普那路亚家庭时，已经看到原始形式的氏族是怎样构成的。凡由于普那路亚婚姻，并且依照这种婚姻中必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而构成一个确定的女始祖即氏族创立者的公认后代的人，都是这种氏族的成员，这样就组成了氏族。由于在这种家庭形式下父系血统不能确定，所以只承认女系。又由于兄弟不得娶自己的姊妹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妇女结婚，所以，根据母权制，同这些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便列在氏族以外。这样，留在血族团体内部的只有各代女儿的子孙；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一俟这种血缘亲属集团构成一个与同一部落内其他类似集团相对来说的特殊集团，它又是什么样子呢？

摩尔根举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别是塞讷卡部落的氏族，作为这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这个部落内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1）狼，（2）熊，（3）龟，（4）海狸，（5）鹿，（6）鹬，（7）苍鹭，（8）鹰。每个氏族内都盛行以下的习俗：

1.氏族选举一个酋长（平时的首脑）和一个酋帅（军事领袖）。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世袭，一旦出缺，必须立刻重新补上；军事领袖，也可以从氏族以外的人中选出并且有时可以暂缺。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别一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

---

[1] “一时”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首长。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须经其余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被隆重地，就是说由全易洛魁联盟的联合议事会委任。这样做的意义，在后面就可以看出来。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此外，由于他的职位，他也是塞讷卡部落议事会以及全体易洛魁人联盟的议事会的成员。酋帅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号施令。

2.氏族可以任意罢免酋长和酋帅。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定的。被罢免的人，此后便像其他人一样成为普通战士，成为私人。此外，部落议事会也可以甚至违反氏族的意志而罢免酋长。

3.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否定表现，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包括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族。摩尔根由于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就第一次揭示了氏族的本质。从前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报告，把构成氏族制度的各种集团，糊里糊涂地、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统称为部落、克兰[51]、萨姆[52]等等，而且往往说，在这种集团内部禁止通婚，这证明以前人们对于氏族是多么不了解。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麦克伦南先生就在这个混乱中得以充当拿破仑，用最后的判决建立了这样的秩序：一切部落分为部落内部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和许可通婚的（内婚制的）两种。他这样把问题更加彻底混淆以后，便埋头于最深沉的研究中，去探讨在他的两个无聊乏味的类别中，究竟哪一种较古：是外婚还是内婚。自从发现了那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其成员间不能通婚的氏族之后，这种荒谬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言而喻，在我们见到易洛魁人时他们所处的那种发展阶段，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是被严格遵守着的。

4.死者的财产转归其余的同氏族人所有，它必须留在氏族中。因为易洛魁人所能遗留的东西为数很少，所以他的遗产就由他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分享；男子死时，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亲的兄弟分享；妇女死时，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而不是由她的兄弟分享。根据同一理由，夫妇不能彼此继承，子女也不得继承父亲。

5.同氏族人必须互相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做到这一点；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假使一个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么被害者的全氏族就有义务实行血族复仇。起初是试行调解；行凶者的氏族议事会开会，大抵用道歉与赠送厚礼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的议事会提议和平了结事件。如果提议被接受，事情就算解决了。否则，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个或几个复仇者，他们的义务就是去追寻行凶者，把他杀死。如果这样做了，行凶者的氏族也没有诉怨的权利，事情就算了结了。

6.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几套人名，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人名，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人名一开始就自行带来氏族的权利。

7.氏族可以接纳外人入族，并用这个办法吸收他们为整个部落的成员。这样，未杀死的俘虏，由于被一个氏族接纳入族，就成为塞讷卡部落的成员，从而获得了氏族和部落的一切权利。接纳外人入族的事情，是根据氏族的个

别成员的提议而实行的：男子可以提议接纳外人为兄弟或姊妹；女子可以提议接纳外人为自己的孩子；为了确认这种接纳，必须举行入族仪式。个别因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氏族，常常由于大批接纳别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重新兴旺起来。在易洛魁人中间，入族仪式在部落议事会的公共集会上举行，实际上已经变为一种宗教仪式。

8.印第安人的氏族有无专有的宗教祭祀，很难确定；不过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多少都是和氏族联系在一起的。在易洛魁人的六个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期间，各个氏族的酋长和酋帅，由于他们的职位，都被列在“信仰守护人”以内，而执行祭司的职能。

9.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纽约州境内四周都为白种人包围的易洛魁人，他们的墓地现在已经绝迹了，但从前是存在过的。在其他印第安人那里，这种墓地还保存着；例如，和易洛魁人有近亲关系的吐斯卡罗腊人，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在墓地上，每一氏族都独成一排，所以，总是把母亲而不是把父亲和孩子埋在一排。而在易洛魁人中间，死者的全氏族都要参加葬仪，营造坟墓，致悼词等等。

10.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这种议事会选举、罢免酋长和酋帅，以及其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出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罪献礼（杀人赔偿金）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入氏族。总之，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

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

“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53]

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按照母权制组成为氏族。仅在某几个部落如达科塔人的部落，氏族已然衰落；在另外几个部落中间，如在奥季布瓦，奥马哈等部落中间，氏族已经是按照父权制组成了。

在许多有五六个以上氏族的印第安人部落中间，我们遇到，每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联合成一个特殊的集团，摩尔根按照它的极相似的希腊式样忠实地把印第安语的名称译过来，把这种集团叫作 Phratrie（胞族）。例如，塞讷卡部落有两个胞族；第一个胞族包括 1—4 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包括 5—8 四个氏族。更详细的研究表明，这种胞族大抵是当初由部落分裂成的最初的氏族；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氏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这些氏族如今也作为单个的氏族而存在；而包括一切女儿氏族的最初的氏族，则作为胞族继续存在。在塞讷卡人和大多数其他印第安人中间，一个胞族内的各氏族被认为是兄弟氏族，而别个胞族的各氏族则被认为是它们的从兄弟氏族，——这种称呼，在美洲亲属制度中，像我们在前边所看到的，都具有极其真实而明确的意义。塞讷卡人起初在胞族内也不能通婚，但是这种习俗久已废除了，如今只限于氏族。塞钠卡部落有一种传说，“熊”和“鹿”两个氏族是最初的氏族，其他氏族都是从这两个氏族分化出来的。这个新组织扎下根以后，便根据需要而改变；要是某一胞族的一些氏族灭亡了，那么

为均衡起见，有时就从别的胞族中拨几个氏族去补充它。因此，我们在不同的部落中间，可以看到名称相同的氏族以不同的方式集结在各胞族中。

易洛魁人的胞族的职能，部分地是社会性质的，部分地是宗教性质的。（1）胞族间互相赛球竞技；每一胞族派出自己的优秀球员，其余的人按胞族旁立观看，并以本胞族球员的获胜打赌。（2）在部落议事会上，每个胞族的酋长和军事领袖坐在一起，两个胞族彼此相对，每个发言者都面对各胞族的代表讲话，把他们当作特别的团体。（3）如果部落内发生杀人事件，而行凶者与被害者不属于同一个胞族时，被害者的氏族往往诉诸自己的兄弟氏族；于是这些氏族就举行胞族议事会，把对方胞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使对方胞族也召集自己的议事会，以谋求事件的解决。因此，在这里，胞族又以最初的氏族的资格出现，并且比它派生的较微弱的单个氏族更有获胜的希望。（4）在重要人物死亡时，对方胞族办理安葬和丧礼，而死者胞族的成员则以死者的近亲服丧人资格参与葬仪。酋长死时，对方胞族将出缺一事通知易洛魁人的联盟议事会。（5）在选举酋长时，胞族议事会也出面参预。兄弟氏族对选举的确认，被认为是一种当然的事情；但另一个胞族的氏族则可能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胞族的议事会即召开会议；如果议事会认为异议是正当的，选举就算无效。（6）从前，易洛魁人有一些特殊的宗教神秘仪式，白种人把它称为巫术集会。这种神秘仪式在塞讷卡人那里，是由两个宗教团体举行的；新会员入会时还举行正式的入会的仪式；两个胞族中各有一个这样的团体。（7）在征服时期[①]，住在特拉斯卡拉四个区的四个 lineages（血族），如果是——而这差不多是肯定的——四个胞族的话，那么这证明，像希腊人的胞族以及德意志人的类似的血族团体一样，这种胞族也都有军事单位的意义；这四个血族在作战时各成一队，各穿自己的制服，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首领。

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则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则往往没有胞族这种中间环节。那么，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么特征呢？

1.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相当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宽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这也跟丹麦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îsarnholt（丹麦语为 jarnved，limes Dani-cus）、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萨克森森林和 branibor（斯拉夫语，意即“防卫林”，勃兰登堡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相同。由这种不确定的疆界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疆界的不确定，多半仅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时候，才会在实际上感到不方便。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发生，而不是有意选择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自己使用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上的总称“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

2.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用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实质上

[①] 指 1519—1521 年西班牙侵略者征服墨西哥的时期。——编者注

范围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2000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26 000人，这是在合众国说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3.有隆重委任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军事领袖的权利。

4.有罢免他们的权利，甚至可以违反他们氏族的愿望而罢免他们。由于这些酋长和军事领袖都是部落议事会的成员，部落对待他们有这种权利是当然的。凡已经组成部落联盟而且一切部落都有代表参加联盟议事会的地方，上述权利便转归联盟议事会了。

5.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

“印第安人，是按照野蛮人方式信仰宗教的人民。”[54]

他们的神话迄今还远没有得到考证性的研究；他们已经给自己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赋予人的形象，但是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自然崇拜与自然力崇拜。各部落各有其定期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特别是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祀的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落各自庆祝自己的节日。

6.有管理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它是由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领袖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随时都可以罢免的；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其余的部落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按照通例，每个出席的人都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妇女也可以通过她们所选出的演说人陈述自己的意见。在易洛魁人中间，最后的决定需要一致通过，跟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公社在作出某些决定时一样。部落议事会特别负有调整同其他部落的关系的责任；它接待和派遣使者，宣战及媾和。要是发生战争，大多由志愿者去作战。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反对这种敌人的军事行动，大多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组织；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刻出动。部落的领土若被侵犯，其防卫也大多由志愿者来担任。这种队伍的出发和归来，总要举行公共的典礼。这种出征并不需要得到部落议事会的同意，没有人去征求这种同意，也没有人给予这种同意。这正和塔西佗所记述的德意志人扈从队的私人出征一样[①]，不过德意志人的扈从队伍，已具有比较常备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在平时也有组织，在战时团结其他志愿兵的强固核心了。这种武装队伍的人数一般不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也是由不大的战斗力量来进行的。假如有几支这样的扈从队为了一次大规模战事而联合起来时，其中每支队伍只服从它自己的首领；作战计划的统一，好歹由这些首领的议事会来保证。据阿米亚努斯·马尔采利努斯的记载，4世纪阿勒曼尼人在上莱茵的作战方法，就是如此。

7.在有些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首领，但他的权力很小。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这是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编者注

方面多半都没有结果；这种官员，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由最高军事首长发展来的。

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区。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在合众国，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便可以见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大概是很大的达科塔族系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经过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纽约州，并分成了五个部落：塞讷卡，卡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们以捕鱼、打猎及原始园艺为生；住在大多用栅栏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们的人数从未超过两万；五个部落中有几个氏族是共同的；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的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接壤的、为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他们不久以前才征服来的，所以这些部落惯于团结起来对付被他们驱逐的部落，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至迟到 15 世纪初，就发展成为一种正式的“永世联盟”，这种联盟，一经意识到它的新的实力，便立刻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 1675 年前后，当它达到了极盛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广大土地，把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纳贡。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因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9]和秘鲁人除外）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联盟的基本特点如下：

1.五个血缘亲属部落以完全平等和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的独立为基础，结成永世联盟。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称为父亲部落，互为兄弟部落；其余两个称为儿子部落，也互为兄弟部落。有三个氏族——最老的——在五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另外有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这些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员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

2.联盟的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 50 个地位和威信平等的酋长组成；这个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

3.这 50 个酋长，在联盟成立时，被分配在各部落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立的新的公职。当出缺时，有关的氏族便重新进行选举，同时有关的氏族也可以随时罢免他们；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

4.联盟的这些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

5.联盟议事会的一切决议，须经全体一致通过。

6.表决是按部落举行的，这样，每个部落以及每个部落内的议事会全体成员，都必须一致赞成，决议才算有效。

7.五个部落议事会中每一个都可以召集联盟议事会，但联盟议事会本身不得自行召集。

8.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个易洛魁人都可以发言；但只有议事会才能作决定。

9.联盟没有一长制首长，即没有主掌执行权的首脑。

10.但联盟有两个具有平等职能和平等权力的最高军事首长(类似斯巴达

人的两“王”，罗马的两执政官）。

易洛魁人在其中生活了四百余年、而且直至今日还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我依据摩尔根，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可能研究还不知有国家的一个社会的组织情况。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所以毛勒凭其正确的直觉，确认德意志的马尔克制度是一种纯粹社会的制度，虽然它以后大部分成了国家的基础，但在本质上它是和国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是公共权力逐渐从马尔克、乡村、农户、城市等最初的组织中产生，和与之并行产生的情形。[55] 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出，一个原来统一的氏族集团怎样逐渐散布于辽阔的大陆；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民族[Völker]，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失去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内部，单个的氏族怎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作为胞族保存下来，但是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部落中仍然是氏族的名称，一般说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许多部落没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氏族作为社会单位出现以后，氏族、胞族和部落这整个社会组织就怎样以几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因为是天然性）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来。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层次的血缘亲属关系，每个都是闭关自守，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但是又互相补充。归它们管辖的事情，包括低级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公共事务。所以，我们凡遇见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为社会单位时，我们也就可以去寻找类似前面所讲的那种部落组织；凡有充足资料的地方，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我们不仅能找出这种组织，而且也会确信，即使在没有资料作为依据的地方，只要与美洲社会制度作一比较，也有助于我们解决最困难的疑难和哑谜。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洛魁人在 1651 年左右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56] 的时候，他们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的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例证。祖鲁卡菲尔人在数年前，

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57] 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服兵役，也不知道什么是操练。英国人诉苦说，卡菲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他们的最小的一条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如钢，像鞭条一样。”——一位英国的画家这样说。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要是我们把他们的状况和现代绝大多数文明人的状况作一比较，那么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无产者和小农同古代自由的氏族成员之间，差距是巨大的。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它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部落联盟的建立就已经标志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图也表明了这一点。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缓和一些。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展，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使人感到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差别，他们都仍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①]。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6 页。——编者注

四　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组织起来了。胞族可能是没有的，在多立斯人中间就是这样；部落联盟也不是到处都有成立的必要，但无论如何氏族是基本的单位。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所以，希腊人的氏族也绝不再是易洛魁人的那种古老的氏族了，群婚[①]的痕迹正开始显著地消失。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正在产生的私有制就这样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由于在实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权利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不仅容许少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也规定要这样做。

根据格罗特的《希腊史》[58]，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上的：

1.共同的宗教祭祀和祭司为祀奉一定的神所拥有的特权。这种神被假想为氏族的男始祖，并用独特的名称作这种地位的标志。

2.共同的墓地（参看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59]）。

3.相互继承权。

4.在受到侵害时提供帮助、保护和支援的相互义务。

5.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在氏族内部通婚的相互权利和义务。

6.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共同财产，有自己的一位 Archon（酋长）和一位司库。

此后，几个氏族结合为一个比较不那么密切的胞族；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共同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以及在胞族成员被杀害时进行追究的权利。一个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举行的祭祀，由一个从贵族（Eupa-triden）中间选出的 Phylobasileus （部落酋长）主持。

格罗特所说的，就是这样。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透过希腊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60] 要是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那就看得更加清楚。

希腊的氏族还具有以下这几个特征：

7.按照父权制计算世系。

8.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但女继承人例外。这一例外及其确立成为规定，就证明旧时的规则仍然有效。这也是从下述普遍通行的原则中产生的，即妇女出嫁后，就不再参加本氏族的宗教仪式，而改行她丈夫的氏族的宗教仪式，注籍于她丈夫的胞族。根据这一点以及狄凯阿尔科斯的著名的一段话看来[61]，可知外婚乃是规则，而贝克尔在《哈里克尔》一书中径直认为，无论什么人都不得在本氏族内部通婚。[62]

9.接纳外人入族的权利；这是用家庭接纳的办法来实现的，不过要有公

[①]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开的仪式，而且只限于例外情形。

10.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我们知道，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酋长；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这一职务是在一定的家庭里世袭的。在野蛮时代结束以前，不大可能有严格的[1]世袭制，因为这种世袭制是同富人和穷人在氏族内部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秩序不相容的。

不仅格罗特，而且尼布尔、蒙森以及迄今为止的其他一切古典古代历史编纂学家，都没有解决氏族问题。不论他们多么正确地叙述了氏族的许多特征，但是他们总是把氏族看作家庭集团，因此便不能理解氏族的本性和起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国家在公法上也不承认家庭，到今日为止，家庭不过存在于私法上而已。然而我们的全部历史编纂学直至现在都是从以下一个荒诞的，尤其在 18 世纪已成为不可侵犯的假定出发的：未必早于文明时代的专偶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围绕它而逐渐萌发起来的核心。

马克思补充说："格罗特先生应当进一步注意到，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63]

摩尔根爱引用格罗特的话，因为后者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和十分受人信任的证人。格罗特又说到，每个雅典氏族都有一个从它的假想的男始祖传给他们的名称；在梭伦时代以前，死者的财产一律由同氏族人（gennêtes）继承，在梭伦时代以后，死者如无遗言，其财产亦由同氏族人继承；遇有杀害事件，首先是被害者的亲属有权利和义务向法庭控告犯罪者，其次是同氏族人，最后是同胞族人：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最古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划分成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64]

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马克思语）[65]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既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种祖先纯粹是神话人物，他们便根本没有可能解释氏族是怎样从许多彼此相邻的、起初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单是为了解释氏族的存在，他们还是非这样做不可。这样他们便陷入了说空话的圈子，不能超出这样一个论题：族系的确是一种虚构，但氏族是一个现实，因之，格罗特终于说（括弧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

"我们只是偶而听到这种族系，因为仅仅在一定的、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公开把它提出来。可是，比较卑微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仪式（这真奇怪，格罗特先生！），有一个共同的超人的男始祖和族系，像比较有名的氏族那样（格罗特先生，这在比较卑微的氏族那里真十分奇怪呵！）；根本的结构和观念的基础（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直白地说是肉欲的！）在一切氏族中都是相同的。"[66]

马克思把摩尔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如下："与原始形态的氏族——希腊人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有过这种形态的氏族——相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保存了全体氏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的知识。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物。随着专偶制家庭的产生，这

---

[1] "严格的"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种事物就湮没无闻了。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族系，相形之下，个体家庭的族系便显得没有意义。氏族名称的作用就在于使具有这种名称的人不忘他们有共同世系的事实；但是氏族的族系已经十分久远，以致氏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了。氏族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接纳外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更改的证据。反之，像格罗特[1]和尼布尔所作的那样，把氏族变为纯粹虚构和幻想的产物，从而事实上否定氏族成员之间的任何亲属关系，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蛰居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联系（尤其是专偶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即幻想的族系创造了现实的氏族！”[67]

胞族，像在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还能表明所有这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男始祖。比如，据格罗特说：“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共同的神为其男始祖。”[68]

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作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帮助胞族，部落帮助部落。[69]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究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在较早的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节日，而且，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自然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再次，胞族有一个胞族长（phratriarchos），据德·库朗日说，它还有全体大会，通过必须执行的决定，拥有法庭和行政机关。[70]甚至以后的轻视氏族的国家，也给胞族保留下了若干公共的行政性的职能。

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细密的集团划分，是以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干涉自然形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原因何在，希腊历史都没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拥挤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有主要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大多数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 Vö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Vö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

[1]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不是格罗特，而是格罗特经常引用其著作的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学者坡吕克斯。——编者注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1.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bulê），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狄奥尼修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议事会正是这样由贵族（kratistoi）组成的[71]。议事会对于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就谈到过忒拜议事会曾作了一个对当时局势有决定意义的决议，即为伊托克利斯举行荣誉葬礼，而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则扔出去让狗吃掉。[72] 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2.人民大会（agora[阿哥腊]）。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Umstand]（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事务；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埃斯库罗斯的《求援女》）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权力，因为，正如舍曼所说（《希腊的古代》），“当谈到一件须要人民协助来办的事情的时候，荷马并未向我们指出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们来这样做的手段”[73]。

原来，当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有可能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形成的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的或者巴赛勒斯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

3.军事首长（Basileus[巴赛勒斯]）。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道：“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共和党人美国佬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但很公正地说到油滑的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时代》一书[74]：

‘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酋长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还给他们加上绅士的资格，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认：总的说来，我们发现在他们那里似乎有长子继承的习惯或法律，而且规定得很充分但是并不是明确到了极点’[75]。”

看来，格莱斯顿先生本人也会觉得，带有这种保留条件的长子继承制，也已经充分地等于没有，尽管并不是明确到了极点地等于没有。

我们已经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是怎样继承的。一切职位多半都是在氏族内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族范围内继承的。出缺时，最亲近的同氏族男亲属——兄弟，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屏弃他。因此，如果说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么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很有可能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证明不经过人民选举就实行合法继承。这里所说的情况，在易洛魁人和希腊人那里，就是氏族内部特殊的贵族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腊人那里，除此之外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制的最初萌芽。因此，这种推想说明，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正像罗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定是或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的公认的机关——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的。

在《伊利亚特》里，勇士的统领亚加米农，并不是作为希腊人的最高国

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而出现的。当希腊人中间发生内讧时，奥德赛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指明了他的这一地位：多头指挥是不好的，应该由一个人做统帅等等（此外还有一节人人爱诵的关于权杖的诗，但这是后人加的）。[69]“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既不让亚加米农也不让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而是让‘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人身不自由的人，例如牧猪人优玛士等人，也都是‘神的’（dioi 和 theioi），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①]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 basileia[巴赛勒亚]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语）[76]

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予的。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巴赛勒斯由于职位的关系大概也是议事会的成员。可见，用 König 来翻译 Basileus 一词，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 König（Kuning）是由 Kuni、Künne 而来的，即氏族酋长的意思。不过，古希腊文的 basileus 跟现代意义的 Künig 一词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 basileia 很确定地叫作 patrikê，即由氏族产生的意思，并说 basileia 有明确规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权限。[77] 亚里士多德也说，英雄时代的 basileia 是对自由人的统率，巴赛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78]；可见，巴赛勒斯并未握有后来的意义上的统治权力。[①]

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

[①]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接着还有一句为恩格斯所省略的话：“奥德赛用来称呼亚加米农的‘科伊腊诺斯’（kopavos ）这个词和‘巴赛勒斯’这个词一样，也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编者注

[①] 就像希腊的巴赛勒斯一样，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长也被误解为近代 的王公。摩尔根最先对于西班牙人的起初是出于误会和夸张，后来 简直是说谎的报告作了历史的考证，并证明，墨西哥人处于野蛮时 代中级阶段，但他们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 人，他们的社会制度在根据被曲解了的报告来推论的范围内说，相 当于以下的情形：这是一个包括三个部落的联盟，它征服了其他几 个部落并使之纳贡；它由联盟议事会和联盟军事首长来管理，西班 牙人就是把这个联盟军事首长变成了“皇帝”。

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国家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同时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初始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所要补充的，多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还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Volksrecht]；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的第一步。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 Eupatriden 即贵族、Geomoren 即农民和 Demiurgen 即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没有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权利上的差别。[1]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悄悄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

---

[1] 在 1884 年版中这句话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因为其余两个阶级并未获得任何特殊的权利”。——编者注

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一职已经废除；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专偶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么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民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转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们可以说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象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能起作用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的歉收，他们的河流湖泊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生活资料，尽管有时少，有时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联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

如何，于是产品有那么一天被用来反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效果的控制。

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春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开了一系列其他的次要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那个时候肯定就已经远远超过自由的雅典人的数量；氏族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于赚钱而定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公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操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十二个；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 594 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

谈。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2500 年来私有财产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

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而做到的，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地产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一下。然后又对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议事会规定由 400 人组成，每一部落为 100 人；因此在这里，部落依然是基础。不过这是新的国家组织从旧制度中接受下来的唯一方面。至于其他方面，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500、300 及 150 袋谷物（1 袋约等于 41 公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一切公职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公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都要在这里报告自己的工作；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得到更新；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此外，四个阶级都是新的军队组织的基础。前两个阶级提供骑兵，第三阶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阶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服务，大概还领薪饷。

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然而，按照财产来规定政治权利，并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办法。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家制度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许多国家，而且恰好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暂时的作用；从亚里斯泰迪兹的时候起，一切公职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79]

其后 80 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形成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而另一方面，也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

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接纳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被保护的外来的移民。[80]

这时，帮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公元前 509 年）最终把他们推翻，但与之同时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81]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曾经用诺克拉里试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

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区域，即所谓德莫，分别实行自治。居住在每个德莫内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库、以及审理轻微案件的 30 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也有自己的神庙及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侍奉他们的祭司。德莫的最高权力，属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说得对，这是实行自治的美洲市镇区的一种原型。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借以开始的单位，正好和现代国家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借以完结的单位相同。

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作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出一个菲拉尔赫[①]即部落长，指挥骑兵；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挥步兵；一个将军，统率在部落境内征召的全体军人。其次，它提供 5 艘配有船员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 50 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

结果组成了雅典国家，它是由 10 个部落所选出的 500 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

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纳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释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挤而不再过问公事；它们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社团。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传统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很久，只是逐渐才消亡下去。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国家设施中可以看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所以 18 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就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 policées）[①]。这样，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或者如德国南部和瑞士所说的 Landjäger[②]。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

[①] 来源于古希腊文的“菲拉”（部落）一词。——编者注

[①] 法文“police”（警察）的形容词“policé”意为“文明的”。——编者注

[②] 方言，意即宪兵。——编者注

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让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工作。这仍是旧的氏族观念。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 9 万人，而男女奴隶为 365000 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奴隶为 45 000 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 18 个奴隶和 2 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手工工场，在大房间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效；或者就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82]，——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从罗马建城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由许多拉丁氏族(传说有 100 个）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不久又加入了一个萨伯力安部落，据说也有 100 个氏族；最后加入的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分子构成的第三个部落，传说它也有 100 个氏族。初看起来，这全部故事表明，在这里除了氏族以外，很少再有自然形成的东西，连氏族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在故土上继续存在的母亲氏族的分支。各个部落都带有人为构成的痕迹，但它们大部分都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分子构成的，并且不是按照人为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的已经长成的部落的样子构成的；同时仍不排除三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的核心都是一个真正的老部落。中间环节——胞族，是由 10 个氏族组成的，叫作库里亚；因此，共有 30 个库里亚。人们公认，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

罗马的氏族，至少在该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的制度：

1.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财产仍保留在氏族以内。在罗马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因为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系后裔已经没有继承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即十二铜表法[83]，首先是子女作为直系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没有子女，则由父方宗亲（男系亲属）继承；倘若连父方宗亲也没有，则由同氏族人继承。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内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财富的增加和专偶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只限于父方宗亲，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十二铜表法上的顺序是相反的。

2.拥有共同的墓地。克劳狄名门氏族，在由雷吉尔城迁到罗马时，得到了一块土地，此外还在城内得到了一块共同墓地。还在奥古斯都时代，死在条顿堡林山的瓦鲁斯的首级运到罗马后[84]，即埋在氏族坟地；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专用的坟地。[①]

3.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氏族祭典是众所周知的。

4.氏族内部不得通婚。这在罗马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成文法，但一直是一种习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罗马人夫妇中，没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继承权也证实了这一规则。妇女出嫁后就丧失了她的父方宗亲的权利，而退出自己的氏族；不论她或她的子女都不能继承她的父亲或父亲的兄弟，因为不然的话，父亲的氏族就会失掉一部分财产。这一惯例只有在女子不能和同氏族人结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5.共同的地产。这在原始时代，从部落土地开始实行分配的时候起，始终是存在的。在各拉丁部落中间，我们看到，土地一部分为部落占有，一部分为氏族占有，一部分为家户占有，那时这种家户未必是[①]个体家庭。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了个人，每人大约一公顷（两罗马亩）。但是后来我们也还看到氏族掌握的地产，至于那为共和国全部内政史所围绕的国有土

[①] “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专用的坟地”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①]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未必是”，而是“并不必定是”。——编者注

地，就更不必说了。

6.同氏族人有互相保护和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一点，成文史仅有片断的记载；罗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为这样一种超乎一切的力量，以致防御侵害的权利就转到了它的手里。当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捕时，他的氏族的全体成员，包括他的私敌在内，都穿上丧服。[85]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86]时，各氏族都联合起来，赎回他们的被俘的同氏族人；元老院则禁止它们这样做。

7.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这种权利一直保持到帝政时代；被释奴隶可以采用他们从前的主人的氏族名称，但不能获得氏族的权利。

8.接纳外人入族的权利。其办法是接纳到某一家庭中（像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这同时也就是接纳入族。

9.关于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但是，由于在罗马存在的最初时期，从选举产生的王起，自上而下一切官职都是选举或任命的，同时，库里亚的祭司也是由库里亚选举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氏族酋长（principes）也定然如此，虽然氏族酋长从氏族内同一家庭选出的办法可能已成为规则。

这就是罗马氏族的职能。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易洛魁人”[87]。

今天[①]就连最著名的历史编纂学家们在内，关于罗马氏族制度的概念还是怎样的一片混乱，仅举一例就可以看出。在蒙森关于共和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氏族名称的论文（《罗马研究》1864 年柏林版第 1 卷）中，有这样一段话：

“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员以外，——被接纳入族和受保护的人包括在内，但奴隶当然除外，——血族的名称也给予妇女……部落〈蒙森在这里如此翻译 gens 一词〉是……一个从共同的——真实的或推测的或甚至虚构的——世系中产生的，由共同的节日、墓地和继承权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一切有人身自由的个人，因而也包括妇女，都可以而且必须算在该共同体内。但是，确定已婚妇女的血族名称却成了一种困难。当妇女只能同自己血族的成员结婚时，这一困难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可以证明的是，在长时期内，妇女和血族以外的人结婚比同血族以内的人结婚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gentis enuptiO）到 6 世纪时，还被当作赏给个人的特权……但是，凡是实行这种外婚制的地方，妇女在上古时代是转入夫方部落的。毫无疑问，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妇女完全加入夫方的法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脱离她自己的公社。谁不知道出嫁的妇女就丧失了在本氏族内继承遗产或将自己的遗产传给本氏族成员的权利，而加入自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们的所有同氏族人的继承团体呢？假使她被她的丈夫接纳而加入他的家庭，那么她怎能和他的血族不相干呢？”（第 9—11 页）

可见，蒙森断言，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因而，罗马的氏族是内婚制，不是外婚制。这种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经历相矛盾的观点，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以李维著作中引起很多争论的唯

---

① 从本段开始到“在罗马建城差不多 300 年后”（本卷第 125 页）以前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一的一段话（第 39 卷第 19 章）[1]为依据的，这段话说，元老院于罗马城建立 568 年即公元前 186 年，曾作出如下的决议：

uti Feceniae Hispalae datio，deminutio，gentis enuptio，tutoris optioitem esset quasi ei vir testamento dedisset；utique ei ingenuo nubere liceret， neu quid ei qui eam duxisset， ob id fraudi ignominiaeve esset，——费策妮娅·希斯帕拉应有处理她的财产、减少她的财产、在氏族以外结婚、给自己选定保护人的权利，如同她的〈已故的〉丈夫曾用遗嘱把这个权利授予她一样；她可以和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结婚，不能认为娶她为妻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耻的事情。

毫无疑问，在这里，一个被释女奴隶费策妮娅获得了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同样无疑的是，丈夫也有权用遗嘱的方式允许妻子在他死后有权在氏族以外结婚。但是在哪一个氏族以外呢？

如果像蒙森所推测的那样，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她在结婚以后也仍然留在该氏族以内。不过，第一，正是这个关于氏族内婚的断言，尚待证明。第二，如果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男子自然也应当如此，否则他就会找不到妻子。这样一来，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遗嘱把一项他自己也没有并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权利传给他的妻子了；这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是荒谬的。蒙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又推测道：

“为了在血族以外结婚，在法律上，大概不仅需要得到掌权者的同意，而且需要得到全体氏族成员的同意。”（第 10 页注）

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其次，它跟那个决议的明确语意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给予她的；元老院给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给予她的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给予她的乃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绝对权利，以便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受到损害；元老院甚至责成现在的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遭到任何烦恼。这样，蒙森的推测便全然不能成立了。

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而她本人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个决议，她的丈夫就有权允许他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是说，他有权处理他所不属于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用不着多说的。

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上对于这类场合所容许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老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继承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如果一定要造成例外，那么除了把这份财产遗留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试问谁还有资格授权她这样做呢？在他把一部分财产遗留给她，而同时允许她通过结婚或当作结婚的结果而把这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别

[1] 梯·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编者注

的氏族的瞬间，这份财产还是属于他的；因而，他实际上只是处置他自己的财产。至于这个妇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的关系，那么，正是他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结婚，使她加入了这个氏族；因此，同样自然的是，也正是他可以授权她通过第二次结婚而退出这个氏族。总之，只要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实行内婚制的奇怪观念，而同摩尔根一起承认它最初是实行外婚制的氏族，那么问题就很简单而不言自明了。

还有最后一种推测，这种推测也有它的拥护者，而且它的拥护者似乎最多。根据这个推测，那个决议只是说：

“被释奴婢（libertae）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 e gente enubere〈在氏族以外结婚〉，也不得作出任何由于丧失家庭权利而使被释奴婢脱离氏族团体的行为。”（朗格《罗马的古代》1856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195 页，那里谈到我们从李维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话时，引用了胡施克的话[88]）

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那个决议对于完全自由的罗马妇女的地位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证明；更谈不上她们应在氏族内部结婚的义务了。

Enuptio gentis[在氏族以外结婚]一语，只出现在上面那个决议中，在全部罗马文献中再没有遇见过；enubere——与外人结婚——一语只遇见三次，也是在李维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无关。那种虚幻的、认为罗马妇女只能在本氏族内部结婚的看法，其来源仅仅是那个决议。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那个决议或者只是与被释女奴隶所受的特殊限制有关，那么它对于完全自由的妇女（ingenuae）就什么都没有证明；或者它也适用于完全自由的妇女，那么它倒证明妇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外结婚，而结婚以后便转入夫方的氏族，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

在罗马建城差不多 300 年后，氏族联系还这样牢固，以致一个名门氏族，即法比氏族，经元老院许可，竟以自己的力量征伐了邻近的维爱城。据说有 306 个法比人出征，尽为伏兵所杀；唯一剩下的一个男孩，延续了这个氏族。

我们已经说过，10 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胞族在这里叫作库里亚，它有着比希腊胞族更重要的社会职能。每一个库里亚都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圣物和祭司；全体祭司构成罗马祭司团之一。10 个库里亚构成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像其余的拉丁部落一样，最初大概有一个选举产生的酋长——军事首长兼最高祭司。所有三个部落合在一起，构成罗马人民，即 populus romanus。

这样，只有身为氏族成员，并且通过自己的氏族而为库里亚成员和部落成员的人，才能属于罗马人民。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正像尼布尔最先正确地看到的那样，是由 300 个氏族的酋长组成的[89]；正因为如此，他们作为氏族的长老被称为 patres，即父老，而他们全体则构成元老院（长老议事会，由 senex——老者一词而来）。氏族酋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进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种企求就变成实际的权利，这一点在关于罗慕洛赐给第一批元老及其子孙以贵族身分和特权的传说中得到了反映。元老院像雅典议事会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有决定权，在比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新法律方面有权预先讨论。这些新法律，最后由叫作 comitia curiata（库里亚大会）的人民大会通过。来参加大会的人民按库里亚分组，而在每个库里亚内大概又按氏族分组；在通过决议时 30 个库里亚各有一票表决权。库里亚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一切高级公职

人员，包括勒克斯（所谓王）在内，宣战（但由元老院媾和），并以最高法院资格，在一切事关判处罗马公民死刑的场合，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作最后的决定。最后，与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并列的，还有勒克斯，他完全相当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但决不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90]几乎是专制的王。[拉]他同样也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他决没有民政方面的权力，换句话说，决没有处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除非这些权力来自军事首长的惩戒权或法庭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袭的；相反地，他大概是由其前任推荐，先由库里亚大会选出，然后在第二次大会上被隆重委任。他也是可以罢免的，高傲的塔克文的命运，便是证明。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政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下。尽管库里亚和部落可能一部分是人为的组织，但它们都是按照它们所由发生并且从四面包围着它们的那种真正的、自然产生的社会的模型造成的。尽管自然成长的罗马贵族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尽管担任勒克斯的人力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最初的根本性质，而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个最初的根本性质。

这时，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上的人口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居民。所有这些新的国民（关于被保护民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都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 populus romanus 即本来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人身自由的人，可以占有地产，必须纳税和服兵役。可是他们不能担任任何官职；既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也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有土地的分配。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权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并有武装，于是就成了一种同这时根本禁止增加外人的旧的 populus 相对抗的可怕力量了。加以土地看来几乎是平均分配于 populus 和平民之间的，而商业和工业的财富，虽然还不十分发达，可能也主要是在平民手中。

由于全部传说的罗马原始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暗又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史料典籍著作家们的唯理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的尝试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因而，关于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动因，都不可能说出什么确定的意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的原因在于平民和 populus 之间的斗争。

据说是由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这位勒克斯依照希腊的榜样特别是梭伦的榜样制定的新制度，设立了新的人民大会；能参加或不得参加这个大会的，不分 populus 和平民，都依是否服兵役而定。凡是应服兵役的男子，都按其财产分为六个阶级。前五个阶级中每个阶级的最低财产额为：一、10 万阿司；

[拉] 丁语的 rex[勒克斯]，相当于克尔特—爱尔兰语的 righ（部落长）和哥特语的 reiks[勒克斯]。哥特语的这个词，像德语 Fü rst 的本义（与英语的 first，丹麦语的 f(rste 相同，意即“第一”）一样，也是氏族 酋长或部落酋长的意思，这从哥特人在 4 世纪时对于后世的王即全 体人民的军事首长已有特别名称即 thiudans[狄乌丹斯]一事中已 可以看出来。在乌尔菲拉所翻译的圣经中，阿尔塔薛西斯和希律从 来不叫作 reiks[勒克斯]，而是叫作 thiudans[狄乌丹斯]，提比利乌 斯皇帝的国家从来不叫做 reiki，而叫作 thiudinassus。在哥特的 thi- udans（这个词我们不大确切地译为“王”）的名字 Thiudareiks 即德 语的 Theodorich[狄奥多里希]亦称 Dietrich[迪特里希]中，两个名 称合而为一了。

二、75 000 阿司；三、5 万阿司；四、25 000 阿司；五、11000 阿司；据杜罗·德·拉·马尔计算，这些数目大约相当于 14 000、10500、7000、3600 和 1540 马克[91]。第六阶级为无产者，是由那些没有什么财产、不服兵役和不纳税的人构成的。在新的百人团人民大会（comitia centuriata）上，公民以军队方式按连队来编组，每队 100 人，称百人团，每个百人团有 1 票表决权。但是，第一阶级出 80 个百人团，第二阶级出 22 个，第三阶级出 20 个，第四阶级出 22 个，第五阶级出 30 个，而第六阶级，为了体面起见，也准出 1 个。此外，还有从最富裕的公民中征集的骑士所组成的 18 个百人团；一共有 193 个百人团；多数票为 97 票。但骑士和第一阶级合在一起就有 98 票，即占多数；只要他们意见一致，就可以不征询其余阶级的意见，决议也就有效了。

以前库里亚大会的一切政治权利（除了若干名义上的权利以外），现在都归这个新的百人团大会了；这样一来，库里亚和构成它们的各氏族，像在雅典一样，就降为纯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团体，并且作为这样的团体还苟延残喘了很久，而库里亚大会不久就完全消失了。为了把三个旧的血族部落也从国家中排除出去，便设立了四个地区部落，每个地区部落居住罗马城的四分之一，并享有一系列的政治权利。

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炸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

只是在那僭取了真正王权的最后一个勒克斯，即高傲的塔克文被驱逐以后，在两个拥有同等职权（像在易洛魁人那里那样）的军事首长（执政官）代替了一个勒克斯以后，这个新制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演变，这里包括，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溶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逐渐吞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打开了门户。

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92]的氏族[93]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间以比较纯粹或比较模糊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度，或者亚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①]这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氏族的时候，那一位曾经费了莫大气力去误解氏族问题的麦克伦南，就已经证实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克人、切尔克斯人、萨莫耶特人[②]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民族——华拉耳人、马加尔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③]不久以前，马·柯瓦列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萧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其他高加索部落的氏族。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存在，作若干简短的记述。

克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们看到了仍然充满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炸毁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在苏格兰，在上世纪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

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纪[94]，即至迟于 11 世纪所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然这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残余；每个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行分配。从它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这种农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 1869 年作的[95]）——未必能直接证实这一点。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在 11 世纪时，克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专偶制所代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之后才不能解除，或者更确切些说，才不能终止。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那时便要分家：由妻子来分，丈夫取他的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规则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须把妻子的嫁妆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中间那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结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新夫的婚床，也要顺从前夫的要求。而如果已经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他们也是夫和妻。在结婚以前，少女的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与此有关的规定，具有非常轻佻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道德完全不符。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他这样做的三种情况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

“对于同一过错，或者要求赎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

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不受损失的理由，范围非常广：只要丈夫口有臭气就够了。为赎回初夜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赎金（gobr　merch，中世纪的 marcheta 这个名称、法语的 marquette 就

---

① 以下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② 涅涅茨人的旧称。——编者注

③ 约·弗·麦克伦南《原始婚姻》1865 年爱丁堡版。——编者注

① 《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 年版第 1 卷第 93 页。——编者注

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如果我们补充下面几点：在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操持也要给以赔偿；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现行的婚姻形式就显得严格了，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的民族来说，在 11 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爱尔兰氏族（即 sept[塞普特]；部落称为 clainne，即克兰[51]）不仅由古代法典,而且还由 17 世纪被派到那里去把克兰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所证实并作过记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存在，首领（英国法学家称之为 caputcognationis[宗族长]）便把全部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应该是依照在德国通行的规则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属于所谓 rundale[朗得尔]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种村田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被英国征服者所掠夺的先前属于氏族公有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是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Gewanne”[“大块”]，如摩泽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大块中都有一份；沼地和牧场共同使用。就在 50 年前，有时还重新分配土地，有些时候每年都重新分配。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界图，看去极似摩泽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德地区的一个德意志人农家公社的地界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factions”[“帮”]中。爱尔兰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派，它们是建立在看起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为英国人所完全不理解的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进行心爱的盛大殴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族的人为的复活，是氏族灭亡后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流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继续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 30 年代，莫纳亨郡的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氏族或克兰。①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 1745 年起义被镇压而灭亡的。[97] 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个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样一个环节，则是没有疑问的。在瓦尔特·司各脱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说，这种克兰，

“就组织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典型，也是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员的突出例证……从他们的结世仇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成员对于酋长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我们都看到了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世系是按照父权制计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内，而妇女的子女则转到他们父亲的克兰里去”[①]。

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有下述事实为证：据贝达说，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②]甚至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

[①]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357—358 页。——编者注

[②] 贝达《盎格鲁教会史》第 1 册第 1 章。——编者注

格兰人中间还以初夜权的形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纪，那时，只要是初夜权没有赎回，克兰的首领或国王，便可以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每个新娘行使这个权利。[①]

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纪，才有可能占据了多瑙河、莱茵河、维斯瓦河和北方诸海之间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正处在大迁徙中，而苏维汇人只是到凯撒时代才稳定地定居下来。凯撒谈到苏维汇人时明确地说过：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gentibuscogna-tionibusque）分开居住的[98]；而在gensJulia[尤利氏族]的一个罗马人的口中，gentibus 这个名词有着不容误解的确定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人；甚至在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他们似乎还按氏族[②]定居。从《阿勒曼尼亚法典》[99] 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们是按血族（genealogiae）分开居住的。这里使用的 genealogia 一词，与后来的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不久以前，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见解，说这些 ge-nealogiae 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100] 所以关于 fara 也可以这样说，这个词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里——自然也在哥特部落和赫米奥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里——的含义和《阿勒曼尼法典》上的 genealogia 一词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大体一致。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古代语言研究文献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 kuni，中古高地德意志语的 künne 是和希腊语的 genos，拉丁语的 gens 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称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 gyne、斯拉夫语的 žena、哥特语的 qvino，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 kona，kuna 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看到 fāra 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 fisan，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 faran，意即乘车[①]、迁徙，用来表示当然只由亲属构成的迁徙队伍的一个固定的分队。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 s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的 sib，古

[①] 在 1884 年版中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还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这种 权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经常可以见到——在俄国人当 中也流行过；到 10 世纪时被奥丽珈女大公废除。"这一段话在 1891 年版中被恩格斯略去。第二段话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尼韦奈和弗 朗什孔泰，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还存在着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 的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相似的由农奴家庭组成的共产制家户，这也 是从前氏族组织的残余。这种共产制家户还没有完全消亡，例如在 鲁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造型别致的 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大厅，四周是卧室，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 人。"这一段话在 1891 年版中被恩格斯修改后补入第二章（见本卷 第 56—57 页）。——编者注

[②] 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本 卷第 136 页）以前的段落，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中增补的；在 1884 年版中原是如下一段话："……还按氏族居住。在公元 8 世纪的《阿 勒曼尼法典》中 genealogia 一词完全与马尔克公社一词同义。这样 我们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并且恰恰又是苏维汇人，在这里是 按血族即 gentes 分居的，每个氏族都分有确定的地区。勃艮第人和

[①] 德语是 fahren。——编者注

代高地德意志语的 sippia，sippa，都是亲属[②]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仅有复数的 sifjar 即亲属一词；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101] 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

“这群人中的男子，谁是你的父亲……或你是哪一血族的？”（eddo huê-lihhes cnuosles du sls）

要是德意志语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称，那么这恐怕就是哥特语的 kuni 了；这不仅因为它和亲属语中相应的说法一致，而且因为最初表示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的 kuning（König[王]）一词就是从 kuni 这个字演变来的。sibja（亲属）这个词似乎无须加以考虑；至少，sifjar 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不仅表示血缘亲属，而且也表示姻亲亲属，即包括至少两个氏族的成员；因此，sif 这个词本身不可能是表示氏族的用语。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骑兵队和楔形步兵纵队的战斗队形，也是按氏族的组织来编的；如果塔西佗说的是按家庭和亲属关系[③]，那么这种不明确的用语的来由是，在塔西佗时代氏族在罗马早已不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了。

有决定意义的是塔西佗的这一段话，那里说：母亲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作自己的儿子；有些人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所以当要求人质的时候，那个将受到约束的人的姊妹的儿子被认为是比他自己的儿子还要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照母权制组织起来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的活生生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被当作德意志人特有的一种东西。[①]某一个这样的氏族，其成员假如把自己的儿子当作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么这位父亲就责任自负。但是假如成为牺牲品的是姊妹的儿子，那么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男孩子或少年的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罪责；这个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使我们在德意志人那里没有发现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迹，那么有上面这一段话也就够了。[①]

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关于诸神的晚景和世界的毁灭的《Völuspâ》（《女预言者的预言》）[103] 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此后又过了大约 800 年。在这个《女预言者的预言》中，——如现在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 [104]，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

[②] 德语是 Sippe。——编者注

[③]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7 章。——编者注

[①] 起源于母权制时代并在许多民族中间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 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只是在英雄时代的神话中希腊人才具有。据 狄奥多鲁斯（第 4 卷第 34 章）说，梅里格尔杀死了铁斯特士的儿子 们，也就是自己母亲阿耳泰娅的兄弟们。阿耳泰娅认为这种行为是 一种无可饶恕的罪行，她诅咒凶手——她自己的儿子，并祈求他死。“据说，诸神听从了她的愿望，结束了梅里格尔的生命。”又据狄奥多 鲁斯（第 4 卷第 44 章）说，海格立斯率领下的亚尔古船英雄在色雷 斯登陆，他们在那里发现，菲尼士受他新妻子的教唆，残酷虐待被他 遗弃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奥帕特腊所生的两个儿子。但在 亚尔古船英雄中间，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奥帕特腊的兄弟 们，也就是被虐待者的母亲的兄弟们。他们立刻保护他们的两个外 甥，释放他们并杀死看守者。102

[①] 以下直到本页“此外，在塔西佗时代”以前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

“Broedhr munu berjask ok at bönum verdask，
munu systrungar sifjum spilla”.

“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
姊妹的儿女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了。”

Systrungr 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的罪还要大。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 systrungar 一词；要是不用这个词，而用 syskina-börn（兄弟姊妹的子女）或 syskinasynir（兄弟姊妹的儿子们），那么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对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

此外，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②]德意志人中间，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父亲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实，是和刚刚所说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同时也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制在当时还是多么新近。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见到母权制的遗迹。那时，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农奴中间，似乎仍然不大信赖父系血统；所以，当封建领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奴的时候，例如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凯泽斯劳滕，就要求有六个最近的血缘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身分（毛勒《城市制度》第 1 卷第 381 页[①]）。

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缔结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沦为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激励他们的战斗士气；他们认为妇女体现着某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听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珀河畔布鲁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妲，就曾经是推动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中，齐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部统治。[105] 在家里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动，看来仍须由众成年男子来承担。

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专偶制的对偶制。这还不是严格的专偶制，因为还允许显要人物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操，一般说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克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也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的不可破坏。他举出只有妻子通奸，才是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漏洞，而且过分明显地用来给放荡的罗马人作美德的镜子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的美德骑士，那么，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恪守道德准则的最后痕迹消失得比德语还要快得多。只消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点了。不言而

[②] “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①] 毛勒《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 年埃朗根版。——编者注

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硬给德意志人加上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整个民族中都没有盛行过的节欲行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得多。

从氏族制度中产生了把父亲或亲属的仇敌关系像友谊关系一样继承下来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为杀人或伤人赎罪的赔偿金。这种赔偿金在上一代还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经证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这种赔偿金，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关于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第 21 章），与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几乎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经最终分配了耕地以及与此有关的那几段文字应如何解释，像这种热烈而无休止的争论，如今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自从证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据凯撒证明[①]，在苏维汇人当中就是如此，——继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以来；自从确定耕地的这种定期重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必再费一词了。如果从凯撒到塔西佗的 150 年间，德意志人从凯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维汇人的共同耕作（他说，他们完全没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个体耕作，那么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而且没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那个阶段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读到他说得很简洁的话：他们每年更换（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地。[①]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个耕作和土地占有阶段。[②]

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作更改。在此期间，问题已转到另外一个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经证明（见前引书，第 44 页[③]），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是流行很广。在这以后，问题已经不再像毛勒和瓦茨争论的那样——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而是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无疑问，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但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 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人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出来。

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组成，而是

[①] 凯撒《高卢战记》第 4 卷第 1 章。——编者注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26 章。——编者注

[②] 以下直到“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本卷第 142 页）以前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55—57 页。——编者注

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作为共同的马尔克来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个地带，而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抛荒。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是很多的，因之，任何争夺地产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过多，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后正在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种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水域则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看来已经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较之迄今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推测，能更好地诠释典籍，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 CodexLaureshamensis[106]，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家庭公社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但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森林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显要人物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①]（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克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钱币很少使用，数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钱币。他们不制造金银饰品，也不重视这些。铁是很少见的，看来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差不多全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冶炼。鲁恩文字（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文字）仅仅用作暗语文字，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方便，因而其独立的金属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无疑发展起了这样的工业。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武器——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和 2 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一起——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即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向文明的罗马帝国迁徙，使这种土生土长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亚速海沿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个作坊，因而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到处都有氏族酋长（principes）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这种人民大会，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上，至少在

---

① 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集）第 18 卷第 17 章。——编者注

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氏族才有，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酋长（principes）和军事头领（duces）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举出来的；向父权制的过渡，例如在希腊和罗马，促进了选举制逐渐变为世袭制，从而促进了每个氏族形成一个贵族家庭。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或在它以后不久便衰落了。军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不问世系如何。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发挥作用；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大会由王或部落酋长主持；决定由人民来做：怨声表示反对，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民族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酋长为主席的全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酋长可能只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拘何时何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经有了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被释奴隶一般处于低微地位，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这样一些宠儿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现在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奴隶，起初在宫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忠诚，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例如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马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曾发展出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酋长议事会和已在图谋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

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典型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莱茵河左岸的乌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共为 18 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 10 万人[1]，这已经大大超过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 2 万人，但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较确切的民族试着划分一下，那么每一个这样的民族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 1 万平方公里，或 182 平方地理里。但是，罗马人的 GermaniaMagna[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瓦河为止，占有依整数计共 5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 10 万人，那么整个大日耳曼尼亚的人口总数，应达 500 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就今日的情况来说——1 平方公里 10 人，或 1 平方地理里 550 人——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统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等等，——它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大系统[1]，而这些在公元前 180 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做过雇佣兵的德意志人，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 100 万人，那么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 600 万了。

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铸币来判断，是属于 3 世纪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 300 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大系统（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奥南人），沿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谓法兰克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则是印格伏南人的事情。到 5 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在这一文明的棺木旁边了。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

---

[1] 这里所推测的数字，在狄奥多鲁斯关于高卢的克尔特人的一段文字中可以得到证实。他说："在高卢住着人口不等的许多民族，其中最大者，人口约为 20 万人，最小者约为 5 万人。"（DiodorusSiculus，V，25.）因而，平均起来是 125000 人；由于各个高卢民族发展程度较高，应该把他们的人口设想得比德意志人多一些。

[1] 普林尼《博物志》第 4 卷第 14 章。——编者注

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的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出炉的罗马公民身分并没有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欠缺的表现。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是到处都具备的；各行省的拉丁方言差别越来越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neue 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自己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消灭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

社会状况同样也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统治的目的已经放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事业；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做到了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部分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场，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一部分为了满足主人的奢侈生活，一部分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主人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经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 1/6，或者仅仅 1/9，他们与其说是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是交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能和自由民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看作完全有效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作简单的同居（contubernium）。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富人的家庭奴隶和供他们显示豪华的奴隶，在社会上还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分，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结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释奴隶的人数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的人数，破产的自由民（类似美国从前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典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同流合污达数世纪之久，以后也从来没有阻止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止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买卖奴隶，也没有阻止过后世买卖黑奴。[1]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他们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侵害，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护；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 4 世纪的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也就是神圣的教会所心领神会的,并且在 9 和 10 世纪竭力仿效以扩张神的国家即教会地产的诡计。诚然，在那个时候，即公元 475 年左右，马赛的主教萨尔维安还对这种掠夺表示愤慨，并且说，罗马官吏和大地主的压迫已经如此严重，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罗马统治之下。[1]关于那时父母常常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的事情，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 2/3 在自己人当中分配。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仍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归全体人民占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占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成了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场始终没有分配而留作共同使用；这种使用，以及被分配下去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越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越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越是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

---

[1] 据克雷莫纳的主教利乌特普朗德说，10 世纪在凡尔登，也就是说， 在神圣德意志帝国，制造阉人成了一个主要的行业，因为把这些阉 人输入西班牙，供摩尔人的后宫使用，可获厚利。107

[1] 萨尔维安《论神的统治》第 5 册第 8 章。——编者注

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它起源于各成员的亲属关系的痕迹往往还是很显著的。可见，至少在保存着马尔克公社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氏族制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制度，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纽带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么，这是血缘纽带的各种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内由于征服而同样发生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普遍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组织管理起来。但是，它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都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种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非常迅速。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

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大的林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赠送或赏赐给他的扈从队。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军事扈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扈从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补入了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开的人，而且还由于也补入了奴隶、农奴和被释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宫廷，他就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儿。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赠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邑[108]的形式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去世时为止。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

不仅如此，由于王国幅员广阔，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的手段来管理了；氏族酋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也已经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越来越变成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新贵的会议。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即法兰克人的主体，正如以前共和制末期的罗马农民一样，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贫困衰败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该地的核心的农民，到 9 世纪之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召募的自由农民的卫国军，现在已经由新贵的仆从所组成的军队代替。在这些仆从中，还有一些依附农民，他们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主人，而更早一点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的后裔。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相应的贵人跋扈（在这种贵人之中还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图把自己的职位变成世袭的郡守[109]），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查理大帝死后 50 年，法兰克王国便毫无反抗地匍匐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 400

年前罗马帝国匍匐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

不仅对外软弱无能，而且内部的社会秩序（不如说是社会无秩序），差不多也是一样。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他们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去乞求新贵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经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变化的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也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过不了几代，他们大多数已经都是农奴了。自由的农民等级灭亡得多么迅速，这从伊尔米农所编的圣日尔曼-德-普雷修道院（当时在巴黎附近，现在巴黎市内）的地产登记册[110]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个修道院的地产散布四周，面积极为广大，还在查理大帝在世的时候，就住有2788户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兰克人。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黎特，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保护人让农民把自己那块土地交归他所有，然后仅仅是再将这块土地交回农民终身使用，这个曾被萨尔维安宣布为背神行为的习俗，如今到处被教会施加在农民身上了。现在日益盛行的徭役，其原型既是罗马的安加利[111]，即为国家所服的强制劳役，又是德意志马尔克公社成员为修桥、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的工役。这样一来，居民的主体在过了400年以后好像完全又回到起初的状况去了。

然而，这不过证明两点：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化和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400年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居民阶级。在罗马帝国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的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把它恢复起来。这是由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决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大庄园经济或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规模经营嫁接在这种社会上面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帝用著名皇室田庄所作的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庞大实验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是对修道院说来才获益甚丰；但是修道院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正常的社会团体；它们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绩，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不永远是一个例外。

但在这400年间，毕竟是继续前进了。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末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却已经不同了。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破产的、贫穷的、轻视劳动为奴隶贱事的自由民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奄奄一息的罗马世界的“无益的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9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文明的沉沦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前辈来说曾经是古典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则是新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400年看起来多么没有成果，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mod-erne Nationalitäten]，亦即西欧人类为

了未来的历史而实行的分化和改组。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解体过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112]）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①]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无恙地经受了不到200年后的十字军远征的大流血。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神秘的魔法，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族系，并且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自由意识，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是罗马人所丧失的一切品质，而仅仅这些品质就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新的国家，培养出新的民族[neue Nationalitäten]——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他们的氏族制度的果实，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德意志人改革了专偶制的古代形式，缓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给了妇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那么，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们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的最严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即一个抵抗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无论在古典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这样现成，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果不是他们的纯粹野蛮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使之成为唯一的形式，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强调指出的[113]，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fournit aux cultivateurs des moyensd'affranchissement collectif et progressif[①]），因此之故，这种形式大大胜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形成了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典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已经达到并努力开拓的野蛮时代高

[①] 以下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①] 给土地耕种者提供了一个获得集体和逐渐解放的手段。——编者注

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

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现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所以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

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氏族制度已经完全形成。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两个[1]；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是在个别情况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状态完全适应的。它无非是这种社会状态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从没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

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较稠密，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1]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所以，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

但是，人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雌水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还有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又有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

---

[1] “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 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夏洛特皇后群 岛上的海达人部落中，还有 700 人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的家户经济。 在努特卡人那里，整个部落都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生活。

——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都发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无可置疑的遗迹；在这种作坊中发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大概是靠全体和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仍然是一种例外的事件。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酋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①]的时候，个人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起货币作用了。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

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在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①]交给个人使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没有更多的权利。

在这一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件。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金和银已开始用于首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已比铜和青铜高。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首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

[①]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①] “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交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享用，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却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随着男子在家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认，并且永久化了。但是这样一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抗了。

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还软。所以，石制武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仅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101]中，而且在 1066 年的黑斯廷斯会战中[114]都还使用石斧。但是，进步现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间断地、更加迅速地进行着。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

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不作加工按重量交换罢了。

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过渡平行地发生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狄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继续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115]，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经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畜群具有相当规模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存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进一步又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于是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

需。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而自己因此就成为一个居民的最有用的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不过，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年轻的商人阶级还丝毫没有预感到它未来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个阶级正在形成并且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而这就够了。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有了它呢？商人。对货币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他尽心竭力地叫人们知道，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他在实践上证明，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身面前，其他一切财富形式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以后货币的权力再也没有像在它的这个青年时代那样，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横暴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人投在高利贷债权人的脚下，——这两种立法都是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都只有经济上的强制。

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这时还出现了表现为地产的财富。各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他们最近首先力求实现的，正是要摆脱氏族公社索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他们已成为桎梏了。这种桎梏他们是摆脱了，但是不久他们也失去了新的土地所有权。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不折不扣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但是，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纽带。这意味着什么，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作了说明。土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权刚一确立，抵押就被发明出来了（见关于雅典的一章）。像淫游和卖淫紧紧跟着专偶制而来一样，如今抵押也紧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而来了。你们曾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那么好了，现在你们得到它了

——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乔治·唐丹！[1]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只要从一开始就恰巧不是旧的部落显贵，便把部落显贵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民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1],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对着没有它的参与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在一起，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公民中间居住着。直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共同事务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勉强能够安排。除了氏族团体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还千方百计在破坏它。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城市的对立于乡村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构；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构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同时，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外氏族公社的居民，他们在国内已经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像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被逐渐接纳到血缘亲属的血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种封闭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抗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前面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

---

[1] 莫里哀《乔治·唐丹》第 1 幕第 9 场。——编者注

[1] 雅典奴隶的人数见前第 117 页。在科林斯城全盛时代，奴隶的人数 达 46 万人，在埃吉纳达 47 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隶的人数都等于 自由民的十倍。

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贵族制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融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的，氏族制度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从而社会的经济基础依然如故，所以，氏族制度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血族和城市望族的血族中，甚至在农民的血族中，例如在迪特马申[①]，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117 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9 万雅典公民，对于 365 000 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

[①] 对于氏族的本质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个历史编纂学家是尼布 尔，这应归功于他熟悉迪特马申 116 的血族。但是他的错误也是直接 由此而来的。

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屡见不鲜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国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破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那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也是这样。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越增长，股份公司越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越容易实现。除了美国以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甚至一本正经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成绩。不过，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国以外，新的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

德国，很难说普选制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

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插进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作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

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认识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相当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1]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1]；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

---

[1]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1] 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118 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 命题：罗马的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时代”，遗嘱制确切些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代从 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 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出罗马 的法的规定，从而得出了上述的完全非历史的论断。这在该书中是 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结论，认为在罗马 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 学家，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 远。

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①]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 552 页）

写于 1884 年 3 月底—5 月 26 日
1884 年以单行本形式在苏黎世出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32—203 页

[①] 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

恩格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19]（1848—1849 年）[120]

当二月革命[121]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22]。同盟之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同盟除了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在本国大约有 30 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单个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

而对于德国党，则特别指出：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等（《宣言》第 4 章）[②]。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是得到了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就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检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 40 年以后，它已经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巴黎的二月事变促使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匆忙上阵，从而改变了这个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过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但是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状况以及因此同样落后的阶级关系，立刻就发生作用了。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

---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285 页。——编者注

②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306—307 页。——编者注

有勇气，更没有迫切要求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是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不知道它自己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他们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是它现在由于害怕竟不赞成工人们享有这些权利。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当我们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现成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但是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目的也不在这里。

当我们到达科隆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派人士，部分地也由共产主义者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科隆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 24 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不过我们作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编辑部。此人只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第 2 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隆，而不是柏林。首先，科隆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123]而保持有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大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知道它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行动上怯懦的奴颜婢膝的小资产阶级，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京城”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但是，关键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邦法，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到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勒弗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一年徒刑[124]，而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我们于 1848 年 6 月 1 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编辑部的制度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一家必须定时出版的大型日报，如

果采用别的制度，就不能保持一种贯彻始终的立场。况且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勿容置疑的，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才使得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

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分为两个派别：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国变成瑞士式联邦共和国的南德意志派，后者当时几乎是清一色的巴登人。我们当时应该对这两派都进行斗争。不论是把德国普鲁士化，或者是把德国的小邦割据状况永远保存下去，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能容许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个清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碎障碍、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可以较量的战场。但是，建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同样也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容许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制度、传统和王朝，正是德国革命应当打倒的唯一的国内劲敌；此外，普鲁士只有先把德国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才能统一德国。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只能是这样的。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通过对俄战争，而且只有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重、严肃或热烈的。我们的敌人全都很卑鄙，我们对他们一律采取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君主国、权奸、贵族、《十字报》[125]，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对待他们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但是，我们对那些由革命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的态度也没有两样。第一号报纸就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来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怯懦的决议毫无用处。[126] 这篇文章的代价就是使我们失去了一半股东。法兰克福议会甚至连辩论俱乐部都算不上；这里几乎根本不进行什么辩论，而大多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用来鼓舞德国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

柏林议会就具有较大的意义了，它是在同一种实际力量相对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兰克福的空中楼阁里进行辩论和通过决议。因此，对它就谈得较为详细。可是，我们对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尔采-德里奇、贝伦兹、埃尔斯纳、施泰因等的态度，也像对待法兰克福分子的态度一样尖锐；我们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犹豫、畏缩和瞻前顾后，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一点自然引起了民主派小资产者的恐惧，他们正是为了供自己使用才制造出这些偶像的。但是，这种恐惧恰好证明我们击中了要害。

同样，我们也反对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错觉，仿佛革命已经随着三月事变而告结束，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们看来，2 月和 3 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地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伟大的变革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自成一家，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我们大家的愿望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煞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就越顺从，越好说话。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越是对工人政党作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最后，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127]，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痴迷不悟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他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他们在实际上的失败。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结果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政府便把整个议会解散了；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议会已经失去人民的信任。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①]时，我便发觉，我们不只是在一个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捏造的）《人民之友》[128]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吼，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一个完全被歪曲了形象的马拉的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要求不宣布革命已经结束，而宣布革命是不断的革命。

我们曾经公开声明，我们所代表的派别，只有在德国现有的正式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开始为达到我们党的真正目的而斗争：那时我们将成为反对派，同这个最极端的政党相对立。

但是，事变却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昂扬的激情。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卫在自己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129]

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横加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举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

我们的对外政策很简单：支持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派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从 2 月 24 日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130]，运动越是具有全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开始斗争。维也纳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不免延迟了俄国的进攻，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攻的最终到来就越是肯定无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了。

这一政策贯穿着俄军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的每一号报纸，而俄军的入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并决定了革命的失败。

在 1849 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号比一号更猛烈

[①] 阿·布日尔《马拉，人民之友》1865 年巴黎版第 1—2 卷。——编者注

和热情。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 8 篇论文）[131] 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说，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地主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他并且要求 10 亿塔勒的赔偿费。

与此同时，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论文[①]在 4 月间以一组社论的形式发表了，论文明确指出了我们政策的社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 4 月、5 月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 8000 驻军和警察作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 8 枝步枪和 250 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 [132]，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1849 年 5 月 18 日，打击终于到来了。

德累斯顿和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伊瑟隆的起义被围困；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遍布军队，在彻底镇压普鲁士莱茵地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们了。编辑部人员有一半受到法庭迫害；另一半作为非普鲁士人被依法驱逐。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政府有整整一个军团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武器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隆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们说：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①]

《新莱茵报》在它创办即将一周年时就这样停刊了。开始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已经说过，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没有照付，——而在 9 月已经差不多发行到 5000 份了。在科隆宣布戒严时，报纸曾经一度被封；在 10 月中报纸又不得不重新从头开始。但是，1849 年 5 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 6000 订户，而当时《科隆日报》[133]，据该报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 9000 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遭到打击后，编辑部解散了。马克思去了巴黎，当时那里正准备着 1849 年 6 月 13 日 [134] 到来的结局；威廉·沃尔弗这时已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占有他的席位——当时这个议会必须在被从上面解散或是投向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我则到了普法尔茨，作了维利希志愿部队中的副官 [135]。

写于 1884 年 2 月中—3 月初
载于 1884 年 3 月 1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1 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7—26 页

---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331—363 页。——编者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619 页。——编者注

恩格斯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36]

随着 1852 年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决，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第一个时期的帷幕便降下了。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但它从 1836 年起持续到了 1852 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散居国外，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经开展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是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 1847 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的史料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 年和 1854 年柏林版，上下两册。[137] 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重要的史料来源。

我在这里所能谈的只是一个梗概，而且也只限于同盟本身；只能谈一谈为了理解《揭露》[①]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我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光辉的青年时代的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

1836 年，从德国流亡者于 1834 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同盟”中分出了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原先那个只剩下雅科布·费奈迭这类最不活动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沉寂了：当警察在 1840 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相反，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受巴贝夫主义[138]影响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决不排除准备适当时机在德国举行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它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139]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 1839 年 5 月 12 日举行了起义；同盟各支部都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败。

德国人之中被捕的有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路易-菲力浦政府觉得把他们比较长期地监禁之后驱逐出境也就够了。[140] 两人都去了伦敦。沙佩尔出生在拿骚的魏尔堡，他在吉森学习林业科学时于 1832 年加入了格奥尔格·毕希纳组织的密谋团体，1833 年 4 月 3 日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警察岗哨的行动[141]，而后逃亡国外，并于 1834 年 2 月参加了马志尼向萨瓦的进军[142]。他身材魁伟，果断冈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 30 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从“蛊惑者”[143]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要越出他的理智，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能干的人，

[①]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57—536 页。——编者注

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亨利希·鲍威尔生于法兰克尼亚，是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个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

鲍威尔到达伦敦后，遇见了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的沙佩尔，他靠教授语文维持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恢复了同盟的各种中断了的联系，使伦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这里（或许更早些时候在巴黎）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隆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起码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力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 1843 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平均共产主义[①]，我当时还报之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所留给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

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的自由便利了他们。早在 1840 年 2 月 7 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就已经成立，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144] 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员的地方；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当时尚称为“秘所”。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都采用了。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同盟盟员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了它们。凡是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协会等团体。联系主要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这些盟员在必要时也担任特使。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给了同盟很大帮助，这些政府把它们看不惯的工人——十有九个是同盟盟员——全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了特使。

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一个智力非凡的人，但也像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动摇而垮台）等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 [145] 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 1844 年巴黎《前进报》[146] 上所说的话：（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①]这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

在德国也有了许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暂的性质；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后（1846 年底）

[①] 如上所述，我把平均共产主义理解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为依据的共产主义。

[①]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83 页。——编者注

才在柏林（门特尔）和马格德堡（贝克）发现了同盟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

在巴黎，1840 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

同盟骨干是裁缝。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在巴黎，德语在裁缝业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 1846 年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个从德隆特海姆乘船直达法国的挪威裁缝，在一年半内几乎没有学会一个法文字，而德语却学得很好。 1847 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两个支部成员主要是裁缝，有一个支部成员主要是家具工人。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同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那些民族的会员，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阿尔萨斯人。 1847 年，甚至有一个穿军服的英国近卫掷弹兵也成了常客。协会不久便命名为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在会员证上至少用 20 种文字写着（虽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错误）“人人皆兄弟！”这句话。像公开的协会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有限的：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员的民族成分复杂，在理论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经打下了。

通过流亡在伦敦的 1839 年 5 月 12 日起义的战友，同盟和法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激进派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波兰的正式流亡者，也和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说是盟友，不如说是敌人。英国的宪章派，由于他们的运动的性质仅限于英国，被看作不革命的而受到漠视。同盟的伦敦领导者们只是后来通过我才同他们建立了联系。

此外，随着一桩桩事变的发生，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的目光仍然盯着巴黎，把它看作革命策源地——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已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人们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这些德国工人负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们拥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5 月 12 日的经验表明，盲动的企图已经应该放弃。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把每个事变解释为风暴来临的预兆，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谋性的章程，那么，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见，他们的见解已经开始同那些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源于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说，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师傅。通过把裁缝手工业变成听命于大资本家的大规模的家庭工业，从而对裁缝业即现在所谓的服装业实行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这些手工业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刚刚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

的发展，并且能够组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和“正义”暂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形成了。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 年）[147] 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 1844 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 1845 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

但是，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作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作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 [148]，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49]，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 [121] 始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150] 的编辑，我是该报的撰稿人。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马克思是民主协会 [151] 副主席），以及《改革报》[152]（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消息）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们同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们当然是知

道的；1843 年沙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利亚大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以同盟特使的身份出现，和一个疯子哈罗·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他创办了一家报纸 [153]，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通告 [154] 里反对了他，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

后来，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轻的帮工裁缝了，他对自己的才能感到惊讶，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的优势而受忌妒者迫害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暗敌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个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在那里特别是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合不来。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预言家的使命。

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朴素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尔布雷希特这种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种诈取钱财的骗人预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①]，这种通过克利盖和阅读有关著作而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过去的理论观念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使伦敦的盟员认识到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当时伦敦领导者中有两个人无疑促进了这种体会，他们在理论理解能力上大大超过上面所说的那些人。这两个人，是海尔布隆的细工画家卡尔·普芬德和图林根的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②]

一句话，1847 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确信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298—301 页。——编者注

[②] 普芬德约在八年前死于伦敦。他具有一个思维独特而缜密的头脑， 有诙谐、讥讽和舌辩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多年任 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在参加协会总委员会的人当中，有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如下老盟员：埃卡留斯、普芬德、列斯纳、罗赫纳、马克思和 我。后来埃卡留斯完全献身于英国工会运动。

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时代和目的的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

至于说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的的组织，至于说这个组织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使在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对此我们没有怀疑过。而同盟就正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把比较靠近我们的朋友组成一个同盟支部，而我则经常到巴黎的三个支部去。

1847 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现在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说。[1]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已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体。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 1847 年 12 月 8 日最后通过。这个章程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书第 1 册第 239 页附录十。

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同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举行。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经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 17 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经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二月革命爆发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刻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那里事实上已经完全处于戒严状态，特别是德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举行集会了。我们大家都正准备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决定自行解散，把它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并且授权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议（1848 年 3 月 3 日）的五个人刚一分手，警察就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起来，并强迫他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国。

不久我们大家又在巴黎会面了。在这里拟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曾在整个德国传播，并且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155]

---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72 页。——编者注

1.宣布全德国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3.给人民代表支付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武装全体人民。

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宣布农民的抵押地归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交纳给国家。

9.在通行租佃制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交纳给国家。

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它们全部转为国家财产，并且无偿地由没有财产的阶级支配。

14.限制继承权。

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税。

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工人都能生存，并且负责照管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少数人今后仍力图使之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

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卡尔·沙佩尔 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 约·莫尔 威·沃尔弗

当时在巴黎人们热中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解放自己的祖国。德国义勇军是由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领导的。由于一切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但立刻失去工作，而且还在社会上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加入这种义勇军的人数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组织义勇军的办法来摆脱外国工人，于是决定给他们提供 l'étape du soldat，即行军营房和每日 50 生丁的津贴，直到他们到达边境为止，在那里，经常被感动得流泪的外交部长、饶舌家拉马丁就有办法把他们出卖给有关政府。

我们最坚决地反对了这种革命儿戏。正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这一点是有拉马丁作保证的。由于维也纳和柏林的革命取得胜利，组织义勇军已经毫无意义；然而，儿戏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156]，在里面说服工人不要去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返回祖国，在那里为加强运动而进行活动。我们的老友弗洛孔当时任临时政府委员，为那些由我们派回国的工人争得了许诺给义勇军的同样的旅途便利。这样我们就送了三四百个工人回到德国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同盟盟员。

当时很容易预见到，在突然爆发的人民群众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其软

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瓦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开展小小的分散的运动。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形势非常不同，以致同盟要发指示也只能发出极为一般的指示；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要好得多。一句话，自从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消失时起，这样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对于刚刚使这个秘密同盟摆脱了最后一点密谋性残余的人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了。在有《新莱茵报》[119] 作为坚强中心的莱茵地区，在拿骚，在莱茵黑森等等地方，到处都是由同盟盟员在领导极端民主运动。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优势地位成了这样做的障碍。在布雷斯劳，威廉·沃尔弗成效卓著地活动到 1848 年夏天；他还在西里西亚获得了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委任状。最后，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157]，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 1850 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有些太急于要成为大政治家，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块唯一能够持久地实现这些的领土。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乌合之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 1849 年 5 月德累斯顿的起义 [158]，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宗得崩德 [159]，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存在于纸面上，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 1850 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支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的波尔恩没有成为大政治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他那特有的多愁善感的德语。

随着 1849 年巴黎的 6 月 13 日 [134]，随着德国五月起义的失败和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 [160]，1848 年革命的整个伟大时期便结束了。但是，反动派的胜利这时还决不是最后的胜利。必须把被打散的革命力量并从而把同盟重新组织起来。像 1848 年以前一样，形势使得无产阶级任何公开组织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组织起来。

1849 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重新聚集在伦敦；只缺少沙佩尔和莫尔。沙佩尔当时被监禁于威斯巴登， 1850 年春天获释后也到了伦敦。莫尔为了执行重要任务和进行宣传鼓动，曾在极危险的情况下多次出差（最后他在莱茵省普鲁士军队中为普法尔茨炮兵队召募骑乘炮手），后来加入了维利希部队的贝桑松工人连，在穆尔格河战役中在罗腾费尔斯桥边头部中弹牺牲。但这时维利希出现了。维利希是 1845 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

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对于自己肩负着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天生的解放者的使命深信不疑，并以这种预言家身份直接觊觎政治独裁权和同样多的军事独裁权。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维利希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

同盟就这样重新组织起来，发表了刊登在附录（九，第 1 号）中的 1850 年 3 月的《告同盟书》[①]，亨利希·鲍威尔作为特使被派往德国。由马克思和我校审的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各次欧洲革命——1815 年、1830 年、1848—1852 年、1870 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 15 年到 18 年）中在德国无疑会作为使社会摆脱共产主义工人的救星而首先获得政权。因此，在那里所说的，有许多今天也还适用。亨利希·鲍威尔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这个矮小快活的皮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离开了工作，有些是独立进行工作的过去的盟员重新集合在一个积极的组织内，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们。同盟开始在各个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和体操协会中起着比 1848 年以前还要大得多的主导作用，所以在 1850 年 6 月印出的最近一期（三个月一期）告各支部书已经可以指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周游德国的波恩大学生叔尔茨（后来在美国当过部长）“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见附录九，第 2 号）[161]。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起过作用的革命组织。

然而这个组织应当有怎样的作为，则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涨的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 1850 年期间越来越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经准备了 1848 年革命的 1847 年工业危机已经消除；一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每个长着眼睛来看事物，并且用它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1848 年的革命风暴正在逐渐平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从这个基础上反弹回来。”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62]的《1850 年 5 月至 10 月时评》一文里这样写过（1850 年汉堡版第 5、6 两期合刊第 153 页）。[①]

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作邪说，那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要的德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们不但为各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而全部问题不过是要用举借革命贷款的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的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364—375 页。——编者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13—514 页。——编者注

个共和国。因此，像维利希这样一个人落入这种圈套，连怀有旧日革命热情的沙佩尔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数伦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也跟着他们滚入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制造者的阵营，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我们所坚持的沉着态度并不合乎这班人的口味；他们认为，应该开始制造革命；我们极为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做法。于是发生了分裂。关于以后的情况，可在《揭露》里读到。接着，诺特荣克首先被捕，后来又有豪普特在汉堡被捕，后者成了叛徒，竟泄露了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并且还必须在法庭审判时充当主要证人；他的亲戚不愿蒙受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去了，后来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于他有功，先被任命为普鲁士总领事，后又被任命为德国总领事。现在他又在欧洲了。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隆被告的名单列在下面：（1）彼·格·勒泽尔，雪茄烟工人；（2）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后来去世时是进步党邦议会议员；（3）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数年前在布雷斯劳去世，那时正做摄影师；（4）威·约·赖夫；（5）海尔曼·贝克尔博士，现任科隆市市长，上议院议员；（6）罗兰特·丹尼尔斯博士，医生，案件以后几年死于在狱中染上的肺病；（7）卡尔·奥托，化学家；（8）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目前在纽约当医生；（9）约·雅·克莱因博士，目前在科隆当医生并任市议员；（10）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但他当时已在伦敦；（11）约·路·埃尔哈德，店员；（1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裁缝，目前住在伦敦。经过 1852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12 日的公开审判，他们之中由陪审法庭按未遂叛国罪判处六年要塞监禁的有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判处五年徒刑的有赖夫、奥托和贝克尔，判处三年徒刑的有列斯纳；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德被宣告无罪。

从科隆案件时起就结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我们解散了我们的同盟；又几个月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159]也一命呜呼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那时，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工业不断急遽发展的大工业国了。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理解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和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经济上的对立，因为那时这种对立本身还刚刚产生。现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迟一下德国无产阶级发展到完全理解它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的过程，也必须对整个德国无产阶级使用非常法。那时，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人到二十人不等的小团体悄悄地举行集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的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何章程、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国。俾斯麦在欧洲、在德国境外是公断人；而在国内，却如马克思还在 1844 年就已预见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双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立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

---

[1] 沙佩尔在 60 年代末在伦敦去世。维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并且战功 卓著；他任准将时在默夫里斯伯勒（田纳西州）战役中胸部受伤，但 又治愈；约于十年前在美国去世。关于上面说过的其他人，我还要指 出：亨利希·鲍威尔在澳大利亚失踪了，魏特林和艾韦贝克在美国 去世。

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经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同盟在 1847 年到 1852 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作狂人呓语，看作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 年 10 月 8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41—261 页

载于 1885 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并载于 1885 年 11 月 12、19 和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6—48 号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63]
1888年单行本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①]。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3]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①]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现在经过修订以单行本出版。

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②]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1—412页

---

① 见本选集第2卷第34页。——编者注

① 指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② 指《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编者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1]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 1848 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 1848 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正像在 18 世纪的法国一样，在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164]。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 1833 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165]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166]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167] 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 1789 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

---

[1] 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斐·恩克版。

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168]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用不着去研究这种观察方法是否同自然科学的现状完全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遥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确实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169]中，尽管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外化”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

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这个人想出了绝对观念，那么在实践上也一定达到了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这个绝对观念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对同时代人的实践的政治的要求不可提得大高。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对这些结构，直到现在他的渺小的敌人还发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完结了，而世界历史虽然已经无事可做，却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因而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旦我们认识到（就获得这种认识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 1830 年到 1840 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手；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维劳动”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 30 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越来越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虔诚派的正统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国家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 1840 年，正统教派的虔诚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一派或那一派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170] 中实践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么，在 1842 年的《莱茵报》[171] 上青年黑格尔学派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 1840 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 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成了第一个推动力。后来，布鲁诺·鲍威尔反对该书中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证明许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创作神话的途径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问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最后，出现了施蒂纳，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许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①]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可以说是这个观念的下降；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彷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

[①] 指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 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这样。这种崇拜，尽管不能认为有道理，在“纯粹思维”的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至高统治下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从 1844 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同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紧密相连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下面可以看到，这一任务是怎样实现的。

但是这时，1848 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①]，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出现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该怎么办。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步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

---

① 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 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要对自己出现 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 1884 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172

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作出进一步的结论：他的哲学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 300 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 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必定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 [173]，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而不可知论者企图在英国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么，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驳倒，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拘泥于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相继表现出来的这位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而这决不是到处都不可避免的。作者越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越是把各种流派、特别是现在流行的自封的哲学派别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越大。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

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终于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身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而且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认为的那种东西，即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174]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 18 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18 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 50 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力的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已经知道，自然界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不会前进；它总是产生同一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作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的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 18 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

学的基础上到处都出现了对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预想（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 14 和 15 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50 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并到处兜售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进一步发展理论，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去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 1848 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么，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 15 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成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纷纷涌来的这一大堆杂乱的发现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有了条理。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的发现，费尔巴哈在世时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对科学充分关注，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何况对这些发现就连当时的自然科学家有的还持有异议，有的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里只能归咎于德国的可怜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座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小识小见之徒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得完全正确：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一点费尔巴哈是做不到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 1840 年或 1844 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 19 页）“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理想的力量吗？”（第Ⅷ页）

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作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至多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必然联系；然而康德自己把他的哲学叫作“先验的唯心主义”，决不是因为那里也讲到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是施达克会记得的。有一种迷信，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迷信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习气（见《现象学》[1]）。

第二，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

第三，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 [175] 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流传下来的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庸人偏见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虽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习以为常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教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怜惜怜惜读者吧。

---

[1] 即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三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融化在宗教中。

“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某一历史运动，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不应当说宗教也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176]（引自施达克的书，第168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象）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而性爱在最近800年间获得了这样的发展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通行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立法神圣化；这些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在法国，从1793年到1798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感觉到需要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宗教去代替它。

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抛开对某种在他看来也已成为过去的特殊宗教的回忆，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作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因此，仅仅为了使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40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说：因此，无神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费尔巴哈想以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建立真正的宗教，这就等于把现代化学当作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么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可以存在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成上也出了一份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

“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

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古老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传布的，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拿

日耳曼人来说，甚至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以及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在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里，我们才发现比较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甚至在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内，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也只有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 13 世纪到 17 世纪，才带有这种宗教色彩；而且，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 18 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挡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用不着我们去把这些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使这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离开费尔巴哈多么远了。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现在已经不值一读了。

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即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映象。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被反映为这个神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思想上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扬感性，宣扬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人们之间纯粹的性关系以外的某种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的确，在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出现这样的命题：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177]——“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养料，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养料了。”[178]——“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179]，等等。

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用这些命题去干什么，它们始终是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关于社会的学说，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180]。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黑格尔指出：

“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181]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他有句名言：

“当人最初从自然界产生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182]——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是根本不结果实的。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只能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他人有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又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他一切准则都是从中引伸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乏和空泛。

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会对己对人都有利。他的这种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满足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娱乐、辩论、活动、消费和加工的对象。费尔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说得很直截了当：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养料，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养料了。”

至于说到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绝对的，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依法”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资产

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和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从那时以来并且由于那个缘故，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至于说到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是否好一些呢？就连“萨多瓦的教师”[183]不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吗？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么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的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是自愿到交易所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时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赔了钱，那么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错了，而且，我在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威风来。只要爱不纯粹是温情的空话，交易所也是由爱统治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做的事情，爱也在这里得到实现。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么我就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还成了富翁。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可是爱啊！——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而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

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 1848 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

得这种悲惨的结局。

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四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184]以后，就只从事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重要的；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怪物；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不仅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①]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阐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接过来了。但是这种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的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维的人脑为转移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

[①]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 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 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 40 年，在这以前和这 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 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 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 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 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 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 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 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①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

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这一发现，不仅使我们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使我们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看出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从而能完成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量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辐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研究者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

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相反，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186] 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那些纯属空谈的说明表示不满。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

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现在工人不再像 1848 年在莱茵地区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已经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简化了，以致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 1815 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 1830 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那种大的、曾经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说不通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推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了；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完全打碎。但是，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

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么，以前的一切时代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当然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义，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的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罗马法，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进行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加工成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种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邦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制定出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编纂学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 15 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上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亲属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无可争辩地由别的神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古老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这个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

异族的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187]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能够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188]为了使它成为国教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它在250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189]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同封建贵族进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斗争便开始采取全国性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190]。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败；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191]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192]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皮埃尔·培尔已经在忙于从事活动，而1694年伏尔泰也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便于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国民议会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

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理性主义，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还加了一些例证。证明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而在这里我可以说，在其他著作中证明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

随着 1848 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193]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碍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思辨[①]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公开敌对的时代了。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写于 1886 年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6 年《新时代》杂志第 4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① 德文“Spekulation”既有“思辨”的意思，也有“投机”的意思。——编者注

期和第 5 期，并于 1888 年以单行本形式在斯图加特出版

第 21 卷第 301—353 页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节选）[194][1878年的计划][195]

1.历史的导言：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2.自黑格尔以来的德国理论发展的进程（旧序[①]）。回到辩证法上去是不自觉的，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

3.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4.各种科学的联系。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圣西门（孔德）和黑格尔。

5.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概要：

（1）数学：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数学的无限出现在现实中；

（2）天体力学——现在被看作一个过程。——力学：出发点是惯性，而惯性只是运动不灭性的反面表现；

（3）物理学——分子运动的相互转化。克劳修斯和洛施米特；

（4）化学：理论，能。

（5）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必然性和偶然性。

6.认识的界限。杜布瓦-雷蒙[196]和耐格里[197]——亥姆霍兹，康德，休谟。

7.机械论。海克尔。[198]

8.原生粒的灵魂——海克尔和耐格里。[199]

9.科学和讲授——微耳和。[200]

10.细胞国家——微耳和。[201]

11.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海克尔和施米特。[202] 因劳动[Arbeit]而发生的人的分化。——经济学应用于自然科学。亥姆霍兹的“功”[“Arbeit”]（《通俗讲演集》第2卷）。[203]

---

① 指《<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见本卷第281—290页。——编者注

[历史导论][导 言] [204]

现代的自然研究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毫无结果地消失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现代的自然研究，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①],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个时代是从 15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王权依靠市民打败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Nationälität]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民族[Nationen]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当市民和贵族还在互相争斗时，德国农民战争就预告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持红旗，高喊财产共有的要求。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典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日耳曼语族各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族各民族那里，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一种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囿于小市民习气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又加以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 16 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 [205]。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

[①] 即 16 世纪。——编者注

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自然研究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自然研究同开创了近代哲学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道，把自己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由的自然研究方面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能把乔尔丹诺·布鲁诺一下子便烧死，至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自然研究用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了路德焚烧教谕行为的一个革命行动，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怯懦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206]。从此自然研究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要求之间的争执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很有力量，其发展势头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距离（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

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的这一最初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领域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玫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力学，和它靠近并且为它服务的，是一些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臻完成。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立了；主要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一举弄清楚了。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角度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甚至离眼前的这种完成还很远。液体和气体的力学只是在这个时期末才有了更多的研究[①]。如果把光学当作例外，那么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在当时还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而光学取得例外的进步是由于天文学的实践需要。化学刚刚借助燃素说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207] 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因此古生物学还完全不可能存在。最后，在生物学领域内，人们主要还是从事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仅是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材料，而且还有解剖学和本来意义上的生理学的材料。至于各种生命形式的相互比较，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气候等等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则还几乎谈不上。在这里，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几乎已经完成。

然而，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某种独特的总观点，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托里拆利在治理阿尔卑斯山区河流方面的研究。”——编者注

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旋转下去，永不停息，或者直至旋转到万物的末日。恒星永远固定不动地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凭着“万有引力”而互相保持这种位置。地球亘古以来或者从它被创造的那天起（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就一成不变地总是保持原来的样子。现在的“五大洲”早就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的山岭、山谷和河流，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而这些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只有经过人手才发生变化或移动。植物和动物的种，一形成便永远固定下来，原来是什么样，所产生的东西仍是什么样，而当林耐承认通过杂交有时可能育出新种的时候，这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了。与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不同，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着。自然界中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面临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

18 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着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研究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解释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作物质的本质特性，那么开初造成行星轨道的未经说明的切向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些问题，自然科学往往只能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之初向神学下了挑战书；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这一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这时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种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当时的哲学博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并把细节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我把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也算入这个时期，因为除了上面所叙述的，再也没有其他的自然科学材料可供他们利用。康德的划时代的著作对于他们依然是一个秘密，而拉普拉斯在他们以后很久才出现。[208] 我们不要忘记：这种陈旧的自然观，虽然由于科学的进步而显得漏洞百出，但是它仍然统治了 19 世纪的整个上半叶[①]，并且一直到现在，所有学校里主要还在讲授它。[②]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旧的自然观的知识，为把全部自然科学 概括为一个整体提供了基础。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还是纯粹机械地进 行罗列，后来圣西门和由黑格尔完成的德国哲学曾同时做过这方面 的工作。”——编者注

[②] （注释）有一个人以自己的科学成就提供了排除上述观点的极其重 要的材料，可是直到 1861 年，这个人居然还毫不动摇地相信这种观 点，下面这段典型的表述就是证明：“我们的太阳系的整个机制，就我们

在这种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位自然研究家，而是一位哲学家。1755 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推动的问题被排除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如果说大多数自然研究家对于思维并不像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209] 这个警告中那样表现出厌恶，那么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从而避免无穷无尽的弯路，省去在错误方向下浪费的无法估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和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不仅在空间中必然有并存的历史，而且在时间上也必然有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么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成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歇尔才充实了他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逐渐受人重视。进一步的一些发现使它终于获得了胜利；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恒星的自行；证明宇宙空间中存在着有阻抗的介质；通过光谱分析证明宇宙物质的化学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炽热星云团的存在[①]。

但是，如果这个逐渐被认识到的观点——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么大多数自然研究家是否会这样快地意识到变化着的地球竟承载着不变的有机体这样一个矛盾，那倒是值得怀疑的。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揭示了相继形成的和逐次重叠起来的地层，而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灭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骼，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必须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现今的表面以及在这一表面上生存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这种承认最初是相当勉强的。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变革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取代了上帝的独一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杠杆。最初把理性带进地质学的是赖尔，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些渐进的作用，取代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起而引起的突然变革。[①]

赖尔的理论，与以前的一切理论相比，同有机物种不变这个假设更加不能相容。地球表面和各种生存条件的逐渐改变，直接导致有机体的逐渐改变和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异性。但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也是一种势力。赖尔本人许多年来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的学生们就更没有看到。这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流行的分工

所能识别的而言，就是要去 保持现存的东西，保持其长久不变的存在。正如从远古以来，地球上 的任何一种动物，任何一种植物，都没有变得更完美些，或者说根本 就没有变过样；正如我们在一切有机体中见到的阶梯次序只是彼此 靠近，而不是彼此相继；正如我们本身的种属从躯体方面来看始终 是一样的，——同样，甚至同时存在的诸天体的极大的多样性，也并 没有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各种形式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梯， 正好相反，一切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本身具有同样的完美性。”（梅特 勒《通俗天文学》1861 年柏林第 5 版第 316 页）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潮汐对地球自转的阻碍作用也是由于康德现在才被认识。”——编者注

① 赖尔的观点的缺陷——至少就这一观点的最初的形式来说——就 在于，他认为在地球上发生作用的各种力是不变的，在质上和量上 都是不变的。地球的冷却对他说来是不存在的；地球不是朝着一定 的方向发展着，而只是以杂乱无章的、偶然的方式变化着。

来说明，它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它夺走纵览全局的眼力。

这期间物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成果由三位不同的人在自然研究的这一部门的划时代的一年即 1842 年中几乎同时作出概括。迈尔在海尔布隆，焦耳在曼彻斯特，都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热的机械当量的确定，使这个结果成为无可置疑的。同时，格罗夫 [210]——不是职业的自然研究家，而是英国的一名律师——通过单纯地整理物理学上已经取得的各种成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会损失任何力。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即物理学上的各个不变的“种”，就变成以不同方式分化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存在着这样多那样多的物理力这样一种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已经得到证明。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获得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表明：运动着的物质的永恒循环是最终的结论。

从拉瓦锡以后，特别是从道尔顿以后，化学的惊人迅速的发展从另一方面向旧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就证明了适用于无机物的化学定律对有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平了。

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特别是由于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地进行的科学旅行和科学探险，由于生活在当地的专家对世界各大洲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确的考察，此外还由于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尤其是从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发现细胞以来的进步，已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使得运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同时也成为必要[①]。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查明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不同的有机体按照它们的同类器官相互进行了比较。不仅就它们的成熟状态，而且就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进行了比较。这种研究越是深刻和精确，那种固定不变的有机界的僵硬系统就越是一触即溃。不仅动物和植物的单个的种之间的界线无可挽回地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冒出了像文昌鱼和南美肺鱼 [211] 这样一些使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遭到嘲弄的动物[①]；最后，甚至发现了说不清是属于植物界还是动物界的有机体。古生物学档案中的空白越来越多地被填补起来了，甚至最顽固的分子也被迫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单个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信服的一致，承认有一条阿莉阿德尼线，它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越来越深地陷进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的同时，即在 1759 年，卡·弗·沃尔弗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213] 但是这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 100 年以后，即 1859 年，才由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②]。几乎同时还发现，以前被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胚胎学”。——编者注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一角鱼。同样，始祖鸟等等”。212——编者注

[②] 达尔文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于 1859 年 11 月 24 日出版。——编者注

说成是一切有机体的最后构成成分的原生质和细胞，原来是独立生存着的最低级的有机形式。因此，不仅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而且机体种源说过去遇到的一个最根本的困难也被排除了。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214]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则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其形式更加明确得多。的确，从经验上证明这种循环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与已经确立的东西相比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会一年一年地弥补起来。如果我们想到科学的最主要的部门——超出行星范围的天文学、化学、地质学——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100年，生理学的比较方法还不足50年，而几乎一切生命发展的基本形式即细胞被发现还不到40年，那么这种证明在细节上怎么会没有缺陷呢[①]！

——

从旋转的、炽热的气团中（它们的运动规律也许要经过几个世纪的观察弄清了恒星的自行以后才能揭示出来），经过收缩和冷却，发展出了以银河最外端的星环为界限的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和太阳系。这一发展显然不是到处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在我们的星系中，黑暗的、不仅仅是行星的星体的存在，即熄灭了的太阳的存在，越来越迫使天文学予以承认（梅特勒）；另一方面，属于我们这一星系的（依据赛奇的观点）还有一部分气状星云，它们是还没有形成的太阳；这并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另一些星云如梅特勒所认为的，是一些遥远的独立宇宙岛，这些宇宙岛的相对发展阶段要用分光镜才能确定。[215]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尚未被超越的方法详细地证明了一个太阳系是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的；以后的科学越来越证实了他的说法。

在这样形成的各个天体——太阳以及行星和卫星上，最初是我们称为热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占优势。甚至在今天太阳还具有的那种温度下，也是谈不上元素的化学化合物的；对太阳的进一步的观察将会表明，在这种场合下热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电和磁；在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不过是由于热和重力发生冲突而造成的，这在现在几乎已成定论。

单个的天体越小，便冷却得越快。首先冷却的是卫星、小行星和流星，正如我们的月球早已死灭了一样。行星冷却较慢，而最慢的是中心天体。

随着进一步的冷却，相互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交替就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亲和性开始起作用，以前化学上的呆性元素现在在化学上相继发生分化，获得了化学性质，相互发生化合作用。这些化合作用随着温度的下降（这不仅对每一种元素，而且对元素的每一种化合作用都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一部分气态物质由于温度下

---

① 手稿中本段上下端均用横线同上下文隔开，中间划有几道斜线，恩 格斯通常以这一方式表示手稿相应段落已在其他著作中利 用。——编者注

降先变成液态、然后又变成固态，随着这样造成的新条件，而不断地变换。

当行星有了一层硬壳而且在其表面上有了积水的时候，行星固有的热同中心天体传递给它的热相比就开始越来越处于次要地位。它的大气层变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气象现象的活动场所，它的表面成为地质变化的场所，在这些地质变化中，大气层的沉降物所起的沉积作用，同来自炽热而流动的地球内部的慢慢减弱的外张作用相比越来越占有优势。

最后，一旦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再超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么在存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有生命的原生质。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直到现在连蛋白质的化学式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化学上不同的蛋白体究竟有多少，而且只是在大约十年前才认识到，无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形成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定形的蛋白质由于形成核和膜而得以产生第一个细胞。但是，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也就有了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发展的基础；我们根据古生物学档案的完整类比材料可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其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216]留传了下来；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逐渐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则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搏斗，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得以最终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从此人和猿之间的鸿沟就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的身躯的肢体，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而人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和主要是借助于手。甚至蒸汽机这一直到现在仍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影响某些个别的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条件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自然规律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是部分地借助于手而相应地发展起来，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如

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无意识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这种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适得其反，那么情况就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作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但是，“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①]。也许经过多少亿年，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这样一个时期会无情地到来，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越来越聚集在赤道周围，最终连在那里也不再能够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渐渐地消失，而地球，一个像月球一样死寂的冰冻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越来越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太阳上面。有的行星遭到这种命运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晚些；代替配置得和谐的、光明的、温暖的太阳系的，只是一个寒冷的、死去的球体，它在宇宙空间里循着自己的孤寂的轨道运行着。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我们的宇宙岛的其他一切星系或早或迟地都要遭到这样的命运，无数其他的宇宙岛的星系都是如此，还有这样一些星系，它们发出的光在地球上还有活人的眼能接受时将不会达到地球，甚至连这样一些星系也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并且遭受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会怎样呢？太阳的遗骸是否将永远作为遗骸在无限的空间里继续运转，而一切以前曾无限多样地分化了的自然力，是否将永远变成引力这样一种运动形式？

“或者”，如赛奇问道（第 810 页），“在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些力，它们能使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重新唤起它的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不知道的。”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像知道 2×2=4 或物质引力的增减取决于距离的平方一样。理论自然科学把它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加工为一个和谐

[①] 歌德《浮士德》第 1 部第 3 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的整体，现在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寸步难行；但是在这样的理论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运用还不完全清楚的数量去进行计算，并且总是用思想的彻底性去补救有缺陷的知识。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接过运动不灭的原理；离开这个原理它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但是物质的运动不仅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它也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乃至意识。有人说，物质在其整个无限悠久的存在中仅仅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与其永恒性相比只是极短的时间内，才有可能使自身的运动发生分化，从而展开这种运动的全部富源，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就等于宣称物质是会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性不能仅仅从数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一种物质的纯粹机械的位置移动即使有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热、电、化学作用、生命，但是这种物质如果不能从自身中产生这些条件，那么这样的物质就丧失了运动；一种运动如果失去了转化为它所能有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能力，那么即使它还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宇宙岛的物质把极大量的运动——究竟是何种运动，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转化成了热，以致（依据梅特勒的说法）从中可能产生了至少包括了 2000 万颗星的太阳系，而这些太阳系的逐渐灭亡同样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转化是怎样进行的呢？关于我们的太阳系的将来的遗骸[①]

是否总是重新变为新的太阳系的原料，我们和赛奇神父一样，一无所知。在这里，我们要么必须求助于造物主，要么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形成我们的宇宙岛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天然具有的，因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由物质再生产出来，即使是在亿万年之后，是多少偶然地然而是以寓于偶然性之中的必然性再生产出来。

这种转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被承认了。现在人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天体的最终命运是互相碰在一起。人们甚至已经计算这种碰撞必然产生的热量。天文学所报道的新星的突然闪现和已知旧星的同样突然的亮度增加，用这种碰撞来说明最为便当。同时，不仅我们的行星群绕着太阳运动，我们的太阳在我们的宇宙岛内运动，而且我们的整个宇宙岛也在宇宙空间中不断运动，和其余的宇宙岛处于暂时的相对平衡中；因为连自由浮动的物体的相对平衡也只有在相互制约的运动中才能存在；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宇宙空间中的温度不是到处都一样的。最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的热，除了极小的一部分以外，都消失在空间里，甚至不能把宇宙空间的温度提高百万分之一摄氏度。这全部巨大的热量变成了什么呢？它是不是永远致力于为宇宙空间供暖的尝试，是不是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只在理论上仍然存在于宇宙空间的温度已上升百亿分之一度或更低度数这一事实中？这个假定否认了运动的不灭性；它认可这样一种可能：由于天体不断地相互碰在一起，一切现存的机械运动都变为热，而且这种热将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尽管存在“力的不灭性”，一切运动还是会停下来（在这里顺便可以看出，

[①] 遗骸的原文是“caputmortuum”，直译是骷髅，转意是遗骸，燃烧、化 学反应等等之后的残渣；这里指熄灭的太阳和落在太阳上失去生命 的行星。——编者注

用力的不灭性这个说法替代运动的不灭性这个说法，这是多么错误）。于是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某个时候自然研究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气团的主要困难便消除了。

此外，诸宇宙在无限时间内永恒重复的先后相继，不过是无数宇宙在无限空间内同时并存的逻辑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甚至已灌输到德雷帕的反理论的美国人头脑中去[①]。

这是物质赖以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完成其轨道所经历的时间用我们的地球年是无法度量的，在这个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然界意识的人的生命的时间，如同生命和自我意识赖以发生作用的空间一样，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每一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了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但是，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亿个太阳和地球产生和灭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上形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有多么多的数也数不尽的有机物必定先产生和灭亡，然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适于生存的条件，然后又被残酷地消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①] “无限空间中的无数宇宙，引出了无限时间中宇宙先后相继的概念。”（德雷帕《欧洲智力发展史》第2卷第[325]页）

[札记和片断]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数学也开始发展。——后来，在农业的某一阶段上和在某些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型建筑物的出现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力学。不久，力学又成为航海和战争的需要。——力学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它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可见，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这三个部门，而在后古典时期才有了精确的和有系统的研究（亚历山大里亚学派、阿基米德等）。在头脑中几乎还没有区分开来的物理学和化学（元素论，还没有化学元素的概念）中，在植物学、动物学、人体和动物解剖学中，直到那时人们还只会搜集事实和尽可能有系统地整理这些事实。生理学一离开最明显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成了纯粹的猜测；在连血液循环都不知道的时候，也不能不如此。——在这一时期末，化学以炼金术的原始形式出现了。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展示出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①]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这时——撇开早就有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不谈——物理学和化学最终分开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业上的水利工程第一个研究了液体的运动，见克拉克·麦克斯韦）。波义耳使化学确立为科学。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使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动物学和植物学起初依然是从事搜集事实的科学，直到出现了古生物学——居维叶——并且此后不久发现了细胞和发展出了有机化学。由此，比较形态学和比较生理学才成为可能，而且从此以后两者才成为真正的科学。在上一世纪末地质学奠定了基础，最近则有名称很别扭的所谓人类学，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中介。这还要进一步详加研究和阐明。

[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217]（《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序言）

这部著作决不是由于“内心冲动”而产生的。恰恰相反，我的朋友李卜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以前人们只夸耀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事实，但是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实却多得数不胜数。”——编者注

克内西可以为我作证：他曾经费了多少力气才说服我来批判性地阐明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下定这样的决心后，我不得不把这种被宣称为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理论同这一体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舍此别无其他选择。因此，我只好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 1877 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

对于一种大肆自我吹嘘却根本不值一提的体系不得不作出这个对象本身所要求的详尽批判，可以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这种批判使我有可能在不同领域中正面阐发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我根本不想以另一个体系来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不过也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所考察的材料的极其多样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哲学体系，特别是自然哲学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无数新体系，就更不用说了。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买主对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每个人什么东西都能写，而“科学自由”恰恰就在于人们甚至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东西，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218]。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中于高超的胡说；只有实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才很少为这种高超的胡说所迷惑，而在一个除了自然科学以外目前几乎普遍患病的国家里，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工人阶级具有非常健康的本性。

耐格里在他向自然研究家慕尼黑大会所作的演说中曾谈到人的认识永远不具有全知的性质[197]，他这样说显然还不知道杜林先生的贡献。这些贡献迫使我也跟随其后进入一系列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我顶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行动。这特别是指自然科学各个部门而言，在这些部门中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认为，一个“门外汉”想发表意见未免不大谦虚。不过微耳和先生给了我几分勇气，这位先生也在慕尼黑发表了看法，并在另外的地方作了更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每个自然研究家在本身的专业之外也只是一个半通，不客气地说是一个门外汉。既然一位这样的专家可以而且不得不常常不揣冒昧地侵犯邻近的领域，既然在这些领域中他在表达上的笨拙之处和些许不确切之处可以得到有关专家的谅解，那我也就敢于放手来引用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以作为我的一般理论观点的例证，并且可以指望得到同样的谅解。[①]

[①] 本手稿从开头到本段为止这一部分，恩格斯从上到下划了直线，可能表示他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

现今的自然研究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关心理论上的一般结论，同样，每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不可抗拒地被迫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这里出现了某种相辅相成现象。如果说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么今天的自然研究家在理论的领域中，在直到今天还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实际上也是个半通。

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1]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现在仍是激烈争辩的领域。而辩证法直到今天也只有两位思想家曾作过较仔细的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

其次，认识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各种见解，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提出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尺度。然而，在理论自然科学中，往往非常明显地显露出对哲学史缺乏认识。哲学上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并且在哲学界中往往早已被抛弃的一些命题，在理论自然研究家那里却常常作为崭新的知识而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时髦。机械的热理论以新的论据支持了能量守恒原理，并使这一原理重新受到重视，这无疑是它的一个重大成就；但是，如果物理学家先生们还能记起，这一原理早就由笛卡儿提出过，那么它还能以某种绝对全新的东西的面貌出现吗？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再一次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必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甚至最优秀的自然研究家对这种哲学所作的研究也是何等肤浅！例如，凯库勒指出（《化学的目的和成就》），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谟克利特，并且断言，道尔顿最先假定了不同质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且最先认定不同元素具有各自特有的不同重量。可是，我们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第 10 卷第 43—44 和 61 节）中可以看到：伊壁鸠鲁就已经认定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不相同[1]，也就是说，他早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认识了原子量和原子体积。

中已经利用过了。——编者注

[1] 手稿中这一句和前面一句都用铅笔划掉了。——编者注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29 页。——编者注

1848 年这一年在德国一事无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发生了全面的反转。由于民族热中于实际，一方面初步建立起大工业和欺诈事业，另一方面为德国自然科学此后所经历的、由巡回传教士和漫画人物福格特、毕希纳等等所揭开的巨大跃进奠定了基础，于是民族坚决屏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的风沙中迷失道路的德国古典哲学。柏林的老年黑格尔派确实应该遭到这样的命运。但是，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可是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接受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随同黑格尔派一起抛进大海，因而又无可奈何地陷入旧的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起来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和尔后甚至是哈特曼的迎合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在大学里，各种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展开竞争，不过在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这就是它们全都是由过时哲学的十足的残渣拼凑而成的，并且全都同样地是形而上学的。在古典哲学的各种残余中，只有某种新康德主义得以幸存，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后一言就是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下来的部分。最终的结果就是现今盛行的理论思维的漫不经心和杂乱无章。

现在几乎找不到一本理论自然科学著作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自然研究家们自己就感觉到，这种漫不经心和杂乱无章多么严重地左右着他们，并且现今流行的所谓哲学又决不可能使他们找到出路。在这里，既然没有别的出路，既然无法找到光明，也就只好实行反转，这种或那种形式上的反转，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

这种复归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实现。它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但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在进行中，特别在生物学中是如此。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在这些形态中，有两种形态对现代的自然科学可以格外有益。

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辩证思维还以原始的朴素的形式出现，还没有受到令人迷醉的障碍[①]的干扰，而这些障碍是 17 和 18 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为自己设置的，并且由此就堵塞了它自己从认识个别到认识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肢解、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整体、从总体上来进行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的联系还没有从细节上加以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观的结果。这正是希腊哲学的缺陷所在，由于这种缺陷，它后来不得不向其他的观点让步。然而这也是希腊哲学胜过它以后的所有形而上学的对手的优越之处。如果对于希腊人来说形而上学在细节上总是有理的，那么对于形而上学来说希腊人就从总体上总是有理的。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上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上来的原因之一，这个民族的广泛的才能和活动使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享有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希腊哲学的

[①] 海涅《新春集》1831 年版诗序。——编者注

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这种见解已经越来越被接受。有一种自然研究家是越来越少了，这种研究家一方面把希腊哲学的残篇如原子论当作永恒真理来看待，另一方面以希腊人缺少经验自然科学为理由而对他们采取培根式的高傲的蔑视态度。但愿上述见解再前进一步，能促使人们对希腊哲学真正有所认识。

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研究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已经有了开头，因为即使把刚才提到的新康德主义除外，回到康德去又重新成为时髦。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首创者以来，他在自然研究家当中重新获得了应有的荣誉。这两个假说就是先前曾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起源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没有这两个假说，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简直就不能前进一步。但是，要向康德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件劳而无功和得不偿失的事情，因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辩证法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立脚点出发而展开的。

一方面，由于这种错误的立脚点和柏林黑格尔派的无可奈何的堕落，人们对“自然哲学”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这种反应已充分表现出来并演成纯粹的谩骂；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在有理论上的需要时又被流行的折衷主义的形而上学置于完全无援的境地。而在这以后，也许才有可能在自然研究家面前重新提起黑格尔的名字，却不致引发使杜林先生出尽洋相的舞蹈病。

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的问题决不是要捍卫黑格尔的立脚点：精神、思维、观念是本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这种立脚点已经被费尔巴哈屏弃了。在下述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是一致的：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①]；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

同样，也谈不上保持黑格尔体系的独断的内容，而这一内容正是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随着唯心主义立脚点的垮台，建筑在这一立脚点上的体系，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垮台了。但是要记住，自然科学上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在对黑格尔有大致正确理解的范围内，仅仅针对以下两点：唯心主义的立脚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

去除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①]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成功，以致德国的较新的经济学派只是由于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袭马克思（还常常抄错），才胜过了庸俗的自由贸易

[①] 手稿中接着删掉一句话：“我们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甚至比自然科学家走得还远得多，因为我们也……”——编者注

[①] 见本选集第 2 卷第 112 页。——编者注

派。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着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①[①]

可是，在自然科学本身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理论，它们把真实的关系弄颠倒了，把映象当作了原型，因而这些理论同样需要倒置过来。这样的理论常常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盛行。在差不多两个世纪内，热一直不是被看作普通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而是被看作一种特殊的神秘的物质，在这里情况就是如此，而机械的热理论才完成了这种倒置。尽管如此，热质说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却发现了关于热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定律，特别是傅立叶和萨迪·卡诺[219]为一些正确的见解开辟了道路，而这些见解不过是把其先驱所发现的定律倒置过来，翻译成自己的语言。[①]同样，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上百年的实验工作才提供了一些材料，而拉瓦锡利用这种材料才在普利斯特列提取出来的氧气中发现了想象中的燃素的实在对立物，从而推翻了全部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成果决不因此就被抛弃。正好相反。这些成果依然存在，只不过其表述被颠倒过来，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行的化学语言，因此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也就正像热质说同机械的热理论的关系一样，正像燃素说同拉瓦锡的理论的关系一样。

[①] 见本选集第 2 卷第 112 页。——编者注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卡诺函数 C 的倒数　绝对温度。此函数不倒置过来，毫无用处。”——编者注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220]

深入大众意识的辩证法有一个古老的命题：两极相联。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在寻找幻想、轻信和迷信的极端表现时，不是面向像德国自然哲学那样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框子内的自然科学派别，而是面向一味吹捧经验、极端蔑视思维而实际上思想极度贫乏的相反的派别，我们就不致于犯什么错误。后一个学派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它的始祖，备受称颂的弗兰西斯·培根就已经渴望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能够付诸应用，而首先是做到这样一些事情：延年益寿，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返老还童，改形换貌，易身变体，创造新种，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他抱怨这种研究无人问津，他在他的自然史中开出了制取黄金和创造种种奇迹的煞有介事的丹方[221]。同样，伊萨克·牛顿在晚年也颇热中于注释《约翰启示录》[222]。因此，难怪近年来以几个远非最差的人物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看来竟不可救药地迷恋于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降神术。

属于这一行列的第一位自然研究家，是功勋卓著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和达尔文同时提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发生变异的理论的就是此人。他在 1875 年由伦敦白恩士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小册子《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里面说，他在自然知识的这个分支中的最初经验是在 1844 年开始取得的，那时他听到斯宾塞·霍尔先生关于麦斯默术[223]的讲演，因此他在他的学生身上作了同样的实验。

“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且很热心〈ardour〉地进行了研究。”[第 119 页]

他不仅使人进入催眠状态并发生四肢僵硬和局部丧失知觉的现象，而且也证实了加尔颅骨图[224]的正确，因为在触摸任何一个加尔器官的时候，相应的活动就在已受催眠的人身上发生，并以灵活的动作按规定演示出来。其次，他断言，他的被催眠者只要被他触摸一下，就会产生催眠者的一切感觉；他只要把一杯水说成白兰地酒，就可以让被催眠者喝得酩酊大醉。他能使一个年轻人甚至在清醒的时候糊涂得忘记自己的姓名，然而这是其他教员不用麦斯默术也可以办到的。如此等等。

1843—1844 年冬季，我也适逢其会在曼彻斯特见到了这位斯宾塞·霍尔先生。他是一个很普通的江湖术士，在几个教士的赞助下在国内跑来跑去，用一个少女作催眠颅相学的表演，借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灵魂的不朽，证明当时欧文主义者在各大城市中所宣传的唯物主义毫无价值。少女受到了催眠，然后催眠者只要摸一摸她的颅骨上的任何一个加尔器官，她就像演戏一样作出各种表示相应器官控制能力的动作和姿势；例如，摸一下爱孩子的（philoprogenitiveness）器官，她就爱抚和亲吻所幻想的婴孩，如此等等。此外，这位堂堂的霍尔还用一个新的巴拉塔里亚岛[225]丰富了加尔的颅骨地理学：他在颅骨顶上发现了一个敬神的器官，只要摸一摸这里，他的那位受了催眠的小姐就跪下去，把双手合在一起，并且在惊讶的庸人观众面前作出一副虔敬地祈祷的天使的样子。表演到此结束并达到高潮。上帝的存在得到了证明。

我和我的一个熟人也同华莱士先生一样，对这些现象颇感兴趣，并且想试一下，我们能在什么程度上再现这些现象。我们选择了一个 12 岁的活泼的男孩来作对象。安详的凝视或轻柔的抚摩就轻而易举地使他进入催眠状态。

但是，因为我们对这套把戏不像华莱士先生那样虔诚，那样热心，所以我们也就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除了很容易产生的肌肉僵硬和丧失知觉状态以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意志完全被动而感觉又异常过敏的状态。被催眠者一旦由于任何外部刺激而从昏睡中醒过来，他就显得比清醒的时候更活跃得多。跟催眠者没有任何神秘的感应关系；任何其他的人都同样可以很容易地使被催眠者动作起来。让加尔颅骨器官起作用，在我们看来是太容易了；我们的花样还更多：我们不仅能使这些器官互相置换，把它们配置在整个身体的任何地方，而且还能造出不拘数目的其他器官，如唱歌、吹口哨、吹笛、跳舞、拳击、缝纫、补鞋、抽烟等等的器官，这些器官我们希望安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华莱士用水使他的被催眠者酩酊大醉，而我们却在大脚趾上发现了醉酒的器官，只要摸它一下，被催眠者就会演出最妙的喝醉酒的滑稽戏。但是十分清楚：如果不使被催眠者明白人们希望他做些什么，那么任何器官都不能显示任何作用。这个小孩经过实际练习很快便熟练到这样的程度：只要多少有一点暗示就够了。这样造成的器官只要不用同样的方法加以改变，对于以后的催眠是永远有效的。这个被催眠者也就有双重的记忆，一种是清醒时的记忆，另一种是催眠状态中的完全独立的记忆。至于说到意志的被动性，说到对第三者的意志的绝对服从，那么只要我们不忘记整个状态是在被催眠者的意志服从催眠者的意志的情况下开始的，而且没有这种服从就形成不了这种状态，那么这种被动性，这种绝对服从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只要被催眠者同催眠者开个玩笑，那就连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催眠术家也无计可施了。

这样，我们不过随便怀疑了一下，便发现了催眠颅相学的江湖骗术的老底，这是一系列与清醒状态时的现象多半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无须作任何神秘主义解释的现象，而华莱士先生的热心（ardour）却使他一再地自欺欺人，靠了这种欺骗去在各种细节上证实加尔颅骨图，确认催眠者和被催眠者之间的神秘的感应关系。[1]在华莱士先生的天真得有些稚气的谈话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探究这种江湖骗术的真相，而是不惜任何代价去使所有的现象再现出来。只要有了这种气质，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刚入门的研究者靠简便易行的自欺欺人变成一位行家。华莱士先生终于相信了催眠颅相学的奇迹，这时他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神灵世界中去了。

到 1865 年，他的另一只脚也跟着踏进去了。当他在热带地方旅行了 12 年回来以后，桌子跳舞的降神术实验使他进入了各种“神媒”的团体。他进步得多么快，他对这套把戏掌握得多么纯熟，上述小册子就可以证明。他希望我们不仅要当真相信霍姆、达文波特兄弟以及其他看来多少是为了钱并且大多一再暴露出骗子面目的“神媒”们的一切所谓的奇迹，而且要当真相信许多从很古的时候起就被信以为真的神灵故事。希腊神托所的女占卜者、中世纪的女巫便都是“神媒”，而扬布利柯在他的《论预言》中已经十分确切地描绘了。

“现代唯灵论中最令人惊异的现象”[第 229 页]。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表明，华莱士先生对于这些奇迹在科学上的确证是

---

[1] 如已经说过的，被催眠者是通过练习而熟练起来的。因此，当意志的服从变成习惯以后，两个当事者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某些个别现象会越来越强化，甚至在清醒状态中也有微弱的反映，这是完全可能的。

处理得何等轻率。如果有人要我们相信神灵会让人给它们照像，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奢望，而我们在认定这种神灵照片是真实的以前，当然有权要求它们取得十分确凿的证明。但华莱士先生在第 187 页上说：1872 年 3 月，主神媒古皮太太（父姓为尼科尔）跟她的丈夫和小儿子在诺亭山[1]的赫德森先生那里一起照了像，而在两张不同的照片上都看得出她背后有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的形象，优雅地（finely）披着白纱，面貌略带东方韵味，摆出祝福的姿势。

“所以，在这里，两件事中必有一件是绝对确实的[1]。要不是眼前有一个活生生的、聪敏的、然而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物，就是古皮先生夫妇、摄影师和某一第四者筹划了一桩卑劣的（wicked）骗局，而且一直隐瞒着这一骗局。但是我非常了解古皮先生夫妇，所以我有绝对的信念：他们像自然科学领域中任何真挚的真理探求者一样，是不会干这种骗人的勾当的。”[2][第 188 页]

这样看来，或者是骗人的勾当，或者是神灵的照片。对极了。如果是骗人的勾当，则或者是神灵早已印在照片底版上，或者是有四个人参与其事，或者如果我们把活到 84 岁于 1875 年 1 月去世的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的或易受愚弄的古皮老先生撇开不谈的话（只要把他送到作为背景的西班牙式的屏风后面就行了），那也就是有三个人参与其事。一位摄影师要替神灵找个“模特儿”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对此无须多费唇舌。但是摄影师赫德森不久就因一贯伪造神灵照片而被公开检举，而华莱士先生却镇静地说：

“有一件事情是明白的：如果发生了骗人的勾当，那立刻就会被唯灵论者自己看破的。”[第 189 页]

这也就是说，摄影师也不大可信了。剩下的是古皮太太，而替她撑腰的是我们的朋友华莱士的“绝对的信念”，此外再没有别的。再没有别的吗？决不是这样。替古皮太太的绝对可靠来撑腰的，还有她自己的如下说法：1871 年 6 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从汉伯里山公园她的家里，凭空被摄到兰布斯·康第特街 69 号——两地的直线距离是三英里——并且被弄到上述 69 号房子中正在举行降神仪式的一张桌子上。房门是关着的，虽然古皮太太是一个极肥胖的伦敦女人（这的确很重要），可是她突然闯到屋里来，在门上或天花板上连个小小的窟窿都没有留下来（1871 年 6 月 8 日伦敦《回声报》[227] 上的报道）。现在谁还不相信神灵照片是真的，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英国自然研究家中的第二位著名的行家，是威廉·克鲁克斯先生，化学元素铊的发现者和辐射计（在德国也叫作光转车辐射计）的发明者[228]。克鲁克斯先生大约从 1871 年起开始研究唯灵论者的表演，为了这个目的应用了许多物理学仪器和力学仪器，如弹簧秤、电池等等。他是否带来了主要的仪器，即一颗抱怀疑态度的有批判力的头脑，他是否使这颗头脑始终保持工作能力，我们是会看到的。无论如何，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克鲁克斯先生就像华莱士先生一样完全被俘虏了。他叙述道：

“几年的工夫，一个年轻的女人，弗洛伦斯·库克小姐，就显示出值得注意的神媒的特性，而且最近已经登峰造极，化成一个肯定是来自神灵世界

---

[1] 诺亭山是伦敦西城的一个区。——编者注

[1] 这句引文的原文是“Here，then，oneoftwothyingsareabsolutelycertain”。神灵世界是超越于语法的。有一次，某位喜欢开玩笑的人把语法家林德利·默里的灵魂召来。人家问他来了吗？他回答道：“Iare”（美国人的说法，不说“Iam”[我来了]）226。这位神媒是在美国出生的。

[2]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赤着脚，披着飘洒的白色长袍，而这时神媒却穿着深色的衣服，被捆缚着，沉睡在一间密室〈cabinet〉或邻室里”[第181页]。

这个神灵自称凯蒂，看起来非常像库克小姐。一天晚上，沃尔克曼先生，古皮太太现在的丈夫，突然拦腰把它抱住，紧紧搂住不放，看它到底是不是库克小姐的化身。这个神灵显示出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它竭力反抗，观众们来干预，瓦斯灯被熄灭，撕扯了一阵以后，重新安静下来，屋子里点起了灯，这时神灵已经不见了，而库克小姐仍然被捆着，不省人事地躺在原来的角落里。但是，据说沃尔克曼先生直到现在还坚持认为，他抱住的是库克小姐而不是别人。为了从科学上来确证这件事情，一位著名的电学家瓦利先生作了一次新的实验，把电池的电流通到神媒库克小姐身上，使得她不切断电流就不能扮演神灵的角色。然而神灵还是出现了。所以它的确是和库克小姐不同的存在物。而进一步确证这件事情便是克鲁克斯先生的任务。他第一步是要取得这位神灵小姐的信任。

这种信任，如他自己在1874年6月5日的《灵学家》周报[229]中所说的，“逐渐加深，直到除非由我来安排，不然她就拒绝降神。她说她希望我一直在她近旁，就在内室的隔壁；我发现，在这种信任已经建立而且她确信我决不致对她食言以后，各种现象的表现程度大大加强了，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证据也如意地得到了。她常常和我商量参加降神仪式的人以及他们的席位，因为她最近变得非常不安〈nervous〉，原因是她感到有人曾不怀好意地向她暗示，除了其他的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外，有人可能使用武力”。[①]

这位神灵小姐对这种既亲切又科学的信任给了最充分的回报。她甚至出现——现在这使我们不会再感到吃惊——在克鲁克斯先生家里，和他的孩子们玩耍，给他们讲“她在印度冒险的趣闻”，向克鲁克斯先生讲述“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痛苦的经历”，让他拥抱她，好让他相信她的结结实实的物质性，并让他察看她每分钟的脉搏次数和呼吸次数，最后还让她自己和克鲁克斯先生并排照像。华莱士先生说：

“这个形象在人们看见她，摸到她，给她照像，并且和她谈话以后，就从一个小屋子里面绝对地消失了，[①]这个小屋子除了通往挤满观众的隔壁一间屋子，是没有其他出口的”[第183页]。

假若观众们十分有礼貌，信任发生事情的房子的主人克鲁克斯先生，就像克鲁克斯先生信任神灵一样，这也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把戏了。

可惜这些“完全被证实了的现象”，甚至在唯灵论者看来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相信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十分相信唯灵论的沃尔克曼先生怎样采取了非常物质的突然下手的办法。现在又有一个教士，“不列颠全国灵学家协会”委员，也出席了库克小姐的降神仪式，而且毫无困难地发现：神灵从门进到里面并在里面消失的那间屋子，是有第二道门通往外界的。当时也在场的克鲁克斯先生的举动，“使我原以为这些表演中也许有点什么玩意儿的信念受到了最后的致命打击”（查·莫里斯·戴维斯牧师《神秘的伦敦》伦敦廷斯利兄弟出版社版）。此外，人们怎样使“凯蒂们”“现身”的事，在美国也真相大白了。有一对姓霍姆斯的夫妇在费城举行表演，当时也出现了一个“凯蒂”，她得到信徒们丰富的馈赠。但是，这位凯蒂有一次竟因为

[①] ①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①] ①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报酬不够多而罢了工，这就引起一个怀疑者下决心非要探查出她的踪迹不可；他在一个 boarding house（公寓）里发现了她，是一个毫无疑问有血有肉的年轻女人，占有了赠送给神灵的一切礼物。

同时，欧洲大陆也有自己的科学的降神者。彼得堡的一个学术团体——我不大清楚是大学或者甚至是研究院——曾委托国家枢密官阿克萨柯夫和化学家布特列罗夫探究降神现象，但似乎并没有多少结果。[230] 另一方面，——如果可以相信唯灵论者的喧嚣的声明——德国现在也推出自己的唯灵论者，这就是莱比锡教授策尔纳先生。

大家知道，策尔纳先生多年来埋头研究空间的“第四维”，发现在三维空间里不可能出现的许多事情，在四维空间里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四维空间里，一个全封闭的金属球，不在上面钻一个孔，就可以像翻手套一样地翻过来；同样，在一条两端各无尽头或两端都被系住的线上可以打结，两个分离的浑然一体的圆环，不锯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套在一起，还有许多这一类的把戏。根据神灵世界最近传来的捷报，策尔纳教授先生曾请求一个或几个神媒帮助他确定第四维空间中的各种细节。结果据说是惊人的。他把自己的手臂架在椅子的扶手上，而手掌按在桌子上不动，降神仪式一开始，椅子的扶手就和他的手臂套在一起了；一条两端用火漆固定在桌子上的线，竟在中间打了四个结，如此等等。一句话，神灵是可以极其容易地完成第四维空间的一切奇迹的。但是必须注意：我是在转述别人的说法。我不能保证这个神灵通报的正确性，如果它有什么不确实的地方，策尔纳先生应当感谢我给他提供了一个更正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个通报不是虚假地报道策尔纳先生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显然会在神灵科学和数学方面开辟一个新纪元。神灵证明第四维空间的存在，而第四维空间则为神灵的存在担保。而这一点一经发现，科学便给自己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面对第四维和更高维的空间的数学，面对呆在这种高维空间中的神灵们的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过去的全部数学和自然科学都只不过是一种预备科目罢了。克鲁克斯先生不是已经在科学上确证桌子和其他家具在移到——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第四维空间的过程中会损失多少重量，而华莱士先生不是也声称他已经证明在第四维空间中火不会伤害人体。现在甚至已经有神体生理学了！神灵们会呼吸，有脉搏，这就是说，他们有肺脏、心脏和循环器官，因而在身体的其他器官方面至少是和我们一样齐全的。因为会呼吸就要有在肺里被燃烧的碳水化合物，而这些碳水化合物又只能由外界供给，于是要有胃、肠及其附属器官，而这一切一经确定，其余的就毫无困难地都跟着有了。但是这些器官的存在就使得神灵们有生病的可能，这样一来，微耳和先生也许就不得不写一部神灵世界的细胞病理学了。而因为这些神灵大多是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而且除了她们的超凡的美丽，她们和世间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完完全全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用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出现在“爱上她们的男人”[①]的身边；而且，既然克鲁克斯先生通过脉搏已经断定，她们“并不缺少女性的心”，所以在第四维空间里也会有自然选择，不过再也用不着担心人们在这里会把这种选择和万恶的社会民主主义混淆起来。[231]

够了。这里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究竟什么是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这并不是自然哲学理论的过度滋蔓，而是蔑视一切理论、怀

[①] 莫扎特《魔笛》第 1 幕第 14 场帕米纳和巴巴盖诺的二重唱。——编者注

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证明神灵存在的并不是那种先验的必然性，而是华莱士先生、克鲁克斯先生之流的经验的观察。既然我们相信克鲁克斯利用光谱分析进行的观察（铊这种金属就是由此发现的），或者相信华莱士在马来群岛所获得的动物学上的丰富的发现，人们就要求我们同样去相信这两位研究家在唯灵论方面的经验和发现。而如果我们认为，在这里毕竟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即前一种发现可以验证，而后一种却不能，那么降神者就会反驳我们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乐于给我们提供机会来验证这些神灵现象的。

实际上，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所以，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

数学方面的情形也一样。平庸的形而上学的数学家，都十分高傲地夸耀他们的科学成果是绝对无法推翻的。但是这些成果也包括虚数在内，从而这些虚数也就带有某种实在性。如果我们已习惯于给 $\sqrt{-1}$ 或第四维硬加上我们的头脑以外的某种实在性，那么我们是否再前进一步，承认神媒的神灵世界，这也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了。这正如凯特勒谈到德林格尔时所说的：

“这个人一生中曾为那么多的谬论作辩护，那确实就连教皇永无谬误的说法也可能已经接受了！”[232]

事实上，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唯灵论者的。第一，那些“高级的”现象，只有当有关的“研究家”已经着迷到像克鲁克斯自己天真无比地描绘的那样，只能看到他应看到或他想看到的东西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第二，唯灵论者并不在乎成百件的所谓事实被揭露为骗局，成打的所谓神媒被揭露为下流的江湖骗子。只要所谓的奇迹还没有被逐一揭穿，唯灵论者就仍然有足够的活动地盘，华莱士围绕着伪造神灵照片的事件就一清二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伪造物的存在，正好证明了真实物的真实。

这样，经验本身就表明，要摆脱降神者的纠缠，不能靠经验上的实验，而要运用理论的思考；用赫胥黎的话说：

“我认为从证明唯灵论是真理这件事当中所能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给反对自杀提供一个新论据。与其死后借每举行一次降神仪式赚一个基尼[①]的神媒的嘴巴说一大堆废话，还不如活着做清道夫好。”[233]

[①] 基尼是英国从前的一种金币，合 21 先令。——编者注

[札记和片断]毕希纳[234]

……两个哲学派别：具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具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后一派证明：根据和后果、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映象和本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经分析证明，一极已经作为核内的东西存在于另一极之中，到达一定点一极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只是在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之上展开。——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范畴在他那里表现为预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表现为它的单纯的反照。实际上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再现。到上一世纪末，甚至到1830年，自然研究家有旧的形而上学差不多还能应付过去，因为真正的科学当时还没有越出力学——地球上的力学和宇宙的力学的范围。尽管如此，高等数学已经带来了混乱，因为高等数学把初等数学的永恒真理看作已经过时的观点，常常作出相反的论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家看来纯属谬论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融了，数学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在这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纯粹抽象的量之间的关系、恶无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态，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愿又不自觉地成为辩证的数学家。数学家们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为了调和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为了弄清楚在他们面前表现为不可否认的结果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纯属荒诞无稽的东西，以及为了合理地说明以无限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的出发点、方法和成果所采用的隐晦说法、无聊诡计和应急手法，是再滑稽可笑不过了。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化学——原子论。物理学的抽象的可分性——恶无限性。生理学——细胞（由分化而发生的个体和种的有机发展过程，是合理的辩证法的最令人信服的验证）。最后，各种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化，这种转化使范畴的一切固定性都终结了。尽管如此，大批自然研究家仍然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而且当他们必须合理地解释这些新近的事实，即这些可以说在自然界中证实了辩证法的事实并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时候，便束手无策。这里应当想到：原子和分子等等是不能用显微镜来观察的，而只能用思维来把握。试把化学家们（肖莱马例外，他懂得黑格尔）和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比较一下吧，在那里最终不得不用笼统的空话来掩盖这种束手无策。脱掉神秘主义外衣的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已经离开那个有了固定不变的范畴，可以说有了逻辑的初等数学，有了逻辑的日常工具就足以解决问题的领域。哲学因自然科学抛弃了它而对自然科学事后进行了报复。而自然研究家们本来可以从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中看到：在这全部哲学中隐藏着某种即使在自然研究家们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莱布尼茨——以无限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的创始人，和他比较起来，归纳法的蠢驴牛顿[235]成了剽窃者和害人者[236]；康德——拉普拉斯以前的天体起源理论；奥肯——在德国采纳进化论的第一个人；黑格尔——他对自然科学的广博的概括和合理的分类是比一切唯物主义的胡说合在一起还更加伟大的成就）。

———

[《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237]

[50 年代在德国搞过唯物主义的实行庸俗化的小贩们，决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①]的这个界限。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反对信仰世界创造主的新论据。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情决不是进一步发展理论。唯心主义由于 1848 年革命受到了沉重打击,而唯物主义在它的这一更新了的形态下更加衰落。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承担责任，这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唯物主义本身混淆起来。

但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经验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极其辉煌的成果，从而不仅有可能完全克服 18 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由于证实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领域（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从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体系。气体力学；新创立的有机化学，它从无机物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所谓有机化合物，从而扫除了这类化合物的不可捉摸性质的最后残余，1818 年以来创立的科学的胚胎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动植物学比较解剖学——这一切领域提供了前所未闻的新材料。但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三大发现。

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罗伯特·迈尔、焦耳和柯尔丁）而导致证实能量的转化。自然界中无数的起作用的原因，过去一直被看作某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称作所谓力——机械力、热、放射（光和辐射热）、电、磁、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现在全都被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证明，这种能在自然界中不断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在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这一或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例如，我们可以用千克米表示热量单位，又用热量单位来表示若干单位的或任何量的电能或化学能，反过来也可以；我们同样可以把一个活的机体所消耗的和所获得的能量测量出来，并且用任何单位，例如用热量单位表示出来。自然界中一切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哲学的论断，而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第二个发现——在时间上更早一些——是施万和施莱登发现有机细胞，发现它是这样一种单位：一切机体，除最低级的以外，都是从这种细胞的复制和分化中产生和生长起来的。有了这个发现，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不仅是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还有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的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解开了，被归结为某种遵循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共有的同一规律所发生的过程。

但是还剩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是按照细胞分裂规律各自从一个细胞中生长起来，那么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何而来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总括地加以论述和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多少变化，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绰绰有余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序列，在大的基本的轮廓上被证实了；这样一来，不仅有

[①] 指 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编者注

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为认识人类精神的前史，为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结构的、但有感受刺激能力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直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不了解这个前史，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被归之于自然的原因。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还得去做：说明生命是怎样从无机自然中产生的。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上，这也就等于说，应从无机物中制造出蛋白体来。化学正在完成这个任务的道路上日益前进，虽然距离完成任务还很远。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维勒在 1828 年才由无机物制成第一种有机物——尿素，而现在以人工方法不使用任何有机物就能制成无数所谓有机化合物，那么我们就不会让化学在蛋白质这一难关面前停步不前。到目前为止，化学已经能够制出它确切知道其成分的每一种有机物。只要有朝一日蛋白体的化合成分被弄清楚，化学就能着手制造活的蛋白质。但是，要求化学在今天或明天就完成自然界本身在个别天体的极为有利的环境下经过千百万年才完成的事情，这就等于要求创造奇迹。

这样，同前一世纪比较起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现在已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牢固的基础上了。那时，只是对于天体和地球上的固体在重力的影响下所发生的运动有相当详尽的了解：差不多整个化学领域和整个有机界仍然是不可理解的秘密。现在，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大的基本的轮廓上已得到解释和理解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无非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直的理解，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原本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两千多年来存在着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哪怕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上去，也要比初看起来困难些。因为问题决不是要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把那些在错误的。但对于那个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内获得的成果，从这种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出来。而这是多么困难，许许多多的自然研究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证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门科学中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本门科学以外不仅是唯心主义者，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自然科学的所有这些划时代的进步，都在费尔巴哈那里擦肩而过，基本上没有触动他。这与其说是他的过错，不如说应归咎于当时德国的可悲的环境，由于这种环境，大学教席都被毫无头脑的折衷主义的小人霸占了，而比这些小人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乡间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几乎变成一个粗俗的人。于是出现这种情况：他在谈到自然界时，不得不说一些美文学的空话，虽然附带也作出个别的天才的概括。例如，他说：

“生命当然不是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一般说来不是某一个别的自然力或自然现象的产物，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却把生命归结为这种产物；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238]

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这和下面这一情况一点也不矛盾：蛋白质，作为生命的唯一的独立的载体，是在自然界的全部联系所提供的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然而恰好是作为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而产生的。费尔巴哈围绕着思维和思维器官大脑的关系问题而沉溺在一连串毫无结果的和徒兜圈子的思辨之中，沉溺在施达克乐于步他后尘的这个领域之中，这也应当归咎于这种孤寂的生活。

够了，费尔巴哈反对的是唯物主义这个名称[239]。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在自然领域中他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在人类……领域中[……]

自然研究家相信，他们只有不理睬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得有思维规定，而这些范畴是他们从所谓有教养者的那种受制于早已过时的哲学残渣的一般意识中盲目地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的哲学课中听到的一点儿东西（这种东西不仅是片断的，而且是分属于极不相同的和多半是最蹩脚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杂烩）中取来的，或是从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缺乏批判的和杂乱无章的读物中取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同样做了哲学的奴隶，而且遗憾的是大多做了最蹩脚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辱骂哲学家骂得最厉害的人恰好成了最蹩脚的哲学家的最蹩脚的庸俗残渣的奴隶。

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

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240]

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研究家当中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都要糟糕。唯物主义者只去说明事物，是不理睬这套废话的。只有当那些纠缠不休的教徒们想把上帝强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这件事，并且作出简单的回答，或者像拉普拉斯那样说："陛下，我不……"[241]，或者更粗鲁一些，以荷兰商人经常用来打发硬把次货塞给他们的德国行商们的方式说："我用不着那路货色"，并且这样就把问题了结了。而上帝竟不得不忍受他的保卫者给他的脸色！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历史中，上帝在他的保卫者当中受到的待遇，就像耶拿战役中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的文官武将当中受到的待遇一样。在科学的推进下，一支又一支部队放下武器，一座又一座堡垒投降，直到最后，自然界无边无沿的领域全都被科学征服，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把"第一推动"留给上帝，但是不允许他对自己的太阳系进行别的任何干预。神父赛奇虽然履行教规中的全部礼仪来恭维上帝，但是并不因此就变得手软些，他把上帝完全逐出了太阳系，而只允许后者在原始星云上还能作出某种"创造行动"。在一切领域中，情况都是如此。在生物学中，上帝的最后的伟大的唐·吉诃德，即阿加西斯，甚至要求他去做十足荒唐的事情：他不仅应当创造实在的动物，而且还应当创造抽象的动物，即创造作为鱼的鱼！[①]最后，丁铎尔完全禁止上帝进入自然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

[①]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初稿第19页到此为止，这句话的后半句在下一页上，但是这一页没有找到。——编者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8页。——编者注

界中去，而他之所以还允许上帝存在，只是因为对这一切事物（自然界）总得有个什么人能比约翰·丁铎尔[242]知道得更多些！[①]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没有他连一根头发也不能从头上掉下来——相距不知有多远！

丁铎尔的情感上的需要什么也证明不了。格里厄骑士确实有爱恋和占有曼侬·列斯戈的情感上的需要，而后者一次又一次地出卖她自己和他；为了取悦于她，他做了骗子和王八。如果丁铎尔要责备她，他会回答说：这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上帝=我不知，但是无知并不是论据（斯宾诺莎）。”243——编者注

[辩证法作为科学]辩证法[244]

（阐明辩证法这门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

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作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只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就会立即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了。

此外，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黑格尔的人都知道，黑格尔在几百处地方都善于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恰当的例证来证明辩证法的规律。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说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深入地考察这些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

一、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述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按照各自的严格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化合，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这个形式下，黑格尔的神秘的命题就显得不仅是完全合理的，并且甚至是相当明白的。

几乎用不着指出：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同素异形状态和聚集状态，因为是基于分子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所以是基于已经传导给物体的或多或少的运动的量。

但是运动或所谓能的形式变换又怎样呢？当我们把热变为机械运动或把机械运动变为热的时候，在这里质是变化了，而量依然保持不变吗？完全正确。但是关于运动的形式变换，正如海涅谈到罪恶时所说的：每个人独自一人可以是道德高尚的，而罪恶总是两个人的事。[①]运动的形式变换总是至少发生在两个物体之间的一个过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

[①] 海涅《论告发者。〈沙龙〉第3部的序言》。——编者注

运动（例如热），另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另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直到现在还无法在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在这里我们首先只谈无生命的物体；对于有生命的物体，这个规律也适用，但它是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起作用的，而且现在我们还往往无法进行量的测定。

如果我们设想，将任何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那么开头是不会发生任何质的变化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极限：如果我们能够（如在蒸发的情况下）得出一个个的自由状态的分子，那么我们在大多数场合下还可以把这些分子进一步分割，然而只有在质完全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才行。分子分解为它的各个原子，而这些原子具有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分子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化合而成的场合下，取代化合物的分子而出现的是这些元素本身的原子或分子；在分子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场合下，出现的则是自由的原子，它们起着质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初生氧的自由原子，轻松自如地起着大气中结合在分子内的氧原子所决不能起的作用。

但是分子和它所归属的物体，在质上也是不相同的。分子可以不依赖于物体而运动，而同时物体却好像是在静止中，例如热振动；分子可以因位置的变化，因与相邻分子的联系的变化，而使物体处于另一种同素异形状态或聚集状态，如此等等。

这样，我们看到，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的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以及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

在力学中并不出现质，最多只有如平衡、运动、位能这样一些状态，它们都是基于运动的可量度的转移，并且本身是可以用量来表示的。所以，这里只要发生质变，便总是由相应的量变引起的。

在物理学中，物体被当作化学上不变化或呆性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物体的分子状态的变化和运动的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在任何情况下——至少在双方的一方中——都会使分子活动起来。在这里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的或所承受的某种形式的运动的量发生量变的结果。

“例如，水的温度起初对于水的滴液状态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后来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升高或降低，便会达到这样一个点，在这一点上这种凝聚状态会发生变化，水会变为蒸汽或冰。”（黑格尔《全书》，《黑格尔全集》第 6 卷第 217 页）

例如，电流必须达到一定的最低强度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已知的压力下都有其固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多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标志，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不过，黑格尔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是在化学这一领域中取得最伟大的胜利

的。化学可以说是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成分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懂得这一点（《逻辑学》，《黑格尔全集》第 3 卷第 433 页）。拿氧来说：如果结合为一个分子的是三个原子，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只是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质上与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笑气（一氧化二氮 N_2OO）和无水硝酸（五氧化二氮 N_2O_5）是多么不相同！前者是气体，而后者在常温下是结晶的固体。而两者在成分上的全部区别是，后者所含有的氧为前者的五倍，并且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另外三种氮的氧化物（NO，N_2O_3，NO_2），它们在质上与前两者不同，并且彼此也不同。

在同系列的碳化物，特别是较简单的碳氢化合物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正烷烃中，最低的一级是甲烷，CH_4，在这里，碳原子的六个化学键被四个氢原子所饱和。第二种是乙烷，C_2H_6，两个碳原子互相联结，自由的六个化学键被六个氢原子所饱和。再往下，依据代数学公式 C_nH_{2n+2}，便有 C_3H_8，C_4H_{10} 等等，结果每增加一个 CH_2，便形成一个和以前的物体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一系列中最低的一级的三个成员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一级的成员十六烷，$C_{16}H_{34}$，是固体，沸点为 270℃。从烷烃（理论上）导出的伯醇系列（公式是 $C_nH_{2n+2}O$）和一元脂肪酸系列（公式为 $C_nH_{2n}O_2$），情形也完全一样。在量上加上一个 C_3H_6，会引起什么样的质的差别，从如下的经验中就可以明白：我们喝一下不掺杂其他醇类的可饮用的乙醇 C_2H_6O，再喝一次同样的乙醇，但掺入少量的戊醇 $C_5H_{12}O$（它是可怕的杂醇油的主要成分）。第二天早晨我们的脑袋就会有所感觉，而且受到伤害；所以甚至可以说：醉酒和后来的醉后头痛也是量到质的转化。一次是因乙醇而发生的，另一次是因加上去的这一点儿 C_3H_6 而发生的。

在这些系列中，黑格尔的规律还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低级别的同系物只允许原子相互间有一种排列法。但是，当结合成一个分子的原子数目达到每一系列的各自一定的大小时，分子中的原子的组合就可以有多种方式，于是就能出现两种或更多的同分异构体，它们在分子中包含有相等数目的 C、H、O 原子，但是在质上却各不相同。我们甚至能够计算一个系列的每一同系物可能有多少同分异构体。例如，在烷烃系列中，C_4H_{10}。有两个同分异构体，C_5H_{12} 有三个同分异构体；对于更高级别的同系物来说，可能存在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增加得非常快。可见，又是分子中的原子的数目制约着这种质上不同的同分异构体的可能性，并且就已经证实的情形来说，还制约着这些同分异构体的现实的存在。

不仅如此。从每一个这样的系列中我们所熟悉的物体的类比中，还能推论出该系列中未知的同系物的物理性质，并且至少对于紧跟在已知同系物后面的一些同系物，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言其性质，如沸点等等。

最后，黑格尔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化合物，而且也适用于化学元素本身。我们现在知道，

“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一个周期函数”（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第 2 卷第 823 页），

因此，它们的质是由它们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这已经得到了光辉的

验证。门捷列耶夫证明了：在依据原子量排列的各同族元素的系列中，发现有各种空白，这些空白表明这里有新的元素尚待发现。这些未知元素之一他称之为亚铝，因为该元素在以铝为首的系列中紧跟在铝的后面。他预先描绘了这一元素的一般化学性质，并大致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原子量以及原子体积。几年以后，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确实发现了这个元素，门捷列耶夫的预言被证实了，只有微不足道的偏离。亚铝实际上就是镓（同上，第 828 页）。[245] 门捷列耶夫依靠——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一勋业，大胆地说，完全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见过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方面的勋业相提并论。

在生物学中，以及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证实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想从精密科学中举出一些例子，因为在这些科学中量是可以精确地测定和跟踪的。

有些先生在此以前曾经诽谤量到质的转化是神秘主义和不可理解的先验主义，正是这些先生们大概现在会宣称这种转化是某种完全不言自明的、浅薄的和平凡的东西，说什么他们早就应用过了，因此从中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但是，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在其普遍适用的形式上表述出来，这毕竟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如果这些先生们多年来曾经使质和量互相转化，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他们倒可以用莫里哀的茹尔丹先生来安慰自己了。这位茹尔丹先生一生中说话一直使用散文，可是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散文。

[札记和片断][规律和范畴]

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磁，开始有了两极性，后者在同一物体中显现出来；就电而言，这种两极性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带有相反的电荷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应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同时还表明，像“正”和“负”这样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发展形式。我们可以把遗传看作正的、起保存作用的方面，把适应看作负的、不断破坏遗传的东西的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把适应看作创造性的、主动的、正的活动，把遗传看作抗拒的、被动的、负的活动。但是，正像在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一样，在这里——从纯粹实践的理由来考虑——最好也把适应看作负的活动。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的一切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民族只能在进退两难中二者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法总是迥然不同于一切时代谈论政治的庸人们所期望的提法。甚至 1848 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 1849 年也突然地、意外地和违反本愿地发现自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倒退到具有更加尖锐的形式的旧的反动中去，或者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甚至也许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曼托伊费尔反动统治这一德国自由主义的花朵。同样，1851 年法国资产者也陷入了他们确实没有料到的进退维谷的局面：或者是帝制和近卫军制的滑稽可笑的临摹画和一帮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帮流氓面前，为的是在后者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

严格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细颚龙[246]和始祖鸟之间只缺少几个中间环节，而有牙齿的鸟喙在两半球都出现了。“非此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了。在低等动物中，个体的概念简直不能严格地确立。不仅就这一动物是个体还是群体这一问题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发展过程中何时一个个体终止而另一个个体（“裸母虫体”）[247]开始这一问题来说也是如此。——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两极化一样，思想

也在对立中运动。正如在电、磁等等的场合，不能固执片面性，而且也没有一位自然研究家想这样做，同样，在思想的场合也是如此。

——

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但是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地，把一条蠕虫切断，它的正极仍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另一端则形成一个新的负极，上面有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现在变成了正极，即变成了口，而带伤的一端形成为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是正转化为负。

——

两极化。在雅·格林看来，下述论点是确定不移的：德意志方言必定不是高地德意志语，就是低地德意志语。同时，法兰克方言在他看来是完全消失了[248]。因为卡罗林王朝末期的书面的法兰克语是高地德意志语（因为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波及法兰克的东南地区），所以按照他的看法，法兰克语在一些地方已经融合在古高地德意志语中，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融合在法兰西语中。但是仍然完全不能说明古萨利克语区的尼德兰语从何而来。只是在格林死后法兰克语才重新被发现：萨利克语经过革新成为尼德兰方言，里普利安语经过革新成为中莱茵和下莱茵的方言，这些方言有一部分以不同的程度转变为高地德意志语，有一部分依然是低地德意志语，所以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

“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黑格尔自己已经说明了（《全书》第1部第111节，附释）：“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①]（例如，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它们的关系中才有意义，每一方独自来说没有意义）。

——

把正和负看作一样的东西，随便把哪一方看作正，哪一方看作负都无所谓，这不仅适用于解析几何，更适用于物理学（见克劳修斯，第87页及以下各页）[②]。

——

正和负。也可以颠倒过来称呼，在电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也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时，我们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升起，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的变更而已。此外，受地磁的北极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称作北极，这丝毫无碍于事。

——

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的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种子的萌发——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是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这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全书》第1部第268页）[249]。

——

单一的和复合的：这对范畴在有机的自然界中也早已失去意义，不适用了。无论是骨、血、肌肉、细胞纤维组织等等的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②] 克劳修斯《机械的热理论》1876年不伦瑞克第2版第1卷。——编者注

化学组合，都不表示某个动物（黑格尔《全书》第 1 部第 256 页）[250]。有机体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复合的，不管它是多么复杂。

——

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①]，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律是旧的观点的基本原理：α＝α，每一事物都与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恒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定律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都被自然研究一件一件地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上还保留着，仍被旧事物的拥护者用来抵制新事物：一件事物不能同时既是自身又是他物。但是新近自然研究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见前面）。——抽象的同一性，像形而上学的一切范畴一样，足以满足日常应用，在这种场合涉及的只是狭小的环境或很短的时间；它所能适用的范围差不多在每一场合都是不相同的。受对象的本性左右；在一个行星系统中，可以采用椭圆为基本形式来进行寻常的天文学计算，这不会导致实践上的错误，在这里这种抽象的同一性的适用范围就比在几周内完成变态的昆虫的场合要宽广得多。（还可以举其他的例子，例如以若干千年为尺度来计算的物种变化。）但是，对综合性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每一单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也是完全不够用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在实践中现在已经被排除，但是在理论上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研究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而不是各占一边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把差异性纳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

——

同一性——抽象的，a＝a，以及否定的：a 不能等于 a 同时又不等于 a——这在有机的自然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和自身同一而又和自身相区别，这是由于各种物质的吸收和排泄，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全部无休止的分子变化，而这些分子变化便形成生命，其累积的结果一目了然地显现在各个生命阶段上——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生理学越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越加重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越加重要[①]，而旧的、抽象的、形式上的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物看作只和自身简单地同一的东西、看作固定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便过时了。尽管如此，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仍然继续存在。但是，就是在无机的自然界中，同一性本身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不断使它发生变化，使它的同一性变形。只是在数学中，即在一种研究思想事物（不管它们是不是现实的摹本）的抽象的科学中，才有抽象的同一性及其与差异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不断地被扬弃（黑格尔《全书》第 1 部第 235 页）[251]。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因为在命题中谓词必须不同于主词。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词中还是在谓词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谓词

[①] “两个主要的对立”指的是（1）同一和差异的对立，（2）原因和结果的 对立。“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后来加进去的。——编 者注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至于物种进化，就更不用说了。”——编者注

或主词所涵盖不了的（黑格尔，第 1 部第 231 页）[252]。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

——

同一性。补充。不断的变化，即与自身的抽象的同一性的扬弃，在所谓无机界中也是存在的。地质学就是这种变化的历史。在地表上是机械的变化（冲蚀，冰冻）、化学的变化（风化），在地球内部是机械的变化（压力）、热（火山的热）、化学的变化（水、酸、胶合物），属于大规模的变化的是地壳隆起、地震等等。今天的页岩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沉积物；白垩土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松散的、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甲壳；石灰石更是这样，根据某些人的看法，石灰石完全是从有机物产生的；沙岩根本不同于松散的海沙；海沙又产生于被磨碎的花岗石等等；至于煤，就不必说了。

——

偶然性和必然性

形而上学所片面坚持的另一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思维规定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认为这两者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同样是偶然的，这怎能行得通呢？日常的理智和具有这种理智的大多数自然研究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规定。一件事物、一种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两者兼而有之。所以两者是并存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不要把这两类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有决定意义的性状看作必然的，而把同一个种的各个个体的其他的差异称作偶然的，这一点适用于植物和动物，也适用于结晶体。于是较低的组群对较高的来说又被看作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或一个纲里有多少属和目，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类，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被说成是科学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纳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就成了这样一种科学，它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得以产生的原因是叫作偶然性还是叫作上帝，这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者无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对此没有认识，因此它们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中移入自然科学，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打发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一丝一毫不长，也一丝一毫不短；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一只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朵花是由这只特定的

蜜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粒被风吹来的特定的蒲公英种子发了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天清晨4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3点钟或5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连串不可更改的因果链条，由一种不可动摇的必然性引起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被安排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承认这样一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摆脱出来。无论我们是同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一道把这叫作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是同土耳其人一道把这称作天数[253]，还是把这就叫作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场合下都谈不上探索因果链条，因此，我们在一个场合下比在另一场合下一点也不更聪明一些，所谓必然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以什么为根据，豌豆的粒数就依旧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断言这件事情在太阳系的原始构造中是预先早就安排好了的，我们也没有前进一步。不仅如此，科学如果老是从因果链条中去追溯这一个个的豌豆荚事例，那就不再成其为科学，而成了纯粹的游戏；因为单是这同一个豌豆荚就还具有其他无数的、独具的、表现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薄和软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独具的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联系，已经多得连全世界的全体植物学家都解决不了。可见，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与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是处于同一等级的，那实际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为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不仅如此，固然，某一地区内并存的各个有机的和无机的种和个体的多样性，还可以说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但是就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个别的动物来说，它生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什么样的敌人和有多少敌人威胁着它，这都是偶然的。一粒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对于母株是偶然的；这粒种子在什么地方找到发芽的土地，这对于子株也是偶然的；确信在这里一切也都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自然界的各种对象杂陈混出，哪怕是出自自古就有的种种原初的规定，但这种现象却依旧如故，仍是偶然的。

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规定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逻辑学》第2册第3篇第2章：《现实》）。自然科学把这些命题当作悖理的文字游戏、当作自相矛盾的胡说干脆抛在一旁，并且在理论上一方面坚持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空虚思想，认为一个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空虚的机械的决定论，在一般意义上在口头上否认偶然性，而在每一特定场合实际上又承认这种偶然性。

当自然研究依然这样进行思考的时候，在达尔文的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研究又做了些什么呢？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1]中，是从偶然性的现存的最广阔的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偶然的差异，一些差异强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这种差异的甚至最近的原因也只在极少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证实（这期间积累起来的有关偶然性的材料，把关于必然性的旧观念压垮和冲破了），——正是这些偶然的差异迫使达尔文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生物学中的一切规律性的基础，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形而上学的僵固不变的种概念。但是，没有种概念，整个科学就会化为乌有。科学的所有部门都曾需要有种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离开种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不仅会发生问题，而且会干脆被废弃。偶然性推翻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关于必然性的迄今的观念失灵。坚持这种观念，就等于把人的自相矛盾的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任意规定当作规律强加给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把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普遍宣布为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254]——过时学派的生物学家们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

达尔文。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来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1]。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化、有机的生命，这一切，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排除在外，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种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是运动的总和始终不变。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就在于他没有形成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只看到事物，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所以陷入混乱。第 10—14 页[210]）。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另一个表现为结果。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起因

---

[1] 指 1859 年在伦敦出版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1]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斯宾诺莎：实体是 CausaSui[自身原因]，这中肯地表现了相互作用。）”——编者注

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前后相继，就能造成因果观念：热和光随太阳而来；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证明，而且就这个意义来看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的post hoc（此后）决不能为propter hoc（由此）[1]提供根据。但是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太阳光集中在焦点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一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在所有的细节上探究包括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内的全部过程。在这里甚至怀疑论者都不能说，从以往的经验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将出现同样情形的结论。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这样偏离常规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发生化学分解，火药受潮等等，枪筒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

——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hoc，然而并不是propter hoc（《全书》第1部第84页）[255]。非常正确，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有一天太阳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类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1]

——

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对天体进行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如果停在这里不动，那思维是何等的浅薄！

——

[1] “posthoc，ergopropterhoc”（此后，所以由此），这一公式表示对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的推论，即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发生在另一个现象之后便作出两者有因果联系的结论是不合理的。——编者注

[1] 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么这就等于证明它们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编者注

[认　识]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者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多么错误）来证明：他们自始就深信，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理性不是违反自然的。

——

知性和理性。黑格尔的这一区分——其中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一切知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从而还有抽象（狄多[256]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剖开一个果核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狡猾的小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结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陌生的环境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性质来说，所有这些行为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在人和高等动物中间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每一次运用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人和高等动物只要仅仅运用这些初级的方法，或有了这些方法就足够用了，那么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来说就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相反地，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要晚得多，通过现代哲学才达到。虽然如此，早在希腊人那里就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它们深远地预示了以后的研究工作！

——

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偶体）的发展同它们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像一个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这种情形是黑格尔在论述概念时首先揭示出来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发挥着作用，而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这种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

——

抽象的和具体的。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的“具体的”例证都要更具体得多。

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1882年6月8日《自然界》，拉伯克）[257]，但是，在认识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些光线方面，我们的成就比蚂蚁大得多。我们能够证明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而且这种证明只是以我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这就说明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我们还有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情形又正好和眼睛一样。要想知道我们的思维究竟能探索到什么，而试图在康德身后100年去从理性的批判，从认识工具的研究中发现这种思维的作用范围，是徒劳的，正如亥姆霍兹的下述做法也是徒劳的：他曾用我们的视力的缺陷（这一缺陷的确是必然的，一只眼睛如果能看见一切光线，那么正因为如此它就什么也看不见）和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它使视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连这种视力也不能完全准确无误地不断再现出来）去证明我们的眼睛对所看到的东西的性状提供的信息是有假的和不可靠的。我们宁可

从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索到和每天还在探索的东西中，来认识我们的思维究竟能探索到什么东西。这从量上和质上来说已经足够了。相反地，对思维形式、思维规定的研究，是非常值得做的和必要的，而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只有黑格尔系统地从事过。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化学光线在蚂蚁的眼睛里究竟是怎样呈现出来的。谁要为这件事苦恼，我们可一点忙也帮不了。

辩证逻辑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导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并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黑格尔恪守他的整个逻辑学的分类，把判断分为以下几类[258]：

1.实有的判断，判断的最简单的形式，用来肯定地或否定地陈述某一个别事物的某种一般的性质（肯定判断：玫瑰花是红的；否定判断：玫瑰花不是蓝的；无限判断：玫瑰花不是骆驼）。

2.反思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的某种关系规定，某种关系（单称判断：这个人是会死的；特称判断：有些人或很多人是会死的；全称判断：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或人是会死的）[259]。

3.必然性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的实质的规定性（直言判断：玫瑰花是植物；假言判断：如果太阳升起，那就是白昼；选言判断：南美肺鱼不是某种鱼就是某种两栖动物）。

4.概念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对自身的一般本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自身的概念符合到什么程度（实然判断：这所房子是次的；或然判断：如果一所房子是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它就是好的；确然判断：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是好的）。

第一类是个别的判断，第二和第三类是特殊的判断，第四类是普遍的判断。

不管这些东西在这里读起来多么枯燥，不管这种判断分类法初看起来有时是多么专断，但是，对于仔细研究过黑格尔《大逻辑》中的天才阐述（《全集》第 5 卷第 63—115 页[①]）的人来说，这种分类法的内在真理性和内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而这种分类法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以思维规律为根据，而且还以自然规律为根据，对此我们在这里愿意举出一个同这里的上下文无关的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摩擦生热，这在实践上史前的人早已知道，他们也许在 10 万年前就发明了摩擦取火，而且在更早以前就通过摩擦来温暖冻冷了的肢体。但是，从那时起直到发现摩擦本身就是热的一个源泉，谁也不知道又经过了几万年。经过足够的时间，这样的时刻到来了，此时人脑发展到足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这是一个实有的判断，并且是一个肯定判断。

又经过了几千年，到 1842 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才根据这一特殊过程与当时已发现的其他类似的过程的关系，即根据它的最接近的一般的条件来研究这个过程，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助摩擦而转化为热。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经验性认识，我们在认识这个对象方面才

[①] 即黑格尔《逻辑学》第 3 册中关于判断的全章页码。——编者注

能从上述的实有的肯定判断进步到这个反思的全称的判断。

不过从现在起事情发展得很快，只过了三年，迈尔就能够（至少在实质上）把反思判断提高到使它具有现今仍具有的作用的阶段：

在每一场合的各自的特定条件下，每一运动形式都能够并且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每一其他运动形式。这是概念的判断，并且是确然判断，即判断的最高形式。

可见，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过程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关于运动性质的立足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这就说明，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作个别性的判断：摩擦生热这一零星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判断可以看作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即机械的运动形式，显示出在特殊环境下（经过摩擦）转变为另一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每一运动形式都表明能够并且必然转变为每一其他运动形式。有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新的发现为规律提供新的证据，赋予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这样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已不能再增添什么。在普遍性方面——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同样是普遍的——这个规律已不可能再扩大：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可惜，在我们还不能制造蛋白质的时候来谈论蛋白质的运动形式，也就是谈论生命，这是十分尴尬的。

对于全归纳派。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做不到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属于一个整体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记住它们是属于一个整体，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出错的方法。但是并非如此，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成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光微粒和热质是归纳法的成果。现在它们在哪里？归纳法告诉我们：一切脊椎动物都有一个分化成脑髓和脊髓的中枢神经系统，脊髓包含在软骨性的或骨性的脊椎骨中——这种动物就由此而得名。可是冒出来一个文昌鱼，它原来是一种具有未分化的中央神经索并且没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归纳法确认鱼类是一种终生只用鳃呼吸的脊椎动物。可是出现了一些动物，这些动物所具有的鱼的特征差不多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它们除去鳃，还有很发达的肺，并且情况表明，每一条鱼的鳔都是潜在的肺。海克尔大胆地应用进化论，才把处在这些矛盾中而感到很舒服的归纳派解救出来。——假如归纳法真的不会出错，那么有机界的分类中接连发生的变革是从何而来呢？这些变革是归纳法的最独特的产物，然而它们一个消灭另一个。

归纳和分析。在热力学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可以说明归纳法没有权利要求充当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蒸汽机已经最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可以投入热而获得机械运动。10 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而只是越来越迫使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去解释这一情况。萨迪·卡诺是第一个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用归纳

法。他研究了蒸汽机，分析了它，发现蒸汽机中的关键的过程并不是纯粹地出现的，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次要过程掩盖起来了；于是他略去了这些对主要过程无关紧要的次要情况而设计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机（或煤气机），的确，这样一部机器就像几何学上的线或面一样是无法制造出来的，但是它以自己的方式起了这些数学抽象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它纯粹地、独立地、不失真地表现出这个过程。他已经明明触及热的机械当量（见他的函数 C 的含义）[1]，只是未能发现它和看清它，因为他相信热质。这也是错误的理论造成损害的证明。

——

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对同一类的事实的以往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去纯化到足以形成定律为止，那就是要在此以前使运用思维的研究停顿下来，而定律因此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对于缺乏逻辑修养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研究家来说，相互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更替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想法：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260]。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现象，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相互排挤的，可是没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观点的最后的形式，就是“自在之物”。认为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论断（黑格尔《全书》第 44 节）。第一，是离开科学而走到幻想里去了。第二，它没有给我们的科学认识增添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如果不能探索事物，那么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第三，它是纯粹的空话，永远不会被应用。抽象地说，这种论断听起来好像是完全合理的。不过让我们应用一下吧。如果一个动物学家说，“一只狗好像有四条腿，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只狗实际上是有四百万条腿还是一条也没有”，那么我们对这个动物学家应怎样想呢？如果一个数学家先下定义说，三角形有三条边，然后又说，他不知道三角形是不是有二十五条边，那么我们对这个数学家应怎样想呢？如果他说二乘二好像等于四，我们又怎样想呢？不过自然研究家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自在之物这个词，只有在跨入哲学时才敢于应用它。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他们对这个词的处理是多么不严肃，而这个词本身是多么没价值。如果他们当真采取严肃的态度，那为什么终究要去研究点什么呢？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水在 0°C和 100°C之间是液体，这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个规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1）水，（2）一定的温度，（3）正常压力。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气象学的规律也是永恒的，但是，只适用于地球，或者只适用于一个具有地球的大小、密

[1] 见本卷第 290 页。——编者注

度、轴倾斜、温度，并且具有由氧和氮的同样混合体构成的大气以及同量的上升和下降的水蒸气的天体。月球上没有大气，太阳上只有由炽热的金属蒸气构成的大气；所以月球没有气象学，而太阳的气象学则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整个的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针对地球的。太阳、恒星、星云，甚至密度不同的行星上面的电和磁的强度的情况，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元素的化学化合规律，在太阳上由于高温而失去了效力，或者只是在太阳大气层边缘暂时有效，而这些化合物一接近太阳便又分解了。太阳化学正在生成中，而且必然和地球上的化学完全不同，它不是推翻地球上的化学，而是同它毫不相干。在星云中，也许甚至在 65 种元素中连那些本身可能也化合起来的元素都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要谈论对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都同样适用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那么留给我们的也就只有重力，也许还有能量转化理论的最一般的提法，即通常所说的机械的热理论。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论普遍地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宇宙系统从产生到消灭的过程中相继发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现，也就是说变成一部历史，在这部历史中，在每个阶段上都有不同的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起支配作用，从而作为始终具有普遍效力的东西留下来的就只有运动了。

——

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被排除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研究再深入下去，它就越来越有合理性。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黑格尔《自然哲学》第 157 页）[261]。（整个巨大的太阳只是为小的行星而存在。）对我们来说，除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不可能有别的，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是只适用于地球的并且因而只是相对的就损失了什么。如果人们把这一点看得很严重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停顿下来。对我们说来，只要知道，在相同的环境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我们右边或左边比距离太阳还远一千万亿倍的地方，都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这就够了。

——

[耐格里没有能力认识无限][262] 耐格里，第 12—13 页

耐格里先说，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马上又接着说，这种“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是不会出现的！（第 12 页）

第一，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如色彩的浓淡、软硬、寿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都是可以度量和可以认识的，即使它们是不同质的。

第二，存在着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两种不同的物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的属性上）是共有的，另一些质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还有一些质可能是两种物中的一个所完全没有的。如果我们拿两种极不相同的物——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我们由此得到的共同点便很少，至多只有重量和其他一些一般的物体属性是二者所共有的。但是，介乎这二者之间还有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的一个无限的系列，这些物和过程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的这个系列充实起来，并指出每一个物或过程在自然联系中的地位，从而认识它们。这是耐格里自己也承认的。

第三，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

我们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会是绝对不同的。但是就在这里，这些差异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步而消失。嗅觉和味觉早已被认为是同源的、同属的感觉，它们所感知的属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属的。视觉和听觉二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触觉和视觉能很好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根据某物的外形便足可以预先说出它在触觉上的性质。最后，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的始终是同一个我，而提供这各种不同印象的同样也是同一个物，这些印象表现为这个物的共同的属性，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也不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全部混乱都来自关于质和量的混乱观念。根据流行的机械观点，耐格里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能够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关于这一点，将在其他地方作必要的说明），或者说，这是由于在他看来质和量是两个绝对不同的范畴。形而上学。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①][第 13 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我们本来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真实的、穷尽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立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终结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种现象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还是重复发生过 100 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而关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谁也没有自然研究家谈得多。因此，当耐格里说，人们由于不愿意只去研究有限的东西，而是把永恒的东西和有限的东西混在一起，于是就把有限的东西弄得神秘莫测，这时他否定的不是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就是自然规律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遇到一个明显的麻烦。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各种纯粹的有限性组成的，同样，绝对地认识着的思维的无限性，也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彼此并立地和相继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的，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做蠢事，从偏斜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道路行进，往往当正确的东西碰到鼻子尖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它（普利斯特列）[263]。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近的前进过程而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是可以认识的，又是不可以认识的，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耐格里以可笑的方式说出同样的意思：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但是我们确实能认识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一切有限的东西[1]。”[第 13 页]

正是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有限的东西以其总和构成无限的东西，因为耐格里正是从这个总和中提取他的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离开这个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有限的东西，他就根本不会有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

（关于恶无限性本身，要在别的地方来谈。）

（在这种无限性研究的前面，有下列几点：）

1.空间和时间上的“微小领域”。

2.“感觉器官的可能有缺陷的发育”。

3.“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暂时的、变换着的东西，只能认识等级上不同的、相对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能把数学概念推用到自然物上，只能根据从自然物本身得到的尺度来判断自然物。我们不知道任何无限的或永恒的东西，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任何绝对的差异。我们准确地知道一小时、一米、一公斤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第 13 页]

这是老生常谈。先从感性的事物得出抽象，然后又期望从感性上去认识这些抽象的东西，期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经验体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置身在感性体验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不是实实在在的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仿佛空间不是实实在在的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的确，据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还没有人看到过或在其他场合下体验过；只有现实地存在着的各种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感官可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物质”和“运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因此，不研究个别的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并且通过认识个别的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就相应地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不过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又无法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思维的事物，而不是感性的事物，而一切认识都是感性的量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难处：我们固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水果本身[264]。

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也许存在着许多为我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运动形式，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遁辞，等于取消运动不可创造这个规律，至少对我们的认识来说是这样。要知道，这些运动形式是可以转化为我们能感知的运动的！这样一来，例如，接触电就容易解释了。

---

[1]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

关于耐格里。无限的东西的不可理解性。当我们说，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时候，我们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步过程而存在着，即以恶无限性的形式存在着，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就理解了这个过程上所必须理解的一切。最多还有这样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同一个东西——在大循环中——的某种永恒的重复呢，还是这个循环有向下的和向上的分枝。

——

恶无限性。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设置在被充满了的空间和时间中，设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在自身中包含了时间的和空间的无限性——恶无限性，但只是作为被扬弃了的、虽然是本质的但不是主导的因素。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所用不着的。的确，几百万个太阳中只有一个太阳和这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根本的立足点。就地球上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来说，我们是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地球，而就有机体科学来说，则完全局限于这个地球。但是，这对于现象的实际上无限的多样性和对于认识自然界来说，并没有本质的损害，正如对于历史来说，同样地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局限于比较短促的时间和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地区，也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损害的。

——

1.无限的进步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因为它只表现为同一个东西的永恒的重复：1+1+1……

2.然而在现实中它并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前进或后退，因而成为必然的运动形式。撇开它不是无限的这一点不说，因为现在已经可以预见到地球生存时期的终结。但地球也并不就是整个宇宙。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的时间上的历史是排除任何发展的，否则自然界就不是精神的自我外在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承认无限的进步过程是“精神”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形式，只不过他幻想这个发展有一个终结，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确立。

3.还有无限的认识：事物在前进中所没有的无限，在循环中却有了[265]（数量，第 259 页，天文学）[266]。这样，运动形式变换的规律便是无限的，自我闭合的规律。但是这样的无限性又被有限性所纠缠，只是一段段地出现的。1/2 也是如此。[267]

[物质的运动形式和各门科学的联系]

量到质的突变=“机械的”世界观，量变引起质变。这是绅士们从来没有嗅到的！

——

[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运动的基本形式][268]

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本性，自然曾不得不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学会理解这样的形式，然后才能在说明更高级的和复杂的形式方面作出某些成绩。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产生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变动的理论，即天体和地上的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接着、几乎同时而且在有些方面还先于物理学而产生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支配着无生命的自然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成功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对这些运动进程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取得相应的进步的。因此，当力学较长时间以来就已经能够把动物躯体中通过肌肉收缩而引起运动的骨骼杠杆的作用充分归之于那些对无生命的自然界也有效的规律时，对其他生命现象的物理化学的论证则几乎还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研究运动的本性时，我们不得不把有机体的运动形式撇在一边。我们不得不局限于——按照科学的现状——无生命的自然界的运动形式。

一切运动都和某种位置变动相联系，不论这是天体的、地上物体的、分子的、原子的或以太粒子的位置变动。运动形式越高级，这种位置变动就越微小。位置变动决不能把有关的运动的本性包括无遗，但是也不能和运动分开。所以必须首先研究位置变动。

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物质的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这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运动。由此可见，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运动也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在这种认识在自然科学中发挥实际作用以前很久，哲学就已经有了这种认识，所以不难说明，为什么哲学比自然科学整整早 200 年就得出了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结论。甚至哲学作出这个结论时所采取的形式，终究比今天的自然科学的表述要高明些。笛卡儿原理——宇宙中现存的运动的量是永远一样的——只是在形式上有缺点，即用一种有限的表达方式来表示一种无限大。与此相对应，在自然科学中这同一个定律现在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亥姆霍兹的力的守恒定律，另一种是更新的更确切的能量守恒定律。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这两种表

达法中的每一个所表示的正好是另一个的对立面，而且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只表达了关系的一个方面。

如果两个物体相互作用，结果它们当中的一个或两个发生位置变动，那么这种位置变动就只能是互相接近或互相分离。这两个物体不互相吸引，就互相排斥。或者如力学上所说的，在这两个物体之间起作用的力是有心力，即沿着它们的中心点所联结起来的直线的方向起作用的力。在宇宙中，这种事情在发生着，不断地和绝无例外地发生着，而且许多运动看起来不管是多么复杂，这在今天毕竟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设想两个相互作用的物体在相互作用时不受第三个物体的任何妨碍或影响，这时这种作用不是沿着最短的和最直接的路线发生，即沿着联结两个物体的中心点的直线发生，那么这在我们看来是很荒谬的[1]。大家知道，亥姆霍兹（《力的守恒》1847 年柏林版第 1 节和第 2 节）用数学方法也证明了：有心作用和运动的量 [270] 的不变性是互为条件的，如果设想存在着不同于有心作用的作用，那就会导致运动可以创造或消灭的结论。所以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

应当明确指出：吸引和排斥在这里不是被看作所谓“力”，而是被看作运动的简单形式。如康德早就把物质看作吸引和排斥的统一。至于“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到时候将会看到。

一切运动都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然而运动只有在每一个吸引被另一处的相应的排斥所抵偿时，才有可能发生。否则一方会逐渐胜过另一方，运动最后就会停止。所以，宇宙中的一切吸引和一切排斥，一定是互相平衡的。于是，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的定律，就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宇宙中的每一个吸引运动，都必定由一个相等的排斥运动来补充，反过来也是这样；或者如古代哲学早在自然科学中提出力的守恒或能量守恒定律以前所说的，宇宙中一切吸引的总和等于一切排斥的总和。

但是，这里似乎还留下了一切运动总有一天会停止的两种可能性：这或者是由于排斥和吸引有一天在事实上终于互相抵消，或者是由于全部排斥最终占有物质的一个部分，而全部吸引则占有另一个部分。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两种可能性自始就可以不存在。原来，辩证法根据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已经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这样一来，无论是排斥和吸引的最终抵消，还是一种运动形式最终分配在物质的这一半上，而另一种运动形式分配在另一半上，因而无论是两极的互相渗透[1]，还是绝对的分离，这些都不成为问题了。在第一种场合下，这就好比硬要使一条磁石的北极和南极互相抵消，在第二种场合下，就好比把一条磁石从中间切断，硬要使一段只有北极而没有南极，使另一段只有南极而没有北极。不过，虽然从两极对立的辩证性质中已经可以推断这样的假设是不能容许的，可是由于在自然研究家中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占支配地位，至少第二种假设在物理学的理论中仍起着一定的作用。这

---

[1]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康德在第 22 页上说：三维空间决定了，吸引或排斥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269——编者注

[1] 意思是相互抵消和中和。——编者注

一点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谈到。

运动在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这最好是就运动本身的各单个形式来研究。这样最终就会得出结论。

我们且拿一颗行星环绕其中心天体所作的运动来看吧。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追随牛顿把椭圆形的行星轨道解释为两种力，即中心天体的吸引和使行星沿着垂直于这种吸引的路线运动的切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除向心的运动形式外，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还假设了与中心点的联线相垂直的另一个运动方向或所谓“力”。因此，它和前面所说的基本定律是矛盾的，依据这个定律，我们的宇宙中的一切运动，只能沿着相互作用的物体的中心点的方向发生，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只能由有心作用力所引起。正因为如此，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就把下面这样一种运动因素纳入理论之中，这种运动因素，如我们也已经看到的，必然要导致运动可以创造也可以消灭的思想，由此就要假定存在着造物主。这样一来，就需要把这一神秘的切线力归结为某种朝中心发生的运动形式，而完成这个工作的，是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大家知道，按照这种看法，整个太阳系是由某种旋转着的极稀薄的气体逐渐收缩而产生的，旋转运动在这个气团的赤道线上显然最为强烈，并且使个别的气环从这个气团上分离出去，然后这些气环就收缩成行星、小行星等等，并按照原来的旋转方向围绕着中心体旋转。这一旋转本身，通常是用气体的单个质点所固有的运动来说明。这种运动朝极不相同的方向发生，但是最后总有某一多余部分朝一定的方向运动下去，这就引起旋转，这种旋转必然随着气团的收缩而不断地加强。但是，关于旋转的起源，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假说，都是排除了切线力，使之化为向心运动的某种特殊的现象形式。如果行星运动的一个要素，即直接向心的要素，通过重力，即行星和中心天体之间的吸引而体现出来，那么，另一个要素，即切线要素，则表现为气团各个质点原有排斥的残余，即以衍生的或改变了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残余。于是，一个太阳系的生存过程就表现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其中由于排斥以热的形式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从而对于这一体系来说逐渐消失，所以吸引越来越占优势。

一目了然：在这里被理解为排斥的运动形式，和现代物理学所说的“能”是同一个东西。由于太阳系的收缩和由此而来的构成现在的太阳系的各个天体的分离，太阳系便失去了“能”，而这一损失，按照亥姆霍兹的著名的计算现在已经达到原来以排斥的形式出现的在太阳系中的全部运动的量的453/454。

其次，且拿我们地球上的一个物体来看吧。它是靠重力和地球联结在一起的，正像地球是靠重力和太阳联结起来一样，但是这个物体和地球不同，不能作自由的行星般的运动。它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运动起来，而且推动一旦终止，它的运动很快也就停止，这或者仅仅是重力的作用所致，或者是重力和该物体赖以运动的介质的阻抗的共同作用所致。这一阻抗归根到底也是重力的一种作用，没有重力，地球表面上就不会有任何具有阻抗的介质，不会有任何大气了。所以在地球表面上的纯粹的机械运动中，我们所碰到的是重力即吸引占有决定性优势的情形，因而在这里运动的产生显示出两个阶段：首先是逆重力而作用，然后是让重力起作用，一句话，上举和使之降落。

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了以吸引为一方和随之按与之相反的方向发生的运动形式即排斥的运动形式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在地球上

的纯力学（这种力学所研究的，是处于既定的、对它来说是不变的聚集状态和凝聚状态之中的物体）的范围内，这种排斥的运动形式在自然界中是不发生的。无论是岩石从山顶上崩落下来，还是水之所以能够下泻，形成这类现象的物理条件和化学条件都是这种力学范围以外的事情。所以在地球上的纯力学中，排斥运动或上举运动一定是人工造成的，即由人力、畜力、水力、蒸汽力等等造成的。这种情形，这种用人工办法克服天然的吸引的必要性。使力学家们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吸引、重力，或者如他们所说的重力的力，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运动形式，甚至是基本的运动形式。

例如，如果上举一个重物然后让它直接或间接下落而把运动传导给其他物体，那么按照通常的力学观点，传导这个运动的不是重物的上举，而是重力的力。例如，亥姆霍兹就让

“我们最熟悉的和最简单的力，即重力，作为推动力而起作用……例如在一座靠重锤推动的挂钟里。这个重锤……如果不使钟的全部机械运转起来，便不能顺应重力的牵引”。但是它不自行下落，便不能使钟的机械运转起来，而且这种下落最终一直要持续到联结它的链条完全松直为止。“到那时，钟就停了，重锤的推动能力暂时用尽了。重锤的重力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减少，它依旧被地球在同一的程度上吸引着，可是这个重力引起运动的能力已经丧失了……但是我们可以用手臂的力量把钟再上好，重锤就又升上去。这样一来，重锤又获得了它原先的推动能力，又能使钟走起来。”（亥姆霍兹《通俗讲演集》第 2 卷第 144 页）

因此，按照亥姆霍兹的说法，使钟走起来的，不是运动的主动的传导，不是重锤的上举，而是重锤的被动的重力，虽然这个重力本身只是由于被上举才脱离被动状态，而在联结重锤的链条松直以后又回到被动状态。所以，照我们刚才见到的新观点看来，能仅仅是排斥的另一种说法，而照亥姆霍兹的旧观点看来，力则是排斥的对立面吸引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就来弄清这一点。

这样，当地球上的力学中的变化过程终结的时候，当重物先被上举然后又下落到同一高度的时候，构成这个过程的运动将怎样呢？在纯力学看来，它是消失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决没有消灭。它有一小部分转化为空气的声波振动，而绝大部分则转化为热。这些热一部分传导给有阻抗作用的大气，一部分传导给落体本身，最后一部分传导给落体所碰到的地面。钟的重锤，也以摩擦热的形式，把自身的运动逐渐传导给钟表机械的各个齿轮。可是转化为热，即转化为排斥的一种形式的东西，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下降运动，就是说，并不是吸引。相反地，如亥姆霍兹正确地指出的，吸引，重力，现在仍然和先前一样，确切地说，甚至变得更大了。倒不如说，通过下落而在力学上被消灭的，并且以热的形式重新出现的，恰好是借上举而传导给被上举物的排斥。物体的排斥变成了分子的排斥。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热是排斥的一种形式。它使固体的分子发生振动，从而减弱各个分子间的联系，直到最后开始向液态过渡；在液态下，如果继续加热，热便又会增强分子的运动，直到达到这样的程度：分子完全脱离物体，并以一定的速度一个一个地自由运动起来，而这个速度对每一个分子来说取决于它的化学构造。如果再继续加热，热就使这个速度更加增大，从而使分子越来越互相排斥。

但是，热是所谓“能”的一种形式；后者在这里再次证明与排斥是同一

的。

在静电和磁的现象中，我们有吸引和排斥的两极之分。关于这两种运动形式的作用方式，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假说，面对事实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只要吸引和排斥是由静电或磁所引起，而且能够毫无阻碍地展开，它们就会完全互相抵偿。这事实上已经是从两极划分的本性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各自的作用不能完全互相抵偿的两极，决不是极，而且到现在为止在自然界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极。流电现象我们在这里暂时撇开不谈，因为这方面的过程决定于化学过程，因而比较复杂。所以我们最好来研究化学的运动过程本身。

当两个份重的氢和 15.96 个份重的氧化合成水蒸气的时候，从这个过程中散发出 68.924 热量单位的热量。相反地，如果要把 17.96 个份重的水蒸气分解为两个份重的氢和 15.96 份重的氧，那么这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要有等于 68.924 个热量单位的运动量传导给水蒸气，不管这是以热本身的形式还是以电运动的形式发生的。一切其他的化学过程也是一样。在大多数场合下，化合时放出运动，分解时必须导入运动。在这里，排斥通常也是过程的主动方面，即取得更多的运动或要求导入运动的方面，吸引则是过程的被动方面，即造成运动过剩并放出运动的方面。因此，现代的理论也宣称：总的说来，元素化合时释放能量，化合物分解时束缚能量。所以“能”在这里又是表示排斥的。亥姆霍兹又说：

“这个力〈化学亲和力〉，我们可以想象为吸引力……碳原子和氧原子间的这种吸引力所作的功，同地球以重力的形式对一个上举的重物所作的功是一样的……当碳原子和氧原子互相冲撞而化合成碳酸气的时候，新形成的碳酸气粒子一定是处在极猛烈的分子运动中，即处在热运动中……当碳酸气后来向四周放出自身的热的时候，碳酸气中的碳和氧仍然丝毫没有减少，而两者的亲和力也和以前一样强。但是这个亲和力现在只表现在这一点上：它把碳原子和氧原子牢固地联结在一起，不让它们分开。”（上引书，第 169[—170]页）

同上面刚刚说过的完全一样，亥姆霍兹坚持认为，在化学中和在力学中一样，力只存在于吸引之中，因而它是和其他物理学家称作能并与排斥完全等同的东西正好相反的东西。

因此，我们现在不再只有吸引和排斥这两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而有一大串从属形式，那种在吸引和排斥的对立中展开和收缩的包罗万象的运动的过程，就是在这些从属形式中进行的。但是，把这形形色色的现象形式归纳到运动这一总的名称之下，这决不仅仅是我们的理解的问题。相反地，这些形式本身通过实际过程就证明它们是同一运动的不同形式，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互相转化。物体的机械运动可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磁；热和电可以转化为化学分解；化学化合反过来又可以产生热和电，而以电为中介又产生磁；最后，热和电又可以产生物体的机械运动。而且这种转化是这样进行的：一种形式的一定运动量，总是有另一形式的精确规定的一定运动量与之相适应，而且，用来量度这个运动量的量度单位，不管是从哪一种运动形式中借用来的都无所谓，就是说，不管是用来量度物体的运动，量度热，量度所谓的电动力，还是量度化学过程中转化的运动，都是无所谓的。

在这里，我们是立足在“能量守恒”理论的基础上，这个理论是尤·罗·迈

尔在 1842 年建立的[1]，并且从那时以来国际上对它的研究已获得了十分光辉的成就。现在，我们应当研究一下这个理论目前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这就是关于“力”或“能”以及关于“功”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根据较新的、现在几乎已经被公认的观点，“能”被理解为排斥，可是亥姆霍兹却主要是用“力”这个词来表示吸引。人们会以为这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差别，因为在宇宙中吸引和排斥是互相补偿的，因此把这个关系中的哪一方当作正或当作负，似乎都无所谓，这就好像正的横座标是从某一直线上的某一点向右边算起或向左边算起都是无所谓的一样。但是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

目前我们在这里考察的并不是宇宙，而是地球上发生的一些现象，它们被地球在太阳系中和太阳系在宇宙中的十分确定的位置所制约。我们的太阳系每一瞬间都向宇宙空间放出极大量的运动，而且是十分确定的质的运动，即太阳热，亦即排斥。而我们的地球本身只是由于有太阳热才有生气，而且它本身在把这种太阳热的一部分转化为其他运动形式以后，最终也把所获得的太阳热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在太阳系中，特别是在地球上，吸引正在大大胜过排斥。如果没有太阳放射到我们这里的排斥运动，地球上的一切运动都一定会停止。倘若太阳明天就冷却，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球上的吸引还会和现在一样。100 公斤重的石头，只要还在原来的地方，就和原先一样还是重 100 公斤。可是运动，无论是物体的还是分子和原子的运动，都会进入我们所想象的绝对静止状态。所以很清楚，对于在今天的地球上所发生的过程来说，是把吸引还是把排斥看作运动的主动的方面，即看作“力”或“能”，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地，在今天的地球上，吸引由于明显地胜过排斥而变成完全被动的了；一切主动的运动都应归功于来自太阳的排斥的供给。因此，最新的学派——虽然它对运动关系的本性还不清楚——把“能”理解为排斥，这从事物本身来看，以及从地球上的过程来看，甚至从整个太阳系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

“能”这个词确实没有把整个运动关系准确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只包括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作用，但没有包括反作用。而且它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能”是物质以外的某种东西，是植入物质中的某种东西。但是和“力”这个词比起来，无论如何还是宁可选择“能”这个词。

力的观念，如各方面所承认的（从黑格尔起直到亥姆霍兹止），是从人的机体在其周围环境中的活动中借用来的。我们说肌肉力、双臂上举力、腿

---

[1] 亥姆霍兹在他的《通俗讲演集》第 2 卷第 113 页上表示，在自然科学证明笛卡儿关于运动在量上不变的原理方面，除迈尔、焦耳和柯尔丁外，似乎他自己也有一份功劳。“我自己对迈尔和柯尔丁毫无所知，而且只是在我自己的研究完成时才知道焦耳的实验，但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竭力探究从上述考察方法中可以得出的自然界中各种过程间的一切联系，并且 1847 年在以《论力的守恒》为名的小册子中公布了我自己的研究。”271——但是在这部著作中，从 1847 年的水平来看，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只有下面这两点是例外：一点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个很有些价值的数学上的推导，即断定“力的守恒”和在某一体系中各个不同物体之间发生作用的各个力的有心作用，只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说法；另一点是他较为准确地表述了下面这个定律：某一既定的力学体系中的活力和张力的总和是不变的。在其他各个方面，自 1845 年迈尔的第二篇论文发表后，就早已超出亥姆霍兹的这部著作。迈尔在 1842 年就已经肯定了“力的不灭”，并且在 1845 年又根据自己的新观点，围绕“自然界中各种过程间的联系”说出了比 1847 年的亥姆霍兹高明得多的东西。272

的弹跳力、肠胃的消化力、神经的感觉力、腺的分泌力等等。换句话说，为了不必对我们机体的某种机能所引起某种变化的真实原因作出说明，我们就塞进某种虚构的原因，某种和这个变化相当的所谓力。然后我们又把这种偷懒的办法搬到外在世界中去，这样，有多少种不同的现象，便虚构出多少种力。

自然科学（天体的和地球上的力学或许是例外）还在黑格尔的时代已经处于这种质朴的发展阶段，而黑格尔已经完全正当地攻击当时流行的把什么都命名为力的手法（引证一段话）[273]。他在另一个地方也指出：

“说磁石有灵魂〈如泰勒斯所说的〉，比说它有吸引力更好些；力是一种属性，它可以和物质分离开来，可以认为是一个宾词；而灵魂则是这种运动本身，同物质的本性是一回事。”[①]（《哲学史》第1卷第208页）

现在我们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可以轻易地谈论各种力了。且听听亥姆霍兹的说法：

“当我们完全认识某一自然规律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求它在毫无例外的一切场合下起作用……这样，规律在我们面前就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力量，因此，我们把它叫作力。例如，我们把光的折射定律客观化，把它看作透明物体的一种折射力；把化学亲和定律客观化，把它看作各种不同物质间的亲和力。我们同样他说金属的电接触力，说粘合力、毛细作用力等等。这些名称把一些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起初只包括了一小批条件还相当复杂的[①]自然过程……力只是作用的客观化了的规律……我们所引进的力的抽象概念，只补充了这样一层意思：我们不是任意编造这个规律，它是现象的无法反驳的规律。这样，我们的旨在把握自然现象即发现其规律的要求，就采取了另外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应当去探究构成现象的原因的力。”（上引书，第190页。1869年在因斯布鲁克的报告）

首先，把关于力的纯主观的概念，塞到一个已认定为不以我们的主观为转移的、从而是完全客观的自然规律中去，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奇特的“客观化”方法。干这种事情的充其量只是一个最遵守教规的老年黑格尔派，而不应当是亥姆霍兹这样的新康德主义者。当我们把某种力硬塞进业经确定的规律中去的时候，我们既没有给这个规律，也没有给它的客观性或它的作用的客观性添加哪怕一点点新的客观性；所添加的只是我们的主观的论断：这个规律靠着某种暂时还完全未被认识的力而起作用。但是，当亥姆霍兹给我们举出光的折射、化学亲和性、接触电、附着、毛细现象这些例子，并把支配这些现象的规律提高到力这个“客观的”显贵等级上去的时候，这种在规律中塞进某种力的做法的隐秘含义立刻就显露出来了。

“这些名称把一些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起初只包括了一小批条件还相当复杂的自然过程。”

正是在这里，“客观化”（不如说是主观化）有了某种意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完全认识了规律，而恰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它，因为我们还弄不清这些现象的“相当复杂的条件”，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时求助于“力”这个避难所。可见，我们由此就表明，我们对规律的本性及其作用方式不是有知识，而是缺少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力”这个词作为尚未被探明的因果关系

[①] ①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①] ①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的略语，作为语言上的权宜之计，日常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超过了这一点，那就糟了。如果亥姆霍兹有权利用所谓光的折射力、电接触力等等来解释物理现象，那么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就同样有权利用热力和冷力来解释温度的变化，从而就用不着对热这个现象作任何进一步的研究了。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力”这个词也是不确切的。它片面地表现一切。一切自然过程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建立在至少两个发生作用的部分的关系上，建立在作用和反作用上。可是，由于力这个概念来源于人的机体对外界的作用，再者也来源于地球上的力学，所以它包含的意思是：只有一个部分是主动的、发生作用的，而其他那部分是被动的、接受作用的；这样一来，就把两性的差异推广到无生命的存在物上去，而对此直到现在却不能作出证明。力作用于其上的这另一个部分的反作用，最多只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反作用，表现为一种阻抗。这种看问题方法甚至在纯力学以外的许多领域里也是行得通的，因为在这些领域里涉及的只是运动的简单的转移及其量的计算。但是在比较复杂的物理过程中这就不够了，亥姆霍兹自己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光的折射力在光本身中和在透明物体中一样多。在附着和毛细作用中，“力”在固体表面上和在液体中肯定一样多。关于接触电，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里有两块金属各自起着作用；而“化学亲和力”如果包含在什么地方的话，那无论如何应包含在起着化合作用的两个部分中，但是，由两个分开的力所构成的一个力，一个不引起自身的反作用、却在自身中包含和承载着这种作用的作用，决不是地球上的力学所理解的力，而这门科学却恰巧是真正知道力的含义的唯一科学。要知道，地球上的力学的基本条件，首先是不去研究碰撞的原因，即每一种情况下的力的本性，其次是持有力的片面性的观点，认为同这个力相对抗的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总是和自身相等的重力，这也就是说，同地球上的任何下落空间比起来，地球半径总是等于无限大。

我们现在进一步看看亥姆霍兹怎样把他的“力”“客观化”，使之成为自然规律。

在 1854 年的一篇讲演（上引书，第 119 页）中，他研究了最初形成我们的太阳系的星云球体原来所包含的“能作功的力的蕴藏量”。

“事实上，它不过是以它的各个部分彼此间的万有引力的形式获得这方面的一笔极为巨大的妆奁。”

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同样无可怀疑的是，这全部重力或引力妆奁依然丝毫未减地保存在现在的太阳系中，也许要除去一个微不足道的量，这个量是同可能一去不复返地抛到宇宙空间中去的物质一道丧失的。其次，

“各种化学力必定也是既有的，已准备好起作用的；但是，各种物质只有发生最紧密的接触，这些力才能起作用，所以在它们开始起作用以前，一定要发生浓缩现象”[第 120 页]。

如果我们像亥姆霍兹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把这些化学力看作亲和力，即看作吸引，那我们在这里也不得不说，这些化学吸引力的总和依然丝毫未减地继续存在于太阳系中。

但是在同一页上，亥姆霍兹还叙述了他的计算的结果：在太阳系中“最初的机械力现在大约只有 1/454 还原样存在着”。

这怎么能和上面所说的相一致呢？引力，无论是万有引力或是化学吸引力，都依然完好地存在于太阳系中。亥姆霍兹并没有给出力的某个其他的确

实来源。当然，按照亥姆霍兹的说法，这些力已经作了巨大的功。但是这些力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或减少。太阳系中的每一个分子乃至整个太阳系本身的状况，都和前面的例子中的钟锤的情形相同。“重锤的重量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减少。”一切化学元素的状况都和前面说过的碳和氧的情形一样：每种元素既有的总量依然原样保存着，而“全部亲和力也仍然和以前一样强”。那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力”作了据他计算比太阳系现在能作的功还要大 453 倍的巨大的功呢？到目前为止，亥姆霍兹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不过他进一步又说：

“我们不知道，[原始星云球体中]是否另外还有以热的形态存在的力的蕴藏[①]。”[第 120 页]

但是，请让我说几句。热是一种排斥的“力”，因而是逆着重力和化学吸引的方向起作用的，假设重力和化学吸引为正，它就是负。因此，既然亥姆霍兹从万有吸引和化学吸引来构成他的力的原始蕴藏，那就不应当把此外还存在着热的蕴藏算到这个力的蕴藏中去，而应当从中减掉。否则，当太阳热正好逆着地球的引力把水变成水蒸气并使水蒸气上升的时候，太阳热就必然会增强地球的引力；或者用来输送水蒸气的发烫的铁管所具有的热，就必然会增强氧和氢的化学吸引，可是它本来恰好会使这种吸引不起作用。所以，当亥姆霍兹设想一定量的排斥运动可以以热的形式加到吸引形式的运动上去，并增加后者的总量时，他犯了一个明显的计算错误。

或者，以另外的形式来说明这同一个问题。假设星云球体半径为 r，因而体积为 4/3πr3，其温度为 t。再假设另一质量相同的星云球体在较高的温度 T 之下有较大的半径 R 和体积 4/3πR3。显然，在第二个星云球体中，只有当它的半径从 R 缩小到 r，即把相当于温度差 T—t 的热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的时候，吸引，无论是力学的吸引或是物理的和化学的吸引，才能和第一个星云球体中的吸引以同样的强度发生作用。所以较热的星云比较冷的星云要凝缩得晚一些，因而从亥姆霍兹的观点看来，热作为凝缩的障碍，就不是“力的蕴藏”的正量，而是负量。

这所有的“力的蕴藏”，不管是可能存在的，还是可能加以证实的，我们都冠以同样的符号，使它们可以相加。因为我们暂时还不能使热转换，不能用等量的吸引来代替热的排斥，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两种吸引的形式下来实现这种转换。于是我们就干脆用气团自身独立化的那一时刻存在于其中的排斥运动或所谓的能的总和，来代替万有引力，代替化学亲和力，代替那些自始可能就在这些力之外存在着的热。这样，亥姆霍兹的下述计算就理顺了，在这里他要计算的是

“由于太阳系各天体从弥漫的星云物质发生假设的最初的凝缩而必然出现的变热现象”[第 134 页]。

他就这样把全部“力的蕴藏”都归结为热，归结为排斥，从而就可以把想象的“热这样一种力的蕴藏”加到“力的蕴藏”上去。于是他的计算表明：最初存在于气团中的全部能量（即排斥）的 453/454，已经以热的形态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或者确切地说，现在的太阳系中的一切吸引的总和，与太阳系中还存在着的一切排斥的总和之比，是 454：1。但是这样一来，这些计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算就和拿这些计算来作例证的讲演的本文发生矛盾了。

力这个概念甚至在亥姆霍兹这样的物理学家身上都引起了这样的思想混乱，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它在从事计算的力学范围以外的任何研究部门中，在科学上都是不适用的。在力学中，运动的原因被当作已知的，人们关心的不是运动的起源，而只是运动的作用。因此，如果有人把某种运动的原因称作某种力，这丝毫无损于力学本身；但是人们习惯于把这个名称也搬到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去，这样一来混乱就不可避免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而且还会常常看到。

关于功的概念，我们在下一章中再谈。

（应当阐明功这种运动的传递及其形式的概括。）

[札记和片断]

运动和平衡。平衡和运动是分不开的。[1]在天体的运动中，运动处于平衡中和平衡处于运动中（相对的）。但是，任何特殊的相对的运动，即这里的一个运动着的天体上的个别物体的全部个别运动，都是旨在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追求。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在太阳上没有单个物体的平衡，而只有整个质量的平衡，或者说只有一种极微不足道的、由密度的显著差异所制约的平衡，在表面上是永恒的运动和骚动，离解。在月球上似乎只有平衡占统治地位，没有任何相对的运动——死亡（月球=否定性）。在地球上，运动分化为运动和平衡的变换：个别运动趋向平衡，而总体运动又破坏个别的平衡。岩石进入静止状态，但是剥蚀、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断地破坏这个平衡。蒸发和雨、风、热、电和磁的现象也造成同样的景象。最后，在活的有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单位和较大的器官的持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有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并且始终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

[1]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平衡=吸引胜过排斥"。——编者注

[关于数学] [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274]

I

加在第 17—18 页上[①]：
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上的无限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8 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是从内容方面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并且重新提出下面这个命题：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275]。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尽管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尽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可是不容否认，这个哲学在许多场合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类似之处以及反过来的情形并且证明同一些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抛弃了。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状的遗传，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个体的一系列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例如，在我们中间，一些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的儿童来说都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从经验上来证明，这就完全是“累积的遗传”的结果。想用证明的方法向一个布须曼人或澳大利亚黑人传授这些公理，这可能是困难的。

在本书[①]中，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各个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一个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中的两领域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出来，只有形而上学的懒汉才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切理论进步中，同 17 世纪下半叶发明微积分比较起来，未必再有别的东西会被看作人类精神如此崇高的胜利。如果说在什么地方可以出现人类精神的纯粹的和唯一的业绩，那就正是在这里。至今仍笼罩着微积分中所运用的各种数量（各阶的微分和无限）的那种奥秘，是下述事实的最好的证据：人们总是以为，这里所研究的是人类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②]，而客观世界提供不出任何相应的东西。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自然界对这一切想象的量都提供了样本。

我们的几何学是从空间关系出发，我们的算术和代数学是从这样的数量出发，这些数量适合于我们的地球上的关系，就是说适合于力学称之为质量的物体量，这是出现在地球上的并由人推动的质量。和这些质量比起来，地球的质量显得是无限大的，并且也被地球上的力学当作无限大来看待。地球

---

① 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373—375 页。——编者注

① 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484 页，本书指《反杜林论》。——编者注

② 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376 页。——编者注

半径=∞，这是整个力学应用于落体定律时的原则。但是，当我们所考察的是那些用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恒星系中的、必须以光年来估算的距离时，不只是地球，而且整个太阳系以及其中呈现出的各种距离，又都成为无限小了。这样，我们在这里不仅已经有了第一阶的无限，而且还有了第二阶的无限，我们的读者高兴的话，还可以凭自己的想象构造出无限空间里的其他的更高阶的无限。

但是，按照现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流行的观点，力学所研究的地球上的质量，即物体，都是由分子构成的，而分子是最小的微粒，如果不破坏所研究的物体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同一性，便不能再加以分割。根据威·汤姆生的计算，最小的分子的直径不能小于一毫米的 1/5000 万[276]。但是，即使我们假定最大的分子的直径甚至达到一毫米的 1/2500 万，然而同力学、物理学，甚至化学所研究的最小的质量比较起来，分子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量。尽管如此，分子还是具有所考察的质量的一切特性，可以在物理学上和化学上代表质量，而且在一切化学方程式中确实代表着质量。一句话，分子同相应的质量相比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正如数学上的微分同其变数相比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一样。唯一的差别是：在微分中，在数学的抽象中，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神秘的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在这里却是不言自明的，并且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自然界使用这些微分即分子的方式和所遵循的规律，与数学使用数学中的抽象的微分的方式和规律是完全相同的。例如：x^3 的微分是 $3x^2dx$，这里略去了 $3xdx^2$ 和 dx^3。如果我们按几何学来设想，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边长为 X 的立方体，其边长按无限小 dx 量增大。我们假定这一立方体是由一种可升华的元素构成的，比方说，是由硫磺构成的；再假定构成一个角的三面被遮盖起来，另三面是露着的。我们把这个硫磺立方体放在硫磺蒸气中，再把气体温度降低足够的度数，于是硫磺蒸气就凝结在这个立方体的露着的三面上。如果我们设想这是一个以纯粹的状态发生的过程，因而假定在这三面的每一面上最初凝结了一个分子厚的一层，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超出物理学和化学惯用的实验方法。立方体各边的长度 x 增大了一个分子直径的长度 dx。立方体的容积 x^3 增加了 x^3 和 $x^3+3x^2dx+3xdx^2+dx^3$ 之差，按照数学中的同一理由，我们可以略去 dx^3 和 $3xdx^2$，即略去一个分子和联成直线的长度为 $x+dx$ 的三排分子。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立方体的质量增加了 $3x^2dx$。

严格说来，硫磺立方体上并不存在 dx^3 和 $3xdx^2$，因为在同一空间内不能有两个或三个分子存在，因而这个立方体的质量的增量恰好是 $3x^2dx+3xdx+dx$。这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说明：在数学上 dx 是一个线量，而大家知道，这种没有厚和宽的线在自然界中并不能独立地存在，因此数学的抽象也只是在纯数学中才是无条件地有效的。既然这个 $3xdx^2+dx^3$ 也可以略去，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蒸气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一杯水的最上面的一层分子蒸发了，那么水层的高度 x 就减少了 dx，这样一层分子又一层分子地蒸发下去，事实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微分。如果热的水蒸气在一个容器中由于压力和冷却又凝结成水，而且分子一层又一层地累积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把那些使过程变得不纯粹的次要情况撇开不谈），直到容器满了为止，那么这里就不折不扣地发生了一种积分，这种积分和数学上的积分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一种是由人的头脑有意识地完成的，另一种是由自然界无意识地完成的。不过，和微积

分运算完全类似的过程，不仅仅发生在从液态到气态或从气态到液态的转变中。当物质运动由于碰撞而中止，并转化为热即分子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不是物质运动发生微分，又是什么呢？当水蒸气的分子运动在蒸汽机的汽缸中累积起来，把活塞冲高一定的距离并且自身转化为物质运动的时候，这种运动不是被积分了吗？化学把分子分解为原子，即具有更小的质量和体积的量，然而是同阶的量，所以二者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有限的关系。因此，表示物体的分子组合的一切化学方程式，就形式来说是微分方程式。但是这些方程式由于其中所表示的原子量实际上已经积分化了。化学所指靠的正是已知其量的相互关系的微分。

但是，原子决不能看作简单的东西或者甚而看作已知的最小的物质粒子。撇开越来越倾向于把原子看作复合的东西的化学本身不谈，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断言：充当光辐射和热辐射的介质的宇宙以太，同样是由分立的粒子构成的，不过这些粒子极小，以致它们同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的关系就像后两者同力学的物体的关系一样，也就是像 d^2x 同 dx 的关系一样。因此，这里我们在关于物质构造的现今流行的观念中，同样看到了二阶微分；没有任何根据令人相信，每个人只要高兴，为什么不会作这样的设想：自然界中一定还存在着和 d^3x，d^4x 等等相似的各种情况。

因此，不论人们对物质构造采取什么样的观点，下面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物质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大的、界限分明的组，每一组的各个成员在质量上各有一定的、有限的比值，但同邻近的组的各个成员的关系上，则具有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比值。目力所及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是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在一些组之间我们发现有中间环节，不过这改变不了什么东西。例如，在太阳系的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之间有小行星，其中一些小行星的直径并不比幼系罗伊斯公国 [277] 的直径大些，此外还有流星等等。例如，在地球上的物体和分子之间有有机界中的细胞。这些中间环节只是证明：自然界中没有飞跃，这正是因为自然界本身是由真正的飞跃所组成。

数学计算的只要是现实的量，它就也要毫不犹豫地采用这个观点。对地球上的力学说来，地球的质量已经被看作无限大，而在天文学中，地球上的物体及与之相当的流星却被看作无限小，同样，对于天文学来说，只要它超出最邻近的恒星的范围来研究我们这一恒星系的构造，太阳系诸行星的距离和质量就会趋近于零。但是，数学家一旦退入他们的无法攻克的抽象堡垒，即所谓纯数学，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却，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而在分析中所运用的方式方法就显得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经验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东西了。数学家们的这种工作方法令人奇怪的是总是取得正确的结果，他们对这种方法与其说作说明不如说作辩解时所表现的愚蠢和荒唐，超过了例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各种最坏的虚虚实实的那些幻想，然而面对这些幻想，数学家们和自然研究家们却害怕得难以言状。他们谴责黑格尔把抽象推到了极端，可是自己正是这样做的，而且规模还大得多。他们忘记了：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推到极端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数学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用的，尽管是不自觉地借用的，所以它不能从它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而只能从现实来说明。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研究现实，那么如我们看到的，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数学的无限性关系的来源的现实关系，甚至会发现自然界

中使这种关系起作用的数学性的类似物。而这样一来，事情就说明了。（海克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糟糕的复述。但是还有连续的物质和分立的物质之间的矛盾；见黑格尔。）[278]

[关于生物学]

生和死。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注：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152—153页）[279]、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但是，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在他面前一切关于灵魂不死的说法便破除了。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成分，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来；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本原，或多或少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他说明生和死的本性，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

生存斗争。首先必须把它严格限制在由于植物和动物的过度繁殖所引起的斗争的范围内，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植物和低等动物的某些发展阶段上发生的。但是必须把这种斗争同下述情况严格分开：没有这种过度繁殖，物种也会变异，旧种会绝灭，新的更发达的种会取而代之。例如，动物和植物迁移到新的地域，那里的新的气候、土壤等等条件会引起变异。在那里，有适应能力的个体存活下来，并且由于越来越适应而形成新种，而其他较稳定的个体则死亡和最后绝灭，那些不完善的、处于中间阶段的个体也随同它们一起绝灭。没有任何马尔萨斯主义，上述情形也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就算这里出现了马尔萨斯主义，它也丝毫不能改变过程，最多只能加快过程。——在某一已知地区的地理、气候等等条件逐渐变化（例如，中亚细亚的干燥化）的情况下，也是一样。在那里动物或植物是否互施压力，这是无关紧要的；由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机体的进化过程照样发生。——性的选择也是一样，在这里马尔萨斯主义也毫不相干。

因此，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无须有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引起全部进化过程。

达尔文的缺点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①]中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者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者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

（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应这些环境者，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退步（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步）。

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步同时又是退步，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向上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为生活的斗争[280]。在达尔文以前，他的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恰好是有机界的和谐的合作，植物王国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氨和碳酸。达尔文的学说刚刚得到承认，这同一些人便立刻到

[①] 这是罗·达尔文《物种起源》第4章的标题。——编者注

处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狭小的界限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也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复杂情况的全部多样性的丰富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81]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的合理性，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断言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但是为了进行论证，我们暂且接受“生存斗争”这个说法。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收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完全不中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所达到的高度使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拒之于这些资料之外；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来重建平衡；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要更加富有内容和更加深刻得多。

[自然界和社会]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282]
劳动者受奴役的过程
导　　言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叫作第三纪的那个地质时代的某个还不能确切肯定的时期，大概是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可能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大片陆地上，生活着一个异常高度发达的类人猿的种属。达尔文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它们浑身长毛，有胡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①]

这种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在攀援时手干着和脚不同的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现在还活着的一切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向前运动。但是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如此，并且非常笨拙。它们的自然的步态是采取半直立的姿势，而且用手来帮忙。大多数的类人猿是以握成拳头的手指的节骨支撑地面，两腿收起，身体在长臂之间摆动前进，就像跛子撑着双拐行走一样。一般说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间观察到从用四条腿行走到用两条腿行走的一切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用两条腿行走的。

如果说我们的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先成为习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成为必然，那么这就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此期间已经越来越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在猿类中，手和脚的使用也通行某种分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抓住食物，这是比较低级的哺乳动物用前爪就能做到的。有些猿类用手在树上筑巢，或者如黑猩猩甚至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掷向敌人。它们在被豢养的情况下用手做出一些简单的模仿人的动作。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相比，竟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两者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任何猿手都模仿不了的数百种动作。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过渡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的使自己的手能做出的一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最低级的野蛮人，甚至那种可以认为已向更近乎兽类的状态倒退而同时躯体也退化了的野蛮人，也远远高于这种过渡性的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石刀以前，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迈出了：手变得自由了，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而由此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①] 罗·达尔文《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1卷第6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编者注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

但是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只是整个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益于手的，也有益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以二重的方式发生的。

首先这是由于达尔文所称的生长相关律。依据这一规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息息相关，哪怕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例如，一切具有无细胞核的红血球并以一对关节（髁状突）来联结后脑骨和第一节脊椎骨的动物，无例外地也都长有乳腺以用来哺养幼仔。同样，在哺乳动物中，偶蹄通常是和进行反刍的多囊的胃相联系的。身体的某些特定形态的改变，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态的改变，虽然我们还不能解释这种联系。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聋的。人手的逐渐灵巧化以及与之保持同步的脚在直立行走方面的发育，由于上述相关律的作用，无疑会反过来影响机体的其他部分。但是这种影响作用现在研究得还太少，所以我们在这里除了作一般的叙述，不能再做什么。

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其余机体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能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那里去寻求根源。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随着每一新的进步又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传递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十分敏锐，以致它们在它们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很容易地学会听懂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表示依恋、感激等等的表达感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经常接触的人几乎难以排除这样的念头：有足够的情况表明，这些动物现在感到没有说话能力是一个缺陷。不过，它们的发音器官可惜已经沿着一定的方向过度专长化了，再也无法补救这种缺陷。但是，只要有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叫声最令人讨厌的鹦鹉说得最好。人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了。它一小时一小时地唠唠叨叨重复它那几句话，的确纯粹是出于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接触。但是在它

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到这些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么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像柏林卖菜的女贩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话。它在乞求美味食品时也有这样的情形。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同脑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同步发育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随有听觉器官的相应的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连被人当作各种物的特定标志的不同气味的百分之一也辨别不出来。至于触觉，即在猿类中刚刚显示出最粗糙的萌芽的触觉，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而一同形成。——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进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育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育，并不是在人同猿最终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在此以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

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钟[1]。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抵抗了邻近的猿群而占得的觅食地区的食物吃光。为了获得新的觅食地区，它们进行迁徙和战斗，但是除了无意中用自己的粪便肥沃土地以外，它们没有能力从觅食地区索取比自然界的赐予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的觅食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这种动物的数目最多只能保持不变。但是一切动物对待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毁掉还处在胚胎状态中的新生的食物。狼不像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动物的这种“过度掠夺”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强迫动物去适应不同于往常食物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获得了和过去不同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而从前某个时候固定下来的物种也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种过度掠夺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力远远高于其他一切猿种的某个猿种中，这种过度掠夺必然造成的结果就是可食植物的数目越来越扩大，可食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越来越增多，总之，就是食物越来越多样化，随之摄入身体内的物质也越来越多样化，而这些物质就是转变成人的化学条件。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已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并且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群和现在的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

---

[1] （注释）这方面的第一流权威威廉·汤姆生爵士曾经计算过：从地球 冷却、到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一亿年 多一点。

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过渡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变成人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几乎现成地含有身体的新陈代谢所必需的各种最重要的物质；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的即同植物生活相关的各种过程的时间，因此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物质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正在生成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动物界的程度也就越高。如果说除吃肉外还要习惯于吃植物这一情况使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仆，那么除吃植物外也要吃肉的习惯则大大促进了正在生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食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得到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为脑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因而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育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恕我直言，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到达现在这个地步的，并且，如果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都曾经有一个时期由于吃肉而竟吃起人来（柏林人的祖先，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 10 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283]，那么这在今天同我们已经毫不相干。

肉食引起了两个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嘴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食更加丰富起来，因为它在打猎之外开辟了新的更有规律的肉食来源，除此以外还提供了奶和奶制品之类的新的食品，而这类食品就其养分来说至少不逊于肉类。这样，对于人来说，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新的解放手段。逐一详谈它们的各种间接的影响，未免扯得太远，虽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些影响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正如人学会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其他的动物，虽然也习惯于各种气候，但这不是独立自主的行为，而只是跟着人学会这样做的，例如家畜和为害的小动物就是这样。从原来居住的恒常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一年中分成冬季和夏季的地带，就产生了新的需要：要有住房和衣服以抵御寒冷和潮湿，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了。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发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动作，提出并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化了。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起初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创造物面前，劳动的手的较为简朴的产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况能作出劳动计划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很早的阶段上（例如，在简单的家庭中），就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连达尔文学派的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自然研究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因为他们

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同样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的作为。我们也看到：由动物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并且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而在大多数场合下，正是由于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就妨碍了我们的自然研究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了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赫勒拿岛，第一批扬帆过海者带到陆地上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部消灭光，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引进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土地。但是，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带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于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这样就把各大洲的动植物区系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人们曾去寻找演化为谷类的野生植物，但至今仍是徒劳。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狗，或者种类繁多的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这始终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此外，不言而喻，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有能力作出有计划的、经过事先考虑的行动的。相反地，哪里有原生质和有生命的蛋白质生存着并起着反应，即由于外界的一定刺激而发生某种哪怕极简单的运动，那里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有计划的行动。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捉猎获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从某一方面来看同样似乎是有计划的。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的猎狐活动中，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懂得怎样准确地运用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逃避追逐者，怎样出色地懂得并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切断自己的踪迹。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由于和人接触而获得较高发展的家畜中间，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同样机灵的调皮行动。因为，正如母体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以蠕虫为开端的几百万年的躯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则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晚些时候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更加压缩了。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

---

[1]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通过改良”。——编者注

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284] 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我们曾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之而来的瘰疬症的蔓延。但是，同工人降低到以马铃薯为生这一事实对各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影响比起来，同 1847 年爱尔兰因马铃薯遭受病害而发生的大饥荒比起来，瘰疬症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次饥荒中，竟把 100 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送入坟墓，并有 200 万人逃亡海外。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由此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成了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著居民后来招致灭绝的主要工具之一。以后，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早已被抛弃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 世纪和 18 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一边，而另一边的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使得资产阶级赢得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尔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而这一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但是，就是在这一领域中，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

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原始的土地公有，一方面同眼界极短浅的人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为应付这种原始经济的意外的灾祸提供了某种周旋余地。这种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这同以这种社会科学为其理论表现的社会组织是完全相适合的。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的过程就显示了这种对立，德国在“崩溃”[285]期间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奏：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权，必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丧失所有权，同时一切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不劳动的人的手中；而[……][①]

写于1873—1883年，1885—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
第一次全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5年版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616页

恩格斯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286]

自从我按照译者[①]的希望写完本书的《附录》[②]以来，已经过去10个月了。在这10个月中，美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其他任何国家至少需要10年才能完成

---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① 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298页，——编者注

的变革。1886 年[3]2 月，美国的舆论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4]，因此，那种使欧洲社会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合众国不可能发生，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决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然而正在这时，日益临近的阶级斗争已经投下它的巨大阴影：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289]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特别是全国都在准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广大运动,这个运动说在 5 月开始就在 5 月开始了。[290]我的《附录》表明，当时我已经正确估计了这些征兆，预料会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但是，当时谁也不能预见运动会在这样短的时间以这样不可遏制的力量爆发，会以燎原烈火般的速度蔓延，会从根本上震撼[1]美国社会。

但是事实明摆着，不容抹煞，无可争辩。去年夏天几位美国记者访问我，承他们绘声绘色地告诉我美国统治阶级对此感到多么恐怖；“新的转折”使他们张皇失措，困惑不解。但是，那时运动还刚刚开始，只不过是因为废除黑奴制度和工业迅速发展而成为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那个阶级的一连串杂乱的、显然是互不联系的骚动。在年底以前，这种混乱的社会痉挛开始有了明确的方向。广大工人群众在国内辽阔地区的几次自发的本能的运动，他们对于到处同样的、由同样原因造成的悲惨的社会状况普遍不满的同时爆发，使他们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独特的阶级，一个实际上多少是世代相传的雇佣工人即无产者的阶级。这种意识由于一种纯粹美国人的本能，立即把他们引向自我解救的下一个步骤：组织一个具有自己的纲领并以夺取国会大厦和白宫为目标的工人政党。5 月，掀起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等地发生了骚动，统治阶级试图用暴力和残酷的阶级审判来镇压工人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11 月，在所有的大城市都组成了新的工人政党，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沃基进行了选举。[291]以前，5 月和 11 月只能让美国资产阶级想起合众国公债息票的付息；从今以后，5 月和 11 月将使他们也想起美国工人阶级拿出自己的息票要求付息的日子了。

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领悟到，他们已经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的阶级，在现存社会关系下的一个固定的阶级；又经历了好多年，这种阶级意识才引导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特殊的政党，它不受统治阶级各派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的支配，并且同这些政党相对立[1]。在美国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 17 世纪孕育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在这 10 个月中工人阶级就经历了本身发展的这两个阶段。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工人群众感到他们有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利益，必须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起来；为了表达和实现这

---

[3] 原稿误写为 1885 年。——编者注

[4] 恩格斯在 1887 年的单行本上加了一个注：“我在 1844 年写的那本书用英文出版是有道理的，这恰恰是因为，现代美国工业的状况几乎正好相当于我曾描述的 40 年代的英国工业的状况。从伦敦《时代》月刊 3、4、5 和 6 月号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那些论《美国工人运动》的文章 287 可以看出是多么相似。我欣然提到这些出色的文章，因为这使我有可能同时批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艾威林愚蠢地散布的那些可恶的诽谤。”288——编者注

[1] 在德文版中不是“会从根本上震撼”，而是“现在已经从根本上在震撼美国社会”。——编者注

[1] 在德文版中不是“相对立”，而是“相敌对”。——编者注

种感觉，要把每个自由国家为此目的而预备的政治机器开动起来，——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寻找医治这些共同苦难的共同药物，并把它体现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中。运动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这一步，在美国尚待完成。

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

这个纲领，不管它最初具有什么形式，都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造成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原因，在美国和在欧洲都是一样的；填平这种鸿沟的手段也到处都相同。因此，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①]一定会完全符合那个经过 60 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战斗的欧洲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让它们供全体和为了全体的利益而共同使用。

但是，美国的新的党如果也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它的成立就是为了夺取政权，那么它在怎样对待一旦夺得的[②]政权这个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纽约和东部的其他大城市，工人阶级的组织采取了按职业联合的方式，每个城市都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在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于去年 11 月把亨利·乔治选为它的旗手，因此，它的临时竞选纲领几乎完全浸透了他的原则。在西北部的一些大城市，竞选是根据一个很不明确的工人纲领进行的，亨利·乔治的理论的影响即使有一点，那也很难看得出。在这些人口众多、工业集中的巨大中心，新的阶级运动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而在全国，我们发现两个分布很广的劳工组织，即“劳动骑士”[292] 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中只有后者才有一个符合上述现代欧洲观点的纲领。

在美国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三种多少已经确定的形式中，第一种是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的运动，目前主要是地方性的。纽约无疑是合众国的最重要的城市，但纽约不是巴黎，合众国不是法国。我认为亨利·乔治的纲领，以它目前这样的形式来看是太狭隘了，只能作为地方性运动的基础，至多也只能作为总运动中的一个短期阶段的基础。在亨利·乔治看来，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普遍的原因。但是从历史上看来，这并不完全正确。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在罗马共和国衰落时期，当自由的意大利农民被剥夺了田地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类似 1861 年以前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的阶级；无论是奴隶还是“白种贫民”[①]，这两个阶级都同样无力解放自己，于是古代世界崩溃了。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用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给地主服劳役或交纳产品。直到近代的黎明时期，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归根到底”，而是“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删去了：“一旦夺得的”。——编者注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白种贫民”，而是“贫穷的自由人”。——编者注

即 15 世纪末，农民的大规模被剥夺才给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②]，这些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只有向别人出卖劳动力，才能活命。但是，如果说土地被剥夺使这个阶级产生，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现代的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则使它长期存在，使它人数增加，使它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和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特殊阶级。所有这些，马克思都详细地论述了（《资本论》第七篇《所谓原始积累》293）。马克思认为，现代的阶级对抗和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③]，起因于工人阶级被剥夺一切生产资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土地。

亨利·乔治既然宣布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自然认为医治此病的药剂就是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要求把土地交给社会，但不仅是土地，同样还有其他一切生产资料。但是，即使我们不谈其他生产资料的问题，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土地如何处理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土地应该共同占有，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种，对其他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厂等等也是这样；亨利·乔治却只限于像现在这样把土地出租给个别的人，只调整土地的分配，并把地租用于公众的需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于私人的需要。社会主义者要求的是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变革；亨利·乔治要求的是不触动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这实质上就是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极端派提出的[①]东西，这些人也要求国家没收地租。

当然，如果假定亨利·乔治的话就是他的最终看法，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有按照我现在所看到的来考虑他的理论。

组成美国工人运动的第二个大派别就是劳动骑士。看来，这个派别对运动的现阶段来说是最典型的，当然也是最强有力的。这个巨大的团体有无数的“会”，已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代表着工人阶级内部个人的和地方的各种各样意见。他们有一个相当不明确的纲领，他们结合在一起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实际上无法遵行的章程，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已经本能地感到：他们为实现共同的愿望而联合起来这一事实就使他们成为国内的一支强大力量。这是真正美国式的怪现象：最现代的趋向披着最中世纪的外衣，最民主的甚至叛逆的精神隐藏在貌似强大、实际上软弱无力的专制之下，——这就是劳动骑士向欧洲观察家展示的一幅图画。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这种纯粹表面的怪现象上，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在这个很大的群体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而且正在缓慢地但确实在发展成实际的力量。劳动骑士是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管它的起源和历史如何，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和个别的怪诞行为，不管它的纲领和章程怎样，它其实就是美国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产物，是把所有雇佣工人联合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纽带，不仅使他们的敌人，而且也使他们自己感到自己的力量，使他们对未来的胜利满怀骄傲的希望。只说劳动骑士能够发展，那是不正确的；他们经常处于蓬勃的发展和改造的过程中；这块可塑材料正在涌动，正在发酵，

[②] 在德文版中不是“农民的大规模被剥夺才给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而是“农民大规模被剥夺了，并且这次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条件逐渐把成为无产者的农民变成了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变成了人”。——编者注

[③] 在德文版中不是“处境恶化”，而是“现今的屈辱”。——编者注

[①] 在德文版中是“早已提出的”。——编者注

正在寻找适合其本性的形式。这种形式一定会找到，因为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到那时，劳动骑士是否保留现在这个名称，那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一个局外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用这种原料必定能塑造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从而塑造整个美国社会的未来。

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徒有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实际上都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出现。何况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来的，因为直到最近，它的成员几乎全是使用本国语言的德国移民，大多数人都不太懂当地通用的语言。但是，如果说这个党起源于外国，那么，它同时也就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1]，远远超过美国工人迄今所达到的理解水平。这对美国无产者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掌握并利用欧洲的阶级伙伴在 40 年斗争中所得到的智慧上和精神上的成果，从而加速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到来。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

要把参加这场广大群众运动的各种分子——他们实质上并不敌对，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实际上互不往来——融为一体，这个过程需要有一些时间，而且不可能没有一些摩擦，这在某些地方现在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在一些东部城市，劳动骑士正在同有组织的工联零星地进行地方性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摩擦在劳动骑士的内部也同样存在，根本谈不到和睦融洽。这并不象征着令资本家欢呼庆幸的那种瓦解，而只是表明第一次[1]一致行动的无数工人群众还不知道如何适当地表达他们的共同利益，还没有发现最适合于斗争的组织形式，更没有发现保证胜利所必不可少的纪律[2]。这只是为了伟大的革命战争而进行的第一次群众性集合，是一些由各地独自召集和装备的队伍，它们为组成一支统一的大军而汇合起来，但是还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统一的进军计划。正在汇合的各支部队在途中往往因穿插而彼此阻塞；常常出现混乱、怒气冲冲的争吵，甚至还要动武。但是，最终目的的一致性最后总会战胜一切小风波。这些零乱分散的、争吵不休的队伍很快就会排成一个长长的战斗队列，在敌人面前出现一条井然有序的战线，在威严的沉寂里闪射出武器的寒光，有勇敢的先驱兵在前，有坚定的预备队殿后。

必须达到这种结果，即把各支独立的部队联成一支全国性的劳工大军，要有一个临时[1]纲领，尽管有不足之处，只要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纲领就行，这就是在美国需要紧接着完成的重大步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制定一个不辱没这个目的的纲领，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做许多事情，只要它愿意像欧洲的

---

[1] 在德文版中“理解”后面的那句话改为：“这是迄今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从美国工人中看到的理解”。——编者注

[1] 在德文版中不是“第一次”，而是“现在终于”。——编者注

[2] 在德文版中删去了：“更没有发现保证胜利所必不可少的纪律”。——编者注

[1] 在德文版中不是“临时”，而是“共同”。——编者注

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只占工人阶级极少数的时候那样行动就行。这个策略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是用以下的话写下来的：

“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四十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这个策略到处都引向胜利，目前欧洲所有的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统一的[②]军队在同一的旗帜下战斗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26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87年6月10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和25号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3—392页

---

① 见本选集第1卷第285和306页。——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统一的”的后面加有“伟大的”。——编者注

恩格斯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致《社会民主党人报》[294]编辑部

签署人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累斯顿《萨克森工人报》[295]的现在的编辑部。

《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 年 8 月 31 日第 105 号）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很快就变成少数，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原编辑部的这些话非常出乎我的意外。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情况，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喜欢“希望”什么并且有兴趣“希望”多久，都可以听便，只是我不打算同它“一起”去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么看到这种企图宣布我是支持这些先生的阴谋的极端无耻行为之后，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已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 70 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c′est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备受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贸然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也不会不受到惩罚，关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先生们的确已经取得独特的经验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国会党团或者说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先生乐意去滤出蚊虫，那也决没有道理要德国工人为了对此表示感激就吞下骆驼[296]。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对待党内事物和所存在的观点的状况，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先生们能记取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但愿他们能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彻底的批判性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证书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和1890年9月14日《柏林人民报》第214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0—82页

恩格斯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297]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294]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经时常向其他党派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必然要变化，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要变化。然而，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版面、而且只有它的版面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12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它应当仍旧是原来的它，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一致。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不能不留下一个缺口。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不能代替它。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对于本报的撰稿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的损失。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充分享有一般能开展新闻出版工作所应具备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

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119]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真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简直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从党在维登代表大会上重新恢复并且此后“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又重新开始斗争时起。[298]《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什么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什么帝国刑法典，什么普鲁士邦法统统不管。《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各邦的立法，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里，差不多像票据一样准；德意志帝国邮局无可奈何地把它送到收件人手里，任何一个斯蒂凡也阻止不了。而且当时在德国有一万多订户；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1848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被禁止的刊物，那么工人却在12年的过程中都非常认真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 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在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总是准确无误地进行，我这个老革命者的心里总是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为推销这个报纸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是值得的。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它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级报刊一片死气沉沉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却反映出我们的工人通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生动幽默。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299]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

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四个星期，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的和国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 月 2 日禁令发表，在 4 月 2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中可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300]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领受了一下备受赞扬的瑞士避难权。[301] 正如 1830 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在这里也暴露出，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却总是失灵的。现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 1830 年瑞士实行民主化以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许这个小共和国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条件是它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作出让步。这不应当责怪它。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说，今天没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现在终于是停止胡说什么在“自由瑞士”有圣洁无瑕的避难权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 12 年的斗争，党获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 [302] 已经破产，俾斯麦已经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想再试一试用普通法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也想再试一试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关于“合法”手段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重要。应当努力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但是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酷爱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因素同样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点，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构筑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定不会帮自己的敌人这个忙的。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实力地位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有 20%的选票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也表明，联合在一起的对手总还拥有 80%的选票。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么，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 20%对 80%，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 25 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过彻底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版。为这种情况而储备起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顿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德意志帝国第二次将坚持不了 12 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0 年 9 月 12 日—18 日之间
载于 1890 年 9 月 2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9 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88—92 页

恩格斯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303]

现在这个草案[304]大大优于以前的那个纲领[305]。陈腐传统（无论是道地拉萨尔派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浓厚残渣，基本上已经被清除掉了；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　础上，因而有可能从这个基础出发来进行讨论。

草案分为三个部分：一、绪论部分，二、政治要求，三、保护工人权利的要求。

一　绪论部分共十段

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想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繁复和拖宕。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那也无妨。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而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懂得，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不要为了通俗而作太多的牺牲，不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比最简洁、最扼要的纲领还难得多的东西，他们也懂了；而且，如果说非常法时期难于对新参加进来的群众进行充分的教育，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不能进行，那么现在，当我们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阅读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很快得到弥补的。

我想尝试把整个这一部分写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话，我预备随函附上，或者以后另寄。现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谈一下。

第一段。……“矿山、矿井、矿场”……“的分离”——，三个词是一回事；其中两个应该删掉。我以为可以保留矿山，因为在我国，即使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区，也这样说，要是我，就用最常用的词来表达一切。相反我认为要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第二段。我会在这里加上：“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样加上：“……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或占据者）的依附”等等。

这些先生们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个人财产”据为己有，这在第一段中已经说过了，只是因为一定要把“垄断者”这个词用进来，才在这里重复一遍。不管用哪一个词，都不会使意思有丝毫增加。在一个纲领中，多余的东西会削弱纲领。

“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资料”——这总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劳动资料。在蒸汽机出现以前，没有它也行，但现在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劳动资料直接地或间接地——或者根据它们的构造，或者通过社会分工——都是社会的劳动资料，因此这几个字就充分表达了当前存在的东西，而且表达得很正确，不致产生歧义。

如果这段结尾是模仿国际章程的绪论部分写的，那我认为不如完全照着写，即：“社会贫困（这是第一）、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①]。体质衰退已经包含在社会贫困中，政治依附是一个事实，而政治上的无权利不过是具有相

[①] 见本选集第2卷第609页。——编者注

对正确性的慷慨激昂的词句，这类东西是不应写进纲领中去的。

第三段。我认为头一句必须修改。

“在个人所有者的统治下”。

第一，下面接着谈的是一个经济事实，应当从经济上去说明。但是“个人所有者的统治”这个说法则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原因在于那一伙强盗的政治统治。第二，属于这种个人所有者之列的，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写在这后面的“资产者”是什么？是第三类个人所有者吗？大土地占有者也是“资产者”吗？既然谈到了大土地占有者，那给我们德国整个肮脏腐败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动印记的强大的封建制度残余却可以不提吗？）。农民和小资产者也是“个人所有者”，至少今天还是；但是在整个纲领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因此在表述中应该使他们根本不包括在这里所说的个人所有者这一类之内。

“劳动资料和被剥削者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财富”是由（1）劳动资料、（2）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财富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财富，并且用一个“和”字把两者连结起来，这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

“……在资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

然而，上面所说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到哪里去了？如果这里只需举出资本家，那么上面这样提也就够了。如果要详谈，单单举出资本家是根本不够的。

“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

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我以为这一点要写进去。

第四段。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

这种慷慨激昂的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惋惜，要是我，就不这样说，而只讲一个简单的事实：“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结尾两句把同一件事说了两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个修改方案。[①]

第五段。“原因”应该是“其原因”，这大概纯属笔误。

[①] 见本卷第 416—417 页。——编者注

第六段。“矿山、矿井、矿场”，见第一段。“私人生产”，见前面。我会这样说：“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创造出来，并且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我会像第一部分附件中那样说[②]。

第八段。我不会说“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我会说“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第九段。最后一句：“……放在……并从而集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于一手”。

第十段。在“阶级统治”后面，少了“和阶级本身”几个字。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提议不用“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代之以“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最后一句：“在它的斗争中……适宜于”，我看不如删去。“适宜于改善……”“一般人民（谁？）的状况”，这句话不明确，一切意思都可以包括在内：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行会和工商业经营自由，农业贷款，交换银行，强制种痘和禁止种痘，嗜酒和禁酒，等等。这句话所要说的，前面的句子已经说过了，我们在要求整体时，也就把它的各个部分包括在内，完全没有必要作特别说明，我认为这样会冲淡印象。如果是想用这个句子把话题转到具体要求上去，那么大致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党大力支持一切使党接近于这个目标的要求”（“办法和设施”，因为重复，应该删掉）。或者，更好是直截了当地谈这里所牵涉的问题，即必须补上资产阶级所耽误了的工作；我就是按这个精神拟定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后一句[①]。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为下一部分所作的评论，以及论证我在那里所作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②] 见本卷第 417 页。——编者注

[①] 见本卷第 417 页。——编者注

二　政治要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大错误。这里没有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多得到些达到主要政治目标所需的不同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却决不能达到。帝国宪法[306]，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利来衡量，纯粹是1850年普鲁士宪法[307]的抄本，而1850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内容，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利也没有，这个宪法在宪制冲突时期[308]证明，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为。帝国国会的权利同普鲁士议院完全一样，所以，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帝国国会称作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施莱茨-格雷茨-罗本施泰因[309]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毫无意义。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要着手去解决。这样做多么有必要，正好现在由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一些草率的言论，就忽然认为，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使党足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只能是长期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需要立即解决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其结果就是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不知所措，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难道要重演当年的保护关税事件吗？当时有人宣称保护关税这个问题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因此谁想怎么投票都行，而现在有许多人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中于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310]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可是这些棘手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像在今天的意大利一样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的。如果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状态必须消除。——只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保留权利[311]依然存在，而例如图林根的地图仍然呈现出目前这样一副可怜景象，你就去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吧！另一方面，普鲁士必须停止存在，必须划分为若干自治省，以使道地的普鲁士主义不再压在德国头上。小邦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鲁士主义就是现在正钳制德国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中的一方始终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辞和存在的理由。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这将是一个进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法律体系同时并存。在小小的瑞士这早已成为一种障碍，其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一大退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每个州都有它自己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不分大小，都以州为单位参加表决。前一点我们已经顺利克服，而且不会幼稚到又去采用它，第二点在我们这里就是联邦会议，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它，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的‘联邦制国家’已经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所实行的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从下面进行的运动给予它以必要的补充和改进。

因此，需要统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因为它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312]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安排自治和怎样能不靠官僚制就能办到，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市镇的自治远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

以上所说的一切，没有多少应当写进纲领中去。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类东西的，——从而同时强调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搬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

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没有这两项我们也总是要前进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讨论，没有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纲领中去的，并且至少可以不直接作为对不能直言的事情的暗示：

“省、县和市镇通过依据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关于上面所讨论的几点，是否还能写成纲领要求，我在这里不如在你们当地好作出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能在党内加以讨论。

（1）“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及“选举和投票”之间的区别，我是不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区别，那么无论如何也要说得更加明白些，或者在附于草案之后的说明中予以解释。

（2）“人民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这是对什么而言的？是对所有的法律还是对人民代议机关的决议而言的，应当加以补充。

（5）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资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教他们的胡说。）

（6）“学校的世俗性”一条因此略去，归入前一段。

（8）和（9）这里我提请你们考虑：这两条要求对1.律师，2.医师，3.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家化，以后还要求对工人的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家化。是否能把这一切都托付给卡普里维先生呢？而这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相一致呢？

（10）这里，我会这样说：“为了支付国家、县和市镇的一切靠征税支付的开支，征收累进的……税。取消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间接税、关税等。”其他都是多余的、起削弱作用的解释或论证。

三　经济要求

关于第二点。结社权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得到保障以防止国家的侵犯。

最后一句“为了调整”等等，应作为第四点加进去，并赋予相应的形式。关于这点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员会里各占一半，那我们就受骗了。这样，在今后若干年里，多数总是在企业主方面，只要工人中出一个害群之马就够了。如果不商定在争论的时候分开两半单独表示意见，那么，有一个企业主委员会和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会好得多。

我请你们再次参照一下法国的纲领[313]。在那个纲领里，正好对于第三部分来说，有些东西似乎写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纲领[314]可惜因时间仓促来不及找出来了，它也有许多方面是很好的。

第一部分　附　件

（1）删去“矿井、矿场”，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2）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委靡、政治依附的基础。

（3）在这种剥削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在剥削者——资本家、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积累，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及其生活状况越来越没有保障，等等。

（4）把“私人”（生产）删去。……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占据者阶级已经丧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

（5）“其”原因。

（6）……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7）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由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来解放，也不可能由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解放，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①]。

（8）……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等等。

（9）……放在……并从而把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于一手……

（10）……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②]、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末句删去）。但是，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妨碍着它为人类的……斗争。首先它必须为运动争得自由的场所，必须扫清大量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须完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过于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应该把其他文明国家里已经由资产阶级亲手实现了的各种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

写于 1891 年 6 月 18 日—29 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 1901—1902 年
《新时代》杂志第 1 卷第 1 期
（没有附件）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 卷第 263—280 页

[①] 在手稿中最后半句原来是：“不是依附于大剥削者，就是沦为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不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尾巴”。后来被划掉，用铅笔改成：“除了站到……别无其他选择”。——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和阶级本身”这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315]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 1845 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 24 岁。现在我的年纪相当于那时的三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 1887 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 年由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①]是根据美国版序言[316]写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的。现代大工业已经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小气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普遍使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虽然这些手腕在他本国被看作生意经智慧的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据说德国的许多情况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城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战役[218]以后，连那条旧德国规矩基本守则也声誉扫地了，那条守则就是：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蹩脚货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 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317]的废除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兰开夏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而且是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料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11—325 页。——编者注

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 1844 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发展的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偷偷摸摸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充其量对那些急需挣钱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如果他们不想在竞争中毁灭，就必须抓住每一文钱。于是，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 [318]，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是却使得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具优势。

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营业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气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困苦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 [319]。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 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

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 1885 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 1844 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 1844 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很不相同，但是，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性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320]，“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 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奈尔斯维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289]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 1844 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①]。同样是用小尺小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矿山管理处的房屋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适应目前事物发展的状况即详细地一一列举 1844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这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 1865 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话。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 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 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42—548 页。——编者注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 1825 年到 1842 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 1842 年到 1868 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 1842 年以后日趋消失。从 1868 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的热情使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还有当时我就预见到的（诚然我把时间估计得过于早了）大陆的、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也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照抄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 1885 年 3 月 1 日伦敦《公益》杂志[321]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 6 月的《新时代》[3]第 6 期上。

“40 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然而，如约翰·布莱特所说，‘不是作为乞讨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与政权——实行人民宪章[322]；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 1847 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 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 1848 年 4 月 10 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323]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胜利。

1831 年的议会改革[324]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大土地占有制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干了起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则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比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出色的地方。宪章运动已经奄奄一息。1847 年崩溃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理所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

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从前被看作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作完全合法的机构，当作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 1848 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1867 年和 1884 年的议会改革[325]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议会正在讨论的关于选区的法案，划分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 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326]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 1850—1870 年这 20 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 年有一次危机，1866 年又有一次；但是危机的这些反复发作现在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 1848 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建筑工人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建筑工人就是这样。从 1848 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莱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些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

这就是 1847 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 20 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 1866 年的危机之后，1873 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营业高涨，但这次营业高涨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 1877 年或 1878 年发生，但是从 1876 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营业不振，对于无论哪个行业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将近 10 年来所遇到的情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受将近 100 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 10 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德福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出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世界供应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 1883 年不列颠协会绍斯波特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营业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

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转入不再发展的状态。’[327]

但是结局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 1848—1868 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么，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死气沉沉的营业不振状态变成英国工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未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以上是我在 1885 年所写的文章。在 1892 年 1 月 11 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 1885 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作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证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中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的英国一般获得的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重新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作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直觉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

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大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干过同样的事，而那些瞧不起他们的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还在干同样的事。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个别分子还须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致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1]参加竞选，并且公开以社会主义者的身分参加；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同他们竞争，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外的压倒多数当选了。在米德尔斯伯勒，一个工人候选人[1]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迄今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 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丢脸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德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统治了英国工人几乎 40 年的迷信——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 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鼓舞英国人的竞赛精神。不久的将来会发现，新议会奈何不得格莱斯顿先生，格莱斯顿先生也奈何不得新议会；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

[1] 詹·基·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

[1] 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7—383页

恩格斯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328]

1893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因为我有一些刻不容缓的和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只能祝你们的代表大会取得它应有的一切成就。希望你们的努力将成功地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载于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8号

原文是法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

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329]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的“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在西方面前表现自己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还为受到我抨击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仿佛我的抨击是针对他本人似的。[330]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331]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而且时常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熟悉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土地公有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经盛行于德意志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经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遭到暴力压制，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中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从中发现一个新的口实，使他能够在这个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在自己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农民公社和保障个人自由，把乡村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俄国未来的全部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行动起来力求解决的同一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332]

这就是说，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在俄国则已经解决。

赫尔岑的追随者特卡乔夫像赫尔岑一样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虽然在1875年他已经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是他仍然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限地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上帝选民，那么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上帝选民；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我的抨击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无比高明于赫尔岑们和特卡乔夫们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限大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谋杀，这将给“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留下一个永久的污点。

由于俄国的思想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问世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思想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说他有弱点，

他的视野有局限性，那么令人惊奇的，只是这种弱点、局限性并不太多。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作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于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在西欧，个人已经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不可避免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我们看见，在西方土地公有制的衰亡带来了多么悲修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5卷第16—19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333]。

而在谈到乌拉尔哥萨克那里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然后在各户之间分配产品的制度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在谷物生产中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时乌拉尔人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百俄亩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131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土地共耕制（我们这里也有兵营共产主义）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泽尔河地区的农户公社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保存现有的制度到他们能够使用机器的时候，那么，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自己，而是奴役他们的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如果说在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社会公有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有制对于西方的这个只是行将建立的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是否不能作为民族活动的一个起点，以便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进入一切生产资料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①]里表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时所说的那样：“俄国是应当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

[①] 见本卷第445—446页。——编者注

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制度、克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或者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渗透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一般地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不是公社本身的错，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 1861 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母体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32]）中还存在着的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一终止或通过决定被废止，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存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接近了崩溃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就会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下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有原则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大约 5000 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 1800—1840 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克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

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精神，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 1882 年 1 月 21 日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34]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于解体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筑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农民负担了赎金，再添上税捐加重，同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和越来越差，自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开放了谷物销售市场，而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结果排挤了农民的家庭工业，这类产品原先是由家庭工业制造的，一部分供自用，一部分供出售。久已习惯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地出现了混乱局面，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为富人的债务奴隶。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曾经因货币经济的渗入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过程，在这里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体。[①]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债务奴隶，干脆废

[①] 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 年斯图加特第 5 版第 109—113 页。335

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深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12 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越来越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作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 1877 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分在俄国信用券上署上自己名字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336]（Vestnik Jevropy）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①]在《祖国纪事》[337]（Otetschestvenyja Zapiski）上出来回答他。[338] 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辑，这封信曾以法文原信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 1886 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339]（Věstnik Nar-odnoj Voli）上，随后俄译文又在俄国国内发表过。[340] 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强加给他的观点，仿佛他所持的观点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有制和急速进入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的增补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这一评语是这样写的：“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破坏人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道地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资本论》德文第 1 版第 1 卷第 763 页）[341] 马克思接着说[342]：这段话“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的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①]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②]。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7—18 页。——编者注

[②]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接着马克思澄清了他的批评者的其他一些错误观点；涉及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叙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ispolnitel’nyjkomitet）的政府[343]。这个秘密的并列政府的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支柱，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

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出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靠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建立起铁路网，便不能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地位下解放出来，产生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么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么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建立起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投身于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从上面进行的革命的新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这一运动在这里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冲锋的形式，目的是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

得民族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的自由。认为农民公社本身具有一种能够带来并且必定带来社会新生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我们已经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人不过几百，但是由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大无畏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我们不去同这些人争论，虽然他们把俄国人民看作社会革命的上帝选民。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上帝选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越来越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没有能达到的目的：让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它的宫廷豪华生活，它的官僚，首先是为了它的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的全部赤字了；它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没有黄金，因为流通的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规定以黄金支付的几种关税，顺便指出，这种规定使这几种关税提高 50%。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票据，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到国外提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举借新的外债，那么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使政府拚命努力要在几年内使俄国的资本主义达到高水平。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宣布国家破产。在这两种情况下，俄国对外政策都会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僚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情况下，这种改革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

这种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 1882 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答。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1]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

---

[1] 俄文“мир”既有“村社”、“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编者注

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写于 1894 年 1 月上半月
载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
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
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 卷第 494—510 页

恩格斯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344]

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它的胜利。它既没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本主义模式改组国民生产。它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产阶级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益，反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够，它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信用。

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一方面受到过去的弊病的压迫，这些弊病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典古代（对分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被牲畜所排挤）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又受到资产阶级制度所曾发明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的压迫。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①]

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些地方已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呢？

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典型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小资产阶级，这些人目前还不是无产者，但却是未来的无产者。只有这个面临着经济破产并且已经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如果通过或多或少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那就只能是内阁的更换，卡瓦洛蒂这一帮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345]将会上台；如果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面对这些可能性，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党人[②]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

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首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

[①] 见本选集第2卷第100—101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社会党人"。——编者注

[①] 见本选集第1卷第285和306页。——编者注

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只是把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利益看作分期偿付的债款。因此他们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作是沿着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党人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作是最终目的。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马志尼主义者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和显著扩大活动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活动场所和活动自由更加扩大，至少对目前来说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形式。[②]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所以，当前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亲戚”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评，那么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他们积极合作的时刻可能会到来。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显然，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所代表的阶级的运动，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派认为出动的时刻已经到来，那就让他们去发泄他们的激情吧。至于我们，我们受这些先生们的漂亮诺言欺骗的次数太多了，决不会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论是他们的阴谋，还是他们的声明，都不应该打动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那么，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绝。

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用不着人家来发号令，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子——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席位的错误。[346] 作为由纯粹的共和派组成的政府中的少数派，他们心甘

[②] 参看本选集第 1 卷第 592—593 页。——编者注

情愿地在政府内为多数派投票通过和作出的、针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与此同时，这些先生们加入政府就瘫痪了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的工人阶级。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来，而且有很大保留。至于我所强调的一般的策略，长期以来，我已经确信它的有效性；它从未丧失过这种有效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写于 1894 年 1 月 26 日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 1894 年 2 月 1 日《社会评论》杂志第 3 期

原文是法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14—518 页

恩格斯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347]

一

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作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作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 300 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 60 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348]，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①]；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瑞日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博尔派[349]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才逐渐消失，到 1830 年以后又再现于共产主义者工人身上。厄内斯特·勒南说过：“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此外，特别是

[①] 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 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 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 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 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教律”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 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忌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 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 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教义、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叛者的财富作为奖赏而收归己有。100 年之后，他们自然也处于这些背叛 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时需要再来一次信仰净化，于是又出现新 的马赫迪，戏再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 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 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 57 止，情况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 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 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 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 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 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 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最终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 前迈进。

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1]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很想看看有哪位过去的国际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创伤，至少在某一方面的创伤，能不绽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没有来！好多60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悄悄地对他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话要说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塔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另眼相待。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肤浅的唯理论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生于赫勒斯滂海峡的帕里城、自称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的生平。这个佩雷格林年轻时的事业是在亚美尼亚以通奸开始的，他在犯罪现场就地被拿获，按当地习俗被判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又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350]：“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奥妙的道理。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作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逮捕，投入监狱……当他因此而身被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就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料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基督徒则买通禁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有的基督教会的使者甚至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关系到他们的团体，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去死。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诡辩家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身外的财富，

---

[1] 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巴黎版第1—8卷。——编者注

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保护他，保证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团体。”[①]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尔布雷希特”。他大约从 1840 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351]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个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糊涂蛋。不久就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诱了过去。这位库尔曼给他们作过讲演，这些讲演于 1845 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需要有人来表达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苦难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感不安的东西……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带来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为现实的精神王国的学说。”[352]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庸俗的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老实的魏特林派像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看成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总是怀疑他们；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装腔作势的能手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享受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享受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尔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沃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运动争得新地盘的边远地方，这一类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各国工人政党里都会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体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353]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

[①]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 11—14 和 16 章。——编者注

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同样，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每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都会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找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最初的基督徒也像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那样，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是无比的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二

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原始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曾经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蒂宾根学派[354]，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做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能做到的一切。它承认，四福音书并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大部分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中的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作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蒂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屏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355]。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给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说什么基督教从犹太教产生时就已经定型，并凭大体上已经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这种奇谈怪论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亚派[187]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没有彻底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是做得过分的。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半个世纪，而不顾罗马历史编纂学家们的记述与此不符，总是十分轻率地对待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的著作则是直到

哈德良、安敦尼和马可·奥勒留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心目中，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团体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这一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蒂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判定写作时间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 67 年 6 月和 68 年 1 月或 4 月之间写成的，所以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原始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叫《约翰启示录》；它原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现在由于德国的批判已经变得最易懂、最清楚的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动荡不安。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 164 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1]时的纪元 250 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 15 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并不是只有专家才熟悉，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尤其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直截了当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356]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据着首要地位。原始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莱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357]曾在基督纪元 2 世纪时热中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1]——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第二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有权蒙蔽读者。这些作品（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358]）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所写（这些作者比名义上的作者晚得多），而且所预言的也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 164 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

---

[1] 即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编者注

[1] 塔西佗《编年史》第 12 篇第 52 章和《历史》第 2 篇第 62 章。——编者注

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效验来证实自己的预言，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如果《约翰启示录》果真是那假想的作者所作，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中极孚众望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使徒约翰，此人历史上是否存在尚无法完全肯定，但也可能确有其人。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就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会有力地证实，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但是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信决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最高祭司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188]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没有听说过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得蒙赦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原始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被赦免。于是，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吸取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书中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书中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对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用别的称呼，而只是称作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但一会的人。”

谈到帕加马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诚然，他们的犹太教是先前的犹太教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先是 144 000 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 12

000 人，随后才是无数前来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 69 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是很少意识到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这里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激烈至少不亚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原始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 1848 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至少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才达到的。

最初的基督徒也分裂成无数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并非犹太人而是属于撒但一会的人，帕加马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非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听人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 1869 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一书中（第 303—305、367—370 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使徒书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其实这些著作至少就目前的版本来说其成书时间起码比《启示录》要迟 60 年，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极可怀疑，而且是彼此完全矛盾的。有决定意义的倒是：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

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帕加马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上的 144 000 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属于原始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作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同时，把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30 年代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德文译作“Wiedereinsetzung des Fleisches”——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1]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在柏林也像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还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不止这些的话，不知道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而且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作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热心家也可以写得毫不逊色。

三

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 69 年的经过

[1] 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

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进入原始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革命因素总是这样形成的。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作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经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诉讼程序、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自己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交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者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把死后的永生还看成是一种不幸。于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事实上，也只有靠对彼岸世界获得报偿的希望，斯多亚—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这种天堂乐园决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激烈斗争才攻克与打开。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很快就要到来。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就，至少是部分写就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没有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是应该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们，并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醡，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斗争正在进行，而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角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响号角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四十二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年的一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捆绑 1000 年，在这段时间内，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 1000 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救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末日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光荣的。

对这一预言与当时事件的关系作出解释应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埃瓦尔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连非神学界也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这个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做王，但将被医好，而且还要回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 666”（第 13 章第 7—18 节）。

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究竟是谁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作第一，第二该是提比利乌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做王是从 68 年 6 月 9 日至 69 年 1 月 15 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起来暴动，而在其他行省，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

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 69 年 4 月 15 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谁呢？666 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 300 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作数字来使用：a=1；b=2；g=3；d=4 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作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作切口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作 gematriah——几何学；专干

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作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666 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种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乌斯在 2 世纪末在 666 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 616，在许多人仍然知道数字之谜的时候，这个数字还至少是出现过的。[①] 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禄。数字的根据是（尼禄凯撒）为希腊字 Nêron Kaisar（尼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犹太圣法经传和巴尔米拉铭文都可以证明。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 n（nun）=50；r（resch）=200；w（waw）代替 0=6；n（nun）=50；k（koph）=100；s（samech）=60；r（resch）=200；合计=666。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 Nero Caesar 作根据，去掉第二个 nun=50，我们就得出 666-50=616，即伊里奈乌斯的那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突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加尔巴自己就曾率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进军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命令一个被释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追求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对这些消息尤其感到恐怖。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众多的归附者盘踞在帕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斯诺斯（现在的塞尔米亚）岛上，直到他在奥托时代被杀死为止。在受尼禄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回来，认为他的回来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殉道者出于信仰就为之欣然赴死的千年王国“很快”即将来临，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 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乌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 3 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作了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 1836 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末日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末日的审判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启示录》的虔诚的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 1836 年，斐·贝纳里给 666 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作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 12000 斯

[①]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 5 卷第 28—30 章。——编者注

达第=2227 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 500 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优愁，再没有苦难；生命之水的河从城中流过，河两岸长着生命之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勒南认为，这是一种茶叶——《反基督者》第 542 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68 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末日的审判时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富有诗意的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虽然地位较低，也永远是从神产生出来的。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赎罪而牺牲自己，为此它的地位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作特殊功勋，而不是内在本质必然产生的。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 [359] 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 [360] 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 9 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①]第 1 册第 227 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及其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团体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首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尚未意识到自己与犹太人有所不同。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 000 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用羔羊的血使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

[①] 即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 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一无所知。如果说在路德的译文中，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 deip-nêsô——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Ishallsupwith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为 68 年或 69 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①]，或者最多也只是无名作家的旧著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编纂学家才加以否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 4 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典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16] 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写于 1894 年 6 月 19 日—7 月 16 日之间

载于 1894—1895 年《新时代》杂志第 1 卷第 1 期和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23—552 页

[①]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 写的：“就连蒂宾根学派还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也都如布 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晚出的作品”。—— 编者注

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361]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我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自耕农；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挤到次要地位。

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使得农民把社会主义工人想象成 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成设法抢夺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而怀疑和憎恨他们。1848 年二月革命[121]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那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情况都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农村人，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锋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这个先锋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了，扩展、深化成为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社会党先于所有其他政党明确理解到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因此它早就识破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心安理得地任凭注定灭亡的农民继续被他们的伪保护者所控制，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吗？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一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和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因地区而异，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活家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确保这种手工业有可能支付通常无法思议的低工资，从而使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不仅一般说来对于西欧是最重要的农民，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羁于代役租和徭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同。第一，法国革命已经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方担负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了他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马尔克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马尔克公有土地的权利。马尔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术似地掠夺去了，从而使现代的小农不购买饲料就不能养耕畜。但是，在经济方面，废除封建负担远远抵不上马尔克土地使用权的丧失；养不起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增长。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产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交换的物品或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情况。而如果说马尔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

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们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们这样做。为了保持他们那一小块岌岌可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越加艰苦，他们便越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们便越加倾向于把那些谈论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作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战胜这种成见呢？在不改变自己的信念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拿出些什么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作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是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 1892 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362] 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同业公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最低工资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并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由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其中还专门谈到了佃农）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 5000 法郎的土地，在土地转手时免于征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民法典第 2102 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订早已过了时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佃农调解法庭明显地是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根本损害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并无责难之意，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胃口越吃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迫切地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到他们正走上危险的道路。应该如何帮助农民，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私有者农民来帮助，同时又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对付这方面的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所有制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当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绪论以及今年 9 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要求本身。

绪论开头写道：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本文，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虽然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但是，——至少在今天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î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个因素分隔开来的后果，就是已沦为无产者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大片领地现在的游手好闲的所有者实行剥夺之后，占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大地产，那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几个“鉴于”。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句话之后，应该添上下面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一切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普遍适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工业的进步本来就在排除个人占有，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么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卑鄙的劣品制造者。靠自力耕种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们

自己以及他们的房屋、他们的院子、他们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们的生活比无产者更没有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过上些安生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 2102 条删掉，即使通过法律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使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们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今天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后面这点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把我们引入歧途，以为仿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所有者，把满身债务的所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所有者。自然，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消失对于社会主义是有好处的，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无论如何，现在事情已弄到这样的地步绪论竟直截了当地宣称，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占有，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把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已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作迫切的职责交给了社会主义。绪论委托社会主义“维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说这一所有制“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生的大地主，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位一体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不仅小农的所有权应该得到保护。与此同时，“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谈起一个完全奇特的领域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保护那些即使“剥削短工”——原话就是这样说的！——的法国佃农。这是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

一旦踏上了斜路，往下滑是多么容易和舒服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跑来请求法国社会党人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美言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护他们剥削男女长工，据说就是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们的“剥削”，——那么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为他们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进口国有化的议案）也派到他们那里去，以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为理由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根本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怀有什么恶

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责成他们栽种甜菜，而且条件极端苛刻：他们必须向指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必须购买指定的种子，按规定定量施肥，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到无耻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很熟悉。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接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直接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辞被不同的方面用来作出不符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么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曲解。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是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的本意也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坏；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然而遗憾的是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忘乎所以；如果有人要他们信守诺言，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新近作出了决议的补充。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辞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购置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应当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提供小农使用。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对 3000 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单一的累进税以取代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

若干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类似的要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效果被估计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 9000 万英镑。其中有 1350 万—1400 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 7600 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加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 9000 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 120 英镑（3 000 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 1865—1875 年是 24 000 万英镑。假定现在每年是 3 亿英镑；9 000 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场合便会耗去全部积累的将近 1/3。换句话说，除了社

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做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看来也认识到，这种税收改革农民还得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暂且”（en attendant）向他们许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庄；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的一个优待。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作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颇得人心，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户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一年给每个农民一天多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们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么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们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法律的制裁。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们恰恰在特别需要贷款时却难于获得贷款。

“免费治疗并按成本价格供给药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的保护农民的措施；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甚至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预备役士兵应征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经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降低肥料、农业机器和农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符合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绪论的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的开场白之后，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打算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无法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

二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尽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

选中把小农争取过来。他们只有靠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作辩护，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一些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准备维护一种他们自己宣布为无法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状态）；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广泛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或者最后，其作用对于小农的利益决不是很有意义的；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便自动改正了错误的开场白，并把绪论中那些看起来有冒险性的大话降低到事实上无伤大体的程度。

坦率地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和闭塞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长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许诺，才能于朝夕之间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经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农变成自由的所有者，为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所有者偿还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必然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不会使农民得到解放，而只会延缓一下他们灭亡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争取过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我们是不需要期望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些想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属于反犹太主义者之流。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生产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演奏的是些什么样的曲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完全是从另一个方向寻求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么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

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 20 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几乎完全要靠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

就会发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特殊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取决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收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货币，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理解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向小农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向他们许诺，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 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

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的精神行动，而经济发展会使农民的头脑接受我们的话。

然而，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者们实质上跟我抱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极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63]，也完全确认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364]报上。南特纲领在措辞上的矛盾百出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理解，他们的言论被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遗产分割，而且也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各个过渡阶段的全图。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他们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们，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然而，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经营又普遍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作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大农和中农本身仍然存在，他们就非使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向小块土地农民许诺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是愚蠢行为的话，那么向大农和中农作这样的许诺就近乎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想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直到他们确信，即使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的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准备在将来共同承担其他一切工人正面临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使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决不能给。这样一来，他们就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了。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海外廉价粮食生产的竞争，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无法挽救地要走向灭亡，这是甚至这些农民日益增加的债务和到处可见的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付这种衰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这里我们也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看到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

式。否则，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听天由命，而去同一定会对我们表示欢迎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不过我们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能变得明智。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也就不应该有任何顾忌。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者，因而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经万事具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比方说，在克虏伯先生或冯·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就是这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说服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而且也许还有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日益陷入负债、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越来越拼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之作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 1/3 的领土上，他们掌握着在这里提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掌握着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厂和烧酒酿造厂掌握着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掌握着整个的王国。他们都分散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为取得经济和政治优势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实力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制地日益扩大；只是立法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的半农奴制以及因而有可能对农业工人进行的无限制的剥削，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也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野蛮的侵略成分代表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

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变革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争取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比争取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争取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这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战场，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那么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受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

写于 1894 年 11 月 15 日—22 日之间
载于 1894—1895 年《新时代》杂志第 1 卷第 10 期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63—587 页

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365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119] 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连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更何况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观，决不能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作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所面对的种种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无能为力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 1849—1850 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马克思由于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能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

第一次检验是这样来的：从 1850 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空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最近 10 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 年的世界贸易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生身的母亲；从 1848 年年中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 1849 年和 1850 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前三篇文章中（载于 1850 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 月号、2 月号和 3 月号）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 1850 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时评（5—10 月）》，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

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366] 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述评中对 1850 年 3 月 10 日至秋季的续评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评作为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检验更为严格。在路易·波拿巴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从 1848 年 2 月起直到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为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 3 版，1885 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①]）。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谈到了本书中所描述的时期，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作出的第二次记述与本书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只须作很少的改动。

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第二章中，讲到被称作“初次概述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①]可见，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么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况且，按《共产党宣言》来看这种扩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交给社会。这些先生大概很难说清楚，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林地[367]及其他捐赠在内的贫民救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整体所有，即归了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正是我们想要废除的。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 1789 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而现在又是它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 1848 年 2 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 1789—1830 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暴动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 6 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在 1849 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582—689 页。——编者注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409 页。——编者注

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我们却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作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关照，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一个统治的少数这样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过，往往都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得到眼前需要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就连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然而终究有了运动，有了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虽然这次革命是由少数人领导的，但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还没有理解到、而只是刚刚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要欺蒙，而是要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

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 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 1850 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却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有了经验教训已经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革命变成多数人革命的前景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 1848 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 1848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 1848 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是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 1848 年难以想象的猛烈程度。那时有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纪律、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368]，但是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太平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很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这就始终存在突发暴力事件的威胁，而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任何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即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追求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良机。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 年的向帝制的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愿望还不成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愿望成熟起来的条件。内部安宁为充分发展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将革命潮流引开，使之关注国外，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让“民族原则”[369]发挥有利作用，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俾斯麦实行了他自己的政变，在 1866 年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同样也对那个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

士议院，实行了一个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疆界是小了点，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纠纷的阻碍了。1848 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而在他们旁边则已经有 1848 年革命的继承者令人生畏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 1870—1871 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于是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险恶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这又表明，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 20 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其中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没有结果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 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 1848 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服兵役的人都应召编入人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以及威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全面的变革，从而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酷烈而结局绝对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战争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就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它使得军费按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它却成了两国工人的新的联系纽带。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 1870—1871 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 1871 年 5 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的数十亿 [370]，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也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 1866 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 1871 年为 102 000 张，1874 年为 352 000 张，1877 年为 493 000 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高度赞扬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 1881 年降到了 312 000 张。但是这种状况被很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 年为 550 000 张，1887 年为 763 000 张，1890 年为 1427 000 张。于是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 1787 000 张，即超过总票数的 1/4。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相，都

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经施行了的[371]，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通则。瑞士实施普选权的结果，恰恰最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族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作陷阱，看作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促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 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372] 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够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宣传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 1848 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就是说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

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如果做不到，就证明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但由于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调度得当和遵守军纪等长处，起义在实际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熟练地构筑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支援、后备力量的配置或使用，即各分队的互相配合和协同动作，在防卫一个市区时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是这在起义的场合即使做到了也是漏洞百出；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也就谈不上了。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消极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攻势，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兵，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战斗手段。所以无怪乎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 1848 年 6 月在巴黎，1848 年 10 月在维也纳，1849 年 5 月在德累斯顿，——一当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按纯粹军事观点采取行动，并且手下的士兵仍属可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告终。

1848 年以前起义者多次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 年 7 月和 1848 年 2 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都站着市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义者，或者是因采取冷漠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它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种市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 1848 年 6 月在巴黎那样，起义总是遭受失败。1848 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胜利，一部分是由于 3 月 18 日夜间到 19 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命令下达迟缓。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由于指挥官优柔寡断，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坚持不到，就遭受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①]

在 1849 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政府方面去了；“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经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经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作“人民”，而是把他们看作叛逆者、扰乱分子、抢掠者、分肥分子、社会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形式：他们已经不是毫无掩蔽地径直冲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穿过花园、庭院和房屋迂回前进。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用得巧妙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得手。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而军队就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 1848 年以来还没有增长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 24 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 48 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这种人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 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数大量增加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 1848 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倍。先前大炮发射的是威力不大的实心球形弹和霰弹，现在则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 1848 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役的兵士，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豪华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距离的射击中也远比不上士兵的弹仓枪。在 1848 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造出所需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废物。最后，各大城市在 1848 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 1848 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

因此，巷战今后在大规模革命初期将比在大规模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好像是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 1870 年 9 月 4 日和 10 月 31 日在巴黎[373]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①]

现在，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后一定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总是徒然地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这么笨。他们也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同样要求敌人，把军队排列成老弗里茨式的横队，或是排列成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374]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持燧发枪。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②]。近 50 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②]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

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

在罗曼语族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①]。

在法国，虽然在百多年来地基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掏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采取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信赖军队，一般说来，环境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民中的广大群众——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经有 50 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经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 [375]，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经一致认定再不能继续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小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算在内，那里的贵族革命是 1755 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而告终的。[376] 革命权已经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甚至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也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 200 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 225 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①]。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 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这句话被删 去。——编者注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 斗争》中，“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 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

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 1871 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假以时日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成员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做不到。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得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①]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377]，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颠覆。又是一切都颠倒了。难道今天疯狂的反颠覆的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 1866 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378] 不正是这些颠覆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在那里埋怨颠覆吗？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②] 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颠覆呢？

他们尽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反颠覆法案，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把全部刑法都变成一块可以随便捏的橡皮，但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他们要想认真地对付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采取完全另外的办法。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的颠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经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那就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也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经由俾斯麦在 1866 年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①]

几乎整整 1600 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有一个危险的颠覆派活动过。这一派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他们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他们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他们散布在全帝国，从高卢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他们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但是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感觉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应该公开活动了。这个叫作基督徒的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使得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被删去，而“决走性的战斗”印成“解决”。——编者注

[②] 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编者注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颠覆派，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整个的军团都信奉基督教。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非基督教的国教会的祭典礼仪时，颠覆派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标志——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惩戒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社会党人法，请原谅，我是想说反基督徒法。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正像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帕一样。基督徒不得担任公职，他们甚至不能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徇私”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冯·克勒尔先生那个反颠覆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公道。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它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底亚竟无视皇帝的权威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 303 年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来进行报复。这也就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 17 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了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 年 3 月 6 日于伦敦

摘要载于 1894—1895 年《新时代》杂志第 2 卷第 27 和 28 期，并载于 1895 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1—61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 1842 年 1.马克思致阿·卢格

[1842 年]11 月 30 日于科隆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379]有关的“纠纷”。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个子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立场。我立即回了信，对他们作品的缺点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方面体现自由，而更多地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方面体现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尔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也就是偷运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像一个小孩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1846 年　2.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 年 10 月 23 日于巴黎

给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380]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对于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做的主要就是证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说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从根本上驳倒了它。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激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恼怒，但是我借此迫使高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因

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把人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像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就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像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离经叛道！）。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这当然难不倒我。我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当时争论的各点，它用主张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体谅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就是说，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好些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了口，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些新人中有那么几个，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3.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 年]12 月 28　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安年科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 11 月 1 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促，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对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①]曾经取笑了一番，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

[①] 安年科夫 1846 年 11 月 1 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他的经济学论述。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论述中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

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 1640 年和 1688 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 17、18 和 19 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 17 世纪中叶而结束于 18 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又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这样遥远，竟然忘记了连普通经济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谈分工时，竟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真行！难道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 17 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从 9—12 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必然成为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

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作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可笑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 1825 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 1825 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这一点也适用于英国。至于欧洲各国，那么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机器的引进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作第三个进化，当作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呵！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全部信贷事业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 18 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特意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的，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主观随意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这里存在着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

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么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

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理性的存在，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作范畴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作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暂时的方式，也正像封建方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作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

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个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例如，在 18 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用他的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生活、关于夫妻恩爱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漫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准备中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 [381] 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①]。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1—640 页。——编者注

1851 年　4.恩格斯致约·魏德迈

1851 年 6 月 19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汉斯：

马克思刚刚把你的信转给我，从信中我终于知道了你的确切地址。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在打听你的地址，因为想问你以下这件事。

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382]，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①]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②]，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的冒险经历[383]——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

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学不到什么正经的东西。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当然，我在巴登部队中的晋级除外——我在普鲁士皇家后备军中只不过是个炮兵伍长而已[384]，因此对了解战役的细节，我还缺乏中间一环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普鲁士尉官考试、而且是各兵种尉官考试时所必需具备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这些对我毫无用处，因为现在我已确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现役。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史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些我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记得的。

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来源告诉我，并让我能立即弄到它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们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的编制和组织。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

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书。我猜想，恰恰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比法国或英国的同类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至于炮兵学，贝姆的手册[①]也许是最好的。

在近代战争史方面（我对早期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这方面我有蒙特库库利老头的著作），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纳皮尔中将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匈牙利战争的军事通讯和 评论，一小部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大部分集中收 入第 43 卷。——编者注

[①] 约·贝姆《1819 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 年魏玛版。——编者注

我读过的战争史编纂方面出类拔萃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下功夫钻一钻 1848—1849 年的历次战役，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大概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吧？

其次，我还希望你能介绍一些好的专用的德国地图，价钱不要太贵，但足以用来研究 1792 年以后的各次战役（尤其是 1801—1809 年的符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战役，1806—1807 年和 1813 年的萨克森、图林根、普鲁士战役，1814 年的法国东北部战役，伦巴第、匈牙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比利时战役）。我有施梯勒大地图集，但它太不详细了。我有 1792—1814 年期间各次会战的平面图；它们是收在艾利生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欧洲史》一书所附的地图集里，但是我发现，这些平面图有许多是不正确的。德国有没有价钱不太贵但又可靠的这类地图集？

你对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先生了解得多吗？我只是从梯也尔先生那里知道他的，众所周知，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小矮子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人们当然会认为，他有理由不像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

这就是向你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除此之外，我希望，现在在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是丹尼尔斯的被捕令人深思。看来，这里在准备进行搜查，以便把我们也牵连到这个案件中去，但是这不那么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

关于在伦敦为美国建立石印所的计划，马克思显然会写信告诉你的。像这样的打算，如果一切都要办齐全的话，在这里就需要花很大的代价，而美国报纸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鲁普斯[1]和弗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

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么最好你能和一家或者几家报纸或杂志签订关于通讯报道等的合同。这在伦敦很有好处，不过，最有支付力的几家报纸当然已经满员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德国的报刊情况如何。

指挥官维利希仍旧住在他的兵营里，靠兵营供养和救济过日子。你看会不会弄出什么大规模对抗的事情？

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1852 年　5.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1]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852 年 3 月 5 日于伦敦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1856 年　6.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6 年]4 月 16 日于伦敦

……前天为《人民报》[385] 的创刊纪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像《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被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无产阶级在各国取得统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 [386]。我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他的流亡者团伙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作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经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 2 月 25 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行会狭隘精神指责德国的“学者”即“脑力劳动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他民族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这个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炼。你知道，有这个人在手边，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无论如何是好事情。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387] 的大老粗非常恼怒。

你给施特芬的信我一定转交给他。莱维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请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越少通过邮局越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茨俱乐部派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 [388]，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1857 年　7.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7 年 9 月 25 日[于伦敦]

……你的《军队》[①]一文写得非常好，只是它的分量之大就像给了我当头一棒，因为这么多的工作一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如果我知道你一直要工作到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5—50 页。——编者注

深夜，那我宁愿让这一切见鬼去。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peculium castrense[②]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fabri[③]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应用，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如果今后有时间，你应当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你在叙述中忽略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点：（1）雇佣军制度以完备的形式一下子大规模地第一次出现在迦太基人当中（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我将查考一本最近才知道的、一个柏林人写的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著作[389]）；（2）15 世纪和 16 世纪初意大利军队制度的发展。无论如何，战术方法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同时，马基雅弗利在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极其有趣地描写了雇佣兵队长的作战方式（我将摘要寄给你）。[390]（不过，如果我去布赖顿看你——什么时候？[391]——我不如把马基雅弗利写的书带给你。《佛罗伦萨史》是一部杰作。）最后，（3）亚洲的军事制度，最初出现在波斯人中间，但后来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间则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1858 年　8.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8 年 7 月 14 日于曼彻斯特

……顺便提一下：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看一看，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①]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各种事物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可是，这个人并不知道最近 30 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对生理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是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二是最近 20 年来才学会正确使用的显微镜。使用显微镜所造成的结果比化学更重大。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万发现的（约在 1836 年）。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直到最后“观念”这个每一次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

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转化为热（譬如经过摩擦），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和力，化学亲和力转化为电（譬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

---

② 军营里的财产（指古代罗马人军营中的士兵的个人财产）。——编者注

③ 古代罗马人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编者注

① 黑格尔。——编者注

现在有个英国人（他的名字[1]我想不起来了）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一定量的某种力，例如电，相当于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力，例如磁、光、热、化学亲和力（正的或负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运动。这样一来，荒谬的潜热论就被推翻了。然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

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在接触到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出现，甚至在昆虫、甲壳动物和绦虫等等身上出现（比较模糊一些）。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这种细胞看起来就同生物机体中独立存在的细胞（血球，表皮细胞和粘膜细胞，腺、肾等等分泌出来的细胞）一样……

9.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8 年 10 月 7 日于曼彻斯特

……琼斯的事非常令人厌恶。他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完全按照新同盟的精神讲了话。[392] 根据这件事来看，几乎确实应该相信：采取旧的传统的宪章运动形式的英国无产阶级运动，必须首先彻底毁灭，才能够以一种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形式发展起来。不过也很难想象，这种新的形式将是什么样子。此外我觉得，琼斯的新动向，与过去建立这种同盟而多少获得成功的一些尝试联系起来看，的确是有其根源的：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

1859 年　10.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1859 年 4 月 19 日于伦敦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1]。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将会

---

[1] 焦耳。——编者注

[1] 拉萨尔的剧本。——编者注

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 1848—1849 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探讨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骑士阶层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他做主人公。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像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该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转而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像 1830 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那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 [393]。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而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市民的统一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我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特里尔的理查除外了。难道还有别的时代比 16 世纪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对城市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方面，我必须责备你在有些地方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 121 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身世时，

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阶梯”等等一直到“它的分量比我度过的岁月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变老”，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变老”来开始，是最不应该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警句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像是对簿公堂；还有，在特里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很出色……

11.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1859 年 5 月 18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呢。但这也正是使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在各个方面——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堪称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激动不已，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减弱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阅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1]——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我知道，当我说出如下的事实，即当前的任何一个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反映我国文学特点的，因而是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不过，这给阅读时带来的麻烦

[1] 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贺拉斯的韵律》。——编者注

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394]；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尔），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和戏剧打过相当多的交道；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地托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念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哑角一直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简洁生动，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的舞台脚本大概考虑到了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395]，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昔日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雄辩才能[396]）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济金根》是能够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改编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个性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而已，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么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190]。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里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侯爵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不过，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称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即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就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有好几次机会这样做。但是，我现在又陷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也都描写得非常清楚，这样那时的运

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像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鼓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产生更大的效果。撇开这一点不说，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我觉得，您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靠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一事实，不容许这种结盟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问题也根本不在这里。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比较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着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397]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么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

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

1863 年　12.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3 年 1 月 28 日[于伦敦]

……在上一封信[①]中，我曾向你问过走锭精纺机的事。问题是这样：在这种机器发明以前，所谓的纺纱工人是用什么方法操作的？走锭精纺机我明白，但是它以前的状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398] 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威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也在那里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需要有直接经验才能理解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

你知道，或许还不知道——因为事情本身无关紧要——在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英国的（数学）力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为复杂的工具。但是比较注意经济方面的英国工艺学家们认为（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德国的蠢驴们在这类小事情上是够伟大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犁是机器，而极其复杂的“珍妮机”[399] 等等，既然是用手转动的，就不是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机器的基本形式，那就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而是开始于英国人称为工作机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开始于譬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开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的被排除，而人的这部分劳动不是指单纯的力的使用（譬如踩动轮子），而是同加工、同对所加工的材料的直接作用有关的。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谁都知道，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机来转动机械。

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则变得非常重要。

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撇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即从由手工业自身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一直到真正的大工业这一时期，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作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而且是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水磨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从小亚细亚传入罗马。）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311—313 页。——编者注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性质来说，它本身以半艺术性的手工业和直接的理论相结合为基础。例如，卡尔达诺曾写过关于钟表构造的书（并且提出了实际的制法）。16 世纪的德国著作家把钟表制造业叫作“有学问的（非行会的）手工业”；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同譬如大工业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不同。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在 18 世纪把自动机器（由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从历史上可以证明，沃康松在这方面的尝试对英国发明家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本质特征。机械动力；由这种动力发动的最初的发动机；传动机构；最后是处理材料的工作机；这一切都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摩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动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从 17 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的大数学家，只要他们研究应用力学，并把它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就都是从磨谷物的简单的水磨着手的。因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 Mühle 和 mill[1]这一名称，实际上也应用于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的一切机械发动机上。

磨的情况和压力机、机锤、犁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使动力是人力或畜力，但是打、压、磨、粉碎等等实际工作，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人的劳动。所以，这类机械至少从它的起源来看是很古老的，它最早使用了真正的机械动力。因此，它也几乎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唯一的机械。一旦机械应用于自古以来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取得最后成果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应用于如上述工具那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需要人的手对原料加工的地方，而是应用于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只作为简单的力起作用的地方，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如果人们愿意和德国的蠢驴一样，把使用畜力（也就是完全和人的运动一样的随意运动）叫作使用机器，那么，使用这种发动机无论如何要比使用最简单的手工业工具古老得多……

13.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3 年 4 月 9 日于伦敦

……伊戚希[2]……前天给我寄来了给工人中央委员会就召开莱比锡工人（应读作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建议的《公开答复》[400]。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这是原话）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像他那样“带着闪闪发光的科学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会逐渐遍布全国。这无论如何是令人吃惊的新鲜事！……

我出席了工联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由布莱特主持[401]。他看起来完全像一个独立派分子，每当他说：“在美国没有国王，也没有主教”，总是响起热烈的掌声。工人们自己讲得很精彩，完全没有资产阶级那套空洞词

---

[1] 德语和英语中的“磨”字。——编者注

[2] 拉萨尔。——编者注

句，丝毫也不掩饰他们同资本家的对立（不过，布莱特老头也攻击了资本家）。

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还要等着瞧。此外，你的书[1]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 1844 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恰好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几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而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局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

祝好。

你的卡·马·

1865 年　1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5 年 2 月 23 日于伦敦

敬爱的朋友：

昨天接到您的一封信，我很感兴趣，现在就来逐项回答。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与拉萨尔的关系。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纯属瞎胡闹。他在给我的信（从 1848 年到 1863 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我所代表的党的追随者。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 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临近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越来越暧昧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憎恶，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鄙的布林德[1]（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402] 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同恩格斯一起答应给《社会民主党人报》[403] 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404]，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2]），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纲领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名为撰稿人。[405] 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已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他本来要在 1864 年 9 月底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

---

[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269—587 页。——编者注

[1] 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4—27 页。——编者注

[2] 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本选集第 2 卷第 613—621 页。——编者注

“迫使”俾斯麦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406] 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完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暴露出极其愚蠢可笑的面目！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407]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个良好的机遇，可以借助它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408]，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409]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410]，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直接利益看作“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到处妥协，甚至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以致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再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刚一创办，立刻就看得出，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十字报》[125]的瓦盖纳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411]、《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她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个美妙的计划，由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便防止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像对进步党人[412]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德·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看待他从拉萨尔那里根据遗嘱继承下来的重要性。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越来越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联合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完全废除联合法，因为这样做就会把官僚制度打开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413]，废除贵族在农

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联合法，政府就会用言辞（如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辞）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414]，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这样做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先生之流。（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①]。

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415]。我如果要在那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

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416]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受到了拉萨尔的继承人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正是这种“现实”使德国远远地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

由于每人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就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不能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购买一张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您的亲朋好友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

15.恩格斯致弗·阿·朗格

1865年3月29日于曼彻斯特

……我的回信不得已而拖延下来，倒使我有机会在此期间接到了您的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①]；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了它。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②]时，我也很快就发现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不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编者注

[①] 弗·阿·朗格《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

[②] 查·达尔文《物种起源》。——编者注

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这对它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唯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417]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或对古代的奴隶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

马尔萨斯牧师的这个理论，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种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418]。在英国，这一理论本身早就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合理的范围；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类可能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承受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宣布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必须消除的发展中的障碍。

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解体并且最后走向灭亡；正是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国西部在我们看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肥沃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419]的时候。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亡率不断提高。如果突然来一个工业繁荣（这是常有的现象），使这种劳动变得能用来生产利润，那么劳动就能得到钱买东西，而且总能找到生活资料。这就是整个经济所陷入的无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关系的总体作为前提，然后证明，任何个别部分都是这个总体的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规律”。

您对舒尔采的合作社[420]的描述使我非常感兴趣。这一切也都在这里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而现在大体上都已经过去了。在德国的人们一定还会出现无产阶级自豪感。

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说的关于老黑格尔缺乏较深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的意见。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以致他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没有能力把

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您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169]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的《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1838年出版的[421]）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年迈的巨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尊敬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66年　16.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6年7月7日[于伦敦]

……现在，波拿巴在采用针发枪或其他威力相等的武器以前，当然不愿意发生战争。有一个美国佬[①]在这里提供给陆军部一种步枪，一个普鲁士流亡军官（维尔克）肯定地告诉我，这种枪构造非常简单，不易发热，不大需要擦拭，而且又便宜，这样就使针发枪显得落后了，就像针发枪使“老拜斯”[422]显得落后一样。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中得到更为显明的证实呢？你的确值得费一些力气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②]中作为附录。请你考虑一下。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第一卷里，在那里我专门探讨了这个题目。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

我现在顺便地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实证主义破烂货是出版于1832年！

17.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6年10月13日星期六于伦敦

……从我给您写倒数第二封信以来，我的病老是复发，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搞理论。（国际协会的实际工作照常在进行，而且工作很多，因为事实上我必须领导整个协会。）下月我将给迈斯纳寄去第一批稿子[①]，以后再陆续寄，最后一批我将自己带到汉堡去。那时我一定去看您。

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

[①] 雅科布·斯奈德。——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①] 《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

总共可能有三卷。

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总过程的形成。

第四册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423]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424]。我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例如，拉萨尔在他的《资本和劳动》[①]中自称是表达了我的论述的“精神实质”，其实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他肆无忌惮地剽窃我的著作的时候。可笑的是他甚至重复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失误”，因为我有时光凭记忆引证，没有去查原著。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我是否应该在序言中对拉萨尔的剽窃行为讲几句。他那班盲从的信徒无耻地跑出来反对我，就证明这样考虑无论如何是正确的。[425]

英国工联伦敦理事会[426]（它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第3章。——编者注

1868 年　18.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 年 1 月 8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关于杜林[427]。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节[①]，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年轻。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此外，他还是讲师，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428]，他并不伤心。他的评论中有一处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像在李嘉图本人的书里那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变化准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愉快而又全新的说明。我相信，杜林也是由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这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

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那么，他在第二卷[429]中将会惊奇地看到：价值规定是很少“直接”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147]中已经恰如其分地说过的那样[①]……

19.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 年 3 月 6 日于伦敦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427]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往常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过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 500 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

---

① 相当于《资本论》第 1 卷第 24 章，见本选集第 2 卷第 259—270 页。——编者注

①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96—625 页。——编者注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②]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人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么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

20.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 年 3 月 25 日[于伦敦]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是联系着的。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21.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 年 7 月 11 日于伦敦

……至于说到《中央报》，那么，那个人已经作了尽可能大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想象价值这个东西总还有点什么内容，就只好同意我的结论。[430] 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431]，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

[②] 《资本论》第 1 卷。——编者注

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1]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

但是，够了，是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22.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

1868 年 10 月 13 日于伦敦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411]，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 15 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420]的对立——当作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 1843 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是够聪明的，当然认为这个口号是权宜之计，所以他只能以这个口号（据说！）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为之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322]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432]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其实，任何宗派都有宗教性质。再

---

[1]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编者注

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在我现在的追述中，大部分内容当拉萨尔 1862 年来到伦敦要求我同他一起领导新的运动的时候，我早就对他讲过。

您本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不是在它和阶级运动的共同之处中，而是在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中，寻求自己存在的权利和荣誉。因此，当您在汉堡建议召开工会成立大会[433]的时候，您只有以放弃主席职务相威胁，才粉碎了宗派的反抗。此外，您曾经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双重人物，宣布您时而作为宗派首脑进行活动，时而作为阶级运动的代表进行活动。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434]曾使您有机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并有机会声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证明，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宗派运动已经成熟，可以融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至于说到宗派的真实内容，那么像过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样，宗派会把它当作丰富运动的因素带到总的运动中去。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和您为敌的人就由此得出结论，说您千方百计地想保持您“自己的工人运动”。

至于说到柏林代表大会[435]，那么首先是不应匆忙召开，因为联合法[436]还没有通过。因此，您本应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商量，和他们共同制定计划并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让他们二者择一：公开地附和您或者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的增订版。

至于章程草案[437]，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在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行为规范的管束，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

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普选产生的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冲突，而竟说这样有利于“迅速行动”！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也设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我在 1866 年拒绝了主席的职务，1867 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执行主席（Chairman）。工联伦敦理事会[426]也只有一个执行主席。书记才是它的常设的负责人员，由他处理日常事务。拉萨尔从 1852 年法国宪法中搬用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况且是搬用到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

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我已经把同样的意思写信告诉莱比锡。我不会忽视您的难处，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

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向您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向您担保，我不会在某一天——在我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作为著作家以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就像当年我对待蒲鲁东派的偏见[1]那样。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怀着最良好的愿望。

忠实于您的　卡·马·

23.恩格斯致马克思

1868年11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艾希霍夫的信和狄慈根的手稿[2]一并寄还。为了让女工收拾屋子，我把这份手稿放到一个保险的地方去了，因而就完全把它忘了。

要对这本书作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而且一半是靠自学出来的。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3]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语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基础性研究的情况下苦思冥想出这样多正确的东西……

2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年12月12日于伦敦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白痴将军夫人[1]。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任命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438]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对妇女彬彬有礼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2]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和《论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和本选集第2卷第613—621页。——编者注

[2] 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编者注

[3] 《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

[1] 指玛丽·戈克。“戈克”这个姓的原文是“G(gg”，同“白痴”（Geck）发音相近。——编者注

[2] 此处“女性”照德文字面意思是“美性”。——编者注

1869 年　2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9 年 11 月 29 日于伦敦

……也许你在《人民国家报》[439] 上已经看到我提出的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反对格莱斯顿的决议案[①]。我现在攻击格莱斯顿——这件事在这里已经引起轰动——和以前攻击帕麦斯顿[②]完全一样。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只有当着威势逼人的暴君的面做这类事才觉得够刺激。

但是，我的关于爱尔兰大赦问题的发言以及紧接着我在总委员会里提出的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态度并作出有关的决议的建议，除了要大声疾呼地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目的。

我越来越相信——问题只在于要使这种信念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扎根——，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 1801 年所实行的合并 [440]，代之以自由联盟的关系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有所作为。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的摆布，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在英国本土的任何人民运动都会因为和爱尔兰人（他们占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瘫痪状态。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具有强大设防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被摧毁。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么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像在英国这样是传统的显贵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的压迫者。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

但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解放的天平上毫无疑问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杠杆必需安放在这里。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441] 不要重蹈覆辙！爱尔兰人和英国政府开了个大玩笑，他们把“被判决的重罪犯”奥顿诺凡-罗萨选为议员。政府报纸正以重新废除“人身保护法”[442]、重新恢复恐怖制度来进行威胁！实际上，英国从来都是依靠最残酷的恐怖政策和最卑鄙的收买手段来统治爱尔兰的，而且只要现在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它也决不可能依靠别的手段来统治……

---

①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33—434 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387—461 页。——编者注

1870 年　26.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

1870 年 4 月 9 日于伦敦

……后天（4 月 11 日）我将把我刚刚拿到手的一些国际的文件寄给你们。（今天已经来不及送邮局了。）同样，我将再补寄给你们一些“巴寒尔”[443]的材料。

在我寄给你们的材料中，还有几份你们所知道的总委员会 11 月 30 日就爱尔兰大赦通过的决议（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关于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待遇的爱尔兰文小册子。

我曾打算再提出几个关于必须把现在的这种合并[440]（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同大不列颠的自由平等的联盟的决议案。由于我无法出席总委员会，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没能作出公开的决议。总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委员可以在这方面代替我，因为他们对爱尔兰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而且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也没有足够的威信。

可是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1870 年 1 月 1 日[①]总委员会发出一个由我用法文草拟的机密通告[①]（就对英国的反作用而言，重要的仅仅是法文报纸，而不是德文报纸），其中阐述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从而也就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爱尔兰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这里，我只简略地把要点告诉你们。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这个国家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保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么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而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其后果就是他们在英国也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尽可能便宜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像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区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444]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 6000—10000 英镑，也应当计算在内。

---

① 手稿上是：“1869 年 12 月 1 日”。——编者注

①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35—443 页。——编者注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就压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秘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诚意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在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个通告的几个要点大致就是这样，通告通过这几个要点同时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作出的决议的理由。此后不久，我寄给《国际报》[445]（在布鲁塞尔的我们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①]的机关报）一篇论述英国人对芬尼亚社社员及其他人的待遇并反对格莱斯顿等人的激烈的匿名文章[②]。我在这篇文章中还同时指责了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马赛曲报》[446]登载了居住在这里的可怜的塔朗迪埃所写的论述爱尔兰的一篇乌七八糟的东西），说他们由于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贮藏起来准备对付帝国。

这篇文章发生了作用。我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她在给编辑部的私人信中自称燕妮·威廉斯）给《马赛曲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公布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③]由此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格莱斯顿多年来一直无耻地拒绝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待遇问题进行议会调查，最

[①]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②] 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6—462页。——编者注

[③] 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70—700页。——编者注

后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了。燕妮现在已经是《马赛曲报》在爱尔兰问题方面的正式通讯员了。（这一点当然不要对外人说。）英国政府和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注意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

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我们已经迫使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等等同我们建立了联系，而这一点是总委员会至今没有做到的！

在美国，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

下一次，我将专门谈谈英国工人的情况。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27.马克思致保·拉法格

1870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洛朗[①]：

下星期二我将请杜邦提出您为候选人。[447]

同时请你们注意，巴枯宁的代理人罗班参加了你们的委员会[②]。罗班在日内瓦曾竭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他曾在《平等报》[448]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449]）并为巴枯宁在国际协会中实行独裁统治准备条件。他是专门被派往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活动的。因此，必须密切注视这个家伙，但是不要让他警觉起来。

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应当扼要地谈一谈巴枯宁的阴谋。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450]（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伯尔尼[①]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得心应手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语调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451]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善于张扬，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②]。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族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452]这个团体的纲领[453]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

[①] 保·拉法格的笔名。——编者注

[②] 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①] 此处以及下面的地方，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洛桑”。——编者注

[②] 海涅《吕太斯》第1部分。——编者注

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454]，江湖骗子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话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对地产和资本的所有权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么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围拢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一心一意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应景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只可以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们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漫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愿意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同它们打交道，就意味着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古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货色就是这样。

他秘密地继续进行他的阴谋活动。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一些拥护者，在巴黎和日内瓦也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老贝克尔愚蠢到如此程度，竟听任巴枯宁把他当作主角推到前台。他现在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懊悔。

在巴枯宁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之后，才把情况告诉总委员会，并要求它批准“同盟”的章程。然而他错了。总委员会在一份经过仔细研究拟定的文件中宣布同盟是用来瓦解组织的工具，并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我将把这个文件[①]寄给你们。）

几个月之后，“同盟”的中央局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内容如下：大人物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并使它同国际合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是”或“否”来明确回答我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他们那一方面就要实行公开的分裂，而我们却要对局势恶化负全部责任！

我们回答说，总委员会不是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页。——编者注

论点。我们委婉地暗示，我们把他们的“理论”看成是一种欺骗。我们坚持用“消灭阶级”来代替“阶级平等”，这一点他们做到了[455]。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同盟成员数量的材料，他们没有这样做。（你们也将收到这第二个文件[①]。）

这样，同盟名义上是解散了。实际上它继续作为国中之国而存在。它的支部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同盟在巴枯宁的专断下活动。而巴枯宁作好了一切准备，企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发动决定性的袭击。一方面他唆使日内瓦委员会[②]提出继承权问题。我们接受了挑战[456]。另一方面，他到处搞阴谋，破坏我们的威信，以便使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在代表大会上这个骗子作为“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出现（在里昂追随他的是阿尔伯·里沙尔，这是一个在其他方面非常积极且又正派的年轻人）。这个家伙从什么地方弄到钱来耍弄他的全部阴谋诡计、开支旅费、派出代理人等等，这暂时还是一个谜。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生中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劳动挣过一文钱。

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代表大会以后，他在自己的私人通报——《进步报》[457]（勒洛克勒）和《平等报》[448]（日内瓦）上公开攻击我们，《进步报》是由他的喽啰，瑞士的一名教师詹姆斯·吉约姆出版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听任事态发展，后来我们向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通告信[③]。（瓦尔兰有这个文件的副本。）但是对巴枯宁和同盟从来没有好感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早在收到我们的通告信以前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罗班及其同伙被逐出了《平等报》编辑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了反对同盟及其俄国佬独裁者的阴谋的政变。

这时巴枯宁从日内瓦迁回泰辛。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赫尔岑突然逝世。不久前还猛烈攻击赫尔岑（大概是因为赫尔岑的钱袋没有向他开放）的巴枯宁，忽然在法国的和其他的报刊上成了他的热烈保卫者[458]。为什么？因为赫尔岑（尽管他本人是百万富翁）每年为自己的《钟声》[459]和“俄国宣传”从俄国的“民主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460]。巴枯宁虽然极端仇视“继承权”，但还是想继承赫尔岑的地位和钱。他对死者的颂扬使他把《钟声》、资金等等都转入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形成了俄国流亡者的侨民团体[461]。这些流亡者都是巴枯宁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熟悉这个极平庸的人（虽然作为阴谋家他是很能干的）纯粹的个人野心，因为他们知道，巴枯宁在他的“俄国的”作品中所鼓吹的教条是完全违反国际的原则的。

巴枯宁及其一群盲从者不久前利用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瑞士罗曼语族区代表大会（今年 4 月 5 日）来制造公开分裂[462]。结果代表大会分裂成两个：一个是宣布放弃一切政治的巴枯宁分子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大约 600 人；一个是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 2000 人。吴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公开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他（巴枯宁）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瑞士罗

---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93—394 页。——编者注

② 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③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35—443 页。——编者注

曼语族区的“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团结报》[463]，由巴枯宁的喽啰詹姆斯·吉约姆出版。这家报纸的“原则”就是“巴枯宁”。双方都向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这样，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化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

他期望在我们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取得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在巴黎引起注意，他同《马赛曲报》[446]通信。但是我们已同弗路朗斯谈过，弗路朗斯将加以制止。

现在你们已经了解到足够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巴黎各支部中制止巴枯宁的阴谋。

谢谢洛朗的来信[464]。下一次请设法给你们的信件找一个不易拆开的信封。又及。请看一看，你们是否还保存着《女王信使报》[465]中关于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文章。我们这里需要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哪里也无法弄到。

你们的　老尼克

1871年　28.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71年4月12日于伦敦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起义了，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瓦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像那邪恶的小矮子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为了让位给公社而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土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29.恩格斯致爱·恩格斯

1871年10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妈妈：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689页。——编者注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用适当的形式来答复你最近对我的政治活动提出的意见，以便使你不致感到不快。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科隆日报》上极端无耻的谎言，特别是瓦亨胡森这个坏蛋的卑鄙行为，当我看到那些在战时把所有法国报刊上的东西全都看作是谎言的人，现在却把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作福音书一样在德国各地传布，这时我的心情就不太适于写回信了。由于按照普鲁士的样子枪毙了几个人质，由于按照普鲁士的先例烧毁了几座宫殿，就大叫大嚷起来——因为其余一切全是谎言——，而对于凡尔赛分子枪杀已经解除武装的 4 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事，却无人谈论！然而，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你们只有靠《科隆日报》和《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们灌输谎言。不过，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如在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 [466] 会员、1817 年和 1831 年的蛊惑者 [143]、1848 年的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坏，由于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云散了。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同时对 1871 年的人们也会从好处着想。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 30 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当事变需要，我就不仅会坚持它，在其他方面也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想必你也没有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是我把他引坏了。

这一点不必多谈了。这是无法改变的，只好任其如此。如果再平静一段时间，叫嚣自然会沉寂下来，而你自己也就会比较平静地看待这些事情了……

30.马克思致弗·波尔特

1871 年 11 月 23 日[于伦敦]

……成立国际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宗派有其（历史的）存在的理由，工人阶级就还没有成熟得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现象。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

在巴黎，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派 [467]）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最初几年他们自然就掌握了巴黎的领导权。后来，在那里自然又成立了一些和他们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派、实证论派等等的团体。

在德国有拉萨尔集团。我个人和声名狼藉的施韦泽通过两年信，并且无

可争辩地向他证明了，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他不理解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团体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的谬论），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几年来总委员会都不得不对这种阴谋（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法国南部）进行斗争。最后，总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第九项、第十六项、第十七项）给予经过长期准备的打击。[468]

不言而喻，总委员会不会在美国支持它在欧洲所反对的东西。决议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项现在给了纽约委员会合法的武器来取消一切宗派主义和浅薄之徒的团体，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清除出去……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直到今天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1872 年　31.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469]

1872 年 1 月 14[—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特尔察吉：

我没有早一些答复您 12 月 4 日的来信，是因为我想对您最关心的问题，即关于《无产者报》[470]的经费问题，给以确切的答复。

您知道，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某些政府的惊恐万状的想象之中，这些政府不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协会没有数百万的财富怎么能占据这样强大的阵地。要是这些政府看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费的报告就好了！

尽管很穷，我们本来还是决定给你们寄去 150 法郎，但这时那份登载着消息等等的《玫瑰小报》[471]来了。这就改变了一切。如果你们单是决定派代表参加未来的代表大会，那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充满了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责的通告所要求召开的代表大会啊！如果你们能够等一等总委员会对这个通告的回答，那就好了！总委员会认为你们的决议只能证明，你们不等总委员会起来辩护，就站到了指责者那一方面了，因此，我给你们寄上述款项的委托就被撤销了。在此期间你们已经理应收到了载有罗曼语区委员会的答复[①]的《平等报》[448]，这个委员会所代表的瑞士工人等于汝拉人所代表的十倍。但是，从汝拉通告中已经暴露出起草者本身的恶毒意图。起初，他们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现在又攻击我们，原因是我们在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有义务执行的决议。他们不承认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之流、杜朗之流或涅恰也夫之流，又怎么能够用关于支部自治——像在通告中所说的那样——的华丽辞藻阻止警探和叛徒的渗入。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么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您知道谁是这些权威性的决议的起草人和维护者吗？或许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吧？根本不是。这些权威性的措施是由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而施维茨格贝尔们、吉约姆们和巴枯宁们是最热烈的维护者。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用得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作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如果您想知道通告的起草人在实践中为国际做了些什么，那就请读一下他们自己向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汝拉联合会状况的正式报告（1871 年 11 月 23 日的日内瓦《社会革命报》[472]），您将会看到，他们使一年前还很稳固的联合会陷入了怎样的瓦解和软弱的境地。而这些人还想改革国际！

[①] 《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编者注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32.恩格斯致泰·库诺

1872年1月24日于伦敦

……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473]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既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对原则的背叛。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作社会清算。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轻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天生就是政治性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474]见鬼去吧，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

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当这些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把总委员会迁移到日内瓦去，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这时，他们便采取了另一套办法。他们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452]，即大国际内部的一个国际协会，他们这样做的借口，目前您在巴枯宁派的意大利报刊，如《无产者报》[470]、《玫瑰小报》[471] 上面又可以看到：热情的拉丁种族比起冷淡的、迟缓的北方人来，需要一个更为鲜明的纲领。这个糟糕的计划因总委员会的反对而遭到了失败，总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国际内部有任何分立的国际组织存在。此后，由于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力图用巴枯宁的纲领来偷换国际的纲领，这个计划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另一方面，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起到马志尼止的反动派，每当要攻击国际的时候，他们所抨击的始终正是巴枯宁的空洞而浮夸的词句。因此我 12 月 5 日发表的反对马志尼和巴枯宁的声明[①]是很必要的，这个声明也在《玫瑰小报》上刊载过。

巴枯宁派的核心是由汝拉的几十个人组成的，拥护他们的工人总共不到 200 人。其先头部队是现在到处以意大利工人代表的身分出现的意大利的青年律师、医生和新闻记者，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一些同样的人物，是里昂和布鲁塞尔有时出现的个别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工人；在这里[②]，有一个唯一的标本，那就是罗班。因为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而十分必须召开的代表会议让他们找到了借口，而且由于瑞士境内的大多数的法国流亡者转到他们那方面去——因为这些人（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引起共鸣的东西，而且还由于个人的动机——，于是他们就发动了战役。自然，在国际里到处都有少数不满的人和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这些人也是他们不无理由地可以指靠的。目前他们的战斗力量如下：

（1）巴枯宁本人——这一战役中的拿破仑。

（2）200 个汝拉人和法国人支部的 40—50 人（在日内瓦的流亡者）。

（3）在布鲁塞尔，有《自由报》[475] 的编辑安斯，但是他并不公开拥护他们。

（4）在这里，有从来没有被我们承认过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476] 的残余分子，这个支部已经分裂为三个彼此敌对的部分；其次是大约 20 个从德国人支部中清除出去的（由于提议大批退出国际的缘故）冯·施韦泽先生式的拉萨尔分子，他们这些捍卫极端的集中和严厉的组织的人，十分适合同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结成联盟。

（5）在西班牙，有巴枯宁的几个私人朋友和信徒，他们至少在理论方面对工人，特别是对巴塞罗那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很重视组织，而别人没有组织的情况是会使他们感到诧异的。巴枯宁在这里能指望获得多大的成功，只有在 4 月间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上才能看出来，由于工人将在大会上占优势，所以我并不为此担心。

（6）最后，在意大利，据我所知，都灵、博洛尼亚和吉尔真蒂[①]的支部都主张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派的报刊说已经有 20 个意大利支部站在他

[①] 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发表的攻击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511—513 页。——编者注

[②] 在伦敦。——编者注

[①] 现在称作：阿格里真托。——编者注

们方面，我不知道这些支部。反正领导权几乎到处都操在巴枯宁的乱叫乱嚷的朋友和信徒的手中；但是，只要较为仔细地研究一下，大概就会发现，拥护他们的人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意大利工人群众到现在终究还是马志尼主义者，而且只要国际在那里被认为是放弃政治的，他们将仍然是马志尼主义者。

但是，无论如何，意大利的现状是，巴枯宁派目前在那里还是可以在国际里左右形势的。总委员会并不想抱怨这种情况；意大利人有权随心所欲地干蠢事，而总委员会将只用和平辩论的办法来反对他们。这些人也有权声明拥护汝拉人那样的代表大会，虽然无论如何总使人感到极为奇怪，那些刚刚加入而且一点情况也不可能了解的支部，怎么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立即站到某一方面，尤其是在它们还没有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前！我已经直率地对都灵人说明我对此事的看法，对于其他像这样发表过声明的支部，我也将这样做，因为任何这种附和通告[477]要求的声明，都是间接赞同通告中所包含的对总委员会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诽谤，而总委员会也即将就这个问题发出自己的通告[①]。如果您在通告发出之前能够阻止米兰人发表类似的声明，那么您就实现了我们的一切希望。

最可笑的是，正是那些声明拥护汝拉人并从而谴责我们搞权威主义的都灵人，现在突然要求总委员会用一种它从来没有采取过的权威的方式对付他们的对手都灵工人联合会[478]，开除那个根本不属于国际的《多事人报》[479]的贝盖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要我们在听取工人联合会对这件事的意见以前就做！

星期一[②]我给您寄去了一份载有汝拉通告的《社会革命报》[472]、一期日内瓦出版的《平等报》[448]（可惜，载有代表着比汝拉人多二十倍的工人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所作的答复[③]的一期，我再也没有了）以及一期《人民国家报》[439]，您从这期《人民国家报》中可以看出，在德国人们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来自60个地方的120个代表——已一致声明拥护总委员会。[480]比利时代表大会（12月25—26日）要求修改章程，但是要求在例行的代表大会上（9月）进行修改。[481]我们每天都从法国收到表示拥护的声明。在英国这里，所有这一切阴谋自然都得不到任何支持。总委员会决不会为了讨好几个阴谋家和妄自尊大的人而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只要这些先生还不越出合法的范围，总委员会是乐意给他们行动自由的，这个由各式各样的人物结成的联合很快就会自行瓦解；但是，只要他们做出一点违反章程或代表大会决议的事情，总委员会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如果想一想，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正好是在国际到处都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开始他们的阴谋的话，那就不能不想到，国际密探先生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插了一手的。事实正好是这样。在贝济耶，日内瓦的巴枯宁分子有警务总长[①]给他们做通讯员；两个重要的巴枯宁分子——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勃朗曾经到过这里，并且向他们所要争取的一个里昂工人绍耳说，推翻梯也尔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把波拿巴拥上王座，所以，他们是拿着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55页。——编者注

② 1月22日。——编者注

③ 《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编者注

① 阿·布斯凯。——编者注

波拿巴的钱周游各地，向流亡者进行拥护波拿巴复辟的宣传！这些先生们所谓的放弃政治就是如此！在柏林，俾斯麦资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482]唱着同一的调子。俄国警察是怎样插手这件事情的，我暂且不作结论，但是巴枯宁是彻头彻尾地卷进涅恰也夫事件中去了。（他固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这里有俄文的原本报告书，而马克思和我都懂俄文，所以他是无法骗过我们的。）[483]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国奸细，至少也进行过这种活动；此外在巴枯宁的那些俄国朋友中还有各种形迹可疑的人物。

您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感到很遗憾，我曾经特意写信给您，要您避免能导致这种后果的一切；您住在米兰，这对国际说来要比公开活动所能取得的一点点效果重要得多；在秘密状态下也能做出许多事情来，等等。如果我在翻译等等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地去做。不过您得告诉我，您能从哪种文字译成哪种文字，我怎样才能对您有所帮助。

既然警察狗仔把我的照片也扣下了，我现在另给您寄上一张，并请给我寄来两张您的照片，其中一张用来促使马克思小姐给您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只有她还有几张好的）。

再一次提醒您当心和巴枯宁有联系的一切人物。紧紧地纠集在一起和进行阴谋活动是一切宗派的特点——您提供的任何消息（您可以确信这一点）都会立刻跑到巴枯宁那里去的。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忠于诺言一类的事情纯系资产阶级偏见，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事业必须始终加以蔑视。在俄国，他是公开这样说的，在西欧，这是秘密的学说。

请您即刻写信给我。如果我们能够使米兰支部不参加意大利其他各支部的大合唱，那就好了。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弗·恩格斯

1873年　33.恩格斯致马克思[484]

1873年5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是离不开运动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处于运动之外，处于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之外的物体，是谈不上的。物体只有在运动之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物体的运动之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①]

1.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位置移动（是在时间之中的——为了使老黑格尔高兴）——机械运动。

（a）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地说，可以把下落看作这样的运动。向着许多物体所共有的一个中心点运动。但是，只要单个物体不是向着中心而是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运动，那么虽然它还是受落体定律的支

[①] 卡·肖莱马在这段话的页边上写着："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卡·肖·"。——编者注

配，但是这些定律已经变化成为[1]。

（b）抛物线定律并直接导致几个物体的相互运动——行星等等的运动，天文学，平衡——在运动本身中的暂时的或表面上的平衡。但是，这种运动的真正结果最终总是运动着的诸物体的接触，一些物体落到另一些物体上面。

（c）接触的力学——相互接触的物体。普通力学，杠杆、斜面等等。但是接触的作用并不就此穷尽。接触直接表现为两种形式：摩擦和碰撞。二者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新的、不再仅仅是力学的作用，即产生热、光、电、磁。

2.本义上的物理学——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科学，它逐一研究了每种运动形式之后确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运动形式互相转化；并且最后发现，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在一定的强度（因不同的运动着的物体而异）下就产生超出物理学范围的作用，即物体内部构造的变化——化学作用。

3.化学。过去，对于研究上述运动形式来说，无论研究的是有生命的物体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没有多大关系。无生命的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甚至是最纯粹的。与此相反，化学只有在那些从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身上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人工制造这些物质越来越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它构成了向关于有机科学的过渡，但是，这种辩证的过渡只是在化学已经完成或者接近于完成这种实际的过渡的时候才能实现。[2]

4.有机体——在这里，我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③

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你的　弗·恩·

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起，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加工这些东西总还需要很多时间。

34.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73 年 6 月 20 日于伦敦

……至于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那么您自然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判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特别是在个别场合下。但是，也应当考虑到下述情况。当人们像您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全德工人联合会 411 竞争的地位时，就会容易过于重视对手，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首先想到对手。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总还得附带接受一大批这样的首领，这些人被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被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特别是想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

---

[1] 卡·肖莱马在这段话的页边上写着：“完全正确！”——编者注

[2] 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这是最根本的！”——编者注

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这就是爱森纳赫的不幸，这在当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分子无疑是危害了党，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没有那些人参加，党在今天是否起码就不会同样强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这些分子得到加强，就将是一个不幸。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不和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正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制造者，可是叫喊团结叫喊得最响。这些团结狂，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以更加尖锐的对立形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些大嚷团结的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比任何人都多。

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猖狂起来，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是设法使国际纯净清白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牙破灭了[485]，您知道，大会的多数代表都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各自回家去了。而几乎所有这些误以为可以在国际中找到博爱和调和的理想的失望者，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比在海牙剧烈得多的争吵！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么，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特别是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干出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背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它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缩小，而仍然一定要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丑剧，因为原则早已在海牙牺牲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光荣地摆脱开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像这一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 10 个月中尽一切力量撒谎，诽谤，搞阴谋，而结果怎样呢？他们，即国际大多数的所谓代表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详见和这封信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439] 的那篇文章[①]）。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说来，我们还会这样做；当然，策略上的错误总是可能犯的。

[①] 恩格斯《在国际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516—520 页。——编者注

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会逐渐地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

顺便提一句，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1]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党派中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在罗马帝国里处于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您也不应当忘记，例如说，《新社会民主党人报》[482]比《人民国家报》的订户多，那么原因是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是狂热的，而由于这种狂热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鲜的地方（例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一般地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热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1874 年　35.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74 年 9 月 12[—17]日于伦敦

……在你退出以后[486]，旧国际总归是完全地结束并终止了。这也是件好事。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能够提到首要地位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 1864 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必然打破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吵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忌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485]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注入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10 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各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像 1849—1864 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

[1]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节《教育的真理》。——编者注

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1875 年　36.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

1875 年 11 月 12—17 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从德国旅行回来以后[487]，我终于能够来谈一谈您的那篇文章了，我刚刚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488]。现在寄上我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意见是用德文写的，这样可以叙述得简洁些。[489]

（1）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接受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反过来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研究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样性的丰富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又片面的说法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句空话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2）在您所列举的三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①]中，看来只有赫尔瓦尔德值得一提。泽德利茨顶多只能说是一个小有才气的人物，而罗伯特·比尔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三次》目前正在《海陆漫游》杂志上发表。[490]那里正是他夸夸其谈的好地方。

（3）我要把您的那种攻击法叫作心理攻击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宁愿选择另一种方法。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自己在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①]，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比较好的。对于德国，由于虚伪的温情主义已经并且还在继续造成闻所未闻的危害，这种方法并不合适，它会被误解，会被歪曲为温情主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在最近期间），而且首先要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残余，恢复物质事实的历史权利。因此，我向这些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进攻时（也许在适当时候这样做），大概将采取下述方式：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81]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像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合理的，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已经证明了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

[①] ①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

[①] ①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

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研究家和哲学家。

（4）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由于这种区别，就有可能，如您所正确指出的，使

“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①]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②]。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结论的情况下，我从我自己的前提出发将进一步作出下面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视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研究家称心如意的。

（5）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想用相应的另一种措辞来表述您的下面这个实质上完全正确的命题：

“为了便于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思想，最后能够……发展到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①[①]

（6）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①]。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

——

11 月 17 日

我再次被打断了，今天又拿起这封信，以便给您寄去。您可以看出，我的这些意见与其说是有关您的攻击的内容，倒不如说是有关您的攻击的形式和方法方面。我希望您会认为我的这些意见写得够清楚的。这是我仓促写成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②] 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

[①] ①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

[①] ①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

的，重读之后，本想把许多地方修改一下，但是又担心会把信改得紊乱难读。

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

1876年　37.恩格斯致马克思

1876年8月25日星期五于拉姆斯盖特

……目前在拉姆斯盖特住的几乎全是小菜贩和其他很小很小的伦敦小店主。这些人在返程票有效期间，在这里待一个星期，然后让位给另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以前是当天来当天走，现在要待一个星期。乍看起来，以为这是些工人，但是这些人的谈吐立即显出他们的状况大概略好一些，属于伦敦社会最令人厌恶的阶层，这种人在言谈和举止上已经准备好在必然临头的破产以后操起同样必然临头的沿街叫卖的行业。让杜西想象一下自己的老朋友戈尔早晨在沙滩上被三四十个这样的集市女人围住的情景吧！

在海滨浴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愚蠢的情况下，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1]。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于是他就像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驮着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几乎没有越出普鲁士通用邦法的适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体现了“国家”。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他宣扬的永恒真理是些什么，你可以从他把烟草、猫和犹太人看作三样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痛加叱骂这一点看出来。

杜西给琳蘅的信刚刚寄到，我立即把它寄往伦敦。

《每日新闻》和老罗素关于“土耳其暴行”的叫喊，给俄国人帮了大忙，为他们即将发动的战争作了出色的准备。一俟自由党先生们在这里执政，他们就会发动战争。自由党地方报刊现在也大肆鼓噪，而且由于老迪希[1]已经退居上院[491]，自由党叫喊家们在最近下院开会时想必会在那里左右一切。对于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卑鄙行为，当然都闭口不谈。好在塞尔维亚人挨了打——甚至福布斯这个仅存的唯一有理智的战地记者，也以毫不掩饰的热情谈到土耳其军队的军事优势——，而白色沙皇[2]进行干预并不那么容易。

你的夫人和莉希向杜西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877年　38.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

1877年10月19日[于伦敦]

---

[1] 欧·杜林《哲学教程》。——编者注

[1] 迪斯累里。——编者注

[2] 指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尤为强烈。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492]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我假定他怀有“无比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①]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和花了许多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145]。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39.马克思致威·布洛斯

1877年11月10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我“不生气”（如海涅所说）[①]，恩格斯也一样。[493]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②]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494]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但是，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类事件[495]——它一定会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充分利用——，毕竟使我们在与“德国的党内同志”的关系方面慎重行事。

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都用于完成我的著作[①]；恩格斯现在正忙于写几部篇幅较大的著作[②]，同时仍在继续为《前进报》写文章[③]。

关于我“和贝克斯神父的配合”[496]，我想不时地了解些详情，这会很有

[①] 指赫希柏格在《未来》杂志上发表的社论《社会主义和科学》。——编者注

[①] 海涅的诗集《抒情间奏曲》第18首。——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趣的。

恩格斯日内将给你写信。

我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向你衷心问好。

完全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1878 年　40.恩格斯致威·白拉克

1878 年 4 月 30 日于伦敦

……我觉得，在您对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的看法中[497]，关于未来的展望稍多了一些。尽管一方面由于提供了不受任何监督的最充分的财政独立，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支配铁路职员和烟草制品经销商这两支新的大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配职位的权力和贪污受贿，会使普鲁士主义的实力获得巨大增长，尽管有这一切，但不应该忘记，今天将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的任何移交，根据情况的不同，都可能有两重意义和两重效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498]但是，我们德国刚刚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目前还仅仅是准备借助于大工业和通过崩溃[285]来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我国，需要尽可能高度发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因为它使资本积聚并使对立极端尖锐化，特别是在东北部。易北河以东地区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解体，在我看来，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前进的一步，除此之外，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德国工业的和手工业的小生产的解体和为大工业所取代。归根到底，烟草专卖的唯一积极方面就在于，它将一举而把一种最低下的家庭工业变为大工业。然而，另一方面，对国家烟草工人可能立即实行非常法，剥夺他们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而这可能更糟糕。在我国没有必要使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成为国有经济部门，至少对铁路还没有必要，这在英国也刚刚开始；相反，对于邮政和电讯，这倒是必要的。对于这两种新的国家垄断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我们将得到的补偿只能是鼓动演说中一句新的响亮的空话。因为纯粹出于财政和权势的考虑，而并非由于迫切的内在需要建立的国家垄断，不会给我们提供哪怕多少像样一点的论据。况且，实行烟草专卖和废除家庭烟草工业所需的时间，至少将同俾斯麦主义的最长寿命相等。您还可以相信，普鲁士国家会使烟草的质量大大下降，并使它的价格大大提高，从而使得自由竞争的拥护者们能兴高采烈地宣扬国家共产主义已大出其丑，而人民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正确的。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俾斯麦的无知妄想,同他 1863 年关于兼并波兰和在三年内使它日耳曼化的计划相比毫无逊色……

您的　弗·恩格斯

1879 年　41.马克思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

[1879 年 4 月于伦敦]

卡列耶夫先生的著作[499]非常好。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过奇怪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像是土地所有者的一个租户。卡列耶夫先生根本不对，他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和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像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如果卡列耶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给他的名著[①]所写的

[①]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 年伦敦版。——编者注

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像魁奈所作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里维耶尔的梅尔西埃，认为妻的动产[500]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42.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

1879年4月10日于伦敦

阁下：

收到您的2月来信时（珍贵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书籍也同时顺利地寄到）[501]，正好我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怀疑她能否经受得住这次发作。在这同时，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出了几次问题。（实际上，自从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局势[①]使我无法继续我的一年一度的卡尔斯巴德之行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研究您寄给我的资料，而这种情况刚刚才有所好转。在此期间，我曾通过一个去圣彼得堡的德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不过信中只限于说明收到了您的信和向您介绍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昨天这个人又在这里出现了，并且告诉我，由于出了些事，他最远只到了柏林并已完全放弃了彼得堡之行。

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您（这一点请不要对外人说），据我从德国得到的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厉，我的第二卷[②]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一点没有使我感到气愤，其原因在于：

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285]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此，必须注视目前的进展，直到情况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目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沃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然而金融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仅仅受到些微的影响。与此相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取利润。至于这次的停滞是什么样的停滞，您可以从英国工商业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中去判断，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了。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

---

① 指由于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形成的局势。——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2卷。——编者注

终日的现象，尽管 1857 年和 1866 年我都在伦敦。[1]

毫无疑问，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金融市场的条件之一，自从最近两国之间的交往发展以来，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了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法兰西银行握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它的银行券的自由兑现还没有恢复，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假如去年秋天法国货币突然被收回去的话，英格兰银行肯定会采取最后的极端的医治手段，即中止实行银行法令 [502]，那时我们的金融市场就要崩溃了。

另一方面，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金融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兰开夏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些银行不仅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为工厂主无利可图的生意进行票据贴现和垫款，而且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用来创办新的工厂，例如在奥尔德姆就是这样。同时，以棉制品为主的存货，不仅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这是运到那里去委托销售 [503] 的——，而且在曼彻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积起来。如果不是首先在工厂主当中、继而在地方银行当中发生一次直接影响伦敦金融市场的普遍崩溃，这种情况怎样才能结束，是很难预见的。

而目前到处是罢工和混乱。

我顺便说明一下，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都很不顺利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但这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如巴黎博览会[1]等等造成的。事实上，铁路不过是通过增加债务从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来维持着繁荣假象的。

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巩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将引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我的医务顾问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 1874 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关于您的极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讲几句。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我把它叫作“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

---

[1] 这两年发生了影响英国经济的世界危机。——编者注

[1] 指 1878 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编者注

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并把这种上部结构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敷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铁路公司除了盈利外，还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线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因为，移民中的小农场主当然优先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

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实施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经营、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被路易·波拿巴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租让铁路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负担的国债和群众遭受压榨的一个新的根源。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举借的新债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性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因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业人口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

在结束我的这封信（送去投邮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时，我再指出一点：要找出在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则越来越显现为不可避免的结局。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即使采取的是有利于债权人而有损于平民的极端可耻的方式），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像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虽然被内战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像，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部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像是对生产的主体部分（农业）的停滞状态和生产者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拒绝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我用不着再继续对比下去了。

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么？

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寄给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彼得堡《欧洲通报》[336]的我过去的明智批评家[504]竟变成了玩弄现代交易所欺骗把戏的平达式的人物。此外，这本书即使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而我一般地说对这类书已不再抱什么期望——，在细节上也是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的。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纸币的论战。

据说，某个政府想从某些国外银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这些银行家要求它以实施宪法作为保证。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用现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与一切形式的政体都协调得不错而且有能力这样做。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43.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

……在关税问题上，您的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既然事实上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要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而在表决时正好应当弃权。没有这样做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不过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部分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部分更受到重视。您说，您不能在国会里只限于采取单纯否决的立场。可是，既然他们最后全都投票反对那项法律，那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决的立场。我只是说，事先应当知道遵循什么策略；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超出单纯否决，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显然这一切暂时不会来麻烦您。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如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事业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通常总会发生分歧，自然而然地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做到……

我主要指的是报告[①]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好像舆论这个因素反对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似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云云（同情！从那些不久前在发生恐慌[505]时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方面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过去了；（2）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要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热中于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也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报告的缺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①]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报告》。——编者注

点不是它讲得太少，相反，而是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幸好忽略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

顺便说说，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881 年　4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1 年 2 月 1 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耽搁了很久，终于动手给您写回信。

不过，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这里来，对您惠寄给我的那本书[②]写详细的书面评论，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了，我将有机会和您面谈这一问题，所以这里只稍微谈点意见。

（1）第 66 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赢利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全部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反杜林论》第 182 页上汇总了《资本论》中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段落。[③]

（2）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506]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剩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绝无义务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顾虑和疑问，或者，比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

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刚刚在形成中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应该从现在起使地球上住满居民——您在第 169—170 页上所谈的，只是很浅地涉及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欧拉的计算法[507]，其价值跟下面这种计算克劳泽的方法完全一样，即假定从公元第一年起按复利存放一个克劳泽，则每隔 13 年增加一倍，那么现

---

① 恩格斯从 1870 年 9 月到 1894 年 10 月初住在这里。——编者注

② 卡·考茨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编者注

③ 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556 页。——编者注

在就应为大约$\frac{1\times 2^{144}}{60}$盾，这是体积超过地球的一大块银子。您在第169页上说美洲的社会关系和欧洲差别不大，这只有在您观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城市，或者只是这些关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的情况下才是对的。广大美洲居民无疑地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30年以上。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其实，早在1844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147] 第109页）："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容易的办法。"[①]

暂时告一段落——其余的问题等以后和您面谈。您要到这里来，很好。您是年轻一代中真正想学到点东西的少数人之一，而在无批判的气氛下，现在德国出的一切历史和经济书籍越来越糟，对您来说，摆脱这种气氛将是很有益处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45.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

1881年2月22日于伦敦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508]，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①]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0—621页。——编者注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吓住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 1789 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 18 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大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46.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1 年 3 月 12 日于伦敦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509]、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47.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1 年 10 月 25 日于伦敦

……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

[510]。导言[①]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的：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可以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杰作是我少见的，措辞这样精练，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叹。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作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工资最低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的。

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不是没有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坚持不要布鲁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耿耿于怀，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小集团便产生了。

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作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是什么改进。

后来，我还在《平等报》[511] 第 2 期[①]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过。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怀有良好意愿的人，也愿意同他进行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这样邀请过人呢？

马克思，其次是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1882 年　48.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2 年 1 月 25 日于伦敦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事态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302]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1000 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

---

① 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64 页。——编者注

① 指《平等报》第 2 种专刊。——编者注

件，他们没有被直接置于革命者的处境中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营垒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294]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相当反动的地方，受到社会排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压抑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日常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小城市风气，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刁难——这一切把人弄得精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于是，在这个“大幼儿园”[512]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以致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都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而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

49.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2年9月12日于伦敦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移民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恰恰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

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埃及的事件[513]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够得逞，也还远不能保持住埃及），以便俄国占据亚美尼亚，按照格莱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托词、借口。这种企图是否会成功，很快就会见分晓。

热情问好。

您的　弗·恩·

50.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2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早就想写信告诉您法国的情况，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动笔。也好，这样倒可以一举两得了。

（1）圣艾蒂安。尽管有比利时人的好意劝告，不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514]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被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452]的共谋者（他是17个创始人之一）。但是，毕竟还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了巴枯宁的实践。事情的进程表明，他们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在兰斯和巴黎开始的事情[515]，在圣艾蒂安完成了。纲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1880年的共产主义的导言[516]，已经被1866年国际章程的导言所代替，而1866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把他们屏除在外。纲领的正面要求都被取消了，因为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它们随意设定的特殊目的制定自己特有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圣艾蒂安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这两个人能够对旧纲领提出的最严厉的责难，就是这个纲领推出去的人比吸收进来的人还多。这一点现在已可以补救：蒲鲁东主义者和激进派[517]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党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么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518]就会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

在所有的罗曼语国家中（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对待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向来很宽。这些代表资格证很多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当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当这还只涉及次要问题的时候，其危害性还不那么大。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把这种做法变成了（最初是在汝拉）常规，他们一贯地伪造代表资格证，企图用这种办法来窃取领导地位。现在在圣艾蒂安就是这样。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不惜采取撒谎、诽谤、搞阴谋诡计等一切手段。只有在这方面布鲁斯才是能手。但是这些人忘记了，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这样小的地区能够得到成功，而在一个大

国的真正的工人党内就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和耍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圣艾蒂安的表面的胜利不能长久保持下去，马隆和布鲁斯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就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411]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垮下来以后，合并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去谋取合并也是过于匆忙了。[519]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垮下来，然后重谈合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合并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此外，甚至罗阿讷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软弱无力的行动要求……

51.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82年10月28日于伦敦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520]“只是反动的一帮[521]”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边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边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举而全线胜利。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刚刚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以及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被孤立了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在法国，早已预料到的分裂发生了。[514]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

烦恼了……

52.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2年11月28日于伦敦

……巴枯宁主义者也完全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数量不多（果真如此，我还远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阿讷派举行的关于两个代表大会[514]的辩论会），这可以通过报刊的影响而两倍三倍地得到弥补。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记者们怎能认为圣艾蒂安派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像此地的工人一样。但是他们从骨子里就是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正像此地的工人已经完全变成的那样。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这类工人投票工具的工人领袖们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

1883 年　53.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3 年 3 月 1 日于伦敦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笨蛋菲勒克从这里只是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

54.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1883 年 3 月 14 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从我给倍倍尔夫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通讯处）的电报里，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上星期五医生——伦敦最好的医生之一——还告诉我们，只要营养跟得上，维持住他的体力，他完全有希望恢复得像以前那样健康。而且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胃口又开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的时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泪，说他异常地虚弱；琳蘅叫我上楼去看他，说他处在半睡的状态，当我上了楼的时候——此时她离开房间不过两分钟光景——他已完全睡着，但是长眠不醒了。19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考了。关于致死的直接原因，没有医生的意见我不好判断；整个情况是这样复杂，以致医生们要把它详细写出来，也要花费许多笔墨。然而，现在这毕竟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最近六个星期以来，我饱受了惊恐，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我看来，起初他的夫人去世，接着，在他非常危急的关头燕妮[①]又去世，这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

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你的　弗·恩格斯

55.恩格斯致菲·范派顿[522]

1883 年 4 月 18 日于伦敦

[①] 马克思的大女儿。——编者注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在 4 月 2 日来信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 1845 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 1847 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难道还需要我特别证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内部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从 1867 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 1872 年 9 月的海牙代表大会[485]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代表，霍博肯的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

56.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3 年 8 月 27 日于伊斯特本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体（它的特点，马克思和我分别在《雾月十八日》[①]和《论住宅问题》第二篇[②]以及其他地方阐述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在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但是，正像后一种斗争不能在旧的专制君主政体下而只能在立宪君主政体下（英国、1789—1792 年和 1815—1830 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因此，如果说，有利的条件和革命的经历曾经帮助法国人打倒了波拿巴[①]，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同依然停滞在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的我们相比，法国人有这样一个优越性：他们拥有一定会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待于夺取。他们在政治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579—689 页。——编者注

[②] 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163—197 页。——编者注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上要比我们先进整整一个阶段。因此，如果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其结果必然是争取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又出现在日程上；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一直到发生危机。

在我们这里，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说，同样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412]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利用它首先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

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 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1848 年的法国）。

您的　弗·恩·

1884 年　57.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 年 2 月 4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邮班快停收了，匆忙写几行。

请您赶快告诉我，您对杰维尔的书[①]打算怎样加工，是整章地保留，逐字逐句地翻译呢，还是按我所建议的加以压缩。只有等我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向迈斯纳征求意见，因为我得告诉他一个确定的消息。已经在巴黎给迈斯纳定了一本；等书来的时候，您的回答大概也到了。

理论部分我很愿意校订，虽然我并不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至于叙述部分，校订没有意义，因为您会避免杰维尔的错误。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

其余的问题过几天再谈。

您的　弗·恩·

58.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 年 2 月 16 日于伦敦

……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全部的材料都包括在莫尼律师著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 年伦敦版，共两卷）这本书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由国家组织生产，并且怎样保证人们过一种他们所认为的非常舒适的生活；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阶段上，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 7 000 万马克的

[①]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收入（现在大概还要多）。这种情况很有意思，而且很容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也附带证明了，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像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并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它和瑞士各旧州[523]的独立的马尔克公社一样，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遗迹。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 年版）。马克思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脑子里正装着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①]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原始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294]的杂文栏或《新时代》[3]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524]。泰勒、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搞的整个骗局，不管是内婚制、外婚制，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拚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收不到！虽然在扉页上还印着一家伦敦书局作为共同出版者。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59.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4 年 3 月 24 日于伦敦

……关于三月的文章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好的，主要点都强调得十分正确。刊登在下一号里的那篇论述人民党员对农民进行说教的文章也很好，其中只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525]。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①]，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立宪君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那是（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专制君主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编者注

[①] “民主”的原文是“Demokratie”，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在德文中有“人民当权”的意思。——编者注

（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就此结束我的赘谈……

60.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4年6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在海滨住了一个星期[526]。右手食指割破，很厉害，所以写得简短而潦草。这样一来，考茨基只好等一等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294]比《新时代》[3]更重要，况且后者的情况是这样的：不论我是否参加意见，反正一样。不过，考茨基的一切行动，就他告诉我的和就我对事态的判断而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527]

《社会民主党人报》情况有些不同。自从抱怨派[528]先生们形式上联合成一个政党并在国会党团中占了多数之后，自从他们意识到他们这种由于实施反社会党人法[302]而取得的力量并利用这一力量之后，我认为，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掌握的一切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

这些人是靠反社会党人法过日子的。假如明天能公开论战，我主张立即出击，那时他们马上就会完蛋。但是目前任何的公开论战都不可能，目前所有在德国出版的报刊都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的人数（在“领袖”中间占多数）使他们有可能拚命造谣中伤，施展阴谋和暗中破坏，——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这是党内斗争的常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应当遵循这一常规。若是分裂，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党，而他们或者退党，或者被开除。

再来谈谈时机问题。现在一切都对他们有利。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分裂后在德国诬蔑和诽谤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冒充群众的代表（因为群众真会选举他们！）。我们手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国外的报刊。他们的话能够被人倾听，而我们却很难办到。如果我们现在就造成分裂，那么全体党员群众就会不无理由地说，党费了很大力气，冒着种种危险，刚刚在改组，而我们却在这时候制造不和，瓦解党。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情况，那么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推迟到在德国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但如果分裂还是不能避免的话，那么它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例如，你和斯图加特分子之间的争吵，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也就是说，在当前应当由于纲领[529]遭到破坏而发生。纲领是这样地坏，你对它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对你来说，那里有足够的立脚点。况且，国会党团是管不着纲领的。其次，分裂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至少要使倍倍尔同意这样做并立即跟我们一起走。第三，你自己应当弄清楚，分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能够怎么办。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

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急躁更坏的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自

己看来似乎总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从千百次的亲身经验中知道得太清楚了。

总之：（1）分裂应当尽可能往后拖；（2）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应当让他们提出来；（3）同时作好一切准备；（4）至少要有倍倍尔，而且尽可能还要有李卜克内西，否则不采取任何行动，李卜克内西只要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就会又转变过来（也许，甚至会矫枉过正）；（5）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对待这些先生们的“傲慢态度”，你们完全可以以千百倍的傲慢回敬他们。你们本来是很会讲话的，你们完全可以用相当尖刻和相当讽刺的话去对付这些蠢驴，以便消除他们的此类癖好。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而应当挖苦他们，用他们自己讲过的话嘲弄他们等等。

同时你别忘了，我的手脚已经被我承担的大量工作束缚住了，所以，如果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我不会有时间像我希望的那样参加进去。

我还想从你那里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些庸人不满的是什么和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而不是对这些庸人的一般的怨言。你要记住，你同他们谈判越久，他们向你提供的可用来指责他们自己的材料就越多！

请来信告诉我，我在和倍倍尔通信中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谈到什么程度。我这几天本应该给他写信，但我想拖到星期一，本月 9 日；到时我可能接到你的回信。

问候考茨基。

你的　弗·恩·

61.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4 年 7 月于伦敦]

……[1]我硬着头皮看了几期《新世界》。[530] 这个杂志无聊透了，没法看下去。至于盖泽尔先生，他的“科学”是碰不得的。一个人在如此低贱的杂志上炫耀他的科学，就证明他实际上什么学问也没有，何况他还一直把“bacillus”印成“Cholera-Baccillus”，好像这个词是来源于 bacca，而不是来源于 baculus。而这个词是任何一本拉丁文词典里都有的。说什么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一样，二者都有片面性，应当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2]，这种说法是陈词滥调，你不必去管它。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我们自己早在 40 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

62.恩格斯致卡·考茨基[531]

1884 年 9 月 20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

[1] 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

[2] 布·盖泽尔《地球的内部结构》。——编者注

随信将稿子挂号寄还。

你评洛贝尔图斯的文章[1]，有关经济方面写得很好；我又要指摘的地方是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所下的不容争辩的论断，你这样也就把弱点暴露给施拉姆，这个人是很会抓住这些弱点的。

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你的确过于一般地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

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维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暂时性的。这样就有了真正的资本。这不是目前的资本，这不过是这个概念的不完备的体现。他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里面得出资本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在他们的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当然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就干脆把真正的资本和根据不同情况有时是资本有时不是资本的生产资料混在一起。这样一来，一切坏的特性，即一切真实的资本特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于是他就可以要求真实的资本必须符合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只行使单纯的社会生产资料的职能，抛弃一切使它成为资本的东西，然而它必须仍旧是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真正的资本……

63.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

1884 年 10 月 15 日于伦敦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病是局部的，虽然有时令人厌烦，但是对整个健康毫无影响，而且决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它最坏不过使我不适于服兵役，但是也许过几年我还能够骑马。四个月以来，我不能动笔，但是我口述并几近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的英译文（已译完的那部分，占全书的 3/8）。另外，我现在找到了一种药。它使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愿不久会进一步好转。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应该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

6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 年 11 月 8 日于伦敦

---

[1] 卡·考茨基《洛贝尔图斯的<资本>》。——编者注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给我们事业的进展帮了大忙。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所能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 1848 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抗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恰好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1885 年　65.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

1885 年 4 月 23 日于伦敦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 1789 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

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从 3 月 13 日[532] 以来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533]）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释放出一种接着便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幻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的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①]。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释放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534]），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但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535]，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①]您不妨看看违心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②]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③]一场宫廷革命，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有其代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举世无双的专制制度用强力禁锢在一起，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 1789 年一开始，1793 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

66．恩格斯致盖．吉约姆-沙克

[1885 年 7 月 5 日左右于伦敦]

……法国人在要求限制妇女劳动方面不像德国人那么迫切，这是由于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妇女的工厂劳动只起比较次要的作用。就我所知，在工资还根本没有废除以前，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英国妇女界争取妇女形式上的权利的先驱们，即主张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的那些人，自己也多半同资本主义对男女劳动者的剥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我承认，在资本主

[①] 草稿中这里删去了：“我不说是在俄国，因为在远离行政中心的省份，这样的打击是无法进行的。”——编者注

[①] 草稿中这里删去了：“也许我们大家的命运都会是这样。”——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③] 草稿中这里删去了：“贵族集团或交易所投机分子集团，好吧，欢迎！直到”。——编者注

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67.恩格斯致敏·考茨基[536]

1885年11月26日于伦敦

……《旧和新》[①]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场工人生活的描写，就像在《斯蒂凡》[②]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意志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员和演员的那种小说才能找到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的发展有的地方是否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某些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为那里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但是，为了表示没有偏颇，我还要找点毛病出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如果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么，除非人们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崇尚正义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方面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可是，产生这个缺陷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出色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巧妙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显示出作

[①] 敏·考茨基的《旧和新》。——编者注

[②] 敏·考茨基的《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编者注

家能驾驭自己的作品……

1886年　68.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86年1月20—23日于伦敦

……至于我提的关于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当时赞成轮船公司津贴[299]的多数派指明一条出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投票反对这个提案，走出他们已经陷入的死胡同。而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如果我们提出积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只提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应该是实际上可行的，不管现政府会不会实行。我还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提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社会主义措施（如上所述），那只能是一些切实可行、但对现政府说来是不可行的措施。因为，这个政府会败坏和糟踏任何类似的措施，政府实行这类措施仅仅是为了断送它。而这个建议是任何一个容克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实行的。给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使他们本身走上一条他们能够消灭容克和租佃者的剥削的道路——把恰恰是这样一部分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这部分居民的被奴役和愚化，使得支撑整个普鲁士的团队能从他们中间得到兵员的补充，总之，要从内部，从根基上炸毁普鲁士这样的建议多数派是想不到的。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越早宣传这个措施，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存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至于德意志帝国没有国有土地，那无关紧要：总是可以找到适当方式的，就像在波兰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那样，当时驱逐出境的事[537]同帝国政府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正因为政府决不可能接受这类东西，所以，提出我所建议的津贴来同轮船公司津贴相对抗是没什么危险的。如果政府能同意这一点，那你当然是正确的……

69.恩格斯致爱·皮斯[538]

[草稿]

1886年1月27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对您昨天亲切的便笺，很遗憾，我只得告诉您，我的时间现在已被无法

拖延的工作完全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无法承担任何新的义务。

如上所述，我无需再申述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写您所请求的文章。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见该书第 2 版第 253—271 页，转载于我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 3 版第 28—48 页。[1]这样一个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经济的社会问题都根本未触及的特殊的概述，我无法写得更简短。因此要为您写 600 字的提要，对我来说是一项力所不及的任务。

忠实于您的

70.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86 年 11 月 29 日于伦敦

……亨利·乔治的成就[291]当然已经暴露了一大堆骗局，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当时没有在场。但是，尽管如此，那还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此外，他们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因此，美国的群众不得不自找出路，看来他们首先在“劳动骑士”[292]里找到了这种出路，这一团体的混乱的原则和可笑的组织看来是同他们自己的混乱情况相适应的。但是根据我所听到的一切来判断，“劳动骑士”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让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从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自然而然地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手中。“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结果出现了鲍德利等人的十足的欺诈行为。可是这种中立态度的势头已经在 11 月选举时期，特别是在纽约，由于群众所采取的行动而被打掉。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应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而这一步已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快得多地实现了，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还是混乱的和极不完备的，它还打着亨·乔治的旗号，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成长，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

美国的运动正处于我们在 1848 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那里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1848 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行得无比迅速；运动开

---

[1] 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617—634 页和 740—760 页。——编者注

展不过 8 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资产者就会去补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像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资产者用这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斗争很快就得到结局，如果我们在欧洲不加紧行动，那么美国人很快就会超过我们。但是正好现在，你们那里加倍地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他们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同时要能说英文和写英文，因为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如果那里存在着理论头脑清醒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么，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方式进行，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539]的先生们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而《人民报》[540]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

71.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86 年 12 月 28 日于伦敦

……我的序言[①]当然将完全论述美国工人最近 10 个月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自然也要涉及亨·乔治和他的土地改革计划。但是不能要求非常详尽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样做的时机已经到了。使运动扩大、协调地发展，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向前进展重要得多。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292]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冷眼看待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强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德国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如果他们像我们在 1845 年和 1848 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运动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

---

① 见本卷第 387—396 页。——编者注

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1]。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从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二百万工人在明年 11 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教条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一旦运动向前发展，马上要作的第一个尝试，就是要在全国规模上把卷入运动的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所有的人——乔治的拥护者、“劳动骑士”、工联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处于面对面的地位。如果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到那时把这个国家的语言学得很好，能够参加讨论，那时他们就能批评别人的观点，通过揭发各种立场的内在矛盾，逐步地使这些人了解他们本身所处的实际地位，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给他们造成的地位。可是，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挠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个大错误，因此，我认为全面而详尽地谈论亨·乔治或“劳动骑士”的时机尚未到来……

1887 年　72.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87 年 1 月 27 日[于伦敦]

……美国的运动，我认为正是目前从大洋的这一边看得最清楚。在当地，个人之间的纠纷和地方上的争论必然要使运动大为失色。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东西，就是这些分歧的加剧并从而导致宗派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越少越好。而德国人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当我们在 1848 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政党，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工人阶级注意的手段；我们是该政党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总章程使当时一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分子、皮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这种广泛性，国际才成为它当时的那个样子，即成为逐步融解和吸收除无政府主义者外的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国家里的突然出现不过是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泰然地让他们寿终正寝，事实上也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在 1864—1873 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我们今天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我认为，我们的全部实践已经证明，可以在工人阶级普遍性的运动的各个阶段上同它进行合作，而无需放弃或隐瞒我们自己的独特立场甚至组织；我担心的是，如果在美国的德国人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他们要犯大错误……

1888 年　7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1]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306 页。——编者注

[1888 年 4 月初于伦敦]

尊贵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像我的朋友、您的译者艾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们而对救世军[541]所作的处理上，这些庸人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生造的情节和曲意的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结构，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如实地叙述了它，使它变成新故事。

您的阿瑟·格兰特先生是一个杰作。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 1800 年前后或 1810 年前后，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恰如其分的描写，那么，在 1887 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 50 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 1816—1848 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 1815 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

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368]；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542]，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 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①]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

1889 年　74.恩格斯致格·特里尔

1889 年 12 月 18 日于伦敦

亲爱的特里尔先生：

衷心地感谢您 8 日的有趣来信。

如果要我对最近在哥本哈根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543]（您成了它的牺牲品）发表意见，那么，我就从和您的意见不同的一点开始吧。

您原则上拒绝同其他政党采取任何共同行动，甚至是暂时的共同行动。即使我不绝对拒绝在采取共同行动比较有利或害处最小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手段，我仍不失为一个革命者。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 1847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在德国谁真正为废除长子继承权和其他封建残余而斗争，为废除官僚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而斗争，为废除反社会党人法[302]和对集会结社权的限制而斗争，那我就会支持谁。如果我们德国的进步党[412]或者你们丹麦的农民党[544]是真正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不仅仅是一些一受到俾斯麦或埃斯特鲁普的威胁就溜之大吉的可怜的说大话的英雄，那么，我决不会无条件地反对同他们一起采取任何暂时的共同行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当我们的议员投票赞成（他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时，这也就是一种共同行动。可是，我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这样做：对我们的直接的好处或对国家的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前进的历史发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而所

---

① 伦敦东头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您在 1847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看到对这种政策的阐明，我们在 1848 年，在国际中，到处都遵循了这种政策。

我把道德问题抛开不说——这里不是谈这一点的地方，所以我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

这种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坚强意志，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这些呢？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朋友莫里斯说：它使我们有腐化的危险。是啊，如果工人阶级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卖身投靠的无赖，那我们最好马上卷起铺盖回家，那无产阶级和我们大家就在政治舞台上毫无作为了。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

因此，在我看来，您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而我认为这里原本只是策略问题。但是策略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

但是在这方面，据我判断，您反对中央理事会的策略是正确的。丹麦左派党[①]多年来充当反对派，表演着这一出有失体面的喜剧，不遗余力地一再在全世界面前显示本身的软弱无力。它早已放过拿起武器来惩罚宪法的破坏者[545]的机会（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并且可以看到，这个左派党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力求同埃斯特鲁普和好。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同这种党共同行动，否则长此下去就要丧失其工人政党的阶级性。所以，您反对这一政策，强调运动的阶级性，我只能表示同意。

至于说到中央理事会对您和您的朋友们采取的行动方式，那么在 1840—1851 年期间的秘密团体中确实发生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开除反对派出党的现象，而秘密组织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英国宪章派中物质力量派[546]在奥康瑙尔独裁时期也相当经常地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宪章派正像其名称所表明的，是一个直接为进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所以他们服从独裁，而开除则是一种军事措施。相反，在和平时期我只知道约·巴·冯·施韦泽那个“严格的组织”的拉萨尔派有过类似的专横行为。冯·施韦泽由于同柏林的警察有着可疑的联系而有必要这样做，其结果只是加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411]的瓦解。任何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美国罗森堡先生自己幸运地退出[547]以后，当然未必会想到按照丹麦的方式对付自己队伍中产生的反对派。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如果您希望全文发表这封信，我丝毫不反对。

忠实于您的

[①] 即农民党。——编者注

1890 年　75.恩格斯致保·恩斯特[548]

1890 年 6 月 5 日于伦敦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横亘在您的面前。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从国外返回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 20 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仍然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处于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多少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大致和 17 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败的伟大运动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闭塞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烈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 1720 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运动又回到旧有的停滞状态，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也类

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样，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距天壤。就拿易卜生的戏剧来说，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宁愿先把它们彻底熟悉一下……

76.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 年 8 月 5 日于伦敦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549] 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①]的评论[①]，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讨厌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 70 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550] 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

---

①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

① 莫·维尔特《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编者注

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流人中间反正已经退化为空话的问题本身。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非常强大，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反社会党人法[302]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非常强大，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些成绩，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过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

77.恩格斯致奥·伯尼克

1890年8月21日于多佛尔
附近的福克斯通

奥托·伯尼克先生布雷斯劳

尊敬的先生：

对于您的问题[551]，我只能给予简短而概略的回答，否则，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得写一篇论文。

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我国工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302]的胜利斗争中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论德国群众的无知，我是难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国所谓有教养的人那种好为人师的狂妄自大倒是更严重得多的障碍。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艺师、工程师、化学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如果再对几个叛徒——在这伙人中间一定会有叛徒的——给以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那么他们就会懂得，就是为自己的利害着想，也不能再盗窃我们的东西了。但是除了这些专家（我把教员也包括在内）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有教养的人”也是完全过得去的，而且，比方说，目前著作家和大学生大量涌进党内，如果不

---

[1] 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带来种种的危害。

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庄园，可以在必要的技术指导下毫不费力地租给目前的短工或雇农集体耕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一些乱子，那么应由容克先生们负责，这些先生们无视所有现存的学校法，把人们弄得如此野蛮。

小农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聪明绝顶的有教养的人，是最大的障碍，这些有教养的人对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总之，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社会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左右一切。

您谈到缺乏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缺乏认识的是那些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想象不到，他们还应当向工人学习何等多的东西。

二、马克思夫人是特里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和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致以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78.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1890 年 8 月 27 日于福克斯通

……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552] 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到处是他们的人；而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军衔甚至将军军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 10 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在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中找到了支持，而这些东西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79.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1890 年 9 月 21[—22]日于伦敦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

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190]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奥地利王室领地形成的过程中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①]，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②]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①]，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

[①] 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689页。——编者注

[②] 《反杜林论》，见本选集第3卷第343—676页。——编者注

[①] 见本卷第214—258页。——编者注

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80.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 年 10 月 27 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553] 的建议，那您做得很对。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如果您注意到，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会在实践中熟悉全部机制，并且不得不研究来自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的第一手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市场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 40 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554]：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当时的问题是有人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至少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里还需要弄清和研究一些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最近 20 年的历史。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欲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 14 世纪和 15 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这是德国——1450—1550 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 1500—1800 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极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

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某个杰·古尔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资金，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被毁灭。现在，这种情况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法也与此相似：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123]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以前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的。尽管如此，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么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愚昧逐渐消除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191]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175]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

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 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1]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2]，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3]，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1]。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2]了。首先必须出版第三卷[3]，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也能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1891 年　81.恩格斯致卡·考茨基[555]

1891 年 2 月 23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前天仓促发出的贺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现在还是言归正传，谈谈马克思的信[1]吧。

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

---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本卷第 214—258 页。——编者注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584—689 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58—335 页。——编者注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81—832 页。——编者注

[2]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

[3] 指《资本论》第 3 卷。——编者注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293—319 页。——编者注

然是借任何事由都可以进行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坦白地说，这也是我发表这个文件的用意。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具体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很坚强，能够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估计，党在目前也会经受得住这种在 15 年前使用的直率的语言，人们会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可是，这一点已经由萨克森的《工人报》[295]、维也纳的《工人报》[556] 以及《苏黎世邮报》[553] 说了。[557]

你在《新时代》[3] 第 21 期上承担起发表的责任 [558]，你这样做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推动力毕竟是我给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至于细节，那么在这方面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你和狄茨所反对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已经删去和修改了，即使狄茨标出更多的地方，我也会尽可能地考虑，我总是向你们证明我是好商量的。至于说到主要之点，那么我的责任就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况且，李卜克内西在哈雷作了报告 [559]，在这个报告中他一方面把抄自马克思手稿的东西放肆地当作自己的加以利用，一方面不指名地对这份手稿进行攻击。马克思如果还在世，一定会拿自己的原稿来同这种篡改相对证，而我是有义务替他做这件事的。可惜，那时我手头还没有这个文件；我只是在找了很久以后才找到的。

你说，倍倍尔写信告诉你，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激起了老拉萨尔分子的恼怒。这是可能的。这些人并不知道事实经过，看来在这方面对他们也没有作过什么解释。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马克思容忍他多年来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东西来装饰门面，而且因为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是有义务的。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 26 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 [302] 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么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对马克思的态度的时候了。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条。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 [560] 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喜欢把一些声名狼藉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作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 年以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来了个转变，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品质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好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中，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批判而感到自己受了伤害的那一部分工人，只了解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而且还是戴着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工作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

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揭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自己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批判，本身就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给别人以勇气。但是，假如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在国会党团里有人叫嚷要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种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再现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①]

《前进报》[561] 上的文章 [558] 很少能触动我。我将等待李卜克内西说明事情的经过，然后再用尽可能友好的语调对二者一并答复。对《前进报》上的文章，只要纠正几个错误的说法（例如，好像是我们不愿意合并，事实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不正确等等），并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就行了。如果不再发生新的攻击或出现错误的论断迫使我进一步采取行动，我想，从我这方面来说就以这个答复来结束这场争论。

请告诉狄茨，我正在整理《起源》[①]。可是今天费舍来信，又要我写三篇新的序言 [562]！

你的　弗·恩·

82.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1 年 7 月 1 日于怀特岛赖德

……巴尔特的书[②]，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不会有那么多浅薄和轻率的东西。一个人评价每一个哲学家，不是根据他活动中的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而是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根据体系，——这个人还是少说为佳。在巴尔特看来，整个哲学史只不过是已经坍塌的种种体系的“废墟”。同他的这个所谓批评家相比，老黑格尔显得多么高大！巴尔特以为，他在这里或那里搜寻到黑格尔（像其他任何一个建立体系的人一样）在创造自己体系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点牵强附会的东西，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说黑格尔有时把相反的、互相矛盾的对立物混为一谈，这真是伟大的发现！如果值得花气力的话，我还可以向他揭露一些完全不同的手法！巴尔特就是我们莱茵河畔称之为哥林多懦夫的那种人，他把一切都看成微不足道的，如不去掉这种习惯，他就会像黑格尔所说的，“从无通过无到无”[563]。

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塞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总是这样

---

① 德语成语，意思是万物都有限度。——编者注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本卷第 1—179 页。——编者注

②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

感叹的。

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给您一一指出几百个歪曲之处。真是可惜。显然，此人如果不是这样急于下最后的结论，是能做些事情的。希望他最近再写点儿东西，这一定会引起更激烈的抨击；给他一顿应得的痛斥，对他会大有好处……

83.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91 年 10 月 14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在《前进报》[561] 刊登的你那个草案 [564] 中，我突然发现写上了“反动的一帮”，甚为惊异。我立即就此写信给你，尽管我担心已经太晚了。这一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不谐和音，破坏了措辞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要知道，这是一个鼓动性的词句，而且又是极端片面的，它只能使人产生武断的和绝对的印象，所以是完全错误的。

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作既成的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将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已经丧失采取任何进步行动的一切能力，虽然这并不是必然的。然而在目前，我们对此还不能像阐述纲领的其他原理那样说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左翼党，不管它们怎样卑劣，也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国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垃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就不是反动的一帮了。

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

一些人摧毁了德国的小邦制度，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实行工业革命的行动自由，实行了物的和人的交往条件的统一，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自己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做了这些吗？

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 1871—1878 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制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间所未闻的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义务教育，把教育普及和提高到我们德国人可以向他们学习的程度，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

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他们直到现在还在议会的历次会议上不但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总是投票赞成对工人的新的让步，——他们是在缓慢地、委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简单地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

总之，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何况这种倾向，例如在英国，永远不会彻底成为事实。如果这里发生变革，资产阶级还会愿意实行种种微小的改革。只是到那时，对将被推翻的制度进行某些微小的改革将失去任何意义。

鼓动中使用拉萨尔的用语，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理由的，尽管我们的人，例如在 1890 年 10 月 1 日 [302] 以来的《前进报》上，用得太滥了。但是，纲领中不容许这种用语存在，它用在那里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

它用在那里，就像银行家贝特曼的妻子要坐在别人打算给贝特曼的房子修建的阳台上一样：“如果你们给我修建一个阳台，我的妻子往上面一坐，楼房的整个外观就给破坏了！”

关于《前进报》刊登的草案中的其他改动，现在无法谈了，这份报纸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而且已经到了发信的时间。

党代表大会[565]在一个光荣的日子里开幕了。10 月 14 日是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的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革命前的旧普鲁士宣告崩溃。让 1891 年 10 月 14 日对普鲁士化的德国来说，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内部耶拿”[566]的开端吧！

你的　弗·恩格斯

84.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1 年 11 月 1 日于伦敦

……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可是，您要采用《全集》第六卷的版本，而不要采用罗生克兰茨编的单行本（1845 年版），因为前者引自《讲演录》的解释性的补充要多得多，尽管亨宁这个蠢驴自己对这些补充也往往不懂。

在导言中您会看到，首先是第 26 节等批判沃尔弗对莱布尼茨的修改（历史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其次是第 37 节等批判英、法经验主义，再其次是第 40 节及以下各节批判康德，最后是第 61 节批判雅科比神秘主义。在第一篇（《存在论》）中，您无须在《存在》和《无》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质》的最后几节，以及《量》和《度》，就好多了。但是，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在这里您随时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弄清问题。例如，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我记得，正是同一和差异的这种不可分离，最初是怎样折磨我的，尽管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碰到这个问题。

然而，您千万不要像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错误的推论和牵强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重要得多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例如，从一个范畴过渡到另一个范畴，或者从一个对立面过渡到另一个对立面，几乎总是随意的，经常是通过俏皮的说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第 120 节）“灭亡了”，这样黑格尔就可以转到“根据”[①]的范畴上去。在这方面思考过多，简直是浪费时间。

在黑格尔那里每一个范畴都代表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这种阶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来作一比较。建议您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只要您稍微读进去，您就会赞叹不已。

[①] “灭亡”的原文是“zu Grunde gehen”，而“Grund”有“根据”的意思。——编者注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如果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就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为正确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的自我发展。这类例子，还可以制造出一打来……

1892 年　85.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

1892 年 6 月 18 日于伦敦

……1890 年，俄国作为出口粮食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能够存在下去并保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吗？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能。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在现在的经济和工业情况下，不可能继续停留在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那种发展阶段。采用蒸汽发动机和工作机械，试用现代生产资料来制造纺织品和金属品（至少是为了国内的需要），或迟或早，想必已经实现了，无论如何是在 1856—1880 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你们国家的宗法式家庭工业也就会被英国机器的竞争所破坏，结果就会成为印度，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受世界大工场英国支配的国家。可是，连印度也通过保护关税来抵制英国棉织品，而不列颠的其他殖民地也是一获得自治，就立即保护本国的工业，抵制宗主国的压倒优势的竞争。代表英国利益的著作家不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拒绝学习他们的自由贸易的榜样，而去实行保护关税。他们当然不敢正视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几乎普遍实行的这种关税制度，正是对付使英国的工业垄断达到顶峰的这同一个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手段，这种手段或多或少是明智的，而在某些场合下是绝对愚蠢的。（例如对德国来说就是愚蠢的，德国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已经成了一个大工业国，而它现在把保护关税推行到农产品和原料方面，这就提高了工业生产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倒退到保护关税的做法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是对英国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形式，正如我说过的，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更坏，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适宜的手段，是另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只要我能证明这一工业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86.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2 年 12 月 31 日于伦敦

……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很好地摆脱少年时代的

“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因为同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相比较，便也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这同新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一样，在那里，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变成了传统的遗产，而且同它的地方观念几乎不能分开。无论美国人多么神气和执拗，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像期票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因为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的现在主要是为这个未来作准备工作；这一工作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主要是物质性质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国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国有土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为私人占有，如果现在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么，你们那里的事情也就好办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1850 年以来的大工业的发展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出现的，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此外，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567]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付诸实践。而那些立宪君主国也无法以品行端正自诩，它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巴拿马：英国有建筑公司丑闻，其中有一个“解放者公司”，把一大批小存户从大约 800 万英镑的存款中彻底“解放了”；德国有巴雷丑闻[568]和勒韦的犹太枪丑闻[569]（这证明，普鲁士军官仍在偷窃，不过是零星地干——这是他们唯一有节制的表现）；意大利有罗马银行丑闻[570]，它几乎已经可以和巴拿马丑闻媲美了，这家银行收买了约 150 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听说，关于这件事的文件不久将在瑞士发表。施留特尔应该注意报纸上有关罗马银行丑闻的一切消息。而在神圣的俄罗斯，有古老俄罗斯公爵称号的美舍尔斯基，由于在俄国对揭发出的巴拿马丑闻无动于衷而大动肝火，他认为这只能说明俄国的道德已经被法国的榜样败坏了，而且“我们自己家里不止有一个巴拿马”……

1893 年　87.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3 年 1 月 18 日于伦敦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至少在开头应该这样。此外，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抗衡，而是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自由党人接受他们。他们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一谈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那就糟糕了。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问题。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

88.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93 年 1 月 24 日于伦敦

……《前进报》[561] 刊登的辛格尔关于交易所的演说[①]是很出色的，我急切希望看到它的速记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我们大家容易忽略的：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要求工人直接关心容克、工厂主和小资产者在交易所里受到的盘剥并要求对此表示愤慨，这等于要求工人拿起武器保护这些工人自己的直接剥削者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我们敬谢不敏。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567]和其他丑闻的温室，因而也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无比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在这种历史意义上，交易所对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

89.恩格斯致弗·雅·施穆伊洛夫

---

① 1 月 20 日《前进报》第 17 号详细报道了辛格尔就交易所税务法附则发表的演说。——编者注

1893 年 2 月 7 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您友好地祝愿我活 90 岁，我非常感谢；如果我仍然能够像现在这样，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我的肉体和精神注定要像许多人那样变得呆滞的话，那就敬请原谅，我不能从命了。

您在马克思传记方面的要求[571]，很遗憾，我只能略做一点：我没有时间做，我正忙于《资本论》第三卷，一时一刻也不能丢开。

关于第一点。除了您已经有的传记材料，我介绍不出更多的。至少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 1844—1849 年的实际活动，一部分是在工人协会，特别是在 1846—1848 年布鲁塞尔协会[148]，一部分是在同盟。[122] 但是您在印刷品中，如我们给《宣言》（1892 年柏林最新版本）所写的序言和附有我的引言[1]的《揭露共产党人案件》[2]（1885 年苏黎世版）中，只能找到某些有关他在同盟活动的东西。关于国际，可靠的只有艾希霍夫[3]，他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写作的；其他所有人的东西，从弗里布尔[1]到拉夫莱[2]和察赫尔[3]，完全是谎言和神话。宁可自己动手写一大本书来正确地阐明事实，也不愿把材料交给第三者去加工。但是我可以向您提供总委员会同巴枯宁进行决定性斗争的两个出版物（《所谓的分裂》[4]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5]）。埃里蒂埃给《柏林人民论坛》[550] 写的《汝拉联合会和米·巴枯宁》一文，渗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编造的一切谎言的盲目信任[572]，这种信任超出了单纯幼稚的范围，而译者，正如埃里蒂埃给我写信所说的那样，又进一步作了无政府主义的歪曲。（不过，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删大砍，倒可使您避免许多错误。）

关于第三点。《神圣家族》[6]无论如何您必须弄到；我自己的这一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拿出去，而叙述书的内容是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摘出要点，也是办不到的。您应该了解全书。在柏林大概可以找到这本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7]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1892 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

马克思在 50 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1]，在他没有完全弄清

---

[1]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 190—210 页。——编者注

[2]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57—536 页。——编者注

[3] 威·艾希霍夫《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1] 厄·爱·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2] 埃·拉夫莱《现代社会主义》。——编者注

[3] 格·察赫尔《赤色国际》。——编者注

[4]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55 页。——编者注

[5]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65 页—515 页。——编者注

[6]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268 页。——编者注

[7]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54—61 页。——编者注

[1] 指马克思在 1857 年 10 月至 1858 年 5 月所写的经济学手稿。——编者注

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及以下各分册都没有出版。

给您寄去《分裂》和《同盟》，希望这些足够您用了；很遗憾，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一切。

衷心问候格拉德瑙尔和当地的全体同志们。

您的　弗·恩格斯

90.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

1893 年 2 月 24 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很久没有写信，请原谅。这也是不得已。我必须努力——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这个冬春把第三卷[②]完成。为此我只好放弃所有其他工作，甚至连信也不写，只要不是非写不可。否则，我不会中止同您继续围绕那个十分有意思而且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573]

现在，除了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以外，我已经结束了第五篇（银行和信用）的编辑工作，这一篇无论从内容本身或就手稿的状况来说，都是最难的。现在只剩下两篇，占全卷 1/3，其中的一篇（地租）内容也很难，但这一篇的手稿，我记得，要比第五篇的手稿完善得多。因此，我仍有希望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原先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保证在 3—5 个月的时间里工作绝对不要间断，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第五篇上，现在这一篇幸而已经完成。在工作的时候，我时常想到这一卷出版之后会带给您多么大的喜悦。我将把清样寄给您，就像过去第二卷那样。

现在来谈我们原来的题目。

我们似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已取得一致意见，只有一个问题除外；您在 10 月 3 日和 1 月 27 日的两封信里都涉及了这个问题，虽然两封信是从不同角度谈的。

在头一封信里您问道：1854 年以后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不但不能促进俄国历来那些制度的发展，反而必然从根本上破坏它们吗？换句话说，农民公社不能作为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吗？

在 1 月 27 日的信中，您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思想：大工业对俄国来说已经成为必然，但是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

好吧，我们来看看。在 1854 年前后，俄国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有制，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虑一下你们国家当时的情况，难道您认为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的公有制上面：一方面使这种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有制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当整个西方都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发展，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340]。但无论根据他的意见，还

[②] 指《资本论》第 3 卷。——编者注

是根据我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我们的作者在 1882 年 1 月给过去的一篇《宣言》写的一篇序言中，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假如俄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与西方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574]

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 10 年或 20 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单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一种至少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会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然后危机就会到来，这就是到世纪末还剩下的一切。而在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挽救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见：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 50 万地主和大约 8000 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永远是您的　派·怀·罗·[①]

来信请寄给考茨基夫人，而不要寄给罗舍夫人。

91.恩格斯致弗·梅林

1893 年 7 月 14 日于伦敦

亲爱的梅林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惠寄的《莱辛传奇》。我不想仅仅是正式通知您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这本书本身——它的内容，所以就拖延下来了。

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575]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 40 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

[①]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①]。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我们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过分地忽略了。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因此，我不仅根本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

[①]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 475 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让这个人在莱比锡当历史教授呢！那里曾经有个老瓦克斯穆特，这个人头脑也很平庸，但对事实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种人！

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再说一次当那些文章在《新时代》[3] 上发表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对大多数事情，甚至各个细节，都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遗憾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一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①]为止的整个情景。您已经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而在破马车散架以前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必须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经过时了）的必要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作全德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 16 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先决条件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今年冬季实现），那么我就能在那里阐述有关的各点。[576]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各种先决条件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其他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不可救药的，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的紊乱。在那里，在中世纪，英国的征服者代表外国的干涉帮助普罗旺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对英国人的战争可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577] 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羞愧的对照，但是正因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列以来，我们对过去的耻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两个帝国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它们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

我已经天南地北地扯得太远了；让这些空话至少给您作个证据，证明您的著作使我多么兴奋吧。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894 年 92.恩格斯致朱·卡内帕

[1894 年 1 月 9 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请原谅我用法文给您写信。近 20 年来，我已经失掉在运用意大利文方面所掌握的那点能力。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578] 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①]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意大利文刊物《社会评论》[579] 第 35 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向您提供的这段文字不能满足您所希望的一切条件，那就请您原谅。但是，由于您要在 21 日（这是个充满吉兆的日子，是路易·卡佩公民被处死刑的日子）前作好准备，所以不能浪费时间。

衷心问好。

您的

93.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1894 年 1 月 25 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

---

① 但丁。——编者注

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于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那些在学校里已被灌输的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1]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2]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3]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4]一书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94.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1894 年 3 月 6 日于伦敦

……前激进派[517]会对你们说，是啊，但是我们法国有共和国！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

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是，你们已经有了共和国，而我们则不同，我们还必须花费 24 小时去建立它。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

95.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4 年 11 月 10 日于伦敦

……这里的运动至今仍然同美国的运动相似，只是多少走在你们前面一点。群众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 11 月 1 日的市政选举中又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自觉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把它联合起来的人，运动长期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盎格鲁撒克逊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很盛行。社会民主联盟[580]同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581]完全一样，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的教条；它目光短浅，固步自封，而且多亏海德门，它在国际政策中固守着腐朽透顶的传统，这种传统固然时有松动，但是

---

[1] 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编者注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584—689 页。——编者注

[3] 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343—676 页。——编者注

[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本卷第 214—258 页。——编者注

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打破。独立工党[582]在策略上十分含糊，它的领袖基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虽然是一个出身于苏格兰煤矿工人的贫民，却创办了一家大型周报《工人领袖》[583]，要是没有一大笔钱，这是办不到的，毫无疑问，这笔钱是他从托利党或自由党人合并派[584]即从反对格莱斯顿和地方自治[585]的人那里弄来的。他在伦敦文坛上臭名昭著的交往和一些直接资料以及他的政治态度都能证实这一点。因此，由于爱尔兰选民和激进派[517]选民的背弃，他很容易在1895年的普选中失去议会中的席位[586]，这将是幸事，因为这个人目前是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他只是在有蛊惑人心的机会时才在议会中出现：说几句关于失业者的空话来抬高自己，却不去为他们争得任何东西，或者在某个王子[①]诞生的时候向女王[②]说一些蠢话（这种做法在这里是极其陈腐和极不值钱的），等等。不过，无论是在社会民主联盟内，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很分散；他们至少使得领袖们唆使这两个组织互相倾轧的一切企图每次都遭到了失败。约翰·白恩士在政治上相当孤独，海德门和基·哈第都对他进行猛烈攻击，而他装出一副似乎对工人的政治组织失去信心、仅仅对工联还抱有希望的样子。的确，他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是有惨痛教训的，如果机械工人联合会不给他支付议会津贴，他就会饿死。他爱虚荣，完全让自由派即激进党人“社会派”牵着鼻子走，他无疑过分重视他所争得的许多个别的让步；虽然如此，在整个运动中，即在领袖们中间，他是唯一真正诚实的人，并且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本能，我认为，比起其他人的狡猾和自私打算来，这种本能在紧要关头是能够引导他走向比较正确的道路的。

在大陆上，随着各种成果的取得，渴望获得更大成果的心理也在增强，而名副其实的争取农民的活动正在风行起来。起初，法国人在南特通过拉法格不仅声明说[363]：通过直接干预去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信和他们谈过）；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的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587]，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地区的负债累累的小农，而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出卖牲口和粮食的中农甚至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我们要把阿尔卑斯的农民以及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农争取过来，就只有把雇农和短工出卖给他们，而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得不偿失。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决定；不过也好，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深入研究。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农民和各省的根本不同的土地关系了解太少，所以他们除了胡说一通以外，不能作出什么决议。不过，这个问题迟早总是要解决的……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①]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

[①] 爱德华·阿伯特，约克亲王。——编者注

[②]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①] 指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编者注

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①]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96.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1894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已经写信给倍倍尔并向他指出，在政治争论中，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行事或者凭一时的激动，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常常吃亏。因此我也要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警告。

倍倍尔在会议上的做法是否不够聪明，这可以争论。但就事情本身而论，他无疑是正确的。[588] 你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当然应当起调解作用，通过争论消除甚至是确实存在的分歧，做到各方都能接受，在党分裂以前谋求党的统一。你作为编辑对倍倍尔的行为可能感到不愉快。然而，编辑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应当是党的领袖所期望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人并不总是不得不戴着必不可少的编辑眼镜，而且还提醒编辑本人，他作为党的领袖，有时不妨暂时摘掉玫瑰色眼镜，用自己的肉眼来观察世界。

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589]前夕，巴伐利亚人在纽伦堡建立了真正的宗得崩德[159]。他们带着明白无误的最后通牒来到法兰克福。另外，福尔马尔说什么各走各的路，而格里洛[②]则说，随便你们通过什么决议，反正我们不服从。他们宣布了巴伐利亚的特殊的权利，并把他们在党内的反对者称为“普鲁士人”和“柏林人”。他们要求党批准他们投票赞同国家预算和同意那种甚至比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这次党代表大会不是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坚决制止这种行为，而是不敢通过任何决议。如果说倍倍尔在这种情况下谈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活动的加强不合时宜，那么，我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谈才合时宜。

而《前进报》[561]在干什么呢？它紧紧抓住倍倍尔攻击的形式不放，说事情并不是那样糟糕，并采取同倍倍尔“完全相反”的态度，以致你因倍倍尔的反对者事后产生的必不可免的“误会”才被迫发表声明，说你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仅仅涉及倍倍尔攻击的形式，而就事情本身而论（在国家预算和农民问题上），他是正确的，你也是站在他一边的。[590] 我觉得，你事后被迫发表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就向你证明，你所犯的右倾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要厉害得多。

整个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归根到底仅仅是巴伐利亚人的策略，这个策略最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两点：为了争取小资产者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赞成国家预算，福尔马尔为了争取中农和大农而在农村进行机会主义的宣传。这两点和巴伐利亚人的宗得崩德立场，是当前存在的唯一实际的问题。如果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置党于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么你们应当为此而感

[①] 指美国和英国。——编者注

[②] 指卡尔·格里伦贝格尔。——编者注

谢他。如果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作是党内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这也不过是他从正确的总观点出发来看这个具体问题，这一点同样是应当肯定的。如果说他急于对这一切进行辩论，那么，他是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是在注意使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上能够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分裂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倍倍尔方面，他不过是直言不讳而已。这种危险来自巴伐利亚人，他们采取了党内前所未有的行动方式，使《法兰克福报》[591] 中那些把福尔马尔和巴伐利亚人看作自己人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欢欣若狂；这家报纸兴高采烈，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也许是这样。我也不认为他自己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竟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 10—30 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作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叫作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像“学士”、考试不及格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一种危险。现在我们能够消化他们。但是消化总得有个过程。为此就需要加盐酸；如果盐酸不够（像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么现在应该感谢倍倍尔，他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消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

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

你说，问题是要“引起有效的行动”。这好极了，但是这种行动究竟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1895 年　97.恩格斯致威·桑巴特

1895 年 3 月 11 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在答复您上月 14 日来信时，对您惠寄的关于马克思的文章[①]谨致谢意。这篇文章，我在亨·布劳恩博士好意寄给我的那一期《文库》②里已经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我很高兴，终于在一所德国的大学里也看到对《资本论》③作了这样的理解。不言而喻，我不能完全同意您对马克思观点的表述。尤其是第 576 和 577 页上关于价值概念的转述，我觉得谈得太远了一点。如果是我，那就首先对这一概念从历史上加以界定，强调它只适用于迄今唯一能够谈得上价值的那个经济阶段，即存在商品交换，相应地也存在商品生产的那些社会形式。原始共产主义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其次，我认为，这个论点还可以有一个在概念上更狭窄的表述。可是这样会使我们扯得太远。您所谈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但在第 586 页上您直接点了我的名，您这种用手枪顶住我的胸膛的惬意的做法使我好笑。然而您可以放心，我不会要您“相信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个别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各种数值 m/c=m/c+v 得出一般的、相同的利润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95—198 页。——编者注

率时所借助的那些逻辑中间环节，单个的资本家是完全意识不到的。因为这些中间环节具有某种历史类似现象或某种存在于我们头脑之外的现实性，所以它们在下面的过程里也就获得了这种现实性：资本家甲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超出利润率、因而也超出他在总剩余价值中应得份额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转入另一个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通常总是低于其应得红利的资本家乙的钱袋中。但这个过程是客观地、在事物中不知不觉地完成的，而我们只是到现在才能判断，要费多大气力才能达到对这个过程的正确理解。如果平均利润率的创造需要单个资本家有意识的合作，如果单个资本家意识到，他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多少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还得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拿出一部分，那么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相当清楚了，亚当·斯密，甚至配第，一定早就会指出这一点。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单个资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这种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润额。但是，不论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总资本。

那么平均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这里还有一些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的工作要做。我们首先看看第三卷上册第153—156页[①]的叙述，这些对您转述价值概念也很重要，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具有或曾经具有比您所赋予的更大的现实性。在交换之初，当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花费在两种物品上的劳动，正是它们在数量上进行比较的唯一标准。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实现停止了，现在不再有这种情况了。我认为，对您来说，不用费什么事就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将这种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后一种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对这个过程作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地进行研究，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将是对《资本论》的十分宝贵的补充。[592]

最后，我还应该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比它的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按马克思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98.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5—198页。——编者注

1895 年 3 月 12 日于伦敦

……您在利润率问题上为什么走上了岔路，我认为，您的来信已经使我得到了一些解释。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 1848 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哲学研究的折衷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玄想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研究得最多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研究的状况，由于和学究气十足的沃尔弗式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对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对这种沃尔弗式的玄想作一些表面的让步。我就是这样来解释您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的，这种偏向也表现在您的来信中谈到价值规律的那些题外话里；在这些地方，我认为您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所以您把价值规律贬为一种虚构，一种必要的虚构，差不多就像康德把上帝的存在贬为实际理性的一种假定一样。

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涉及一切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它只有从那里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

一般利润率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它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近似地存在着。如果一般利润率有一次在两个企业中分毫不差地实现了，如果这两个企业在某一年内获得完全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这是纯粹的偶然性，实际上，利润率是根据各个企业、各个年度的各种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许多企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是 14.876934……）在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为虚构，那我们就严重地误解了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

您可以举工资规律即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为例，劳动力价值只是作为平均数实现的，而且就连这一点也不总是如此，它在每一个地区，甚至在每一个部门，都随着通常的生活水平而有所变化。或者以地租这种从被垄断的自然力中产生的超出一般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为例。就是在这里，现实的超额利润和现实的地租也不是绝对地符合，而只是在平均数上近似地符合。

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来分配的情况也是这样。

1.这两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已经充分地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已经被简化为地主、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和工人这三个现代阶级，而一切中间阶层都已被消灭的前提下，才能最完全地达到近似的实现。这种情形甚至在英国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们决不会让它发展到这个地步。

2.利润（包括地租）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构成的：

（a）由欺诈而来的利润，它在代数和中互相抵销；

（b）由于库存货物（例如，当第二年歉收时，上一年收成的余额）的价值上涨而来的利润。这种利润如果不是已经被其他商品的价值下降所抵消，在理论上归根到底也应该平均化，因为，不是买进的资本家必须多支付的正好等于卖出的资本家多取得的，就是当问题涉及工人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工资终究必须提高。可是，这种价值上涨的最本质的东西不是长期存在的，因而平均化只是在几年的平均数中，而且是十分不完全的，显然要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才会出现；工人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十足的报酬；

（c）剩余价值的总和，但是其中还要扣除送给买主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在危机时期，那时过剩的生产会缩减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实际含量以内。

由此就已经自然地得出结论，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只能近似地符合。而且您还要考虑到，总剩余价值和总资本都不是常数，而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变数。于是，很明显，利润率由$\frac{\sum m}{\sum(c+v)}$来表现，要不是通过一个近似的数列，是完全不可能的；总价格和总价值的符合，要不是经常趋于统一而又经常与这种统一背离的符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还是在其他一切场合都是如此。

难道封建主义曾经和它的概念相符合吗？它在西法兰克王国[593]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594]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难道说，因为这种制度只是在巴勒斯坦有过短暂的十分典型的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也只是在纸上，它就是一种虚构吗？

或者，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因为它们决不是永远和现实相符合，就都是虚构吗？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现实相符合。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鱼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鳃呼吸 如果不突破这个概念,您想怎么能从鱼转到两栖动物呢？而这个概念已经被突破了，我们知道一系列的鱼，它们的鳔已经发展成肺并且可以呼吸空气。如果不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和现实发生冲突，您想怎么能从卵生的爬行动物转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儿的哺乳动物呢？实际上，单孔目动物有整整一个亚纲是卵生的哺乳动物，——1843年我在曼彻斯特看见过鸭嘴兽的蛋，并且傲慢无知地嘲笑过哺乳动物会下蛋这种愚蠢之见，而现在这却被证实了！因此，但愿您对价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吧！

在桑巴特那篇在其他方面都很好的关于第三卷的文章[①]中,我也发现了这种削弱价值理论的倾向；他显然也曾希望得到一种稍微不同的答案。

而您在《中央导报》[595]上发表的那篇文章[②]却很好，对于马克思的利润率理论——由于它的量的规定性——同旧经济学的利润率理论之间的特殊区别作了很好的论证。那位著名的洛里亚自作聪明，认为第三卷中直接抛弃了

[①] 威·桑巴特《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体系》。——编者注

[②] 康·施米特《<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

价值理论[1]，您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很完备的回答。现在有两个人很关心这个问题，这就是罗马的拉布里奥拉和正在《社会评论》上同洛里亚进行论战的拉法格[596]。因此，如果您能把文章寄一份给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教授（他的地址是罗马维克多-艾曼努尔大街251号），那么他会尽一切可能发表这篇文章的意大利文译文；另外再寄一份给保尔·拉法格（他的地址是法国塞纳省勒佩勒），这会给他提供必要的论据，他会引用您的文章的。我已经就此写信告诉他们两人，说您的文章已包含了对主要论点的现成的答案。如果您无法寄发这两份东西，请您来信告诉我。

我必须就此搁笔，否则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写下去。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1] 阿·洛里亚《卡尔·马克思的遗著》。——编者注

注释

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这部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的历史，揭示了原始社会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阐明了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弄清了各个不同社会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剖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证明了国家由阶级产生，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必然消亡。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恩格斯在 1884 年 3 月底至 5 月底这两个月内写成的。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 1880 年到 1881 年间对美国科学家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含有马克思的许多批语和马克思自己的论点，以及其他补充材料。恩格斯研究了这个摘要以后，确信摩尔根这本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两人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充分利用马克思的批语以及摩尔根这本书中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恩格斯在第 1 版序言中把这称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恩格斯充分利用了马克思的摘要和批语以及对摩尔根著作的结构的改造，而且以自己对希腊和罗马、古代爱尔兰、古代德意志人等等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51—369、478—538 和 539—599 页）以及其他著作大大扩充了研究的范围。

起初恩格斯打算把自己的著作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见注 3）上，但是后来考虑到当时德国正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是便又放弃了这个计划。1884 年 10 月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苏黎世问世。1886 年和 1889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该书第 2 版和第 3 版，实际上是苏黎世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尚未售出的《起源》，狄茨把它们买到手以后对封面作了相应改动并加印了一张新的扉页，先注明 1886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后又注明 1889 年斯图加特第 3 版，然后拿到德国出售。本书的第一批外文译本（波兰文译本、罗马尼亚文译本和意大利文译本）于 1885 年出版，其中意大利文译本是经恩格斯亲自审定的。此后恩格斯还审定了 1888 年出版的丹麦文译本。第一个塞尔维亚文译本也于 80 年代末出版。

1890 年，由于积累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恩格斯便着手准备出版本书的新版。在新版准备过程中，他研究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最新文献，其中包括俄国科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对原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并且考虑到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成就，特别对《家庭》这一章作了重要的补充。恩格斯经过修改和补充的《起源》第 4 版，于 1891 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在第 4 版中所作的最重要的改动，在本卷脚注中都作了说明。

恩格斯生前 1892 年和 1894 年《起源》还出版了第 5 版和第 6 版，它们都是第 4 版的翻印。

《起源》首次被译成法文（1893 年，根据第 4 版译出的译文由劳拉·拉法格校订，并经恩格斯审阅）、保加利亚文（1893）、西班牙文（1894）和俄文（1894）；本书到 1902 年才用英文出版。——1。

2　这篇序言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4 版出版以前，经作者同意，曾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

发表在 1891 年《新时代》杂志第 41 期。恩格斯的《起源》1891 年以后以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的各种版本，都收有这篇序言。——4。

3　《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 年至 1890 年 10 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 1923 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 1883 年至 1917 年 10 月是卡·考茨基，从 1917 年 10 月至 1923 年秋是亨·库诺。1885—1894 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从 90 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424、661、662、728。

4　这段引文摘自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86 年伦敦—纽约版第 124—125 页。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最先于 1865 年在爱丁堡出版单行本，而收有《原始婚姻》的《古代史研究》第 1 版于 1876 年在伦敦出版。恩格斯在下面也提到这一版本。——10。

5　马加尔人过去是一个部落，现在是居住在尼泊尔西部地区的一个民族。——10。

6　路·亨·摩尔根的 14 封《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在纽约的《美国评论》杂志 1847 年 2—12 月第 2—12 期，他的著作（Ho-dé-no-sau-nee 或易洛魁联盟》1851 年在罗切斯特出版。——10。

7　恩格斯曾经同爱德华·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马在 1888 年 8—9 月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这次旅行的途中观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534—536 页。——16。

8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19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31332 页）。——18。

9　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是原居住在新墨西哥（今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他们的村庄是一些木箱形的房屋，彼此上下和左右相连，融成一体，可容纳上千人。因西班牙殖民者称这些宅居群为 pueblo（意为人民、村庄、公社）故而得名。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同属史前阿纳萨齐人的有史时期的后裔，但语言并不相同，有四大语系。他们按居住地分为东西两支，东支有较发达的农业，能种植多种农作物，并具有灌溉系统，掌握复杂的建筑术，水平较高，已接近阶级社会；西支则仍保留氏族制度。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一般指印第安人的村庄；在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中，被用作美国西南部部落集团的总称。——21、92。

10　这里的海盗是指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扰害英国、法国、南意大利、俄国等国沿海地区的半商海盗。——23。

11　恩格斯指的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23。

12　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435 页。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53—354 页）写道：“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

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

从“反之，亲属制度……”开始，一直到这段结束，旁边有用红笔划的线；“一般都是如此”下面有用红笔划的线。——26。

13　阿·日罗-特隆在《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 年日内瓦—巴黎版第 XV 页的脚注中援引了索绪尔本人的这种提法。——29。

14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留传下来。但恩格斯在 1884 年 4 月 11 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了这封信：“如果杜西能把信找到，书中还将包括马克思对理·瓦格纳的批评；这里有何联系，请您自己去想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36 页。）——33。

15　指理·瓦格纳的大型组歌剧《尼贝龙根的戒指》的歌词，这部歌剧是作曲家瓦格纳根据斯堪的纳维亚史诗《艾达》（见注 16）和德国史诗《尼贝龙根之歌》写成的。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剧：《莱茵的黄金》、《瓦尔库雷》、《齐格弗里特》和《神的灭亡》。这句歌词引自《瓦尔库雷》的第 2 幕。《尼贝龙根之歌》是根据民族大迁徙时期（3—5 世纪）的古代德意志神话和传说创作出来的德意志民间英雄史诗。这部叙事诗是在公元 1200 年左右形成的，作者不详。——33。

16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13 世纪时的手稿，1643 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 13 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斯土鲁森所编的古代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厄革斯德列克》是《老艾达》诗歌集中属于较晚时期的歌词之一。恩格斯在这里引的是这首诗歌的第 32 和 36 节。——34。

17　亚萨神和瓦那神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两类神。《英格林加传说》是中世纪冰岛诗人和编年史家斯·斯土鲁森所著关于挪威国王（从远古到 12 世纪）的《地球》一书中的第一个传说，该书是作者在 13 世纪上半叶根据有关挪威国王的历史记述以及冰岛和挪威的氏族传说编写成的。恩格斯引的是第一个传说的第 4 章。——34。

18　巴霍芬的观点见他的《母权论》1861 年斯图加特版第 XXIII 页。马克思的话引自《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65 页）。——37。

19　凯撒关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布列吞人的婚姻情况，见他的《高卢战记》第 5 卷第 14 章。——37。

20　《印度的居民》（六卷集），由约·福·沃森和约·威·凯于 1868—1872 年在伦敦出版。下面的引文，见该书 1868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85 页。——38。

21　指的是婚姻等级或组别，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部落都分成二至四个等级或组别。每一组别的男子只能与另一个一定的组别的女子通婚；这种制度把婚姻限制在近亲之间——38。

22　法伊森和豪伊特多年研究澳大利亚群婚制共同取得的研究成果，载于洛·法伊森和阿·威·豪伊特《卡米拉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1880 年墨

尔本—悉尼—阿德莱德—布里斯班版）一书。——40。

23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459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63 页）——44。

24　这段引文出自阿·莱特 1874 年 5 月 19 日写给摩尔根的信，这封信曾全文发表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默纳沙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杂志（新辑）1933 年第 1 期第 138—140 页。恩格斯转引自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455 页（摩尔根指明该信写于 1873 年），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摘录了这段引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61 页）。——46。

25　见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565 页。恩格斯在《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一书摘要》第 10 页上写道“……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目的是不加区别地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古老的，是通过脱离了平日生活的旧习俗来重温往昔岁月的部落集团）第 565 页。”恩格斯在 1883 年 2 月 10 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也提到班克罗夫特谈到的加利福尼亚居民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432 页）。——46。

26　沙特恩节是古罗马每年冬季农事结束后举行的纪念农神沙特恩的节日。节日从 12 月 7 日开始，起初为一至三天，后来延长到五至七天。在节日期间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饮；奴隶也可以参加沙特恩节，允许他们与自由民同席。在沙特恩节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遂成了表示纵情欢乐的盛宴狂饮的普通名词。——47。

27　指 1486 年 4 月 21 日的所谓《瓜达卢佩诏谕》，它是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在加泰罗尼亚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以起义农民和封建主之间的仲裁人的身分作出的裁决，因国王召见农民和封建主代表的地方得名。裁决规定不得再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且取消封建主裁判权和一些羞辱性的封建习俗，其中包括初夜权；为此农民必须付出大量的赎金。——49。

28　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67 页）。——53。

29　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69 页）。——54。

30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465—466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64 页）。——54。

31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470 页，这段引文及马克思的补充，参看《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66 页）。——55。

32　扎德鲁加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大家族，由同一父亲的若干后代及其妻子儿女组成的家庭公社（20—30 人）；共同生产，共同消费。19 世纪后半期逐渐解体。——55。

33　见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的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 年莫斯科版第 32—38 页。在这一著作中，柯瓦列夫斯基引用了 1875 年奥尔山斯基和 1878 年亚·雅·叶菲缅科提供的关于俄国的家庭公社的资料。——56。

34　雅罗斯拉夫的《真理》是古俄罗斯的法典《俄罗斯真理》古本第一部分的名称，它是 11 世纪上半叶在当时的习惯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既有封建权利的法规也有原始公社制度下形成的古老法规。它反映了 11—12 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56。

35　达尔马提亚法典，又称波利察法规，是一部刑法、民法、诉讼法的汇编。15—19 世纪初在波利察（历史上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一直有效。——56。

36　正文中提到的奈阿尔科斯的报道，见斯特拉本《地理学》第 15 卷第 1 章。——57。

37　Calpullis（卡尔普里）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他们被西班牙人征服时期的家庭公社；每一个家庭公社的全体成员都有着共同的世系，家庭公社占有一块公共的土地，土地不得让渡，也不得在继承者之间分配。阿·德·苏里塔在他的著作《关于新西班牙的各类首领、法律、民俗、被征服前后确定的赋税等等的报告》中记述了 calpullis，这一著作载于《有关美洲发现史的游记、报告和回忆录原本，由太诺-孔庞策一次用法文发表》1840 年巴黎版第 11 卷第 50—64 页。——57。

38　指发表在 1890 年 10 月 20 和 27 日、11 月 3 日《外国》杂志上的亨·库诺《古秘鲁的农村公社和马尔克公社》一文。

《外国》是 1828 年至 1893 年出版的关于地理学、民族学和博物学问题的一家德国杂志，最初是日刊，在奥格斯堡出版。从 1853 年起改为周刊，从 1873 年起改在斯图加特出版。——57。

39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而对奥林波斯山的女神们的态度，则反映了对妇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势力的地位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68 页）。——59。

40　见普卢塔克《斯巴达妇女的格言》第 5 章；并见格·弗·舍曼《希腊的古迹》1855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268 页。——61。

41　斯巴达人是古斯巴达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黑劳士是被斯巴达征服的南伯罗奔尼撒的农民，属于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黑劳士属于国家，并隶属于斯巴达人的土地，他们耕种斯巴达人个人使用的土地，向斯巴达人交纳国家规定的地租（约占收成的一半）。但黑劳士既不能被买卖也不能被滥杀。——61。

42　见希罗多德《历史》第 8 卷第 104 和 105 章；并见威·瓦克斯穆特《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30 年哈雷版第 2 部第 2 篇第 77 页。——62。

43　恩格斯引用的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未保留下来的 10 页上的一句活。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类似的思想（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82 页）。——63。

44　庙奴是古希腊和希腊殖民地中属于神庙的男女奴隶。在许多地方，包括小亚细亚和科林斯，女庙奴都在神庙中从事卖淫。——64。

45　见阿米亚努斯·马尔采利努斯《历史》（三十一卷集）第 31 卷第 9 章；并见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阿斯《同哥特人的战争》第 2 卷第 14 章（《查上丁尼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第 6 卷）。——67。

46　普罗旺斯爱情诗是指 11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法国南部的行吟诗人们的诗歌。——68。

47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沙·傅立叶的话，见傅立叶的著作《关于普遍

统一的理论》第 2 版第 3 卷；《傅立叶全集》1841 年巴黎版第 4 卷第 120 页；这部著作第 1 版称作：《论家务农业协作》1822 年巴黎—伦敦版第 1—2 卷。——69。

48　《古德龙》又称《库德龙》，是 13 世纪德国的一部叙事诗。13 世纪上半叶形成，作者不详，在 16 世纪的一部手稿中保存下来，直到 19 世纪初才被发现。——76。

49　见亨·萨·梅恩的《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现代观念的关系》1866 年伦敦第 3 版第 170 页。——78。

50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491—492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75 页）。——82。

51　克兰即氏族，在克尔特民族中，除指氏族外偶尔也指部落；在氏族关系解体时期，则指一群血缘相近且具有共同想象祖先的人们。克兰内部保存着土地公有制和氏族制度的古老习俗。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一直存在到 19 世纪。——84、131。

52　萨姆是马加尔人（见注 5）的血缘团体的叫法，参看摩尔根《古代社会》1977 年商务印书馆版下册第 359 页。——84。

53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85—86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16 页）。——87。

54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115 页；并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36 页）。——90。

55　格·路·毛勒的主要著作有：《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权力的历史概论》1854 年慕尼黑版、《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 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 年埃朗根版第 1—4 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 年埃朗根版第 1—2 卷和《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 年埃朗根版第 1—4 卷。——94。

56　“中立民族”指 17 世纪居住在伊利湖北岸的几个与易洛魁人血缘相近的印第安部落所组成的军事联盟。这个名称是法国殖民者加上的，因为它在易洛魁人和古朗人的战争中保持了中立。——95。

57　指祖鲁人和努比亚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

1879 年 1 月英国人向祖鲁人进攻，祖鲁人在自己的领袖开芝瓦约的领导下非常顽强地抵抗了英国殖民军达半年之久。后者只是由于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巨大优势而在经过一系列战斗之后才取得胜利的。直到 1887 年，英国人由于利用了他们在祖鲁人中间挑起的连续几年的部落混战，才得以最后征服祖鲁人。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入苏丹，遇到苏丹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1881 年爆发了以穆斯林传教主穆罕默德-阿罕默德（他自称“马赫迪”，意即“救世主”）为首的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于 1883—1884 年获得胜利，从英国殖民军手中解放了几乎全部国土。在起义的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只是到 1899 年，英国殖民军利用这个国家因连年打仗和发生部落纷争而内部削弱之机，同时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才征服了苏丹。——95、458。

58　见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54—55 页，并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96—497 页）。——98。

59　指狄摩西尼在法庭上反驳欧布利得的演说词。在这个演说词中提到在氏族墓地只能埋葬本氏族死人的习俗。——98。

60　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97 页）。——98。

61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狄凯阿尔科斯的没有留传下来的著作中的片断，引自瓦克斯穆特的著作《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26 年哈雷版第 1 部第 1 篇第 312 页。——99。

62　见威·阿·贝克尔《哈里克尔。古代希腊习俗状况。对希腊人的私生活的较详细的介绍》1840 年莱比锡版第 2 部第 447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98 页）。——99。

63　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0 页）。——100。

64　见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66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1 页）。——100。

65　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2 页）。——100。

66　见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60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3 页）。——100。

67　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3—504 页）。——101。

68　见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58—59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5 页）。——101。

69　见荷马《伊利亚特》第 2 首歌，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6 页）。——102、105。

70　指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第 3 册第 1 章。见该书 1864 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 146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6—507 页）。——102。

71　见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古代罗马史》第 2 册第 12 章，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8—509 页）。——103。

72　见埃斯库罗斯《七雄攻打忒拜》，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08—509 页）。——103。

73　见格·弗·舍曼《希腊的古迹》1855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27 页，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10 页）。——103。

74　指威·尤·格莱斯顿《世界的少年时代。英雄时代的神和人》第 11 章，见该书 1869 年伦敦版第 428 页。这本著作的第 1 版于 1869 年在伦敦出

版。——104。

75　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10 页）；摩尔根的这段话引自《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248 页。——104。

76　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11—512 页）。——105。

77　见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1 卷第 13 章，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13 页）。——106。

78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3 篇第 10 章，并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13 页）。——106。

79　公元前 477 年通过的选举资格法，允许雅典公民第四阶级，即最低阶级自由的贫民担任民政职务。一部分历史学家曾认为这是从亚里斯泰迪兹时期开始的。——114。

80　指麦特克，即在古希腊城邦定居的外来移民。他们虽有人身自由，但没有雅典的公民权利。他们不能参加人民大会，担任公职和占有不动产，不许和雅典公民通婚等，可以从事手工业、商业等职业并参加祭祀庆祝活动，必须交纳特别的捐税和服兵役，但必须有全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的保护人，在法庭上也只能由全权公民代为辩护。公元前 5—4 世纪，麦特克成为阿提卡的城市人口中重要的部分，在阿提卡的经济生活，尤其是贸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15。

81　克利斯提尼革命指公元前 510—507 年雅典平民反对旧氏族贵族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领袖是阿尔克梅奥尼德氏族的代表克利斯提尼，结果推翻了贵族的统治，并实行了目的在于消灭氏族制度残余的改革。——115。

82　公元前 560 年贫困破产的贵族氏族的代表庇西特拉图夺取了雅典的政权，建立了个人统治的制度即僭主政体。这种制度除去在庇西特拉图去世（公元前 527 年）前曾两次被逐出雅典而有过中断以外，一直存在到公元前 510 年他的儿子希庇亚斯被逐为止，此后不久，在雅典便建立了以克利斯提尼为首的奴隶主民主派的统治。庇西特拉图的旨在保护中小地主的利益反对氏族贵族的活动，没有引起雅典国家政治结构的重大改变。——118。

83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习惯法的解释权原先操于贵族手中，在平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以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为首的十人委员会（十人团）编制法律，公元前 451 年编出十表，次年又成立新的十人委员会，再编两表，先后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公布，故而得名，原物已散失，仅在拉丁作家文集中保存下来不完整的法律条文。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国家的形成过程。十二铜表法是后来罗马法以及欧洲法学的渊源。——119。

84　公元 9 年，在条顿堡林山会战中，阿尔米纽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起义军歼来灭了三个罗马军团,罗马军队的统帅普卜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 鲁斯自杀身亡。

构成罗马人名的中间部分是表明其氏族属性的原名，由此可以推断瓦鲁斯是昆提利氏族的成员。——119。

85　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 451 年和 450 年被选进十人委员会（十人团），委员会受托制定法律，即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在此期间，委员

会享有充分权力，在期满以后，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同十人团的其他人一起企图把委员会的权力延长到公元前449年；但是十人团尤其是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专横和暴力引起了平民的起义，结果十人团被推翻；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就死在那里。——120。

86　布匿战争是古代地中海地区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三次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18—201年，以迦太基的失败而告终。——120。

87　这里恩格斯再次引用马克思关于希腊氏族的意见，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97页）。——121。

88　胡施克关于被释奴婢没有特别许可不得在氏族以外结婚的这段话，见他的学位论文《关于元老院决议赋予费策妮娅·希斯帕拉的特权（《李维全集》第39卷第19章）》1822年格丁根版。——124。

89　巴·格·尼布尔《罗马史》（三卷集）1827年柏林修订第2版第1部第352页。恩格斯的这段话转引自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15页的脚注。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18—419页）。——125。

90　见泰·蒙森《罗马史》1881年柏林第7版第1卷第62—63页。该书第1卷第1版于1854年在莱比锡出版。——126。

91　杜罗·德拉马尔的计算，见他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39及以下几页和第448页。该卷卷末附有新旧度量衡以及货币单位比较表。——128。

92　“德意志人”过去译为“日耳曼人”。在我国习惯上，“日耳曼人”是指中古以前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是指那以后的德意志人。但在德文中和恩格斯著作中，却没有这样的区别。恩格斯在本卷第89—90页指明：“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本篇中所用的“德意志人”、“德语”、“高地德意志语”、“德意志国家”等词，都译为“德意志”，不再一一加以区别。恩格斯在个别地方使用日耳曼一词的，则依原文译为“日耳曼”。——129。

93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编第15章（《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阐述得比较简单，于是恩格斯决定撰写这一章。

摩尔根在上述第15章中还扼要地对其他各民族的氏族发表了看法。马克思在他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编第15章《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66—571页）中完全略去了摩尔根的这些探讨。除一小段关于克尔特人的摘录外，他集中摘记了日耳曼人氏族的材料，同时根据凯撒和塔西佗著作的拉丁文版本核对了摩尔根所引用的资料，在核对过程中又摘录了比摩尔根更多的原始资料。恩格斯在论述日耳曼人时使用了马克思搜集的原始资料。至于克尔特人，他可能依据了他自己在1869年至1870年间写的《爱尔兰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3—571页）；在论述日耳曼人时，他利用了自己的《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478—538和539—599页）等著作。——129。

94　威尔士在 1283 年被英格兰人征服，但在这以后继续保持自治；到 16 世纪中叶它才完全并入英国。——130。

95　1869—1870 年，恩格斯着手编写一部长篇历史著作《爱尔兰史》。为此他曾开列了一个多达 150 余种图书的有关爱尔兰的书目，从这些著作中作的摘要共有 15 本，此外还有札记、单页资料、剪报等准备材料。但是 1870 年 7 月开始出现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迫使恩格斯中止写作，这部未完成的《爱尔兰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523—571 页。后来，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恩格斯利用了这些准备材料和研究成果。这里谈到的有关威尔士法律的摘要，是指他当时对安·欧文受官方委托于 1841 年出版的历史资料集《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一书所作的摘要，见恩格斯 1870 年 7 月 6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511 页）。——130。

96　1891 年 9 月 8 日至 23 日，恩格斯同玛丽·艾伦·罗舍和路·考茨基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作了一次旅行。

由于恩格斯在 1891 年 9 月底拿到最后的清样，所以这个注是后来加上的。——132。

97　1745—1746 年苏格兰山民举行起义，反对英格兰—苏格兰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夺地运动。苏格兰高地的一部分贵族，为了保存封建宗法的氏族制度，并支持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代表对英国王位的要求，而利用了山民的不满。起义失败的结果，造成了苏格兰山地氏族制度被彻底破坏，并加剧了剥夺苏格兰农民的土地的进程。——133。

98　见凯撒《高卢战记》第 6 卷第 22 章。——134。

99　阿勒曼尼亚法典是从 5 世纪起占有现在的阿尔萨斯、瑞士东部和德国西南部的阿勒曼尼亚（阿拉曼尼亚）德意志部落联盟的习惯法汇编；这一法典产生于 6 世纪末 7 世纪初和 8 世纪。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阿勒曼尼亚法典》第八十一（八十四）条。——134。

100　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 年莫斯科版和《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 年斯德哥尔摩版。——135。

101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这部英雄史诗，是 8 世纪古代德意志叙事诗文献，保留下来的是一些片断。——136、163。

102　指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 4 卷第 34、43—44 章。——137。

103　《Vóluspâ》（《女预言者的预言》）是《老艾达》（见注 16）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描述了世界从创始到毁灭及其再生——和平与公正的胜利。接下来引述的两行诗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这两行诗的德译文是恩格斯译的。——138。

104　安·克·班格《女预言者的预言和西维拉的卜辞》1879 年版和索·布格《斯堪的纳维亚关于神和英雄的传说的起源问题探讨》1881—1889 年克里斯蒂安尼亚版。——138。

105　齐维利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和高卢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在 69—70 年（有些史料认为发生在 69—71 年），由增加赋税、加紧募兵和罗马官吏的胡作非为所引起的这次起义，席卷了高卢和被罗马统治的德意志地区的大部分，使罗马有失去这些地区的危险。起义者起初获得了一些胜

利，之后却遭到了几次失败，最后被迫同罗马媾和。——139。

106　《Codex Laureshamensis》（《洛尔希寺院文书》）是授予洛尔希寺院的证书和特权的副本集子。洛尔希寺院是 764 年在法兰克王国建立的，距沃尔姆斯城不远，它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大封建领地。《洛尔希寺院文书》于 12 世纪编成，它汇集了有关特权和馈赠的各类寺院档案证书 3836 份。其中 2700 份是涉及 8—9 世纪的档案，它是关于德国西南部农民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史料之一。——142。

107　见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朗德《奖赏》第 6 卷第 6 章。——150。

108　采邑（beneficium，字面意思是“恩赐”）是 8 世纪上半叶在法兰克王国盛行的一种赏赐土地的形式。一块块的土地连同居住在土地上的依附的农民一起以采邑的形式授予领用人（采邑主）终身享用，条件是要完成一定的多半是军事性的义务。在领用人或采邑主死亡，或未完成义务以及田园荒芜的情况下，采邑就应当归还给原主或他的继承人，若要恢复采邑关系，就须第二次赏赐。实行分配采邑的不仅有王权，教会，而且还有豪绅巨富。采邑制度促进了封建主阶级、特别是中小贵族的形成，使农民群众处于更加受奴役的地位，同时促进了藩属关系和封建等级制的发展。后来采邑变成了世袭封地。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这篇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539—599 页）中揭示了采邑制度在封建制度形成史上的作用。——153。

109　郡守是法兰克王国担任州郡领导的王室官吏。每一个郡守在自己的区域内都享有司法权，可以征税和管辖军队，并在出征的时候统率军队。郡守在任内可以享有王室在该郡的收入的三分之一，并获得赏赐的土地作为酬劳。后来郡守逐渐由王室委派的官员变成了大封建领主，拥有自主权，特别是在 877 年以后，正式建立了郡守官职的世袭制。——154。

110　指 9 世纪编成的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地产登记册（地产、人口和收入登记册），以《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地产登记册》的名称而闻名。恩格斯从地产登记册中引用的材料大概载于保·罗特《远古至十世纪采邑制度史》1850 年埃朗根版第 378 页。——154。

111　安加利是罗马帝国中派给居民的义务，规定居民必须提供马匹和挑夫为政府运输；后来范围更加扩大了，成为居民的沉重负担。——154。

112　依附制度是从 8 至 9 世纪起在欧洲盛行的农民受封建主“保护”，或者小封建主受大封建主“保护”的形式之一，接受保护要履行一定的条件，即为“保护人”服兵役和其他徭役，并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保护人”，然后以有条件地占有的形式领回这些土地。这对于那些迫于暴力而不得不如此做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人身自由的丧失，而对于小封建主来说，则意味着处于大封建主的藩属的地位，因而依附制度一方面促使农民沦入受奴役的境地，另一方面巩固了封建等级制度。——156。

113　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 3 版；《傅立叶全集》1846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220 页。——157。

114　1066 年 10 月 14 日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黑斯廷斯附近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了战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由于在自己的军事组织中还保持着公社制度的残余，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原始的，因此被击败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战死，而威廉则成了英国国王，称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威廉一世。——163。

115　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22 页）。——165。

116　迪特马申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地区，曾是自由民的一个要塞。自由民曾长期保留公社制度，反抗德国和丹麦封建主的征服。从 12 世纪中叶起迪特马申的居民逐渐取得独立。旧的地方贵族到 13 世纪事实上已经消失，在独立时期迪特马申仍是自治的农民公社的总和，这些农民公社的基础在许多地方都是旧有的农民氏族。到 14 世纪，迪特马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转归三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 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和荷尔斯泰因公爵约翰和阿道夫的军队摧毁了迪特马申居民的反抗，胜利者瓜分了这个地区。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马申一直保存到 19 世纪下半叶。——170。

117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257 和 360 节。该书第 1 版于 1821 年在柏林出版。——170。

118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第 2 部：《罗马和日耳曼继承权在历史—哲学发展中的实质》。该书第 1 版于 1861 年在莱比锡出版。——177。

119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 年 6 月 1 日至 1849 年 5 月 19 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 年 5 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 301 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80、204、401、506。

120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是恩格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294）撰写的。——180。

121　二月革命是指 1848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 1848 年 2 月 22—24 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180、197、484。122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 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 1836 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 1847 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 年 6 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

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 1848 年 2 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 1848 年 2 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 3 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 年 3 月下半月到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3 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3—5 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 119）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 1849—1850 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 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 年 9 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 年 5 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 年 11 月 17 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 190—210 页。——180、720。

123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仑法典，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 1804 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即 1804—1810 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 1815 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卷第 253 页）。——183、702。

124　德国学生、民主主义者古·阿·施勒弗尔 1848 年三月革命后曾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报，由于 4 月 19 日在该报第 5 号上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抨击私有资产，捍卫劳动群众的权利，他在 1848 年 4 月受审，并以教唆暴动的罪名被判处六个月要塞监禁。——183。

125　《十字报》是《新普鲁士报》的别名（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 年 6 月至 1939 年在柏林出版，该报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184、568。

126　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14—18 页）。——185。

127　指载于《新莱茵报》（见注 119）的许多篇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林国民议会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马克思之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和第 6 卷）；这一批评也以概括的形式见之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482—578 页）。——186。

128　《人民之友》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89 年 9 月 12 日至 1793 年 7 月 14 日由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让·保尔·马拉在巴黎出版；该报于 1789 年 9 月 16 日至 1792 年 9 月 21 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报上有这样的题字：Marat，l’Ami du Peuple（马拉，人民之友）。——186。

129　指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153—157 页）。——183。

130　1848 年 2 月 24 日是法国路易-菲力浦君主制被推翻的日子。1848 年俄历 2 月 24 日（公历 3 月 7 日），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二月革命（见注 121）胜利的消息以后，向陆军大臣发布了在俄国实行部分动员的命令，准备对付欧洲的革命。——187。

13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于 1849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25 日发表在《新莱茵报》（见注 119）第 252、255、256、258、264、270—272 和 281 号。1886 年，这些文章略经修改后，由恩格斯作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77—289 页）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61—106 页）中对这些文章作了详细的评述。——187。

132　红色雅各宾帽，即弗利基亚帽，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的一种红色尖顶帽。后来在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从此它就成了自由的象征。——188。

133　《科隆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 1802 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隆出版；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见注 119）。——189。

134　1849 年 6 月 13 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 月 13 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189、205。

135　关于恩格斯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中的一员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一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127—235 页）。——189。

136　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是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57—536 页）德文第 3 版而写的引言，第一次载于 1885 年 11 月 12、19 日和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294）第 46、47 和 48 号，并收入 1885 年 11 月下半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在这本书中，除了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外，还包括：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726—734 页），马

克思给这本抨击性著作德文第 2 版写的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624—627 页），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850 年 3 月和 6 月的告同盟书（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364—375 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59—366 页）。——190。

137　《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上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下册的内容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190。

138　巴贝夫主义是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18 世纪末由法国革命家弗·诺·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创立。主张用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共和国。——191。

139　四季社是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革命团体，1837—1839 年在巴黎进行活动。1835 年，布朗基等人建立了家族社，1837 年改组为四季社。其目的是以暴力推翻现存的金融贵族政权，运用少数革命家的专政，建立共和国，实现社会平等。1839 年 5 月 12 日发动了巴黎武装起义，占领市政厅。起义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但没有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当天即被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布朗基等被捕，四季社亦不复存在。——191。

140　沙佩尔在 1839 年 5 月 12 日起义后立即被捕，经过七个月监禁后被逐出法国；鲍威尔仍在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于 1841 年 12 月被逮捕后也被驱逐出境。—— 191。

141　法兰克福袭击岗哨事件是德国民主主义者同维也纳会议后在德国建立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事件之一。 1833 年 4 月 3 日，一群激进分子，主要是大学生，企图通过袭击德意志联邦中央机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在国内掀起变革，宣布成立全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准备得很差的发动被军队镇压了下去。——191。

142　 1834 年 2 月，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组织了他在 1831 年创建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以及一群外国革命流亡者，从瑞士向属于撒丁王国（皮埃蒙特）的萨瓦进军，目的是在那里发动人民起义，以便统一意大利和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意大利共和国；进入萨瓦的部队被皮埃蒙特的军队击溃。——191。

143　蛊惑者指 19 世纪 20 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 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成了镇压这些人的借口。1819 年 8 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这之后“蛊惑者”一词开始流行开来。——191、601。

144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 1840 年 2 月 7 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了协会。从 50 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

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193。

145　魏特林共产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威·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这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40年代中起，魏特林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他自己也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彻底决裂。——193、628。

146　《前进报》是一家德文报纸，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1845年1月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被基佐政府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193。

147　《德法年鉴》是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杂志，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和本选集第1卷第1—16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 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196、578、642。

148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121）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197、720。

149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至1848年2月28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编辑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传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197。

150　《北极星报》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利兹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乔·哈尼也是编辑之一。1843年至1850年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197。

151　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

人协会（见注 148），对民主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 年 11 月 15 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 121）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 1848 年 3 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惩治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已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为更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 1849 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197。

152　《改革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1847 年 10 月至 1848 年 1 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197。

153　指《人民代言者报》，它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46 年 1 月 5 日至 12 月 31 日出版，该报编辑是海·克利盖。——198。

154　指《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3—20 页）。——198。

155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3—5 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 3 月 21 日和 29 日之间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3 月 30 日左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4 月初发表在一系列民主报纸上。《要求》是作为指示性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1848 年 9 月 10 日以前，《要求》在科隆印成了传单，并由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1848 年 10 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措施纲领，这个纲领几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 年 11 月和 12 月在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多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1848 年底或 1849 年初，《要求》在莱比锡也以单行本形式摘要发表。

恩格斯没有全部引用这个文件。——201。

156　指德国工人俱乐部，它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提议于 1848 年 3 月 8—9 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诱工人参加志愿军团打回德国的冒险行径。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203。

157　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斯·波尔恩于 1848 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路线的代表，他把兄弟会的活动局限于组织经济罢工和力图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措施，如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但是，兄弟会的一些经常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的地方分会，在 1848—1849 年革命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 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筹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无产阶级政党时，他们

曾想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 年，政府禁止了兄弟会的活动，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 204。

158　1849 年 5 月 3—8 日在德累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并且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者曾控制了一个主要城区，成立了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赛·埃·奇尔讷为首的临时政府。在起义中起积极作用的有米·巴枯宁、斯·波尔恩和作曲家理·瓦格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累斯顿起义为 1849 年 5—7 月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揭开了序幕。——204。

159　宗得崩德原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 19 世纪 40 年代建立的单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名称来讽刺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方便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于 1852 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203、209、738。

160　指 1849 年 5 月德国一些地方为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 1849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起义，以及 1849 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205。

161　这句话引自 1850 年 6 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61 页）。1885 年，恩格斯在编辑出版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 3 版时，把 1850 年 3 月和 6 月的两个告同盟书都收入该书的附录之中。——206。

162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1849 年 12 月—1850 年 11 月出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 119）的续刊。该杂志从 1850 年 3 月至 11 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 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376—481 页），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127—235、383—483 页），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 1848—1849 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 年 11 月，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刊。——207。

163　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系统的叙述。

这部著作写于 1886 年初，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见注 3）1886 年第 4 期和第 5 期。1888 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斯图加

特出版。恩格斯专门为之写了序言，并在该书附录中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89 年圣彼得堡的杂志《北方通报》第 3 期和第 4 期刊登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俄译文，标题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1890 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波兰文。1892 年，日内瓦劳动解放社全文发表了格·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译文，同年葡萄牙译文面世。1894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月刊《新纪元》第 4 期和第 5 期上登载了劳·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的法译文。1903 年，由美国凯尔出版社发表的英译文，标题为《社会主义哲学的根源》。——211。

164　巴士底狱是 14—18 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从 16 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214。

165　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 1834 年，它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 1833 年）的继续。海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215。

166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该书第 1 版于 1821 年在柏林出版。——215。

167　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一部。逻辑》第 147 节；第 142 节附释。该书第 1 版于 1817 年在海德堡出版。——215。

168　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 1 部第 3 场（《浮士德的书斋》）里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216。

169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 年纽伦堡版。这部著作共分三册：《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和《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218、573。

170　《德国年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简称，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1841 年 7 月—1843 年 1 月，杂志用上述名称出版；以前（1838—1841 年）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的名称出版；1841 年 6 月以前，杂志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负责编辑，1841 年 7 月起由阿·卢格在德累斯顿负责编辑。由于《哈雷年鉴》在普鲁士境内遭到停刊的威胁，编辑部从普鲁士的哈雷城迁往萨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即使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没有出版多久。1843 年 1 月 3 日被萨克森政府查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221。

171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隆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 年 4 月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 10 月起成为该报编辑部成员。《莱茵报》也发表过许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1843 年 4 月 1 日把它封闭了。——221。

172　关于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等描写，见埃·斐·伊姆·特恩的著作《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间》1883 年伦敦版第 344—346 页。——223。

173　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于 1846 年 9 月 23 日发现了海王星。——226。

174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166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 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 2 卷第 308 页。——227。

175　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232、703。

176　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见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 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 1 卷第 407 页。——233。

177　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驳躯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 年莱比锡版第 2 卷第 363 页。——237。

178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254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贫穷操纵并取消所有法律》，见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 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 2 卷第 285—286 页。——237。

179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280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见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 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 1 卷第 409 页。——237。

180　见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280 页。——237。

181　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见他的著作《法哲学原理》第 18、139 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 3 部第 2 篇第 3 章。后面这本著作的第 1 版于 1832 年在柏林出版。——237。

182　这句话摘自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断》，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 年莱比锡版第 2 卷第 411 页。——238。

183　普军在 1866 年奥普战争中萨多瓦一役获胜后，德国资产阶级政论中的流行用语，意思是说普鲁士的胜利似乎是由于普鲁士国民教育制度的优越。这一用语源出《外国》杂志的编辑奥·佩舍尔，他在该杂志 1866 年 7 月 17 日第 29 期上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战争历史的教训》中用了这个用语。——239。

184　指大·弗·施特劳斯的著作《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 年蒂宾根—斯图加特版第 1—2 卷，该书第二部的标题是《基督教教理的物质内容（教义学）》。——241。

185　恩格斯指的是约·狄慈根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纯粹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 年汉堡版。——243。

186　见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 2 部第 2 篇。该书第 1 版于 1837 年在柏林出版。——249。

187　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 4—3 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

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255、464。

188　尼西亚宗教会议是第一次基督教会世界性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约300名主教或代表主教的长老出席。会议针对当时教会存在的“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派的信仰分歧，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三位一体”的信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会议还制定教会法规，以加强主教权力，实为加强皇帝权力，因主教是由皇帝任免的，从此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国教。——255、467。

189　阿尔比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12至13世纪广泛传播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议。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二十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255。

190　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255、558、696。

191　指1688年英国政变（又称“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256、 703。

192　鉴于17世纪20年代起对胡格诺教徒（加尔文派新教徒）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加剧了，路易十四于1685年取消亨利四世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这个敕令曾给予胡格诺教徒以信教和敬神的自由；由于南特敕令的取消，数十万胡格诺教徒离开了法国。——256。

193　小德意志帝国指1871年1月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257。

194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对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最重要成就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念。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多年来对自然科学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恩格斯最初打算写一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者路·毕希纳的论战性著作。这是1873年1月左右的想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2—547页），恩格斯对毕希纳的批判性研究超出了计划中的著作的范围，直接转入《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在以后几年，恩格斯按既定计划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材料是1873—1886年这一时期写成的。整部著作没有写完，并且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

《自然辩证法》的形成史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从计划写这一著作到完成《反杜林论》（1873年初—1878年中）和从《反杜林论》写完后到马克思病逝前（1878年夏—1882年夏）。在前一时期，恩格斯完成几乎所有的札记和关于细节的研究，除原来为别的用途写的文章外，只完成一篇较完整的论文《导言》。在后一时期，恩格斯拟定了未来著作的具体计划，写完了几乎

所有的论文。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由于全力以赴完成《资本论》的出版工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事实上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

《自然辩证法》的材料有四束，并冠以下列标题：《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这种划分显然不是为了立即发表，这里既看不出是按内容划分，也不是严格按写作时间顺序划分。这四束中只有两束（第二束和第三束）有恩格斯编的目录，列出了该束所包括的材料。另两束至今仍无法判定分别包含哪些材料以及材料是如何排列的。

《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还包含了原来不是为这一著作而写的另外一些手稿。这就是：《<反杜林论>旧序》、《反杜林论》三则注释（《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和《最初，凯库勒》）、《<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此外还可能有几篇札记材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6 卷刊出的《自然辩证法》共收入 197 件文字材料，并分别按写作时间顺序和内容编排次序重复发表。后一编排方式的分篇和标题设置，以恩格斯的写作计划为基本依据。本选集采用第二种方式刊出所节选的材料。

全书要目如下：

自然辩证法
1878 年的计划
历史导论
历史的东西
导言
札记和片断
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札记和片断
辩证法作为科学
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规律和范畴
认识
物质的运动形式和各门科学的联系
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
1880 年的计划
运动的基本形式
札记和片断
运动的尺度——功
札记和片断
关于数学
关于力学和天文学
关于物理学
关于化学

关于生物学
自然界和社会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各束手稿的标题和目录

在恩格斯生前，《自然辩证法》的材料没有发表过。在他逝世以后发表了他列入《自然辩证法》的两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于 1896 年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于 1898 年发表在《世界新历画报》年鉴。《自然辩证法》于 1925 年第一次用德文和俄译文对照的形式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5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259。

195 《1878 年的计划》是恩格斯写完《反杜林论》以后，为《自然辩证法》拟定的具体计划，第一次以详细提纲的形式确定了整部著作的结构。该计划可能是 1878 年 8 月下半月或 9 月初写成的，因为里面提到了 1878 年 5—6 月写的《反杜林论》旧序和 1878 年 7 月出版的恩·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此外，这个计划第 11 项提到德国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恩·海克尔和奥·施米特，1878 年 8 月 10 日恩格斯给拉甫罗夫的信中又谈到了同样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315 页）。——259。

196 指埃·杜布瓦-雷蒙于 1872 年 8 月 14 日在德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莱比锡第四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论对自然界认识的界限》；这个报告的第 1 版于 1872 年在莱比锡出版。——260。

197 卡·耐格里关于人的认识永远不具有全知性质的观点，见他于 1877 年 9 月 20 日在德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报告刊载在代表大会《公报》附录中。——260、283。

198 海克尔是自然科学界中持有机械论观点的唯物主义的代表。参看札记《关于“机械的”自然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94—599 页）。——260。

199 原生粒是恩·海克尔对活的原生质的细微粒子的称呼，按照他的学说，其中每一个粒子都是结构极其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并且具有某种初级“灵魂”，即“记忆能力”。

关于“原生粒的灵魂”、关于初级活体中存在着意识的胚胎、关于意识和它的物质基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 1877 年 9 月德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辩论的题目，恩·海克尔、卡·耐格里和鲁·微耳和（在 9 月 18、20 和 22 日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中专门有一章用来维护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回答微耳和的攻击。——260。

200 指鲁·微耳和 1877 年 9 月 22 日在德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在这个报告中微耳和建议限制科学的自由，禁止讲授达尔文主义，恩·海克尔反对微耳和的建议，并出版了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260。

201 关于有机体是“细胞国家”的形形色色的观点，出现在 19 世纪下半叶，按照这种观点，可以把由细胞组成的有机体比作国家，把各个细胞比作单个人。鲁·微耳和在他的《细胞病理学》一书（第 1 版于 1858 年出版）

中提出下述观点，动物个体分解为组织，组织分解为细胞层，细胞层分解为单个细胞，所以归根到底，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见该书 1871 年柏林第 4 版第 17 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个版本的序言中说，“如果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动物个体的统一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的”，这里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著名活动家之一。这个党成立于 1861 年 6 月，在纲领中提出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实现地方自治原则等要求。——260。

202　鉴于有人试图从达尔文的学说中得出社会学的结论，恩格斯计划对他们进行反驳。迫使恩格斯注意这一问题的是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微耳和与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之间的争论（见注 200）。他们对达尔文主义同社会主义运动是否有联系的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同时，恩格斯得知，德国达尔文主义者施米特将于 1878 年 9 月在德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卡塞尔第五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达尔文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报告。这则消息是恩格斯在 1878 年 7 月 18 日《自然界》杂志第 18 卷第 455 期上获悉的。在代表大会后，施米特的报告用《达尔文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以小册子形式发表。恩格斯在 1878 年 7 月 19 日给施米特的信以及同年 8 月 10 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都表示将对有关的言论给以回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311 和 315 页）。——260。

203　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 年不伦瑞克版第 2 分册。关于物理学概念“功”，亥姆霍兹主要是在他的 1862 年的讲演《论力的守恒》（上书第 137—179 页）中谈到的。恩格斯在《运动的尺度——功》这一章中考察了“功”这一范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426—441 页）。——260。

204　《导言》是《自然辩证法》中第一篇较完整的长篇论文，它对以前写成的关于自然界的历史和认识自然的历史的很多札记进行了加工。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这篇《导言》叫作《旧导言》。《导言》中有两个地方使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写作日期。在本卷第 271 页上，恩格斯说：“细胞被发现还不到四十年。”如果留意一下恩格斯在 1858 年 7 月 1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指出发现细胞的大致日期是 1836 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324 页），那么，可得出结论：《导言》是 1876 年以前写的。其次，在本卷第 273 页上，恩格斯写道：“在大约十年前才认识到，无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这里所指的是原虫——最简单的有机体。原虫是恩·海克尔在他于 1866 年出版的著作《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中第一次加以描述的（见注 214）。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导言》约写于 1876 年。《导言》的初稿写于 1874 年底。把上述所有事实加以比较，就可确定《导言》的写作日期是 1875 年底或 1876 年上半年。《导言》的第一部分可能写于 1875 年 11 月或 12 月，第二部分可能写于 1876 年上半年。——260。

205　指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亨·海涅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宗教和哲学史》第 2 册中称这首赞美诗为“宗教改革的马赛曲”。恩格斯在 1885 年 5 月 15 日给施雷特尔的信中重复了海涅的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10 页）。——262。

206　指哥白尼在他临终的那天——1543 年 5 月 24 日（旧历）得到一本

他的刚刚在纽伦堡印好的著作《天体运行》，该著作阐述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263。

207　根据在 18 世纪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燃烧的过程决定于可燃物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它在燃烧时从可燃物体中逸出。但是，由于人们知道，金属在空气中燃烧时重量却增加了。于是主张燃素说的人断言燃素具有一种在物理学上无法解释的负重量。杰出的法国化学家安·罗·拉瓦锡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把燃烧过程正确地解释为燃烧着的物质与氧化合的反应。关于燃素说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旧序》的结尾部分谈到（见本卷第 290 页），并在《资本论》第 2 卷的序言中详加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20－21 页）。——264。

208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 nebula——雾）发展而来的。他在 1755 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见于他的在法兰西共和四年[1796 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 1—2 卷最后一章中。由他生前编好，死后于 1835 年出版的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 6 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 7 个注中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云雾体，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 1864 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 1859 年创造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 年不伦瑞克版第 787、789—790 页。——266。

209　指牛顿在他的基本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 2 版第 3 册的结尾部分《总识》中所表达的思想。牛顿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用重力说明了天体现象和海洋的潮汐。但是我没有指出重力本身的原因。”接着他在列举了重力的某些性质以后，继续说：“至今我还不能从种种现象推论出重力的这些性质的原因，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凡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都应该叫作假说；凡是假说，不管它是形而上学的或物理学的，力学的或隐蔽性质的，都不能用于实验哲学之中。在这种哲学中，一切定理都由现象推论而来，并且用归纳法加以概括。”

黑格尔也注意到牛顿的这种意见，他在《哲学全书》第 98 节附释 1 中指出：“牛顿……直接警告物理学，不要陷入形而上学……”。——267。

210　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利用了威·罗·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 年伦敦第 3 版。第 1 版于 1846 年在伦敦出版。它的基础是格罗夫的讲稿，这些讲稿他曾于 1842 年 1 月在伦敦学院宣读过，此后很快就发表了。——268、328。

211　文昌鱼（Amphioxus）是一种有些像鱼形的小动物，是非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产于许多海洋。

南美肺鱼（Lepidosiren）是肺鱼属的动物，兼有肺和鳃；产于南美。——270。

212　一角鱼（Ceratodus）是一种肺鱼，产于澳洲。

始祖鸟（Archaeopteryx）是一种古生脊椎动物，是鸟类最古的代表，具有爬虫类的某些特征。

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亨·阿·尼科尔森的著作《动物学手册》，该书第1版于1870年出版，恩格斯使用的是1874年以前的某个版本。——270。

213　1759年卡·弗·沃尔弗发表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发育论》，驳斥了预成论，科学地论证了渐成论。

预成是指成熟的机体在胚细胞中预先形成。预成论在17世纪和18世纪生物学家中占统治地位。从预成论的拥护者的形而上学观点看来，成熟的机体的一切部分都已经以紧缩的形式存在于胚胎中，这样一来，机体的发育被归结为已有器官的纯粹量的增长，而本来意义上的发育，即作为新生成（渐成）的发育就不发生了。从沃尔弗到达尔文等许多杰出的生物学家不断论证并发展了渐成论。——270。

214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ωτιβτος——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界。

原虫（来自希腊文μονηρης——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的职能：摄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原虫（最古的原虫）同现代的还存在的原虫区分开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原虫历史地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原虫具有不同的种：Protamoeba primitiva（原变形虫），Protomyxa aurantiaca（原胶胞子），Bathybius Haeckelii（海克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原虫”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于1866年（在他的《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学界确认。目前，曾被海克尔看作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学界所公认——271。

215　恩格斯在这里以及后面利用了下列著作：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第5版和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

恩格斯在《导言》的第二部分使用了他从这两本著作中作的摘录，摘录大概是1876年1—2月做的。——271。

216　加拿大假原生物（Eozoon canadense）是在加拿大发现的一种化石，曾被看作最古的原始机体的遗骸。1878年德国动物学家卡·牟比乌斯否定关于这种化石的有机起源的意见。——273。

217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是这篇论文在第二束材料目录中的标题。它是恩格斯在把《自然辩证法》材料加以分类时列入第二束的。这篇论文的手稿上只有一个《序》字作为标题。而在第一页上面还标有《杜林，科学中的变革》等字样。它是1878年5月或6月初作为《反杜林论》第1版序而写的。但是恩格斯后来又决定用一个较短的序（见本选集第3卷第343—346页）来代替这个原来的序。新序注明日期是1878年6月11日，新序中使用了《旧序》前五段的文字。——281。

218　1876年5月10日，在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周年之际，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英国和法国工业占

领的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展出。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月至9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个事件叫作工业上的耶拿战役，是借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耶拿战役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282、419。

219　指让·巴·约·傅立叶《热的分析理论》1822年巴黎版和萨·卡诺《谈谈火的动力和能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1824年巴黎版。恩格斯后面提到的函数C，见卡诺的著作第73—79页的注释。——290。

220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是写在手稿第一页上的标题。恩格斯后来把它列入第三束，标题是《自然科学和神灵世界》。这篇论文可能最早写于1878年1月，因为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见本卷第299页）谈到弗·策尔纳关于系在桌上的一条线打了几个结的“实验”这个“最近传来的捷报”；策尔纳是1877年12月17日在莱比锡做这些“实验”的。

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在他逝世以后第一次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世界新历画报》年鉴1898年汉堡版第56—59页。——290。

221　指弗·培根《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1622年伦敦版），它是培根计划写但没有写成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科学的大复兴》的第三部分的材料。——291。

222　伊·牛顿以神学为题材的最著名的著作是他逝世六年后于1733年出版的《评但以理书和圣约翰启示录》。

约翰启示录是《新约全书》中的《启示录》，相传为圣徒约翰所著。——291。

223　麦斯默术是一种以关于某种“动物磁力”的理论为基础的医术，以其创立者奥地利医生弗·安·麦斯默（1734—1815）命名。麦斯默术在18世纪末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是降神术的前导之一。——291。

224　19世纪初奥地利医生弗·约·加尔创立颅相学，认为人的大脑的一定部位上生长有各种心理特征的器官，某种心理特性和能力的发展会引起大脑相应部位的发育并使颅骨的相应部位隆起。因此，似乎根据颅骨的外形就可判断人的心理特性。颅相学的结论曾被各式各样的江湖术士包括降神术士广为利用。——291。

225　巴拉塔里亚岛（源出西班牙语 barato——廉价的）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庸·吉诃德》中虚构的一个岛。在该书第2部第45—53章中，唐·吉诃德的侍从桑乔·潘萨被任命为该岛的总督。——292。

226　“I am”是英语动词“to be”（是）的单数第一人称现在式。“We are”，“youare”，“they are”是同一动词的复数形式。——295。

227　《回声报》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68年至1907年在伦敦出版。——296。

228　铊是威·克鲁克斯1861年发现的。

辐射计（“Lichtmühle”——“光转车辐射计”）是一种测量光能的仪器：在一个真空玻璃球内装一根垂直或水平细线，上装几个轻质的小翼，小翼在辐射的作用下旋转，使细线折弯而产生偏向角，用测定偏向角的方法来测量光能。辐射计是1873—1874年由克鲁克斯设计成功的。——296。

229 《灵学家》是英国降神术士的周报，1869 年至 1882 年在伦敦出版；1874 年起用《灵学家报》的名称出版。

下面的引文都引自威·克鲁克斯发表在 1874 年 6 月 5 日《灵学家》上的文章《“凯蒂·金”的最后出现》。——297。

230 指的是彼得堡大学物理学会于 1875 年 5 月 6 日设立而于 1876 年 3 月 21 日结束工作的“神媒现象考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德·伊·门捷列耶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委员会曾要求在俄国传播降神术的人——亚·尼·阿克萨柯夫、亚·米·布特列罗夫、尼·彼·瓦格纳——提供关于“真实的”降神现象的材料。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降神现象发生于无意识的动作或有意识的欺骗，而降神说是迷信。”这个结论曾发表于 1876 年 3 月 25 日《呼声报》上。委员会的材料由德·伊·门捷列耶夫出版，书名是《判断降神术的材料》1876 年圣彼得堡版。——298。

231 恩格斯暗指 1871 年巴黎公社以后在德国特别流行的对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攻击。甚至像微耳和这样的大科学家，以前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也在 1877 年自然研究家和医生慕尼黑代表大会上建议禁止讲授达尔文主义，断言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有紧密的联系，因而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危险的。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 年柏林版第 12 页。——300。

232 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是 1870 年 7 月 18 日在罗马公布的。德国的天主教神学家德林格尔拒绝承认这一教义。美因茨的主教凯特勒最初也反对宣布新教义，但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教义而且变成了它的热烈拥护者。——301。

233 这段话引自托·赫胥黎 1869 年 1 月 29 日给伦敦逻辑学会的信。这个学会邀请他参加降神现象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赫胥黎拒绝了这一邀请，并且发表了许多讽刺降神术的意见。戴维斯的著作《神秘的伦敦》1875 年伦敦版第 389 页引用了这封信。——302。

234 以《毕希纳》为题的这个片断写得比《自然辩证法》所有其他组成部分都早；它是恩格斯第一束手稿中的第一个札记。它似乎是恩格斯计划要写的一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路·毕希纳的著作的提纲。根据这一片断的内容和恩格斯在毕希纳所著《人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72 年底第 2 版）一书页边上所作的批注来判断，恩格斯打算首先批判毕希纳的这一著作。根据威·李卜克内西 1873 年 2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至于毕希纳——你就狠揍吧！”来判断，在此信之前，恩格斯已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卜克内西。因此可以认为，这个片断写于 1873 年 2 月，但也不晚于 5 月 30 日，因为同一天在同一张稿纸上，紧接着写下了札记《自然科学的辩证法》。——302。

235 恩格斯指的是片面地过高评价归纳法的牛顿的哲学观点的局限性和他对假说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所说的“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这句名言中（见注 209）。——303。

236 牛顿不依赖于莱布尼茨并且先于莱布尼茨发现了微积分，莱布尼茨也独立地作出了这个发现，而且使这个发现具有了更加完善的形式。恩格斯写成这个片断后，过了两年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602 页）。——303。

237 《<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是这一片断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

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它原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初稿的四页（第 16、17、18 和 19 页）。在第 16 页的上面写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这个片断属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二章，并且应当紧跟在说明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主要“局限性”那一段后面（见本卷第 229 页）。在最后整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手稿时，恩格斯抽出了这四页，并用另外的内容代替了它（见本卷第 229—231 页），而这一片断的基本内容（论 19 世纪自然科学中的三个伟大发现）则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四章中简略地加以叙述（见本卷第 245—246 页）。因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最初发表在 1886 年《新时代》杂志 4 月号和 5 月号上，所以这个片断的写作日期可以认为是 1885 年底和 1886 年初。这个片断的原稿是从一句话的结尾部分开始写的。这句话的开头部分是根据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原文补全的，补上的部分放在方括号内。——304。

238　这段引文出自费尔巴哈 1846 年写的《从人种学看不死问题》一文（见《费尔巴哈全集》1876 年莱比锡第 3 版第 3 卷第 331 页）。转引自卡·尼·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154－155 页。——307。

239　恩格斯指的是费尔巴哈的箴言（见本卷第 227 页），箴言在费尔巴哈逝世后发表在卡·格律恩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 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 2 卷第 308 页。参看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见本卷第 223—233 页）。——307。

240　指不像过去在牛顿的著作中所表述的那样（见注 209），从旧意义上把“形而上学”了解为一般哲学思维，而是从现代意义上把它了解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308。

241　“陛下，我不需要这种假说”是拉普拉斯对拿破仑问他为什么在《论天体力学》中不提上帝时的回答。——309。

242　恩格斯指的是约·丁铎尔在 187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贝尔法斯特第四十四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开幕词载于 1874 年 8 月 20 日《自然界》杂志第 10 卷第 251 期。恩格斯在 1874 年 9 月 21 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26－127 页）中对丁铎尔的这一发言作了更详细的评论。——310。

243　无知并不是论据，是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 1 部中针对僧侣主义的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讲的一句话，这些人提出“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310。

244　《辩证法》是这篇论文在手稿第 1 页上的标题。在手稿第 5 页和第 9 页（即第二和第三张稿纸开头）的上端边上注有“辩证法的规律”的字样。论文没有完成。它写于 1879 年，但不早于当年 9 月。这个日期是根据下列事实确定的。在论文中引证了罗斯科和肖莱马著《化学教程大全》第 2 卷的结尾部分；这一卷的第 2 部分是 1879 年 9 月初出版的。其次，在论文中一点没有谈到钪的发现（1879 年），如果这篇论文写于 1879 年以后，那么，恩格斯在说到镓的发现时，就不可能不提到钪。——310。

245　周期律是德·伊·门捷列耶夫于 1869 年发现的。在 1870—1871 年，门捷列耶夫详尽地描述了元素周期系中尚缺的一些元素的性质。为了表示这些元素，他建议用梵文数词（例如，“埃卡”——“一”）作为字头加

在该元素所在系列的第一个元素的名称前面。门捷列耶夫所预言的第一元素镓于 1875 年被发现。——316。

246　细颚龙（Compsognathus）是一种已经绝迹的动物，恐龙的一支（鸟臀目），属爬虫类，但就其骨盘和后肢的构造看来很像鸟（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8 年爱丁堡和伦敦第 5 版第 545 页）。——318。

247　恩格斯指的是腔肠动物通过发芽或分裂来进行繁殖。——318。

248　恩格斯指的是雅·格林的著作《德意志语言史》1853 年莱比锡第 2 版第 1 卷第 580 页。恩格斯在他于 1881—1882 年写的专著《法兰克方言》中较详细地谈到法兰克方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564—599 页）。——319。

249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135 节附释：“不应当把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看作动物的各个部分，因为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是四肢和各种器官，它们决不是和它们的统一体毫无关系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但这个解剖学家这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320。

250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126 节附释：“甚至有人还将这种认为物的持存是由独立的质素所构成的理论常常应用于有机生命方面，也是显得不够用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一动物是由骨骼、筋肉、神经等所构成。但很明显，在这里我们用构成一词，与前面所说花岗石是由某些质素构成的，其意义又不相同。因为在花岗石里，各种质素的联合完全不相干，即使不联合在一起，各个质素仍可独立存在。反之，有机体的各部分，各肢节只有在它们的联合里才能存在，彼此一经分离便失掉其为有机体的存在。”——321。

251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117 节附释：“此外，比较的任务既在于从当前的差别中求出同一，则我们不能不认数学为最能圆满达到这种目的的科学。其所以如此，即由于量的差别仅是完全外在的差别。譬如，在几何里一个三角形与一个四角形虽说有质的不同，但可以忽略这种质的差别，而说它们彼此的大小相等。”——323。

252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115 节附释：“于是同一律便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说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这种命题并非真正的思维规律，而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这个命题的形式自身就陷于矛盾，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谓词间的区别，然而这个命题就没有做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323。

253　天数是源于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的一个术语，意即定数、命运、天意。后来在土耳其语及其他语种中被采用。——325。

254　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其中描写了中世纪天主教嘉布遣教士和有学问的犹太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比在辩论中引用了犹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嘉布遣教士对此的回答是：“让《泰斯维斯-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愤怒的拉比愤慨地喊道：“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327。

255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39 节：“经验中诚然呈现出很多甚或不可胜数的相同的知觉，但普遍性与一大堆事实完全是两回事。同样，经验中还呈现许多前后相续的变化的知觉和地位接近的对象的知觉，但是经验并不提供必然性的联系。如果老是把知觉当作真理的基础，普遍性与必然性便会成为不合法的，一种主观的偶然性，一种单纯的习惯，其内容可以如此，也可

以不如此的。”——330。

256　狄多是恩格斯的一只狗的名字，他在1865年4月16日和1866年8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提到这只狗。——331。

257　恩格斯指的是乔·约·罗曼斯对约·拉伯克《蚂蚁、蜜蜂和黄蜂，对群居的膜翅目观察的报告》1882年伦敦版所作的评论。评论的标题为《蚂蚁、蜜蜂和黄蜂》，载于1882年6月8日《自然界》杂志第658期第121—123页。——332。

258　关于逻辑分为三部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与判断分为四类这二者之间的一致性，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第171节附释中是这样说明的：“判断种类的不同是由逻辑观念本身的普遍形式决定的。因此，我们起初得到的是三类主要的判断，这三类是同存在、本质和概念这三个阶段一致的。这三个主要的类中的第二类，根据本质这一分化阶段的性质，本身又有双重性格。”——333。

259　“单称的”、“特称的”、“全称的”（singulär，partikulär，universell）等规定，在这里就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而不同于辩证法范畴“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Einzelnes，Besonderes，All-gemeines）。——333。

260　指歌德和哈勒用诗歌进行的一场哲学争论。1732年阿·哈勒在他的《人的善行的虚伪性》这首诗中断言：“没有一个生灵能够洞悉自然界的内部本质，他若知道自然界的外壳就已经非常幸运了”。歌德1820年在《无疑》和1821年在《最后通牒》中反对哈勒的这个说法，指出自然界是统一的，不能像哈勒那样，把自然界分为不可认识的内核与人可以认识的外壳。关于歌德和哈勒的这一争论，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中两次提到（第140节注释和第246节附释）。——337。

261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80节附释：“太阳服务于行星，一般说来，正如同太阳、月亮、彗星、恒星都只是地球的条件一样。”——339。

262　《耐格里没有能力认识无限》是这个札记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札记批判了卡·耐格里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见注197）中的基本论点的。恩格斯引用耐格里的报告时所根据的版本是：《1877年德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1877年9月》。这个版本很可能是曾出席代表大会的卡·肖莱马送给恩格斯的。——339。

263　1774年约·普利斯特列描述了氧，但他没有想到，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化学元素，而且这一发现将会引起化学中的变革。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写的序言中更详细地谈到这一发现（见本选集第2卷第272页）。——342。

264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3节注释：“从形式上把握普遍并把它和特殊并列起来，它本身也会变成某种特殊；这种并列的办法，即使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事物，也显然不合理和行不通，例如，怎么会有人要水果而不要樱桃、梨和葡萄，因为它们是樱桃、梨和葡萄而不是水果。”——343。

265　这句话引自意大利经济学家斐·加利阿尼的论文《货币论》第2册，引文稍有改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也摘了这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版本是彼·库斯托第编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

155—156 页。——345。

266　恩格斯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数量的那一篇，其中谈到：天文学之所以值得惊奇，并不是由于它与之有关的不可计数的星星和不可度量的时间和空间的恶无限性，而是“由于理性在这些对象中认识到的并且成为与上述不合理无限相对立的合理无限的那些度量关系和规律”（黑格尔《逻辑学》第 1 册第 2 篇第 2 章注释：关于无限进步的最高意见）。——345。

267　“$\frac{1}{r^2}$也是如此”这句话是恩格斯补写上去的。恩格斯可能是指无理数π，它的意义是完全确定的，可是却不能用一个有限的小数或普通的分数来表示。如果取圆面积为一单位，则由公式$\pi r^2=1$可得$\pi=1/r^2$（r 表示圆的半径）。——345。

268　《运动的基本形式》是这篇论文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它是《1880 年的计划》中预计完成的彼此相联的几章中的第一章，写于 1880 年。——346。

269　《康德全集》1867 年莱比锡版第 1 卷第 22 页上是康德的著作《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第 10 节。这一节的基本论点是：“空间的三维性似乎是来自下列情况，即现存世界中各主体是这样相互作用的：作用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348。

270　这里指的是运动的一般量，运动在量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而不是表示质量和速度的乘积（mv）的特殊意义上的动量。——348。

271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355。

272　恩格斯指的是迈尔的文章《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1842 年发表）和《与新陈代谢联系着的有机运动》（1845 年发表）。这两篇文章收入尤·罗·迈尔《热力学论文集》1874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是这个版本。——355。

273　恩格斯指的很可能是黑格尔《逻辑学》第 2 册关于《形式的根据》这一节的注释。在这个注释中，黑格尔嘲笑了“以同语反复的根据进行说明的这种形式主义的方式”。黑格尔写道：“这种说明方式所喜欢的正是自己的巨大的明显性和明白性，因为，例如再没有比指出植物的根据是某种植物力即产生植物的力来更明显和更明白了。”“如果对于某人为什么到城里去的问题，指出下列根据：城里有吸引他到那里去的吸引力”，那么，这种回答的荒谬程度并不下于借“植物力”来作说明。同时，黑格尔指出：“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是充满这种似乎构成科学特权的同语反复的。”——357。

274　《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是这篇札记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加在第 17—18 页上：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上的无限》是写在本札记开头部分的标题。它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个较大的札记之一，是《反杜林论》第 1 版第 17—18 页上的注释的草稿。——364。

275　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non fuerit in sensu）是感觉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感觉论的这个基本原理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后篇》第 1 册第 18 章和《论灵魂》第 3 册第 8 章。——364。

276　这个数字引自威·汤姆生的论文《原子的大小》，这篇论文最初于 1870 年 3 月 31 日发表在《自然界》杂志第 22 期上，后又作为附录收入威·汤

姆生和彼·加·台特合著的《自然哲学论》一书第 2 版。——366。

277　幼系罗伊斯公国是德国图林根地区的一个小邦，面积 826 平方公里，1871 年加入德意志帝国。——369。

278　“海克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糟糕的复述”可能是指海克尔的心理生理一元论和他的物质构造观。例如，海克尔在他的小册子《原生体之交替发生》（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写的第二个注释《关于机械的自然观》中引用过）中断言，初级的“灵魂”不仅是“原生体”（即原生质的分子）所固有的，而且也是原子所固有的；一切原子都“有灵魂”，有“感觉”和“意志”。海克尔在同一书中说，原子是某种绝对非连续的、绝对不可分的、绝对不变的东西，而同时又承认，在非连续的原子之外，以太是作为某种绝对连续的东西存在的。见恩·海克尔《原生体之交替发生》1876 年柏林版第 38—40 页。

关于黑格尔如何处理物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矛盾，恩格斯在《物质的可分性》这个札记中提到。——370。

279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81 节附释 1：“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370。

280　这一札记与恩格斯 1875 年 11 月 12－17 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见本卷第 621—624 页）。——371。

281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wn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的著作《论公民》1669 年阿姆斯特丹版第 79 页。——372、622。

282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这篇论文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恩格斯原来打算把它当作以《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为标题的一本内容较广的著作的导言。后来，恩格斯把这个标题改为《劳动者受奴役的过程。导言》。但是由于该著作没有完成，恩格斯最后给他已经写成的导言部分加上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标题，这个标题符合手稿基本部分的内容。这篇论文很可能是 1876 年 6 月写成的。因为威·李卜克内西 1876 年 6 月 1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恩格斯答应给《人民国家报》写的论文《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这篇论文 1896 年第一次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 14 年卷第 2 卷第 545—554 页。——373。

283　指雅·格林的著作《古代德国法律》1828 年格丁根版第 488 页所引用的德国修道士拉·诺特克尔（约 952—1022 年）的证明材料。恩格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爱尔兰史》中也引证了诺特克尔的这个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559 页）。——380。

284　在关于人类活动影响植物界和气候的变化问题上，恩格斯利用了卡·弗腊斯的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1847 年兰茨胡特版和马·雅·施莱登的著作《植物及其生命》1848 年莱比锡版。马克思在 1868 年 3 月 25 日的信中曾请恩格斯注意弗腊斯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53 页）。——383。

285　指 1873 年席卷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等国家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危机于 1873 年 5 月以“大崩溃”开始，这是一直延续到 70 年代末的长期危机的序幕。——386、630、633。

286　恩格斯这篇序言是 1887 年 1 月 26 日写完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美国版于 1887 年 5 月在纽约出版。但是，这篇序言在美国版出版以前，未经恩格斯同意就被译成德文，发表在 1887 年 4 月的《纽约人民报》星期日版上了。恩格斯不满意译文质量并正式提出了抗议。之后，恩格斯亲自将序言译成德文，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 1887 年 6 月 10 日和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7 月又分别以德文和英文在纽约出版了单行本，同年序言又被译成法文发表在 7 月 9、16 和 23 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387。

287　指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887 年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一组文章。《时代》是英国的一家月刊，接近社会主义者，1879 年至 1891 年在伦敦出版。——387。

288　恩格斯指的是有许多拉萨尔分子参加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爱·艾威林的诽谤性的指责。艾威林和他的妻子——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及德国社会主义者威·李卜克内西一起，在 1886 年 9 月到 12 月期间到美国作了一次宣传旅行，拉萨尔分子指责艾威林向执行委员会报了假账；恩格斯前后好几个月在通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并帮助艾威林证实这种非难是完全荒谬的和诽谤性的。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在 1876 年费城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基本工人联系很差。曾经发生的党内斗争是在主要由拉萨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387。

289　指 1886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26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冶工人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388、422。

290　指美国 1886 年 5 月 1 日和以后几天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罢工。这次罢工席卷了国内的主要工业中心纽约、费城、芝加哥、路易斯维尔、圣路易斯、密尔沃基、巴尔的摩；罢工结果大约有二十万工人缩短了工作日。但企业主们马上就开始了反攻。5 月 4 日，在芝加哥有人向警察局投了一枚炸弹，警察遂用武器对付工人并逮捕了好几百人，进行了审讯，对芝加哥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们作出严厉的判决，其中四人在 1887 年 11 月被处绞刑。在这以后的几年中，美国工人在 1886 年五月大罢工中取得的成就全被企业主们一笔勾销了。为了纪念这次罢工，1889 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全世界工人每年都要庆祝五一节。——388。

291　1886 年秋天，在准备纽约市政选举期间，为了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治行动，建立了统一工人党。建党的倡导者是纽约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即 1882 年成立的该市工会的联合组织。以纽约为榜样，其他许多城市也建立了这样的政党。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人党领导下，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选举中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统一工人党提出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亨利·乔治得到全部选票的 31%；在芝加哥，工人党拥护者把一名参议员候选人和九名众议员候选人选入了州的立法议会，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候选人仅以 64 票之差而未当选；在密尔沃基，工人党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市长，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州的立法议会的参议员，六名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并有一名候选人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388、677。

292　“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城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骑士团虽曾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动，但是，它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主张阶级合作，反对1886年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90年代末就瓦解了。——390、677、679。

293　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恩格斯提到的《所谓原始积累》在《资本论》德文第3版中是第8篇，从第4版开始它被编入第7篇。见本选集第2卷第259—269页。——391。

294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397、400、647、661、662。

295　《萨克森工人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90年代初是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1890年至1908年在德累斯顿出版。——397、706。

296　滤出蚊虫，吞下骆驼，是从圣经中借用来的一句谚语；意思是注意细枝末节，忽视了主要的东西。——398。

297　这封告别信是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而写的。这封信在该报上发表后，接着又于 1890 年 9 月 30 日刊登在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第 9 期上。同年 10 月 2 日和 3 日分别发表在《萨克森工人报》第 119 号（最后一段被删掉）和《柏林人民报》第 230 号（开头两段被删掉）。此外，这封告别信还被爱·马克思-艾威林译成英文收入她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一文。发表在 1890 年 9 月 25 日的《每日纪事报》第 8903 号上。1890 年 10 月该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正义报》上。——400。

298　维登代表大会指 1880 年 8 月 20 日至 23 日在维登（瑞士）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56 名代表。这是在 1878 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莫斯特和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论，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道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党。同时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 1875 年在哥达通过的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294）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401。

299　1884 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举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294）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 1885 年 3 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402、674。

300　1885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294）编辑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的态度截

然不同，国会党团就此在 1885 年 4 月 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4 号上发表了声明。声明党团不同意党的机关报有权在报纸上批评它的活动，认为对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原则性批评是无根据的攻击。但是，在这个声明公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在外的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作出的决议，坚决抗议社会民主党党团多数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攻击。党团的多数被迫让了步。1885 年 4 月 23 日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何限制党内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样，实际上等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声明。—— 402。

301　1888 年 9 月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要求，把《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294）编辑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和编辑，如伯恩施坦、莫特勒等人驱逐出瑞士，于是报纸迁到伦敦，从 1888 年 10 月 1 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402。

302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 1878 年 10 月 21 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 1890 年 10 月 1 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08—310 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

303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是恩格斯在 1891 年 6 月 18 日和 29 日之间写的。1891 年 6 月 18 日，理·费舍以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随函寄给了恩格斯。从信里可以看出，这份主要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草案，曾经在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上讨论过，其中的一次会议决定把草案寄给恩格斯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

从恩格斯在 1891 年 6 月 29 日给考茨基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接到草案后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批判。他对绪论部分提出了自己的更加概括的表述，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只对有些条款写了草稿（见第一部分附件，本卷第 416—417 页）。恩格斯激烈批判了草案中专门谈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按照他的说法，正是这一部分促使他痛击这种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119—120 页）。恩格斯的批判意见，以及在这以前由于他的坚持才发表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298—319 页），对进一步讨论并制定纲领草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05。

304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寄给恩格斯的并受到恩格斯分析批判的纲领草案手抄稿，迄今尚未发现。——405。

305　指 1875 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298—319 页）中，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18—28 日给倍倍尔的信（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320—327 页）里，对这一纲领的草案（该草案只作了不大的修改就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作了批判。——405。

306　指 1871 年 4 月 16 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它的基础是 1867 年 4 月 17 日批准的而后在 1870 年 11 月根据德国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而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1871 年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和帝国首相所拥有的不依赖于帝国国会的特权非常广。该宪法保存了分立主义的残余和德国一些小邦的特权。——410。

307　1850 年普鲁士宪法是根据 1849 年 5 月 30 日颁布的新选举法选出的众议院的奴颜婢膝的多数支持下，按照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提议，于 1850 年 1 月 31 日通过的比 1848 年钦定宪法更加反动的新宪法。这部 1850 年宪法，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院）和按三级选举制选举出来的下院。议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它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且只对国王负责。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审理背叛国家和危害国内外安全的案件。为了保留国民兵役法，即全民兵役制，宪法规定凡有作战能力的普鲁士居民都由反动的普鲁士政府调配。根据宪法第 40 条，保留了地产长子继承权——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的继承形式，按这种继承形式，所有权不得转让，归长子所有。1850 年 12 月，曼托伊费尔内阁执政，到 1858 年 11 月为止，普鲁士在政治上始终是反动透顶的。1850 年宪法在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在普鲁士仍然有效。——410。

308　所谓的宪制冲突，是指 60 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冲突。1860 年 2 月，这个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资产阶级首肯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 1862 年 3 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 年 9 月底，组成了反革命的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 10 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 1866 年，当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410。

309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两个很小的“主权”国家联成一个名称。这两个在 1871 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小国是：属于长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格雷茨和属于幼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施莱茨-罗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411。

310　指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 1879 年 5 月 17 日在帝国国会上的演说。这个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得到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作辩护，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78—182 页，第 34 卷第 373—376 页）。——412。

311　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特殊权利，这些权

利在关于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1870 年 11 月）中和在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 年 4 月）中被确定下来。其中，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保留了特有的烧酒和啤酒税、独立管理邮电。此外，巴伐利亚在管理它的军队和铁路方面保留了独立性。巴伐利亚、符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中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问题方面的特别的委员会。——412。

312　没有皇帝的帝国指拿破仑·波拿巴于 1799 年雾月 18 日（11 月 9 日）发动政变、推翻了 1792 年 8 月 10 日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国制度，而宣布实行以自己为第一执政的专政。1804 年，在法国正式建立了帝国，拿破仑被宣布为法国的皇帝。尽管制度交替更换，但第一帝国的许多官僚机构却在法国继续保存下来，甚至在 1870 年 9 月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时期也是如此。——413。

313　恩格斯指在 1880 年 11 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的纲领。1880 年 5 月，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领导人之一茹·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纲领草案。恩格斯在 1881 年 10 月 25 日给伯恩施坦的信里指出，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马克思口授给盖得的。恩格斯写道：“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作了某些增减。”（见本卷第 645 页）

马克思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及纲领的实践部分（最低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64、635—636 页。——416。

314　指 1888 年巴塞罗那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纲领后来收入 1891 年在马德里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西班牙文版作为附录。——416。

315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 18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269—587 页）德文第 2 版而写的，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说，1892 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11—325 页）是根据美国版序言（见本卷第 387－396 页）写的，现在这篇德文第 2 版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的。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24—231 页）亦按 1885 年《新时代》（见注 3）杂志第 6 期上的德文照录于本序言中。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418。

316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92—298 页）。这篇文章本来是作为美国版序言写的，但恩格斯后来又改用了另一篇阐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见本卷第 387—396 页）作序言。——418。

317　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从 1815 年起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 1846 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419。

318　关于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作了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67—469 页）。1831 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但很多工厂主并不遵守。

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 1847 年 6 月 8 日英国议会通过的。——420。

319 “小爱尔兰”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关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42—343 页）。

“七日规”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区，从中心点往外有七条放射状街道。——422。

320 小宅子制是英国 19 世纪上半叶某些工厂自己制定的制度，即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给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工资中扣除。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关于这种制度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69—470 页）。——422。

321 《公益》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1891 年和 1893—1894 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1886 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424。

322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 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 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 和 1849 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425、582。

323 宪章派原定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425。

324 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 1831 年由英国下院通过，1832 年 6 月经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425。

325 1867 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交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 1867 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

1884 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 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是在 1872 年实行的。——426。

326 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里，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62—465 页）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 1848 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427。

327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 1883 年 9 月斯波特第五十三次会议的报告》1884 年伦敦版第 608—609 页。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于 1831 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形式发表。——430。

328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答谢邀请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而写的，发表在 1894 年 3 月 25 日—4 月 10 日《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 8 号和 1894 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杂志《日子》第 4—5 期上。

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组的倡议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于 1893 年 12 月 22 日至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参加大会有亚美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俄国、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组织的代表共 26 人。代表大会研究了关于脑力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大会还建议在学生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国际书记处，以建立和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联系。——435。

329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是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进 1894 在柏林出版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文集（1871—1875）》时专门写的。恩格斯在论文集的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90—491 页）里说到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为它写了详细的跋的原因。

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劳动解放社 1894 年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里，小册子由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印刷。这本小册子的译文是维·查苏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后译出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小册子写了序。后来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不同标题在俄国一再出版。——437。

330　恩格斯指彼·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 1874 年<人民国家报>第 117 和 118 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 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 年版第 3 卷第 88—98 页。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答复特卡乔夫的（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261—272 和 272—285 页）。——437。

331　指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 年汉诺威—柏林版第 1—3 册。——437。

332　亚·伊·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编辑威·林顿的三封信是他在 1854 年 1—2 月写的，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林顿的杂志 1854 年第 3 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一段是从 1885 年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第 9 页转引来的。

赫尔岑给林顿的信的全文，见亚·伊·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438。

333　这里所引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第一次发表在 1857 年《同时代人》杂志第 5 期。接下去引的他的另一篇文章

《奥·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一次发表在 1857 年《同时代人》杂志第 7 期。两篇文章都收在 1879 年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 5 卷，以《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为总标题。在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 年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 16—17 页上；后面紧接的第二段引文在第 15 页上。显然恩格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书上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因为这两段引文同该书一样。——439。

334　见《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本选集第 1 卷第 250—251 页）。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译文翻译回去的，因此同序言手稿中有关地方稍有出入。——444。

335　恩格斯指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雅典民族解体的过程，见本卷第 107—118 页。——444。

336　《欧洲通报》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1918 年在彼得堡出版。1909—1918 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 世纪 90 年代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8 年以前该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是米·马·斯塔修列维奇。——445、637。

337　《祖国纪事》是俄国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1884 年在彼得堡开始出版；1839 年起成为当时最好的进步杂志之一。维·格·别林斯基参加杂志编辑部，亚·伊·赫尔岑等人为它撰稿。1846 年别林斯基退出编辑部后，杂志由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接办，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1877 年涅克拉索夫去世后，民粹派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

《祖国纪事》不断受到书报检查的迫害并于 1884 年 4 月被沙皇政府封闭。—— 445。

338　指载于 1877 年《欧洲通报》（见注 336）杂志第 9 期的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回答这篇文章而在 1877 年《祖国纪事》杂志第 10 期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445。

339　《民意导报》是俄国民意党在国外的机关报，1883 年至 1886 年在日内瓦出版，由彼·拉·拉甫罗夫和列·亚·吉霍米罗夫主编，共出五期。——445。

340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339—342 页），是马克思于 1877 年底读到该杂志第 10 期登载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写的。这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曲解。马克思这封信没有寄出，是他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副本和 1884 年 3 月 6 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 1886 年《民意导报》杂志第 5 期上发表。后来又于 1888 年 10 月在俄国的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445、724。

341　马克思关于赫尔岑的这段话，见 1867 年汉堡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第 1 版第 1 卷第 763 页（1987 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第 750—751 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的德文第 2 版及其后各版里删去了这个注释的增补。——446。

342　以下是引自马克思给《祖国纪事》（见注 337）编辑部的信中的几段引文（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339、340 和 341 页）。——446。

343　显然是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876 年秋至 1879 年秋）和民意党（1879 年 8 月至 1881 年 3 月）的领导机关；后者曾宣布以恐怖手段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447。

344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库利绍娃和屠拉梯的请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 1894 年 1 月 19 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请恩格斯就当时意大利国内所酝酿的革命危机谈谈党的策略问题。这篇文章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发表在 1894 年 2 月 1 日《社会评论》杂志（见注 579）第 3 期上，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屠拉梯的译文有几处同恩格斯的手稿有出入。

这篇文章还载于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见注 294）1894 年 7 月 12 日第 24 号，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意大利的状况》。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这封信是根据发表在费耳特里内利学院于米兰出版的 1958 年《年鉴》上的法文手稿译出的。——452。

345　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领袖是费·卡瓦洛蒂。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在许多场合都同社会主义者趋于一致。——453。

346　在 1848 年 2 月 24 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见注 152）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阿尔伯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更不用说“民主主义者部长们”了）只是资产阶级政府可怜的装饰品而已。——456。

347　恩格斯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著作之一，是恩格斯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问题多年研究的成果。据恩格斯自己说，从 1841 年起他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27—336 页）和《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0—16 页）两篇文章里，已经部分地论述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

本文是为《新时代》（见注 3）杂志写的，发表在该杂志 1894—1895 年第 1 卷第 1 期和第 2 期上。恩格斯在世时这一著作还用法文在 1895 年 4 月和 5 月《社会发展》杂志第 1 期和第 2 期上刊登过，是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457。

348　安·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 年斯图加特版第 108 页。对该书的批判，见《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545—568 页）。——457。

349　塔博尔派是 15 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波希米亚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 1420 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该派建立自己的军队，领袖之一是约·杰士卡，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没收天主教会财产，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并曾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拥有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塔博尔派曾经联合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圣杯派，多次击退教皇

和德国皇帝对波希米亚进行的征讨。后来由于圣杯派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 1437 年遭到失败，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459。

350　恩格斯从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话，不像肖特的译文，更像奥·鲍利译的这篇作品的德译文（见《琉善文集》1831 年斯图加特版第 13 卷第 1618—1620 和 1622 页）。——460。

351　恩格斯指的是威·魏特林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支部。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 190—210 页）一文讲述了正义者同盟的历史。——461。

352　格·库尔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 年日内瓦版第Ⅷ、Ⅸ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穿了库尔曼的“预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629—640 页）。——461。

353　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 1846 年和 1847 年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它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友”是产生于 1841 年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于 1847 年 3 月 30 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462。

354　蒂宾根神学学派是德国神学家斐·克·鲍尔在 19 世纪上半叶创立的一个研究并批判圣经的学派。这一派人批判《新约全书》中的矛盾和历史谬误，但又力图把圣经里的某些说法作为符合历史的东西保留下来。可是这些从事研究的人无意中使圣经的威信受到破坏。——463。

355　布·鲍威尔对新约的批判，见他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批判》1840 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此书第 3 卷用《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的名称于 1842 年在不伦瑞克出版。在宗教史文献中把前三部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为符类福音作者。——463。

356　喀巴拉（希伯来语，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经文进行解释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词和数码赋予特殊的象征性含义。这种办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间，后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465。

357　诺斯替教派是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 1 至 2 世纪时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的、犹太教的、各种多神教的以及唯心主义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意为“真知”）的神秘学说——通过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派的特点在于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斥诺斯替教为异端，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残酷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466。

358　《西维拉占语集》，据传为古代一游方预言家（库马城的西维拉）所作，在古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过很大作用。——466。

359　曾德—阿维斯陀是 18 世纪至 19 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正确的名称。阿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塞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元论观念。阿维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 9 世纪直到公元 3－4 世纪。—— 481。

360　指公元前 6 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者叫作“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 597 年攻占耶路撒冷和公元前 586 年最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强制移居巴比伦。公元前 6 世纪 30 年代，波斯皇帝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许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481。

361　《法德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它是恩格斯在 1894 年 11 月 15 日和 22 日之间为《新时代》（见注 3）杂志撰写的。促使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言论，首先是他 1894 年 10 月 25 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纲领的补充报告。福尔马尔在说明他所建议的措施时，引述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仿佛那个纲领真是得到恩格斯赞同的。在此以前恩格斯虽然已驳斥过这种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61—562 页），但他认为有必要专门写篇文章来阐述在农民问题上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基本原则，有必要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以及在马赛代表大会（见注 362）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加以批判。

在恩格斯生前，《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曾转载于波兰杂志《黎明》1894 年第 12 期，标题是《农民问题》。——484。

362　1892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 1893 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关于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

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有了高涨，并且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纲领也包含了许多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与私有者情绪，甚至对它的富裕阶层的剥削意图作了某些让步。在党的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这些机会主义倾向更加严重了。——488。

363　指保·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提出的。拉法格的报告还发表在 1894 年 10 月 18 日《社会民主党人》第 38 号附刊上。——501、737。

364　《社会民主党人》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4 年至 1895 年在柏林出版。——501。

365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376—481 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 1895 年 2 月 14 日和 3 月 6 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

从费舍 1895 年 3 月 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

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 1895 年 3 月 14 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

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选集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作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

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说恩格斯主张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1895 年 3 月 30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见注 561）发表了一篇标题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主张“无论如何要守法”。恩格斯感到非常愤懑，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 1895 年 4 月 1 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有必要在《新时代》（见注 3）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恩格斯在 1895 年 4 月 1 日给卡·考茨基的信和 4 月 3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谈到了《前进报》在发表导言时的这种不光彩做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432、436 页）。

在马克思的著作单行本出版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 年的《新时代》杂志第 27 期和第 28 期摘要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见注 302）的危险消除之后，导言仍未能全文发表。

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载在 1895 年《社会评论》杂志第 9 期和 1895 年保加利亚《事业》杂志第 1 期上。——506。

366　恩格斯在 1895 年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单行本时，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见注 162）第 1、2 和 3 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从 1848 年到 1849 年》一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收入这个单行本作为头三章（恩格斯这里提到的也就是这几篇文章），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 5、6 两期合刊撰写的《时评（三）》中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11—514 和 520—531 页）作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这两句话取自时评中收入马克思著作单行本中作为第四章的那部分（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471 页）。——508。

367　指 1871 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萨克森林地。——509。

368　指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正统派是法国于 1792 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 1830 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的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 1830 年七月革命到 1848 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 年），两个保皇集团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513、684。

369　“民族原则”是波拿巴第二帝国（1852－1870）统治集团提出的、反映其对外政策的一个原则。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图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各个大国的统治阶级普遍利用这个所谓的“民族原则”来从思想上掩盖它们的侵略计划

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它的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争夺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397—754 页）中、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70—183 页）中，都曾对“民族原则”进行揭露和批判。——514。

370　指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根据 1871 年法兰克福和约的条款付给德意志帝国的 50 亿法郎赔款。——515。

371　普选权在西班牙从 1868 年（1868—1874 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实施，并经 1869 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 1873 年宣布成立，到 1874 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516。

372　这句话引自马克思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64 页），这个纲领是 1880 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517。

373　1870 年 9 月 4 日，法军在色当溃败的消息传出后，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

1870 年 10 月 31 日，梅斯投降，布尔歇失守以及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同普鲁士人开始进行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公安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并决定于 11 月 1 日举行公社选举。但是由于巴黎革命力量缺乏组织性和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国防政府便乘机借助于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背弃了自己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

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并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5 页。——521。

374　1809 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 1809 年 7 月 5—6 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

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时，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在 1815 年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521。

375　1890—1893 年在比利时发生了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由于在工人党领导下进行了群众性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 1893 年 4 月 18 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4 月 29 日由参议院批准），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以年满 25 岁、居住期限满 1 年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对某几类选民，可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522。

376　恩格斯指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权和贵族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以 1755 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而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贵族以往的优惠和特权得到确认。他们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业享受免税待遇，在国家开支中占有的份额被固定下来，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523。

377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这句话，反映出 1848 年底至 1849 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524。

378　暗指 1866 年普鲁士对奥地利和德意志几个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在 1866 年归并于普鲁士。——524。

379　“自由人”是 19 世纪 40 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 1842 年对“自由人”进行了批判，并拒绝在他所主编的《莱茵报》（见注 171）上发表他们的空洞浮夸的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29—430、435—436 页）。“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 1843—1844 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宣传一种理论，认为只有杰出人物，即“精神”的体现者，“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的观点叫作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写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268 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有害的反动思想的。——527。

380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528。

381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他曾经打算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542。

382　1850 年 11 月中，恩格斯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物质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继续研究经济理论。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几乎每天都有通信。——543。

383　1849 年 6—7 月，恩格斯参加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展开的革命战斗（参看恩格斯 1849 年 7 月 25 日给燕·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525—526 页）。关于这些战斗的详情，见《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127—235 页）。——543。

384　1841 年 9 月到 1842 年 10 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兵役。恩格斯利用业余时间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听课。——544。

385　《人民报》是宪章派的周报，1852 年 5 月由革命的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 年 10 月至 1856 年 1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人民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为该报撰写的一些文章外，还转载了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 年 6 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547。

386　《人民报》（见注 385）编辑部于 1856 年 4 月 19 日发表了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记录（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774—776 页）。

——548。

387　磨坊街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144）。——548。

388　美因茨俱乐部派是 1792 年 10 月法国军队占领美因茨以后，在当地按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样子成立的自由平等之友会（美因茨俱乐部）。该俱乐部要求取消封建负担和建立共和国。1793 年 2 月进行了选举并召开了法国莱茵地区国民公会。国民公会颁布了废除为数众多的僧俗王公的法令，并宣布美因茨及其邻近地区为共和国。

1793 年 3 月，国民公会宣布美因茨共和国并入法国。这样一来，美因茨俱乐部派不仅遭到来自反动贵族势力方面，而且也遭到来自资产阶级势力方面的非难，说他们犯有“背叛祖国”罪。美因茨俱乐部和国民议会也没有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必要支持。虽然法国国民公会发布法令废除了封建依附关系、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以及原来的赋税，但同时它却规定要向法国交纳特别税款。这一点是造成这些阶层愤懑和不平的重要原因。

1793 年 7 月普军占领美因茨，美因茨共和国遂告解体。美因茨俱乐部的成员被逮捕入狱并遭到残酷的虐待。——548。

389　显然是指威·伯蒂歇尔的著作《迦太基史》1827 年柏林版，该书主要讲迦太基的军事史。——550。

390　尼·马基雅弗利《佛罗伦萨史》第 1 版于 1532 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出版。书中描写的雇佣兵队长是 14—15 世纪意大利雇佣兵的首领。——550。

391　马克思大概是 1857 年 9 月 30 日在布赖顿和恩格斯见面的。——550。

392　恩格斯显然指厄·琼斯 1858 年 10 月 4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857 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的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订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只保留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滑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几年后，在琼斯重新开始表现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精神时，这种关系才得以恢复。——552。

393　指 1830 年 11 月开始的 1830—1831 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贵族的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恩格斯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他 1848 年 2 月 22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37—541 页）和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指出，波兰贵族在这次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同德国贵族在济金根和胡登所领导的 1522 年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完全一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38—439 页）。——554。

394　拉萨尔于 1858 年春写了《弗兰茨·冯·济金根》这个舞台脚本，并匿名发表。在皇家剧院拒绝上演这部戏剧之后，拉萨尔于 1859 年春把《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为文学剧本发表。——557。

395　在这里和以后恩格斯谈到舞台脚本和文学剧本之间的区别和其他

艺术创作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针对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同拉萨尔进行论战。——557。

396　拉萨尔 1848 年 11 月 21 日在诺伊斯（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武装起来反对国家政权。拉萨尔发表演说后当天被捕并被审前羁押。高等法院和检察院一再拖延审判，拉萨尔写信请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这一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标题《拉萨尔》在《新莱茵报》（见注 119）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当局和监狱当局对拉萨尔的暴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316—321、531—533、543—548 和 553—558 页）。对拉萨尔的审判是 1849 年 5 月 3—4 日进行的。恩格斯也可能指 1848 年 9 月 17 日拉萨尔在沃林根（科隆附近）民众大会上的讲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民众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书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595—596 页）。——558。

397　“鞋会”和“穷康拉德”是农民秘密团体。它们的活动为德国 1525 年农民战争作了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这一著作中阐述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23—435 页）。——561。

398　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是许多作者的著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括：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时期到十八世纪末工艺学的历史》1807—1811 年格丁根版第 1—3 卷，克腊马尔什和黑伦根据安·尤尔著作整理成的《技术词典》1843—1844 年布拉格版第 1 卷；约·贝克曼《论发明史》1782—1805 年格丁根版第 1—5 卷等。——562。

399　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 1764—1767 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562。

400　即拉萨尔的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 年苏黎世版。

1863 年 2 月 10 日，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委员会建议拉萨尔阐述他在工人运动问题上的观点。拉萨尔 3 月 1 日把阐明他的观点的《公开答复》寄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并主张把它变成“运动的正式宣言”。——565。

401　1863 年 3 月 26 日，工联伦敦理事会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声援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同时，大会的参加者在会上抗议英国站在南部各州一边对美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担任大会主席的是激进派最具声望的领袖约·布莱特。另参看马克思 1864 年 11 月 29 日分别写给约·魏德迈和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434、436 页）。——565。

402　《北极星》是德国的一家周报，1860 年至 1866 年在汉堡出版，从 1863 年起为拉萨尔派报纸。——567。

403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871 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 至 1867 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1871 年至 1876 年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名称出版；该报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声明。——567。

404　1864 年 12 月 21 日和 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403）第 2 号和第 3 号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自译的德译文；马克思在译文中作了一些修改（德译文中最重要的修改，见本选集第 2 卷第 598—608 页和有关的脚注）。——567。

405　1864 年 11 月 11 日约·巴·施韦泽和威·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请他为正在筹办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403）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年 11 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刊物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而且李卜克内西还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于是他们就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以及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屡次批评报纸的路线。在证实了该报编辑施韦泽继续奉行向政府和容克谄媚的拉萨尔主义政策并企图散布对拉萨尔的迷信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65 年 2 月 23 日声明同该报断绝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88、95—98 页）。紧接着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这个机关报撰稿。——567。

406　威·李卜克内西在 1865 年 1 月 20 日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走上了同俾斯麦的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他答应在普鲁士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上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给俾斯麦以支持，交换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这个政治“遗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1928 年发表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完全证实了李卜克内西所报告的消息。——567。

407　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个协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 1859 年 9 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会议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 1849 年 6 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右翼自由派——哥达派。在 1866 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该联盟于 1867 年 11 月宣布解散。——567。

408　普鲁士亲王威廉（1861 年即位为国王）在 1858 年 10 月开始摄政时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 1862 年宪制冲突和 1862 年 9 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结束了“新纪元”。——568。

409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8 年 3 月 20 日的演说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领导地位”。在争取德国统一的时期，这一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568。

410　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568。

411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 1863 年 5 月 23 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

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 70 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 年 5 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 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 1864 年 12 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

412　进步党人是 1861 年 6 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和霍维尔贝克。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 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民族自由党。——569、658、686。

413　马克思讽刺地把普鲁士通行的禁止工人联合和罢工的工商业条例以及 1854 年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称为奴仆规约。

所谓“奴仆规约”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专横地对待农奴，包括肉刑。——569。

414　指施韦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中的第三篇，发表在 1865 年 2 月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403）第 23 号上，也就是说，是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他不再向俾斯麦谄媚以后发表的。在这些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569。

415　1861 年 1 月 12 日，普鲁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蛊惑人心地准许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1861 年春天，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间曾经设法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但是遭到了拒绝，普鲁士当局借口他在 1845 年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的，“因此”“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外国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667—685 页）。——570。

416　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 1865 年 2 月 23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订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单座楼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而表现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 1867 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570。

417　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人口规律”的批判，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第 3 节第（79）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92—693 页）和《剩余价值理论》第 9 章第 2 节、第 14 章第 2 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第 124—128 和第 402—406 页）。——571。

418　关于马尔萨斯在《论人口律》一书中的抄袭行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说得比较详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76—678 页）。——572。

419　“为了共和国不受损失，执政官应该警惕”是古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遭到外部或内部危险的威胁时所使用的一句名言；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就被赋予独裁的权力。——572。

420　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573、582。

421　指威·罗·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该书第 1 版于 1846 年在伦敦出版。——573。

422　“老拜斯”或“褐色的拜斯”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英国军队对于明火枪（燧发的、滑膛的前装枪）的叫法，这种枪的枪身呈褐色。——574。

423　马克思在结束了自己的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整理工作以后，就着手准备《资本论》第 1 册的出版工作。1863 年 8 月他开始誊写和从词句上对这份手稿的一部分进行加工，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叫作“这一册的现有文稿中最早的文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4 页）。然而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马克思决定也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 3 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 4 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 1861—1863 年的大部分经济学手稿编成《剩余价值理论》。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对这部分手稿在准备出版时重新加工。

后来，马克思在加工完《资本论》第 1、2 册和第 3 册以后，又回到第 1 册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 1 册。为了出版《资本论》第 1 册，1866 年整整一年马克思都在为它润色，而在 1867 年 3 月 27 日完成；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的过去的文稿进行新的、仔细的加工。第 1 册的德文第 1 版于 1867 年 9 月作为《资本论》第 1 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 2 册和第 3 册应当以《资本论》第 2 卷的形式出版，而第 4 册《经济学说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 3 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序言）。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最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了并以《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 2 册和第 3 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 4 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 4 册的手稿，但是他在世时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575。

424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第 1 章中概括了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3—177 页）一书的内容。在《资本论》德文第 2 版和以后各版中，《商品和货币》这一章成为第 1 卷的第 1 篇。——575。

42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序言的注释中实现了这个意图。——576。

426　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 1860 年 5 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 60 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参加该理事会的总委员会委员同国际进行接触。

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吸引到协会中来，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协会。在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下，工联伦敦理事会曾在多次会议上讨论，于 1867 年 1 月 14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然拒绝与协会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576、584。

427　指欧·杜林对《资本论》第 1 卷的书评，载于 1867 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 3 卷第 3 期第 182—186 页。——577、578。

428　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对罗雪尔的庸俗经济学观点的彻底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02—111、177—189、225—247、257、286—293、379—389、398—407、672—681 页。——577。

429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 2 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 2 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形成（第 3 册），而最后一卷即第 3 卷（第 4 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本选集第 2 卷第 102 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 2 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 2 卷出版，把属于第 3 册的手稿作为第 3 卷出版。——578。

430　指署名“赫”的书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 3 卷）。第 1 卷第 1 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 年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版》，载于 1868 年 7 月 4 日《德国中央文学报》第 28 号第 754—756 页。

《中央报》即《德国中央文学报》，是德国一家文摘性的科学情报评论周刊，1850 年至 1944 年在莱比锡出版。——580。

431　马克思指《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第 1 章（《商品与货币》）。在德文第 2 版及以后各版中这一章相当于第 1 篇。——580。

432　没落帝国是对晚期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叫法；这里指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582。

433　1868 年 8 月 22—26 日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表明，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的经验的启示下，并在国际工人协会和《资本论》的影响下开始抛弃拉萨尔的教条。大会原则上赞成罢工运动，但

又表示反对实际组织罢工。拉萨尔派的领导人害怕在渴望建立工会的工人中丧失威信（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建立工会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成效的活动），施韦泽和联合会副主席弗里茨舍提出了在柏林召开全德各工人工会代表大会的建议。正统的拉萨尔分子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要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国会议员身分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大会原则上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继续阻挠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583。

434　1868年9月16日莱比锡警察当局勒令设在莱比锡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解散。但是在三星期之后，即1868年10月10日，以约·巴·施韦泽为首的一批拉萨尔分子用同一名称在柏林重新建立了联合会。此后它就在普鲁士警察当局的监督下进行活动。——583。

435　柏林全德工人代表大会是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得到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大会的同意，以国会议员身分于1868年9月26日召开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206名，代表142000多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城市的）。这次代表大会根本拒绝加入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纽伦堡组织的各个工人协会所派遣的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些工会，它们是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式样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总的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施韦泽作了尖锐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工会的分裂，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根本违反工会运动的目的和性质。——583。

436　联合法暗指新工商业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工人有罢工权和联合权。1869年5月29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通过了这一条例。——583。

437　指1868年9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403）第112号附刊上发表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见注435）于1868年在柏林通过的拉萨尔派的工会章程草案。——583。

438　全国劳工同盟于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尔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卡梅伦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586。

439　《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587、611、618。

440　马克思指的是取消 1801 年英爱合并的要求。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 1789 年爱尔兰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合并自 180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瑙尔等人）却把取消合并的宣传鼓动仅仅看作是迫使英国政府作出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 年奥康瑙尔和英国辉格党达成妥协后就完全中止了这种鼓动工作。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 1840 年建立了取消合并派协会，然而他们却力图使这个协会对英国各统治阶级采取妥协的政策。——587、589。

441　1641 年 10 月，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爱尔兰爆发了起义，几乎使该岛的大部分完全脱离英国。这次起义于 1649—1652 年被镇压下去。对爱尔兰残酷的镇压，结果是英国新土地贵族夺取了大量土地，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势力的增长为 1660 年王朝复辟准备了基础。——588。

442　人身保护法是 1679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3—20 天）送交法庭，否则即须予以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588。

443　指 1869 年 9 月 6—11 日国际工人协会在巴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积极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讨论大会议程的土地问题、继承权问题及普及教育问题时的发言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648—656 页）被保存了下来。——589。

444　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一词，通常指那些在爱尔兰拥有地产却长期居住在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获利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590。

445　《国际报》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 年至 1873 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1873 年时该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592。

446　《马赛曲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 年 12 月至 1870 年 9 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登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592、599。

447　保·拉法格在 1870 年 4 月 1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联合会委员会。拉法格认为，他自己不作为新成立的委员会成员而作为伦敦总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较为适宜。他请求马克思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授予他代表权的问题。1870 年 5 月 17 日总委员会授予拉法格代表权。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是 1870 年 4 月 18 日在瓦尔兰主持下召开的第一国际巴黎各支部全体成员大会上成立的。出席大会的有一千二三百人。会上通过了联合会章程。但是，1870 年 4 月底法国境内开始了警察迫害，并且借口举行全民投票而逮捕国际的会员，这样，实质上就使联合会的活动中断了。——593。

448　《平等报》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族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 年 12 月至 1872 年 12 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 年 11 月至 1870 年 1 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

总委员会。但是，1870 年 1 月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593、597、605、611。

449　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未能掌握国际的领导，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转而公开向总委员会开火。巴枯宁的追随者在《平等报》（见注 448）编辑部里攫取了多数，早在 1869 年 11 月 6 日第 42 号上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总委员会违反了关于出版各国工人状况的通报的条例的第二、三条。11 月 13 日《平等报》在第 43 号发表了第二篇社论，建议在英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联合会委员会，据说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易于完成在领导国际共同事务方面的职能。11 月 27 日报纸又发表文章鼓吹放弃政治，并在 12 月 11 日的一篇题为《思考》的社论中，激烈攻击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进步报》对总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1869 年 12 月 14 日总委员会会议首次讨论了《平等报》和《进步报》的问题。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35—443 页）于 1870 年 1 月 1 日经总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准，分发给国际各支部。——593。

450　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 1867 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 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594。

451　指 1868 年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的决议案。为了维护自己的建议，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几次发言，他的发言以及他和他的追随者关于退出和平同盟的声明，都发表在 1868 年 12 月 1 日赫尔岑的报纸《钟声》第 14—15 号上。——594。

452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 1868 年创建的。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 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 年 9 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594、608、650。

453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注 452）的纲领和章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这两个文件于 1868 年在日内瓦以单页的形式用法文和德文出版。1868 年 11 月 29 日约·菲·贝克尔将这两个文件寄请国际的总委员会批准。12 月 15 日总委员会表示反对接纳同盟加入协会，12 月 22 日马克思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之后写成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82—384 页）稍加修改后被一致

通过。通告信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义策略。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分发给协会的所有支部。——594。

454　在 19 世纪 20 年代末传布和发展圣西门学说的一批圣西门信徒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1830 年根据巴扎尔的讲稿，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反映圣西门主义者对继承权的看法的书，即《圣西门学说。第一学年。简述。1829 年》1830 年巴黎版。——595。

455　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坚持下，同盟纲领的第二条于 1869 年 4 月被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596。

456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1869 年夏在总委员会里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8 月 3 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14—416 页）。马克思的报告在 1869 年 9 月 11 日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由埃卡留斯宣读。——597。

457　《进步报》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从 1868 年 12 月至 1870 年 4 月用法文在勒洛克勒出版，主编是吉约姆。——597。

458　巴枯宁在 1870 年 3 月 2 日和 3 日《马赛曲报》（见注 446）第 72 和 73 号上发表了追悼信，信中把赫尔岑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同胞，认为他的死"对他的朋友、对俄国解放事业以及……对全人类的解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谈到 30 年来他和赫尔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说"赫尔岑、奥格辽夫和我始终是一个目标"。1870 年 3 月 5 日、12 日和 19 日《进步报》（见注 457）第 10、11 和 12 号上全文转载了追悼信。——598。

459　《钟声》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 1857 年至 1867 年用俄文出版；1868 年至 1869 年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 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598。

460　指 1858 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梅季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梅季耶夫基金）。1869 年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赫尔岑同意把基金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奥格辽夫转交给涅恰也夫。1870 年，在赫尔岑死后，涅恰也夫从奥格辽夫手中得到了另一部分基金。

马克思是从约·菲·贝克尔 1870 年 3 月 13 日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的。——598。

461　马克思指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这些人是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他们是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追随者。1870 年春季，他们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1869 年去世的国际会员亚·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在这个支部的筹建工作中起过重大的作用。1870 年 3 月 12 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在 1870 年 3 月 22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598。

462　在《平等报》（见注 448）编辑部改组后，巴枯宁分子力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他们在 1870 年 4 月 4—6 日于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族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保证了形式上的多数票。在是否接受巴枯宁于 1869 年 6 月在日内瓦建立的、实际上由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注 452）实行领导的、

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支部，以及拉绍德封的巴枯宁派支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内瓦俄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吴亭曾发言揭露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分裂发生了，日内瓦的代表和其他拥护总委员会的人单独继续开会。马克思所提到的关于在拉绍德封发生分裂的报道，发表在 1870 年 4 月 9 日《平等报》第 15 号上。

同盟的支持者以罗曼语族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族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绍德封。巴枯宁分子着手办《团结报》（见注 463）。1870 年 4 月初，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和同盟的支持者给总委员会寄去了关于拉绍德封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并请求对分裂问题作出决定。总委员会于 1870 年 6 月 28 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决定保持原有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而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委员会另选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90 页）。——598。

463　《团结报》是巴枯宁派的周报，该报由詹·吉约姆编辑，1870 年 4 月至 9 月在纳沙泰尔出版，1871 年 3 月至 5 月在日内瓦出版。它的前身是《进步报》。——598。

464　马克思指的是 1870 年 4 月 18 日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称劳拉为珞朗，因为保尔·拉法格的笔名是保尔·洛朗。——599。

465　《女王信使报》是英国保守派的政治文学周报，1869 年 1 月至 7 月在伦敦出版。——599。

466　道德协会是普鲁士爱国的秘密政治团体，于 1806 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战败之后创立。它联合了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旨是唤起爱国热情，争取自己的国家从拿破仑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和建立立宪制度，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 年，普鲁士国王应拿破仑的要求取缔了道德协会。然而协会继续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拿破仑失败后，该协会由于要求宪法而被迫害，很快就瓦解了。——601。

467　互助主义派是 19 世纪 60 年代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自称。他们提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计划：用组织互助（如建立合作社、互助会等）的办法来解放劳动者。——602。

468　指国际工人协会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下列决议：《关于各国委员会、地方支部、派别、团体及其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第二项决议第 1、2、3 条）；《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第九项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十六项决议）以及《关于瑞士罗曼语族区的分裂》（第十七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51—452、454—456、458—460 页）。——603。

469　1871 年 12 月 4 日卡·特尔察吉请求恩格斯从物质上支援他所办的《无产者报》（见注 470）。1872 年 1 月 6 日以后，恩格斯写完了给他的回信。但是，信刚要寄出，恩格斯从《玫瑰小报》（见注 471）获知：特尔察吉支持汝拉联合会关于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因此，1 月 14—15 日恩格斯重写了一封信，仅保留了原信的两段文字（略加修改）。其余的文字，部分写在原信删去的各行之间，部分写在一张白纸上。——604。

470　《无产者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2 年至 1874 年在都灵出版，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605、609。

471　《玫瑰小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

1867 年至 1873 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 1871 年至 1872 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 1872 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

1871 年 12 月 28 日《玫瑰小报》在第 360 号上的《工人运动》这篇评论中报道说：都灵“无产者解放社”通过了支持松维利耶通告的决定。——605、609。

472　《社会革命报》是 1871 年 10 月至 1872 年 1 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 年 11 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606、611。

473　指巴枯宁企图在 1868 年 9 月于伯尔尼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 450）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他起草的鼓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阶级平等、废除国家和继承权等等的纲领。在同盟的大多数人拒绝了他的草案之后，他同少数人退出了和平同盟。并于同年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注 452），他的上述纲领草案成了这个同盟的纲领的基础。——607。

474　指 1869 年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利。第五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拒绝接受新支部的权利，第六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有暂时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利。这些决议在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载入组织条例，它们遭到巴枯宁派的攻击。——608。

475　《自由报》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1865 年至 1873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67 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610。

476　1871 年法国人支部是由一部分法国流亡者于 1871 年 9 月在伦敦组成的。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发表在该支部的机关报《谁来了！》上，这一章程在 1871 年 10 月 14 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在 10 月 17 日的会议上，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作了关于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71—474 页）。获准的决议中指出，支部章程的某些条文与共同章程抵触，这使它加入国际发生困难；建议支部修改这些条文，以适应国际的章程。支部在 10 月 31 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对总委员会的一般权力提出异议。支部的答复经委员会讨论后，于 1871 年 11 月 7 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讨论。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提出了马克思写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99—504 页）。以后支部便瓦解为几个小组。——610。

477　1871 年 11 月 12 日在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松维利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松维利耶通告——《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知》。这个旨在反对总委员会和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通告，用关于政治冷淡主义和支部完全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教条来对抗代表会议的决议，它还包含了对总委员会的活动的诽谤性攻击。在通告中巴枯宁派建议所有联合会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来重新审查国际的共同章程和谴责总委员会。恩格斯对这一通告的评价，见他的《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516—522 页）。——611。

478　都灵工人联合会于 1871 年秋在都灵成立，处于马志尼分子的影响之下。1872 年 1 月联合会发生分裂，一批无产阶级分子退出了联合会，组成

了“无产者解放社”，后来这个团体被接受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 1872 年 2 月以前该团体一直受警探特尔察吉的领导。——611。

479　《多事人报》是意大利共和派的讽刺性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8 年至 1872 年在都灵出版。——611。

480　1872 年 1 月 6—7 日在开姆尼茨召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 50 多个地方组织的 120 名代表，其中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人政党对现有选举权的态度问题以及组织工会的问题；在秘密会议上还研究了对松维利耶通告以及对国际工人协会内部进行的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的态度问题。代表大会一致支持总委员会，并赞同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李卜克内西于 1872 年 1 月 10 日写信给恩格斯，告知代表大会的决定：“大会开得很好……在代表们的秘密会议上，一致决定在反巴枯宁派的斗争中支持你们，并委托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1872 年 1 月 23 日马克思把代表大会的决定通知总委员会。——612。

481　1871 年 12 月 24—25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讨论松维利耶通告时不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拟定协会新章程草案。关于代表大会的简短报道发表在 1871 年 12 月 31 日《国际报》第 155 号上，标题是：《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612。

482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报纸，1871 年至 1876 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612、619。

483　1869 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之后，在俄国许多城市展开了成立“人民惩治会”这种密谋组织的活动。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联盟”的代表资格证，企图冒充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由于涅恰也夫组织被破获，他使用的冒险手法遂被揭发出来。涅恰也夫逃到国外，口头和通过报刊散布谣言说：他被捕了，但在流放的途中逃了出来，还说有要杀害他的秘密命令。根据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马克思写了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的涅恰也夫密谋无关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70 页）。——612。

484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谈了他从 1873 年开始写的一部卓越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构思。这封信寄到曼彻斯特，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在那里。恩格斯还请马克思把这封信转给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看。在信稿上保留有肖莱马作的边注。——614。

485　恩格斯指 1872 年 9 月 2—7 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 15 个全国性组织的 65 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618、620、657。

486　左尔格于 1874 年 8 月 12 日退出总委员会。他在 1874 年 8 月 14 日把此事告知恩格斯；他正式退出是在 1874 年 9 月 25 日。——619。

487　1875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德堡，送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去上寄宿中学，白恩士在那里从 1875 年 11 月住到 1877 年 3 月。恩格斯同妻子在 1875 年 11 月 6 日返回伦敦。——621。

488　彼·拉·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发表在 1875 年 9 月 15 日《前进！》第 17 号上，没有署名。——621。

489　这封信中下面的基本内容和《自然辩证法》中的札记《为生活的斗争》（见本卷第 371—373 页）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621。

490　罗·比尔（罗·拜尔的笔名）的小说《三次》刊载在 1875 年 10 月至 11 月《海陆漫游》周刊第 4—8 期上。——622。

491　1876 年 8 月 12 日，迪斯累里得到了贝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爵位，并从这时起成为上院的保守党领袖。——626。

492　《未来》是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1877 年 10 月至 1878 年 11 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是它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想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的企图。——627。

493　由于杜林派在 1877 年哥达代表大会（见注 495）上进行攻击，布洛斯在 187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6 日期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真对德国党的同志们生气了。布洛斯指出，德国工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他还写道，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望已经比他们自己所能想象的高得多。——628。

494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72—577 页）于 1847 年 6 月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拟定，经过同盟各支部讨论后重新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 1847 年 12 月 8 日批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与了该章程的起草工作。——628。

495　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 年 5 月 27—29 日）5 月 29 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见注 561）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了下列提案：“代表大会声明，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尔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他断言，刊登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失策，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是杜林的著作对社会民主党都是有益的。奥·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的提案：“鉴于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的巨大篇幅及其续编大概将具有同样的篇幅；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开始的反对杜林的论战，使后者及其拥护者有权作同样详细的答复和有权同样广泛地利用《前进报》的篇幅；涉及纯粹科学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代表大会决定：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而以小册子形式加以发表。同样，也停止在正刊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斯特的提案和瓦尔泰希的论断。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发表了下述声明：“关于发表恩格斯著作的决定是在 1876 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并且这项决定是由于‘杜林派’的挑动而作出的。某些人觉得这些论文太长。

但是，本来就不能要求《前进报》编辑部给恩格斯这样在科学上只有马克思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规定应当写多长或写多短。这些论文的篇幅应当是大的，因为这关系到要全面击退杜林在他的长篇大论中进行的攻击，并且要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驳倒他的整个体系。恩格斯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报》科学附刊上或在科学《评论》（《未来》杂志）上或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刊登在《前进报》附刊上。——628。

496　布洛斯在 187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6 日期间的一封信中告诉马克思，《北德总汇报》在几篇社论中都谈到“马克思博士和贝克斯神父之间的互相配合”；并且表示要经常给他寄这个报纸。——629。

497　威·白拉克 1878 年 4 月 26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至于俾斯麦的计划，我仍然认为，应该坚决反对。老实说，如果他能够实行铁路法案，我将感到高兴；烟草专卖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仍旧认为，党参与实现这类措施的任何做法都是荒谬的。”——629。

498　这封信里谈到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运输和通讯工具转归国家所有的论点，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中有更详细的阐述。这一章发表于 1878 年 5 月 26 日《前进报》附刊，关于国有化的注（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628 页）是在该书 1886 年再版时增加的。——629。

499　尼·卡列耶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 年莫斯科版。这本书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征得作者同意后转寄给马克思的。——631。

500　妻的动产是从罗马法时期以来就有的法律术语，指的是一种特殊财产、妻子的不在嫁妆之内的财产。——632。

501　显然马克思是指丹尼尔逊 1879 年 2 月 5 日的信。丹尼尔逊在 1879 年 3 月 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这封信。丹尼尔逊自己在信中写道，在 2 月 5 日寄信的同时，他还给马克思寄了关于“近十五年来”俄国财政政策的资料以及大批书籍，其中一部分是珍本。

丹尼尔逊在收到马克思这封信以后，曾在 1885 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资本论》第 2 卷序言中引用过此信的部分内容。——632。

502　指 1844 年银行法令。为了防止发生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局面，英国政府在 1844 年根据罗·皮尔的倡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英格兰银行的法律，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银行券用黄金保证的定额。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得超过 1400 万英镑。然而，尽管 1844 年银行法令已生效，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额实际上并不是依据抵补基金而是依据流通领域中对它的需求来决定的。在经济危机期间，对货币的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曾被迫使 1844 年法令暂停实行，并扩大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634。

503　委托销售（consignatio，意为签署，书面证明）。它是在国外委托出售商品的一种形式。出口商（委托者）把商品运往国外的商行（销售者）的货栈，委托后者依一定条件代为出售。——634。

504　指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他在彼得堡出版的杂志《欧洲通报》（见注 336）1872 年 5 月号上匿名刊登了一篇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对考夫曼这篇文章的看法，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 版跋（本选集第 2 卷第 109—113 页）。——637。

505　指 1878 年 5 月 11 日和 6 月 2 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有利借口。——639。

506　讲坛社会主义者是 19 世纪 70 至 90 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以便排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640。

507　卡·考茨基在他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一书（第 169 页）中援引莱·欧拉的计算法，按照这种计算法，从纯粹理论上说，十二年多一点时间，人口会增加一倍。恩格斯在作复利计算时把一个克劳泽定为 1/60 盾。——641。

508　斐·多·纽文胡斯在 1881 年 1 月 6 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对一个问题作出回答，即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纽文胡斯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这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大会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允许在当地举行大会，所以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 1881 年 10 月 2—12 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12 个国家的代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的问题。大会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各国社会党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结束。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643。

509　海外贸易公司是 1772 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 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644。

510　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作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 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 年 5 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定纲领的实践部分。纲领发表于 1880 年 6 月 30 日《平等报》，1880 年 7 月 10 日《无产者报》和 1880 年 7 月 20 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 年

在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634—636页。法国工人党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鲁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645。

511　《平等报》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断续地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期），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本应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在1886年只出过一期。每一种专刊都有它的刊名。8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该报于1889年2月重新出版。——646。

512　套用亨·海涅《时代的诗》里的一首诗《安心》中的说法：“德意志是温驯的幼儿园，不是罗马的凶手窝。”——648。

513　指从1879年延续到1882年的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那些最后的事件，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已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的英法资本家对埃及进行殖民掠夺。运动的导火线是英法代表以债权强国的身分于1878年进入埃及政府（当部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以曾经提出过“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口号的阿拉比帕沙上校为首的进步军官的代表。由于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埃及总督（执政者）被迫于1881年9月实行宪制；12月埃及召开了国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1879年成立的“祖国党”，它是那些对外国资本的把持感到不满的自由派的地主和商人同依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祖国党”的目的是要实现埃及独立并在国内建立宪制。1882年2月，埃及组成了一个民族政府（阿拉比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它开始解除外籍官员在埃及担任的职务，并计划实行民主改革。但是，1882年夏天，英国挑起了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反对埃及的军事行动，虽然埃及军队（在阿拉比率领下）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抵抗，结果还是英国侵略者获得了胜利。英国占领者在1882年9月占领开罗以后，对民族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埃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抗议英国进攻埃及和炮轰亚历山大里亚的公开集会，是盖得派的中部联合会在《公民报》编委昂·布里萨克、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的参与下，于1882年7月底在巴黎组织的。盖得派关于埃及问题的决议，向阿拉比帕沙和“祖国党”表示敬意，认为他们无愧于自己承担的伟大任务。——649。

514　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纳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1882年9月25日在圣艾蒂安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阿纳，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见本卷第650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

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

1882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 日在罗阿纳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 1880 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阿纳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分布在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650、652、653。

515　指法国工人党兰斯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决定和巴黎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的决定。

兰斯代表大会于 1881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6 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 44 名，其中绝大多数是马隆和布鲁斯的机会主义派别的走卒。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马隆和布鲁斯的创议而于 1881 年 10 月中旬成立的法国工人党民族委员会。

在兰斯代表大会上，马隆和布鲁斯力求通过自相矛盾的关于“最低纲领”的决定。代表大会认为这个纲领“不完全”符合“劳动者的意图”，它实际上由于选区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委员会都被赋予制定自己纲领的权利而被取消了。但是，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决定在新的纲领通过以前这个纲领仍然有效。这一决定旨在反对联合在由茹尔·盖得领导的《平等报》周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机会主义一翼的首领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指望迫使盖得派首先公开起来反对他们，然后指责盖得派搞分裂活动并把盖得派作为分裂主义者开除出党。

中央联合同盟代表大会于 1882 年 5 月 14—21 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平等报》代表被开除出党。——650。

516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在 1880 年起草、并由勒阿弗尔党代表大会（1880 年 11 月）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导言。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得和拉法格拟定的纲领的实践部分虽被代表大会通过，但接受了马隆提出的某些使纲领大为逊色的修正。——650。

517　激进派是 19 世纪 80—90 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 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651、734、736。

518　福尔马尔在其《废除非常法吗？》一文的第二部分曾谈到“反对派的和自由派的‘稀粥’”。——651。

519　指两个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合并是 1875 年 5 月 22—27 日在哥达的合并代表大会上实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抱肯定态度，但是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

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共同意见反映在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18—28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 1875 年 5 月 5 日给威·白拉克的信以及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295—327 页）中。——651。

520　恩格斯指的是奥·倍倍尔的文章《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这篇文章发表在 1882 年 10 月 1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294）第 42 号上，旨在批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倍倍尔主要是对福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见注 518）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作者在那里号召采取暴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谴责了这一策略，认为这对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 1882 年 10 月 1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像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谨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给党的队伍招致不必要的牺牲。——652。

521　拉萨尔关于“只是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 1875 年 5 月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工人党的纲领中。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306—308 页）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进行了批判。——652。

522　恩格斯这封信是为了回答范派顿 1883 年 4 月 2 日来信而写的；范派顿说，不久前举行纪念马克思的游行时，约·莫斯特及其拥护者声称，似乎莫斯特个人同马克思交往密切，曾在德国协助过《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似乎马克思赞扬了莫斯特所作的宣传。恩格斯把自己的信用德文发表在 1883 年 5 月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1 号《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85—388 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摘引了范派顿上述来信中的一段话。——656。

523　所谓各旧州是指瑞士的山区各州，这些州在 13—14 世纪是瑞士联邦的基本核心。——660。

524　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意见并且根据自己研究积累的许许多多和各种各样的材料，在两个月时间内（1884 年 3 月底至 5 月底）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见本卷第 18—179 页）。恩格斯关于泰罗和拉伯克著作的批评性意见，见他为 1891 年出版的此著德文第 4 版所写的序言（见本卷第 4—17 页）。——661。

525　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 294）发表的两篇文章：1884 年 3 月 13 日第 11 号上作为社论刊载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纪念三月战斗》和 1884 年 3 月 20 日第 12 号上以《论人民党的自然历史》为题的社论。——661。

526　1884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4 日，恩格斯在黑斯廷斯（英国南部海滨）德国民主派政论家西·波克罕家中作客。——662。

527　1884 年 5 月 29 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写信给恩格斯说，《新时代》（见注 3）杂志编辑部内，考茨基同出版者狄茨及一批撰稿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暂时不要在该杂志上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662。

528　抱怨派是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在这里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叫作抱怨派。——663。

529　指 1875 年 5 月在哥达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中包含着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许多让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 1875 年 3 月 18—28 日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和 1875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295—327 页），都对这个略加修改便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草案作了评述和分析批判。——663。

530　《新世界。大众消遣画报》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杂志，1876 年至 1883 年在莱比锡出版，后来在斯图加特和汉堡出版到 1919 年；1876 年至 1880 年威·李卜克内西任该杂志编辑；在 70 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665。

531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评论了考茨基驳施拉姆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奥·施拉姆曾把他的《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一文的手稿送到《新时代》（见注 3）杂志编辑部发表，他在该文内猛烈攻击以前在该杂志发表的考茨基的一篇文章《洛贝尔图斯的<资本>》。施拉姆的文章和考茨基的题为《答复》的答辩文章，发表在 1884 年《新时代》杂志第 11 期上。——666。

532　1881 年 3 月 13 日，民意党人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彼得堡刺死了俄皇亚历山大二世。——670。

533　恩格斯指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中一再使用的说法，即俄国的公社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670。

534　指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以下的一段话：“我认为，俄国革命的位能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如果说反动势力日益抬头，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把这种位能变成动能。”——670。

535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2 卷中的说法。黑格尔在那里解释“苏格拉底式的讽刺”时作了如下评论：“所有的辩证法都承认应该承认的东西，好像真是如此似的，然后让它的内部解体自行发展，——这可说是世界的普遍讽刺。”——671。

536　这封信是对卡·考茨基的母亲敏·考茨基 1885 年 10 月 15 日来信的复信，敏·考茨基是 1885 年夏天在伦敦同恩格斯认识的。——672。

537　指非德籍波兰人被驱逐出普鲁士东部各省一事。1885 年 11 月 26 日波兰党团就此向帝国国会提出质询，这个质询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在 1885 年 12 月 1 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俾斯麦宣读了威廉一世的通告，宣称这个问题属于普鲁士政府的职权范围，帝国国会不能讨论。倍倍尔在同一天的会议上发言，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支持这个质询的理由，并指出这个问题属于国会的权限，必须进行讨论等。最后帝国国会在 1886 年 1 月 15—16 日就此进行了一场辩论。——675。

538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给费边社的一个领导人爱·皮斯的回信的草稿。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

费边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 1884 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组织。它的主要首领是悉·韦伯和比·韦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 3 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676。

539　《社会主义者报》是一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1885—1892 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679。

540　《人民报》即《纽约人民报》，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78—1932 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90 年代海·施留特尔曾为该报撰稿。——679。

541　救世军是英国的宗教慈善组织，1865 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创立。该组织的活动后来扩展到其他国家（1880 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开始采用这个名称）。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进行广泛的宗教活动，建立了一

整套慈善机构。——682。

542　恩格斯这里指的是 1832 年 6 月 5—6 日的巴黎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团体；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原来所在的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失去的幻想》和中篇小说《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绘了“在圣玛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克莱蒂安。巴尔扎克称他为“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684。

543　恩格斯指的是 1876 年成立的丹麦社会民主工党的改良主义多数派和以特里尔及尼·彼得逊为首的革命派之间的斗争。聚集在《工人报》周围的“革命派”反对该党机会主义派的改良政策，为把该党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斗争；1889 年中央理事会把特里尔和彼得逊开除出党。革命少数派于是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错误这个组织未能发展成为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685。

544　农民党（左派党）是 1870 年建立的丹麦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在 20 世纪，该党代表大地主、中等地主和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686。

545　指 1875 年开始的丹麦的宪法冲突。冲突的实质是组成议会多数派的农民党力图在宪法上限制国王的权力。组成政府的民族自由党人和议会多数派之间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财政问题上。丹麦议会以宪法第 49 条关于未经议会决定不得征收任何税款为根据，从 1877 年起经常否定政府提出的预算。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便实行临时预算等等，广义解释宪法第 25 条，这一条授权国王必要时得以颁布临时法律。冲突一直继续到政府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在 1894 年达成协议为止。——687。

546　物质力量派是宪章运动两个派别中一派的通称。和道义力量派相反，物质力量派运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主张宪章运动的独立性，防止宪章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危险。这一派的领导者是奥康瑙尔、哈尼、琼斯等人。——687。

547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变动，这些变动发生于 1889 年 9 月，反映了党内不同派别的斗争。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中去掉了罗森堡、欣策、骚特和葛利克，选进了舍维奇、赖默、易卜生和普拉斯特。这就导致了党的分裂，例如 9 月底和 10 月 12 日在芝加哥分别召开了两个单独的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分裂的表现。由聚集在《纽约人民报》周围的党员召开的 10 月 12 日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反映党的先进一翼的观点的新党纲。——687。

548　鉴于 1890 年 9 月 16 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恩斯特的文章，他歪曲恩格斯的意见，企图把恩格斯说成和“青年派”持有一致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93—99 页），其中附有恩格斯这封信的部分内容。——688。

549　《德意志言论》是奥地利的一家经济和社会政治杂志，1881 年至 1904 年在维也纳出版；1881 年至 1883 年 6 月是周刊，1883 年 7 月起改为月刊。——690。

550　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1890 年 6 月 14 日至 7 月 12 日《柏林人民论坛》在总标题《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己》下面连续

刊载了纽文胡斯、恩斯特、费舍以及署名“工人”的文章和这一辩论的结束语。

《人民论坛》即《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1887 年至 1892 年出版。——691、721。

551　伯尼克准备作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1890 年 8 月 16 日写信给恩格斯，请恩格斯回答，在社会各阶级的教育、觉悟水平等等方面目前存在差别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改造是否适宜和可能。伯尼克的第二个问题涉及燕妮·马克思的家庭出身。——693。

552　1890 年 3 月底，柏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席佩耳，公布了题为《五月一日应当做些什么？》的呼吁书，号召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总罢工。这一呼吁书反映了“青年派”的立场。“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 1890 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 年 10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党的领导在社会民主党党团 1890 年 4 月 13 日《告德国男女工人书》中，对上述呼吁书作了回答。——695。

553　《苏黎世邮报》是瑞士的一家民主派日报，1879 年至 1936 年出版。——698、706。

554　恩格斯指 1842—1844 年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实习经商。这几年在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699。

555　恩格斯说明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意图、揭露拉萨尔真面目的这封信，虽是写给考茨基的，实际上是写给倍倍尔看的。恩格斯在同时给考茨基的另一封短信中写道：

“礼尚往来：鉴于你把倍倍尔的信寄给了我，我就把附上的信写成这样，以便你也可以把它寄给倍倍尔，假如你出于和好的考虑同样认为这合适的话。此事完全请你酌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35 页）——705。

556　《工人报》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 年至 1893 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1894 年每周出版两次，从 1895 年 1 月 1 日起每天出版；编辑是维·阿德勒；在 90 年代，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706。

557　1891 年 2 月 6、7、10 和 12 日《萨克森工人报》转载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加了编者按，指出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特殊的意义。

1891 年 2 月 6 日，维也纳《工人报》的一篇柏林通讯写道，恩格斯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通讯还指出，现在“在纲领中十分明确地、毫不妥协地阐明我们党的

理论原则的时候到来了，在此刻公布这个文件也是完全适时的。”

1891 年 2 月 10 日《苏黎世邮报》（见注 553）发表了一篇由弗·梅林起草的社论《艰苦的努力》，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一著作的发表，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力求以其固有的客观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阐明自己的斗争目标，表明了党的威力和战斗力。——706。

558　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 1891 年 2 月 13 日《前进报》（见注 561）发表了一篇由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社论，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试图削弱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要证明哥达合并大会的妥协纲领是正确的。

1890—1891 年《新时代》（见注 3）第 21 期转载了这篇社论，并加了一个简短的引言。编辑部加的一个脚注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把马克思的这封信提交党的领导机构或国会党团审查批准……发表的责任只由我们承担。”——706、708。

559　指威·李卜克内西在 1890 年 10 月 12—18 日于哈雷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报告。在分析哥达纲领时，李卜克内西不指明出处地引用了马克思批判纲领的某些论点。

根据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为将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公布，以便在地方党组织和报刊上讨论。——706。

560　指拉萨尔在 1846—1854 年办理的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拉萨尔过分夸大了这件为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成员作辩护的诉讼案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事业而斗争相提并论。——707。

561　《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 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 1891 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 90 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

562　在 1891 年 2 月 20 日的信中，理·费舍把党的执行委员会关于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决定通知恩格斯，征求他的同意并请他写序言。——709。

563　“从无通过无到无”引自黑格尔的著作《逻辑学》第 1 部第 2 册；《黑格尔全集》第 4 卷 1841 年柏林第 2 版第 15、72、146 页。——709。

564　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 1891 年 10 月 6 日《前进报》（见注 561）第 233 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发现的“反动的一帮”是拉萨尔的论点，曾写入 1875 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最后，代表大会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删掉了关于“反动的一帮”的段落。——710。

565　指 1891 年 10 月 14 日至 21 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首要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代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格尔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这个集团的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新纲领。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严重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712。

566　显然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的结束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6页）。

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的同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被击溃而告终，普鲁士（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投降了拿破仑法国。这次失败暴露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712。

567　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了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纳、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

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717、719。

568　波鸿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巴雷因为企图漏税而隐瞒公司收入、伪造印章和提交质量低劣的铁轨而被控告。——717。

569　勒韦公司兵工厂的厂主故意向国家提供劣质武器，同时对国家高级官员进行贿赂。海·阿耳瓦尔特在他写的小册子《新的揭露。犹太人的枪》（1892 年德累斯顿版）中，揭露并谴责了这个犹太人工厂主。——717。

570　1892 年对罗马银行检查的结果表明，这个银行违法发行了价值 13 300 万的纸币（限额是 7000 万），并且用一大笔款项贿赂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以及其他接近政府的人员。参见恩格斯《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18—426 页）。——717。

571　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弗·雅·施穆伊洛夫在 1893 年 2 月 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应彼得堡《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者巴甫连柯夫的要求，准备写一本篇幅 6 至 8 个印张的详细的马克思传记。施穆伊洛夫请求恩格斯提供一些有关材料：（1）传记本身；（2）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特别是 1847—1849 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时期；（3）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施穆伊洛夫还请求恩格斯求给他寄去一本《神圣家族》，如不可能，则把主要内容告诉他，或者摘出书中要点寄给他。他写道，如果在俄国不能发表这本著作，那他就在国外把它印出来；但是施穆伊洛夫并未实现他的愿望。——720。

572　《柏林人民论坛》（见注 550）从 1892 年 8 月 6 日至 12 月 24 日发表了系列文章《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作者的名字——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蒂埃在最后一篇文章才出现。这组文章依据巴枯宁的材料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企图为巴枯宁派，尤其是巴枯宁派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活动辩护（汝拉联合会是在 1870 年 4 月 4—6 日拉绍德封代表大会上从瑞士罗曼语族区国际各支部中分裂出来的）。这组文章还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菲·贝克尔进行诽谤。特别是 1892 年 11 月 12 日发表的第 10 篇文章中有很多歪曲事实的地方。

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登完，就予以反驳。他于 1892 年 11 月 15 日把声明寄给奥·倍倍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514 页）。声明发表在 1892 年 11 月 19 日《柏林人民论坛》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05—408 页）。

1892 年 12 月 24 日，该报在最后一篇即第 13 篇后面还刊登了埃里蒂埃的答复。埃里蒂埃在答复中，以及在 1892 年 11 月 25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企图反驳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恩格斯给埃里蒂埃的回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10—12 页。——721。

573　见恩格斯 1891 年 10 月 29—31 日、1892 年 3 月 15 日和 9 月 22 日给丹尼尔逊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193—196、304—308、464—468 页）。——722。

574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251 页；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版本，俄文译文与德文原文有一些差别。——724。

575　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于 1893 年作为附录刊载在他的《莱辛传奇》第 1 版中。——725。

576　恩格斯改写《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83—483 页）和扩写德国史的愿望，因忙于《资本论》的出版及其他待写的文章而未实现。保存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48—460 页。——729。

577　勃艮第大公国是 9 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成立的，后来并入大片领土（弗朗什孔泰，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在 14 至 15 世纪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15 世纪下半叶在大胆查理大公时代达到鼎盛。力图扩张自己属地的勃艮第大公国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贵族和法国封建主结成联盟，一起抵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且对瑞士人和洛林进行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艮第。在反对联盟的战争中（1474—1477 年）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在南锡附近的会战（1477 年）中战死。他的属地被分给路易十一和德意志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729。

578　1894 年 1 月 3 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 1894 年 3 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卡内帕来信的页边上写了这封回信的草稿。其中的一段引文，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294 页。——730。

579　《社会评论》是意大利的一家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刊物；1891 年至 1924 年用这个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屠拉梯；在 19 世纪 90 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显著作用。——730。

580　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 年 8 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掌握在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手中。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 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 1884 年 12 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 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 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 582）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735。

581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它是由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在 1876 年费城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移民），同美国基本工人联系很差。党内斗争在由拉萨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最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政党。——735。

582　独立工党是 1893 年 1 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拉德福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基·哈第。该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

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1900 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735。

583　《工人领袖》是英国的一家月刊，1887 年起出版，最初刊名是《矿工》，1889 年起改用本名称，是苏格兰工党的机关刊物；1893 年起是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1894 年起改为周刊；在 1904 年以前，该刊的编辑是基·哈第。——736。

584　自由党人合并派是主张保持同爱尔兰合并的一派，是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于 1886 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736。

585　地方自治是 19 世纪 70 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即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容许爱尔兰实行自治。实施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在主要阵地控制在英国统治集团手里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736。

586　1895 年 7 月 12—29 日英国举行了议会普选。选举结果，保守党人在下院获得 150 个席位，超过半数。独立工党的候选人，包括基·哈第在内，都落选了。——736。

587　指福尔马尔 1894 年 10 月 25 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 589）上的发言。关于这篇发言的报道，发表在 1894 年 10 月 26 日《前进报》（见注 561）第 250 号附刊（1）上。——737。

588　1894 年 11 月 14 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批评了福尔马尔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 589）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他还批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倍倍尔的发言刊登在 1894 年 11 月 16 日《前进报》（见注 561）第 268 号上，还转载在 1894 年 12 月 1 日《社会评论》第 23 期上。——738。

589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于 1894 年 10 月 21—27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 1895 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 1894 年 10 月 31 日《前进报》（见注 561）第 254 号。——738。

590　1894 年 11 月 23 日《前进报》（见注 561）第 273 号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我们的内部状况》，作者可能是李卜克内西。紧接着该报在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短文《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讨论》。它实际上是社论作者的更正。其中写道，社论说的仅仅是“倍倍尔对整个协商过程以及党代会的思想水平……的悲观评论”，《前进报》编辑部对此是根本不同意的等等。

——739。

591　《法兰克福报》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的简称，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 年至 194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1866 年起用这个名称。——740。

592　1895 年 5 月，恩格斯写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003—1030 页）。——743。

593　西法兰克王国是在查理大帝帝国瓦解后建立的，该帝国是一个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盟。843 年帝国在查理的三个孙子之间发生了最后的分裂。其中一人秃头查理得到了瓦解的帝国的西部领土，包括现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东的土地（后来德国的核心）交给了德意志的路易，从北海到中意大利之间的地带则归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掌管。——746。

594　耶路撒冷法典是 1099 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后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法律文献汇编；该法典于 12 世纪下半叶完成。——747。

595　《中央导报》即《社会政治中央导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报；1892 年至 1895 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出版者是亨·布劳恩；1895 年同《社会实践报》合并后改名为《社会实践》。——747。

596　指拉法格的两篇文章：《略驳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批评》和《拉法格的回答》，发表于 1894 年 10 月 16 日和 11 月 16 日《社会评论》（见注 579）第 20 和 22 期。这两篇文章是对某些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回答，这些经济学家支持洛里亚在《卡尔·马克思的遗著》一文（发表于 1895 年 2 月 1 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第 3 集第 55 卷第 3 期）中提出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3 卷的观点。——748。